

中州大学学报

ZHONGZHOU DAXUE XUEBAO

双月刊

《中州大学学报》编辑委员会

主 任 白仲虎

副 主 任 张建伟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 莉 万陆洋 王 代 王宇飞 王 菲 王焕锋

叶大萌 白仲虎 冯 美 吕志元 任 珂 刘 戈

刘海燕 刘秋菊 杨庆年 李玉玲 吴 炯 张 军

张枝梅 张建伟 陈凤菊 姜冬梅 姚 虹 徐自立

徐传波 郭 凯 曹发军 焦红波 谭笑风

主 编 张建伟

执行主编 曹发军

副 主 编 李玉玲 刘海燕

封面题字 陈 云

执行编辑 刘成贺

中州大学学报

双月刊

第 43 卷 第 2 期

2026 年第 2 期(总第 187 期)

目 次

· 文艺学与文学评论 ·

生态潜意识视域下的灾难叙事

——论加缪《鼠疫》中的集体心理与生态观念 常如瑜(1)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小说的爱情叙事研究 陈 铎(8)

历史的烟尘与命运的追问

——论孙瑜长篇小说《隐入高原》 查博文(14)

· 经济与管理 ·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区域协同路径研究 周书焕,柴刘锦(20)

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青年生育意愿的性别化图景:基于 CFPS2022 的实证研究 郭璟璇(27)

数字经济背景下上海市跨境数字贸易发展对策研究 常燕军,张世尚,伍贺徽(34)

水利工程造价咨询职业风险与防范措施 贾连双(39)

· 政治与法律 ·

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出场逻辑、实践模式与优化路径 梁超锋(45)

“数治”赋能城乡协同的“法治”逻辑、困境与路径 牛锦红(51)

· 社会与历史 ·

毛泽东《论持久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维创新及现实启示 张 文,石 聪(58)

2026 年 4 月 20 日出版

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的多维建构 曲翊佼(65)

焦裕禄精神的传统文化意蕴与当代启示 马伟胜(72)

· 传媒与艺术 ·

困境与破局:新媒体时代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 许振波,曾晓敏(77)

传统吉祥纹样数智化生成与应用优化进路 杨 杰,潘媛媛(83)

· 教育与教学 ·

和谐社会视域下大学生生命观教育内容的充实和发展 张 培(91)

应用型本科高校化学化工类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究 李玉玲,张 琳,王焕锋,赵建波,王利平(97)

黄河文化融入化工专业社会实践协同育人研究 孙浩冉,杨 格,王宇飞(103)

人工智能时代中国就业市场“英语+”能力需求分析与英语专业人才培养范式转型探析

——基于“智联招聘”数据的实证研究

..... 何 芳,张国强,黄河玥,郭晋茹,殷 洁(108)

黄河文化融入“西方经济学”课程的价值意蕴及路径研究 彭云龙(115)

· 数理工程技术研究 ·

浅部缩径对 2x2 群桩竖向承载特性影响的透明土模型试验研究 杨庆年,郭兆翔(120)

面向竞赛教学的通用型机器人设计 周 振,肖 丽,孙 冬,于泽琦,张晓冬(124)

MAIN CONTENTS

Disaster Narra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Subconsciousness;On the Collective Psychology and Ecological Thoughts in *The Plague* CHANG Ruyu(1)

A Study of Love Narrative in Chinese Novels Since the 1990s CHEN Duo(8)

Study on the Regional Collaborative Paths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Governance in the Water Source Area of the Middle Route of the South-to-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ZHOU Shuhuan, CHAI Liujin(20)

The Gendered Landscape of Fertility Intentions Among Chinese Youth in the Context of Low Fertility: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FPS2022 GUO Jingxuan(27)

Party Building Leading Efficient Grassroots Governance: Emergence Logic, Practical Model and Optimization Path LIANG Chaofeng(45)

The Rule of Law Logic, Dilemmas and Paths of Urban-rural Synergy Empowered by Digital Governance NIU Jinhong(51)

Three-dimensional Innovation of Marxism Sinicization in Mao Zedong's *On Protracted War* and It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ZHANG Wen, SHI Cong(58)

Dilemma and Breakthrough: The Inheritance of Huizhou Traditional Village Culture in the New Media Era XU Zhenbo, ZENG Xiaomin(77)

Enric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Life Outlook Education Cont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ZHANG Pei(91)

Research on Innovative Talent Training Mode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LI Yuling, ZHANG Lin, WANG Huanfeng, ZHAO Jianbo(97)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Shallow Necking on Vertical Bearing Characteristics of 2×2 Pile Groups Based on Transparent Soil Model YANG Qingnian, GUO Zhaoxiang(120)

生态潜意识视域下的灾难叙事

——论加缪《鼠疫》中的集体心理与生态观念

常如瑜

(江苏理工学院 文化与旅游学院, 江苏 常州 213001)

摘要:加缪的《鼠疫》以瘟疫为主题,瘟疫带来的不只是身体的病痛,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恐慌。这部经典作品描绘的场景,使读者在集体潜意识层面深度反省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从精神分析心理学角度来看,人类集体潜意识之中蕴藏着生态潜意识,生态潜意识是人类对自然的全部情感的积淀与汇聚。《鼠疫》反映了加缪对生态问题的探索,是一部深度反思人类生态潜意识的作品。

关键词:灾难叙事;加缪;《鼠疫》;荣格;集体潜意识;生态潜意识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2.001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2-0001-07

描绘瘟疫及瘟疫引发的社会现象,历来是文学灾难叙事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薄伽丘的《十日谈》到加缪的《鼠疫》,大量作品都以瘟疫为题材,对人类的社会问题和思想观念进行探讨。二十世纪以来,尽管人类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医学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应对瘟疫,但疫病对人类心灵的影响并未削弱。焦虑、恐惧及由此产生的各类负面情绪,仍对人类集体的心理平衡与精神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鼠疫》迫使人类深入思考自我的存在问题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从那一刻起,可以说鼠疫已经成了我们大家的事。”^{[1][2]}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该作品在思想内涵上同卡尔·荣格(Carl Gustav Jung)的集体潜意识理论不谋而合,因而可以借助荣格的理论对《鼠疫》进行解读。荣格认为,潜意识对人类精神生活起着重要影响^{[2][4]}。人类社会对自然的认识,也必然受到潜意识的深刻影响。瘟疫带来的不只是身体上的病痛,还触发了压抑在集体心灵深处的精神病症。这种病症源于人类的集体生态潜意识——蕴藏在集体潜意识之中,是人类对自然的全部情感的积淀与汇聚。生态潜意识是一种潜在的集体心理机制,它

并非时时显现,仅在某些特殊情境下,如瘟疫来临时,才被意识察觉并对其产生作用。

人类对待自然的行为具有群体性特征,生态潜意识反映了人类集体对自然的认知、理解及相应情感。自古以来,不同时期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层层叠加,随着人类个体的遗传和群体文化的代代相承,最终凝结为集体心理中最难以撼动的部分,其过程类似于意识逐渐下潜进而形成集体潜意识的机理^{[2][38]}。生态潜意识不仅影响着人类对自然的情感诉求,更制约着人类对自然万物的意识判断和理性认知。可以说,生态潜意识对人类如何处理自然生态问题具有决定性影响。

一、人类中心主义与绝对平等

人类中心主义是中世纪以来逐渐形成并成为人类普遍持有的集体性观念之一。尽管这一观念源自西方,却随着西方现代科学和理性精神的传播,深刻影响了现代东方社会思潮。它将人类置于一切自然存在的中心与生物进化的顶点,虽曾助力人类从中世纪的卑微处境中挣脱出来,在“人类纪”时代^[3],却成为阻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集体心理障碍。因此,对人类中心主义及其思想主张的反思,是探讨灾

收稿日期:2025-12-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荣格文论思想中的中国元素研究”(24YJA751001)

作者简介:常如瑜(1982—),男,山西太谷人,博士,江苏理工学院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跨学科研究等。

难叙事与生态潜意识关系的起点。

自我中心主义曾让人类陶醉于征服世界的狂妄幻想当中。作为优胜劣汰后的胜利者、食物链顶端的主宰者,人类认为自己拥有支配一切非人类生命运的权力,认定所有非人类生物都应当为人类的生存服务。这种心理重塑了集体意识,消解了对自然的敬畏,建立起一座坚固的意识堡垒,将对自然神秘力量的敬畏与忧惧,全部封存于潜意识深处。

在瘟疫暴发后,人类的盲目自信便受到重创。瘟疫击碎了自我中心主义构建起的堡垒,突破了物种之间的屏障,真正实现了自然万物的“绝对平等”——在瘟疫面前,人与人平等,人与非人类生物亦平等。正如加缪所说,在瘟疫编织的牢笼里,“绝对公正正在牢狱里占了优势”^{[1]191-192}。历史上,人类活动反而是导致鼠疫暴发和传播的重要原因。例如,古代蒙古铁骑对世界的征服活动就成为鼠疫等细菌扩散的“帮凶”^{[4]96},现代西方殖民者也给很多原始部族带来了各种瘟疫。

鼠疫是一种古老的传染病,起源于鼠类,能够给人类社会造成毁灭性打击,并带来持续性影响。它引发了广泛的世界性恐慌,给一些拥有古老文明的族群带来了长久的心理创伤。从神话传说开始,人类就将“瘟疫这种原本属于正常生命演化过程”的自然现象^[5],描绘为可怖神灵降下的灾祸。随着现代生物学的发展,理性取代了盲从,但“天降灾祸”的世界观,对人类集体心理的影响却未消失,时常以文学和艺术的象征形式呈现。

《鼠疫》这部作品,生动再现了人类集体心理中的瘟疫记忆。作为描绘现代灾难的小说,《鼠疫》对瘟疫的理解不同于古代神话传说或古典作品,它是在吸收现代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对人类集体心理展开的深度剖析。加缪以鼠疫这一看似极端却十分典型的疫病为例,对人类中心主义观念进行批判。

在《鼠疫》中,加缪将人和非人类生物的关系置于平等的地位——鼠疫面前,众生平等。瘟疫摧毁了人类原本就脆弱的“自尊”,将人类刚刚树立起来的征服自然、掌控万物的信心浇灭。这对人类来说似乎并不公平,但是对于非人类生物和整个自然生态系统而言,却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平等:任何生物都必须遵守同一个生存规则,没有哪一种生物是例外,换言之,每一种生物都享有平等的生存和繁衍的权利。

自然既是温情和美好的,也是残酷的。它不会因一种生物的灭绝而走向崩溃,毫不夸张地说,即便人类因瘟疫灭绝了,也不会对自然造成毁灭性破坏。

如果将目光从人类群体转向广袤的生态系统,站在整个自然宇宙的立场上,自我中心主义观念就会变得十分可笑。属于人类的生态位一旦空缺,短期内就会被其他有机体占据;“鼠疫只是一种普通的生态现象”^{[4]94},人类社会也不过是另一种“自然现象”,两者是平等的。

只有摒弃自我中心主义的光环,不再将人类视作自然万物的中心或食物链的顶端,过度膨胀的集体欲望才能得到控制,失衡的集体心理才能复归,回到生命本真的起点。绝对平等不仅适用于人类群体之间,也适用于人与自然万物之间。鼠疫杆菌本身也拥有特定的生态位,只不过它至今还未在人类纪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态位”。

总之,《鼠疫》证明,人类并没有因拥有理性意识或其他类似的精神元素而高于万物。在瘟疫面前,自我中心主义被迫让位于万物皆平等的观念,无论愿意与否,人类都应当接受人与万物同源同根、本质相近的事实。如果对此置若罔闻,被瘟疫破坏的心灵平衡将难以恢复,人类的集体心灵势必遭到更为严重的损害。

二、生态潜意识的下行:病态情结

被否定的人类中心主义直接导致恐惧、绝望等情绪的滋长,集体心理的下行力量,必然牵引人类意识回归被压抑和尘封已久的生态潜意识世界。人类中心主义的集体心理一旦瓦解,人类对瘟疫的畏惧便接踵而至。正如“死亡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对死亡的恐惧”^[6]。新的集体性恐慌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损害,远甚于瘟疫本身。瘟疫被视作“随时可能对人类进行集体屠杀而形成的可怕灾难”^[7]。与原始人对世界未知力量的恐惧相比,现代人对瘟疫的担忧同样严重影响着人类的集体心理。

身体的疾病有时还可以通过药物来控制,而心理的失衡却会给社会造成持久而巨大的破坏,“原本属于个人的感情……都突然变成了整城居民的共同感情”^{[1]121}。生离死别所带来的痛苦与绝望,给生者造成了莫大的恐慌与无尽的烦恼,它不断唤醒人类集体心灵深处的记忆——那些自远古时期开始便逐渐沉淀下来的、人类祖先对自然神秘力量的畏惧,其中还夹杂着人类对生存繁衍的强烈渴求。裹挟着欲望与恐惧的复杂情感,使人类在面对瘟疫时总显得软弱无力;即便在启蒙理性高度发达的时代,此类病态心理也未能彻底消除。

加缪用“流放感”来形容鼠疫肆虐时人类的集体精神状况^{[1]123}。陷在孤独与回忆中的人群,恍如被流放一般;个体的流放感相互叠加,汇聚成集体的

心理情结。当每个人都感到自身处于流放状态时,人类社会的向心力就会瓦解,集体性的心理病症也会相继暴发出来。人与非人类生物之间的平衡被打破后,人类社会自身亦会遭受损害。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息息相关,而后的破坏,反过来会进一步加剧前者的恶化。环境的改变引发战争,战争又会进一步加速瘟疫的传播。

受控的自然 是病态的,作为掌控者的人类同样也是病态。二者之间缺乏对话机制,彼此高度戒备、互相提防;受控者往往以灾荒、瘟疫等方式回应掌控者的侵害,而掌控者则变本加厉地实施入侵。长此以往,集体性的偏执、焦虑及恐慌,势必在掌控者心灵深处扎根,进而形成难以动摇的集体情结——一种近似于强迫症的群体心理。

在对立状态下形成的集体情结亦是病态的,可简称为病态情结。恐惧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转化为仇恨,就像瘟疫悄无声息降临人间一样,人类也对瘟疫不宣而战。然而事与愿违,瘟疫不仅难以驱逐,其“后援”更是源源不断:旧的瘟疫尚未被彻底消灭,新的瘟疫便接踵而至,人类为此曾付出过惨痛的代价。更令人沮丧的是,科学与理性揭示了一个残酷事实:人类并非这颗星球与生俱来的主人,而遭人厌恶的病毒却拥有远比人类更为悠久的历史。从这一视角看,肆意破坏生态平衡的人类,反倒更像是生态系统的入侵者。

病态情结给心灵造成的压力远远超过暂时的恐慌,因为恐慌能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散,病态情结却会成为人类心灵深处的痼疾,甚至改变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就鼠疫而言,这一灾祸在心理层面笼罩了欧洲数个世纪;即便它停止了大规模传染,关于鼠疫的故事仍不断被载入各类作品之中。无数担忧鼠疫大流行的谶语、预言或传闻在民间流传,病态情结在集体心灵深处投下的阴霾久久不散。

除了鼠疫这类令人恐怖的瘟疫外,人类的病态情结还源于另一些以温情为外衣、以绝望为本质的瘟疫。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为读者呈现了一种特殊的瘟疫模式:起初,迷人的丽贝卡带来的失眠症令那些精力旺盛的人感到兴奋,他们不必再因睡眠耽误享乐,得以时刻沉浸在感官享乐之中^[8]。它如同毒品一般令人上瘾,直到健忘症侵袭患者,人们才惊觉已经无法摆脱这场可怕的瘟疫。无论是以死亡铸造绝望,还是以温情消解意志,瘟疫都唤醒了人类集体潜意识深处的病态情结。

病态情结反映了生态潜意识的下行过程。在瘟疫面前,人类集体心灵深处的原始恐惧被激发,原本

属于自然的善与美均被病态情结所驱逐。生态潜意识遭到理性意识的进一步压抑,无处宣泄、郁积于心,直到最终崩溃,便如洪水般冲破意识的壁垒,又如潘多拉的盒子般释放出种种乱象,对人类集体心理造成严重冲击。

总之,不断累积与叠加的集体性恐慌,最终形成了难以撼动的心理情结,它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打破了社会生态与精神生态的平衡。这种情结虽看不见、摸不着,却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甚至能够影响人类历史的走向。每当瘟疫暴发时,它便会反复显现,引发集体心理的波动;或是滋生焦虑与孤独,或是触发恐慌及其他各类负面情绪。此时,心理治疗的重要性便远超其他精神活动。

三、生态潜意识的上行:英雄情结

假如下行力量无法疏解被压抑的集体负面情绪,集体潜意识就会转而寻找其他出口。恐慌不仅造成集体心理的扭曲,还会催生出具有上行作用的英雄情结,用以调适群体性病态情结。若两种情结之间保持足够的张力,集体心理层面便会形成一种短暂的动态平衡。英雄形象有助于挽救陷入危局的集体精神,这类形象包括殉道者、先知,以及其他能够率众脱离危难的人物。当他们以特定形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时,便幻化为具备集体心理效力的英雄原型。

在不同的作品里,英雄原型的呈现方式(或曰象征方式)虽各不相同,却均遵循某种潜在的、特定类型的叙事法则,是“特定心理意象中的表现形式”^[9]。它源于神话传统中的“相似性”^{[10]16},并在类型化的现代小说中得以复现。加缪以史诗笔法对现实生活进行升华,《鼠疫》也因此被赋予史诗般的光芒。在阿赫兰,古代神话中的英雄再度复活,这一次他们不再以顶盔贯甲的姿态登场,而是身着医生装束,穿梭在被死神扼住咽喉的街巷之间。他们的敌人不再是同类,而是看不见的病毒;他们所面对的凶险丝毫不亚于你死我活的战争,其精神力量亦不输于任何军队统帅。

面对瘟疫,以里厄为代表的阿赫兰的医生们挺身而出,他们为英雄这一概念赋予了新的注解。里厄与塔鲁本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却在族群陷入至暗的时刻,扛起了远超个体能力的重任,他们的出现为绝望中的人们带来了转机。相较于战争中孔武有力的传统英雄,他们看似柔弱,但却以自身的英勇,为在黑暗中彷徨恐惧的人们寻到了方向,为这座被死亡与恐惧裹挟的城市带来了希望之光。

“里厄”们被赋予了西西弗斯式的悲剧性。他

们奋力挣扎、与命运搏斗,并未如西西弗斯一般安于“荒诞中的幸福”^[11],而是在生命的道路上竭尽全力抗争,试图超越循环往复的痛苦与永恒悲剧的宿命。英雄的出现,既是集体的幸运,亦是一种莫大的讽刺。他们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隐藏于人类集体潜意识深处的怯懦与卑微。加缪是宽容的,他没有一味批判或彻底否定集体心理中的阴暗面,反而以人道主义立场疏解因英雄原型塑造而产生的集体性自我否定,用悲悯情怀弥合伟岸英雄与卑微大众之间的落差。更何况,英雄本身也会因疲惫而生出畏惧、冷漠、懈怠乃至逃离之心,这也是正气凛然的英雄形象无法克服的人性缺陷。

加缪敏锐地觉察到这一问题,便在英雄群体中增设了柯塔尔这一角色,即刻丰富了英雄的类型。准确地说,柯塔尔更像是一个“枭雄”——与其他人大相径庭,瘟疫带给柯塔尔的并非绝望,而是希望乃至欲望。在《鼠疫》所描绘的众多人物中,柯塔尔是非常特殊的,他几乎能够脱离集体心理的控制,不同于周围的任何人。他看到灾难之外人类生命的另一种镜像——“假如在过去,那一队队的男女总会竭力掩盖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今,他们却紧紧依偎在一起,在全城招摇过市。”^{[1]209}那些曾在人类社会正常秩序之下无法言说的欲望、难以彰显的恶,都在瘟疫笼罩的黑暗中得以宣泄与释放。柯塔尔觉察到,瘟疫笼罩下有一些情感被其他英雄人物与大众所忽视。如他与塔鲁交好,并非出于维护人类集体的命运,而只是在客观上抚慰了塔鲁等人,振奋了他们的精神。柯塔尔认为,恰恰是瘟疫让他和城里的每个人回归平等关系,大家承担着同样的责任;原本难以忍受的个人恐惧,一旦融入集体,就变得轻松起来。他为对抗瘟疫的英雄们提供了新的思路,间接赋予他们前行的勇气,让他们不再深陷孤独与疲惫,更让他们相信,共同受难的集体能够产生源源不断的情感力量。这种心理上的自欺欺人,反倒让塔鲁等人在精神上放松下来。

英雄情结促使生态潜意识产生有限的上行运动。英雄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恐惧带来的下行压力。加缪以多个彼此相异且在性格上互补的原型形象,组建起一个强有力的英雄联合体。英雄们迫使大众对自身进行反省,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情感关系。在英雄形象的引领下,集体精神逐渐从压抑中复苏。

遗憾的是,英雄无法让人完全摆脱集体潜意识的桎梏。他们对瘟疫的回应,旨在宣泄集体心理的压抑,为深陷恐慌的心灵提供出口,却难以从根本上

驱散瘟疫及其带来的负面心理。困于阿赫兰的人们,无法彻底消除集体性的忧惧。无论是灾难本身,还是灾难过后的记忆,都对脆弱的群体心理产生持久的影响。英雄情结更像是一支兴奋剂,而非特效药;英雄们不过是在危难中被迫挺身而出的“临时解药”,终究无法根治人类集体的精神病症。

总之,《鼠疫》中的“里厄”们既是英雄,又是殉道者。他们试图挣脱集体性的恐慌,以超人的勇气直面强大的集体情结;即便不能彻底扭转集体情结的下行趋势,至少可以缓解集体心理的失衡。英雄情结在意识与潜意识之间保留了对话的可能,避免集体潜意识积累的情结摧垮人类精神。只是,英雄并不能彻底消除集体恐慌,而要驱逐恐慌,还需要更多系统性的集体心理建设。

四、生态潜意识的羁绊:集体霸权

多数情况下,集体潜意识的下行或上行变化往往是被动发生的;长期受压抑的集体潜意识,其反应速度远滞后于生态环境的变化。在瘟疫降临初期,人类行为通常呈现出明显的被动性特征。究其原因,在于社会群体在主观上既不愿接受瘟疫来袭的可怕事实,也不愿在短期内进行相应调整。既定的族群禁忌^[12]、社会制度与文化惯性等因素共同构成了集体心理霸权(以下简称集体霸权),它对个体形成压制,使其屈从于集体利益。

集体霸权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社会生态系统,赋予个体以“集体心理”^{[13]47-48},使其安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生态位,确保集体能够驱使个体履行对集体的所谓义务。被消融的个体性,对于一个需要建立长期稳态的社会集体而言非常有利;具有高度趋同性的个体存在模式,既保障了族群的延续,也抑制了异类的出现与异化现象的发生。即便部分个体对集体即将面临的危机具备较为敏锐的洞察力,也会因集体霸权的强大力量,被动湮没在集体话语之中。原本具备一定自主性的个体也由此被消解了个性,他们随波逐流于集体意识,心甘情愿地服务于集体,并对一切试图改变既定秩序的行为保持警惕。

集体霸权的特性直接决定了群体在短时间内对瘟疫做出反应的可能性较低。一旦外在于人类集体的自然生态环境发生变化,稳态社会就不再利于集体的繁衍。相应地,变化的环境极易引起集体性恐慌,而被消解的个性又很难在短时间内产生新的观念和应对办法。况且,人类的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对自然环境造成影响,人类对自然的介入,往往“会对动态平衡系统造成难以修复的损伤”^[14]。这样一来,瘟疫的发生不可避免,集体所建构的一系列完整

的社会生态秩序就会遭到冲击,有时甚至面临灭顶之灾。

任何一个集体都希望避免此类灾祸,人为控制疫病自然成为最易于接受的方式。就像人类建设的城市那样,生长于其中的一切自然物都处在人类的严格管控之下,无论是样貌、形态、大小,还是繁衍周期,都要按照人类的意愿生长。人类在铲除林木、踏平原野、驱逐野生动物之后,又重新将这些生物“请进”城市,美其名曰人与万物和谐相处,实则是对野生自然物的规训。

不同于受控于城市中的自然物,病毒的存在却像潜意识一样令人难以捉摸。至少在目前人类的医学水平下,大多数病毒仍然处在“野生”的状态。即便人类能够通过生物学手段对病毒基因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只要病毒暴发并流行,人类就很难对其进行有效治疗,人工干预和控制也非常被动。欧洲历史上就曾暴发过多次大规模的鼠疫,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死亡。而瘟疫本身从发生到结束也都十分突然,原因难以考证。《鼠疫》中的场景,正是对欧洲乃至整个人类抗击瘟疫史的生动再现。

人类社会对能否控制鼠疫这类病毒引起的瘟疫充满了集体性的焦虑,为了抵御这些未知的威胁,社会群体只能进一步加强话语霸权和行为霸权,将个体统摄于集体观念之下,要求每一个个体遵守集体的规定。它不允许个体发出不同的声音,也不允许个体保留自己的意见。这样做既有利于保障集体意志的贯彻,也有利于对抗(免疫)计划的实施。

但是,集体霸权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还可能会加剧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集体潜意识的过度宣泄极易产生偏执行为,这也会将人类集体面临的风险成倍提升。因为集体犯的错误需要每个成员来承担,没有谁能够逃脱责任和相应的惩罚。集体话语主要由群体中具有一定话语权的人提出,很多时候,握有权力的“群体领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英雄^{[13]127},他只是因为某种历史原因获得了话语权。假设群体领袖在判断力方面出现问题,就会给整个集体带来厄运。

集体霸权的负面效应是包括英雄在内的所有人类个体难以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当社会生态危机同自然生态破坏纠缠在一起时,集体霸权就更难适应不断变化的自然生态系统。以某个族群或整个人类为中心的伦理观,并不适用于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自然需要得到平等的生存权利,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集体霸权所不能容忍的。

疏解人类集体生态潜意识中的负面情绪、减轻

人类对瘟疫等自然灾害的恐惧心理、调适人与自然的关系等一系列愿望,都要求突破集体霸权。对此,尊重个体的生命权利、保障非人类生物的生存空间、承认非人类生物和非生物的生存权利等观念,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否则,笼罩在集体霸权中的社会群体将很难找到既能确保人类永续繁衍、又能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稳定运行的方案。

总之,受生态潜意识的影响,人类的集体行为通常表现为自然环境影响下的应激反应。无论是以个别族群为中心的观念,还是以整个人类为中心的思想,都只会导致偏执的霸权心理;当它被用于指导人类的日常行为时,就会毫无例外地对人类心灵和自然生态产生双重破坏。集体霸权无助于解救时刻面临瘟疫或其他自然灾害的人类,也无法实现群体性精神病症的疗愈,它为缓和生态潜意识的压力设置了极大的障碍。

五、集体精神的疗愈

人类对自然灾害的恐惧,之所以会转化为集体潜意识并压抑在集体心灵深处,正是由于人类在意识层面未能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反而在集体霸权的影响下对自然万物充满敌意。人类为了重构心理平衡,维护自我存在的价值,在理性层面始终没有放弃对瘟疫及其所代表的自然神秘力量的反抗。只不过反抗的过程和结果都不尽如人意,曲折艰辛的自然征服史导致了集体心理的扭曲:被囚禁在实验室里的野生动物、按照特定形状生长的植物以及被规训的荒野,并未给人的心灵带来安宁;相反,内心的孤独和敌意抵消了征服自然所带来的安全感。

无论是在文学世界还是在现实当中,人与瘟疫的关系都是相互对立的。现代医学证明,与其他病毒类似,鼠疫病毒只是希望借助人体实现不断繁衍,它们并不想杀死或灭绝人类,只是在寻找合适的栖身之处。它们只是找错了宿主,因为人类并非理想的栖息地,更何况人类还仇视一切拒绝被控制的生命体。在理性的指引下,人类试图消灭这些生物,与瘟疫持续搏斗,直到病毒被彻底绞杀或能够被掌控。

《鼠疫》的结局证明,瘟疫终归会结束,从广泛传播到销声匿迹,人类似乎完成了对瘟疫的又一次征服。而在集体心灵深处,人类仍旧对瘟疫怀着深深的恐惧与担忧。瘟疫的多次暴发与结束都出人意料;出现时毫无征兆,遁去时无影无踪。即便在瘟疫行将结束之际,理性战胜自然的成就感也未能抵消集体的恐惧感。

身体上的病毒远离了人群,心里的病毒却留了

下来。它们悄无声息地藏匿于心灵深处,伴随人类历史代代相传,“与人类始终同在”^{[4]175}。瘟疫不仅“会在人们心灵上留下痕迹”^{[1]266},还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人类的集体心理构成持续压力。瘟疫结束后的狂欢,不过是集体心理的宣泄,无法抹除集体心理曾濒临崩溃的事实。对此,加缪始终保持着警醒,这也是其作品具有“警世”功能的重要原因^[15]。在这段时间里,集体心理始终是脆弱的,它仍然需要持续的精神治疗,以平复瘟疫带来的巨大伤痛。

在集体心理的精神治疗问题上,加缪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他只是忠实地“记录”瘟疫之后群体的反响。至于如何治愈集体的心理创伤,作为个体的他是无力的。借里厄医生之口,他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让它们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罹祸患。”^{[1]288}至于人类能否“吸取教训”,他依然存疑。从社会历史的发展来看,对瘟疫大流行的集体性恐惧仍旧盘踞在潜意识的噩梦中。

作为历史的传承人和现实的亲历者^[16],加缪对瘟疫来临时人类集体心理的描摹,使其作品远远超出了集体意识的边界。他试图在自然与人类心灵之间构建某种张力。单纯从文学角度而言,象征性是《鼠疫》的主要特色^[17]。尽管对二战及法西斯势力的隐喻是作品的重要内容^[18],但从自然生态维度审视,作品对人类集体心理的反思更具现实意义。从自我中心主义的狂妄到理性的抗争,再到深度的自我反省与疗愈,瘟疫带给人类的并非只有负面的破坏。病毒本身亦拥有其特定的生存权利,将病毒视作敌人的心态不仅无法缓解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反而会给集体心理带来更大的困扰。

在《鼠疫》的世界里,自然才是“作者着意刻画的主要角色”^[19],人类不过是配角。顺应自然规律,既不是一句空话,也绝非人类在无法以理理解释自然现象时所持的消极态度。从生态学角度来看,充分认识瘟疫及其自然属性,是敬畏自然的体现;正确处理人与病毒的关系,才是化解集体恐慌心理的关键,据此进行的心理疏导也才有可能真正发挥作用。否则,人类的恐慌将永无止境,人与瘟疫等自然物的关系也将始终处于紧张对立状态。只要瘟疫不断卷土重来,人类的集体性心理问题便无法彻底消除。

尽可能远离病毒的栖息地,不去打扰它们,并维系病毒的“野性”,使其疏离于人类文明,抑或是保持人类文明与野性之间的理性距离。尊重宇宙自然万物,或许是解决人与病毒生存矛盾的可行路径。这要求人类在思想观念与伦理道德层面进行自我纠

偏,摆脱所有以自我为中心的狂妄心态。这对于自然生态与人类自身的精神生态,均具有深远意义。

总之,人类对病毒理性的反抗,应当建立在自我反思与自我纠偏的基础上,而不应敌视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应是对立的,二者本就同根同源。从远古时期的宗教仪式与祈福活动开始,人类便将“配合自然季节的运作”视为重要的生存法则^{[10]262}。将自然视作敌人,无异于将自我视作敌人;单纯以改造自然为目的的行为,并不能为人类集体心灵带来永恒安宁。直面生态潜意识深处的精神问题,不断修正自我意识,才有利于维护个体精神健康和社会生态平衡。

六、结语

在《鼠疫》这部作品中,人类集体的生态潜意识被表征为恐慌与对抗相互叠加的精神图式,并经历了从压抑到反抗、再到调适的复杂过程。同身体上的瘟疫相比,精神上的瘟疫显然更难祛除,这也正是加缪作品中荒谬性的体现,是人类感知世界时“理性的特殊形态”^[20]。无论是由病毒引发的瘟疫,还是精神层面的内在疾病,都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外在自然的关系,尤其促使人类在集体潜意识层面真正接纳万物平等的思想:

一方面,瘟疫不接受人类任何形式的威胁或祈求,它戳破所有冠以“繁荣”之名、如同“皇帝的新装”般的外衣;戳破一切征服者的谎言,让喧嚣归于沉寂,让狂妄沦为荒谬。精神疾病与肉体瘟疫相互裹挟,使人类如同被关进笼中的生灵,在恐慌中完成深切的忏悔。

另一方面,瘟疫让那些长期遭受虐待、欺凌与压迫的非人类生物获得了喘息之机。在人类自我封闭之后,其他动物得以从栖身之地走出,不必再畏惧从天而降的灾难,它们可以大摇大摆地穿行在这本就属于它们的世界里,毫无顾忌地享有自然赋予的生存权利。

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学说备受生态主义者的诟病,不折不扣地反映出人类自我认知的偏狭。人类意识控制下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并没有因为当今生态问题和生态保护运动的兴起而有所改变,它本身就像一种精神瘟疫,悄无声息地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其“传染性”并不比病毒弱。精神瘟疫比病毒拥有更强的破坏力,它对人类身体的威胁是间接的,会以使人上瘾的方式,让集体精神跌入有害的癫狂和无可救药的自恋中,而且越陷越深。

依靠现代理性意识,现代人获得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却不能因此剥夺其他物种的生存权利——

人与其他物种(包括病毒在内的微生物)之间的关系始终密不可分。只有在观念上形成对瘟疫的正确认知,重构生态潜意识的心理内容,才有可能使人类从偏执的集体观念中解脱出来,也才有利于改善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阿尔贝·加缪. 鼠疫[M]. 刘方,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2] 荣格. 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M]. 成穷,王作虹,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1.

[3] 鲁枢元. 生态批评的空间[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42.

[4] 威廉·H. 麦克尼尔. 瘟疫与人[M]. 余新忠,毕会成,译.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

[5] 余凤高. 瘟疫的文化史[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3.

[6] 欣正人,编著. 瘟疫与文明[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4:3.

[7] 霍华德·马凯尔. 瘟疫故事[M]. 罗尘,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10.

[8] 加西亚·马尔克斯. 百年孤独[M]. 范晔,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1:40-41.

[9] 埃利希·诺伊曼. 大母神:原型分析[M]. 李以洪,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4.

[10] 约瑟夫·坎贝尔. 千面英雄[M]. 朱侃如,译.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

[11] 阿尔贝·加缪. 西西弗的神话[M]. 杜小真,译. 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146.

[12] 弗洛伊德. 图腾与禁忌[M]. 文良文化,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20.

[13] 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M]. 冯克利,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4] 福冈伸一. 生物与非生物之间[M]. 曹逸冰,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7:233.

[15] 洪子诚. “幸存者”的证言:“我的阅读史”之《鼠疫》[J]. 南方文坛,2008(4):4.

[16] 郭宏安. 谈谈阿尔贝·加缪的《鼠疫》[J]. 读书,1982(2):51.

[17] 刘雪芹. 反抗的人生:论加缪的《鼠疫》[J]. 外国文学研究,1992(4):62.

[18] 柳鸣九. 论加缪的思想与创作[J]. 当代外国文学,2004(2):110.

[19] 张良春. 加缪作品中景物描写的象征意义[J]. 外国文学研究,1986(1):21.

[20] 李元. 论加缪的“荒谬”概念[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23.

(责任编辑 刘海燕)

Disaster Narra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Subconsciousness:
On the Collective Psychology and Ecological Thoughts in *The Plague*

CHANG Ruyu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Jiangsu 213001, China)

Abstract: Albert Camus' *The Plague* is centered around the theme of the plague, the plague not only brings physical pain but also causes mental panic. This classic work depicts scenes that enable readers to deeply refl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at the level of collective subconscious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analytic psychology, the collective subconsciousness of humans contains ecological subconsciousness, which is the accumulation and convergence of all human emotions towards nature. *The Plague* reflects Camus' exploration of ecological issues and is a work that deeply reflects on human.

Keywords: Disaster narrative; Albert Camus; *The Plague*; Carl Gustav Jung; Collective subconsciousness; Ecological subconsciousness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的爱情叙事研究

陈 铎

(南京晓庄学院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1)

摘 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小说,呈现了爱情作为一种消极关系的集体经验,预示了现代社会以自由作为终极目标所必将遭遇的困境。爱与欲的位阶发生了显著的转换:灵肉统一、性与爱交融的古典理想,逐渐让位于身体欲望;身体欲望对情爱主体的反向支配,亦折射出商业化逻辑对情感生活的影响。面对个体精神萎缩和严峻的两性现实,也有部分作家如潘向黎、迟子建、叶弥等尝试冲破这种表述的困境,以积极的情感主体传达出一种珍贵的重写爱情的努力。

关键词:20世纪90年代以来;爱情叙事;消极关系;重写爱情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2.002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2-0008-06

回溯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爱情”始终与时代命题的表达交相呼应:五四时期借“恋爱自由”呼唤人的觉醒,革命年代将个人情感升华为阶级与民族的情感,新时期以“我是人,我要爱”传达对极“左”现实的控诉,并在“爱,是不能忘记的”宣言中迎回久违的情感复苏。进入20世纪90年代,文学叙事中的爱情话语却吊诡地走向了反面,池莉《不谈爱情》、张洁《无字》、苏童《离婚指南》、魏微《化妆》等作品,不约而同地勾勒出一幅爱情消散的图景:他们笔下的爱情不是呈现为一种病态的消极关系,昭示着固有的以激情、亲密、承诺为伦理价值核心的理想爱情的失落;就是降格为一种纯粹的身体经验表达,在肉体欲望的桎梏中,不复以超越性的精神追求而存在。

一、作为消极关系的爱,以及现代性困境

20世纪90年代以来,爱情叙事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把爱情作为一种消极关系来呈现。这里的“消极”包含两层内涵:其一,主体在恋爱过程中产生的消极心态和消极感受,以及由此导致的面对爱情时的消极信念;其二,恋爱主体惯于采用种种消极

的、非建设性的手段,如移情出轨、回避矛盾、中断关系等来处理感情当中的问题。

首先来看第一个方面。需要承认的是,爱情在激发个体旺盛的生命激情,给人带来强烈的亲密感、愉悦感、新鲜感的同时,也伴随着强烈的焦虑、痛苦、不安等,这是一种人皆有之的普遍经验,也被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所表现。不同的是,此前这种情感关系的焦虑或恋爱失败的颓丧,仅仅作为一种个体经验而存在,并且不一定导致面对爱情时的消极信念;世纪之交,这种普遍性的“不谈爱情”的痛苦宣告,以及爱情信仰的幻灭,已经充斥在文学叙事的方方面面。这方面的例子俯拾即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张洁2002年出版的三卷本小说《无字》。《无字》以八十万字的体量,细致剖析了爱情从萌生走向瓦解的漫长过程。这部作品,无论是在同时代的文坛,还是在张洁的个人创作史上,都像是一种痛苦的宣告,宣告我们孜孜以求的爱情理想竟是虚妄。遥想1979年张洁的代表作《爱,是不能忘记的》,在该作品中,爱情尚是一种“比法律和道义更牢固、更坚实”的存在,一种超越生死的、“比死亡更强大的力

收稿日期:2025-12-10

基金项目:2022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新世纪以来女性作家的婚恋叙事与伦理困境研究”(2022SJYB0582);2022年度校级科研项目青年专项(人文社科类)“张洁研究”(2022NXY44)

作者简介:陈铎(1991—),女,河南信阳人,文学博士,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女性文学。

量”^[1]。到2002年的《无字》，原本崇高的爱情，在破除了有情人难成眷属的外在阻力后，却只剩下一地鸡毛的婚姻日常，以及男女之间无处不在的微观权力较量。20世纪80年代末，池莉就在她的“新写实三部曲”中向世人宣告了“不谈爱情”：在粗粝的现实生活面前，爱情早已在等待分房、夫妻斗气、孕育子女等过程中渐次磨损，逐渐降格为一种“唯物”的存在，失去了应有的灵性与光泽。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苏童的《已婚男人》和《离婚指南》中，这种出于“过日子”的基本生存需要也不存在了，主人公杨泊的疯癫和自戕赤裸裸地昭示了爱情连同生活本身都已在颓废的主体意识中沦入虚无。1997年，徐坤在《厨房》中，细致地描绘了一个女主人公如何以厨房语言向男人婉转示爱，而男人却唯恐这份爱成为自己自由无羁的单身汉生活的负担，竭力避免自我身心的深度卷入，最终选择以置身事外的把玩心态，将这份郑重的心灵交付变成一场轻佻的情爱游戏。一度在文本中随处可见的、象征着自由昂扬的主体性精神的浪漫爱情，已经沦为一声“俱往矣”的感伤和喟叹。

第二个方面。与面对爱情时的消极信念紧密相关的是恋爱过程中的消极心态和消极手段，恋爱主体常以移情、出轨、分手等方式处理情感生活中的矛盾。借鉴以赛亚·柏林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划分，本文以“消极关系”来描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爱情样态。需要说明的是，区别于传统爱情依托激情、亲密与承诺形成的深度情感联结，现代爱情更多的时候表现为对这种深度情感联结的拒绝；比起传统的婚姻伦理和家庭责任对个人情感生活的要求，个体更倾向以“不作为”的方式来巩固自由的边界。作品中，分手、离婚等关系断裂叙事的大量涌现，正是这一特征的集中体现。与此前不同的是，面对以分手、离婚为表征的亲密关系破裂，当事人不再将其视作情感失败而沉溺痛苦，反而将其视为重构自我主体性的重要方式。如在林白《一个人的战争》中，时隔多年，主人公回顾自己与心上人N飞蛾扑火般的爱情，提及那些无止境的等待、无署名的劳作、不情愿的堕胎等，那种时过境迁后的冷静审视，已经完全替代了彼时为爱献祭的崇高与庄严。她发现了男人的志大才疏、不负责任、满口谎言之后，终于意识到自己所爱的不过是虚拟的偶像，她于是平静地宣布“我从爱情的折磨中逃了出来”，“能穿越爱情的人是真正有福的人”^[2]。在这里，正是通过对爱情创伤的诊断，对非理性之爱的否定，主人公才

得以重新找回内在的心灵秩序。还有潘向黎的《白水青菜》，出轨的丈夫迷途知返、重新回到妻子身边，但这道象征着夫妻爱意的白水青菜汤已然由浓酽变得寡淡，妻子的生活重心已由家庭转向事业。这其实暗示了妻子对于丈夫是否归来、爱意是否如常的关切，已经让位于自身的精神独立与成长。在乔叶的《零点零一毫米》中，当妻子被强暴，丈夫在贞操情结的驱动下质疑妻子自愿服从，深陷绿帽焦虑而拒绝报警，无一丝一毫对妻子身心遭受侵害后的关心，妻子最终醒悟，“往昔所有用来安慰日子的那些东西，都不能成立了”^[3]，决定不再以沉默和忍耐缝补起千疮百孔的婚姻，而是在心里默默盘算着后续的离婚事宜。在这里，正是通过对传统的婚姻家庭秩序的拒绝，情感主体的自觉能动性与其独特价值才得以彰显。

同样是以消极方式来退出关系、确认存在，恋爱主体的心态却因性别不同而有着微妙的差异。一般来讲，父权制分配给女性的角色更多是在婚姻家庭内部，女性比男性更多地受到生育等生理条件的限制，因此女性倾向于将爱情视作步入婚姻的前期阶段，无论是进入关系或中断关系在心态上都更为严肃。相比之下，男性则更倾向于利用现代婚恋关系的“自由”之便，最大化地享用婚前的潜在资源，因此也更容易滑向纵欲享乐的一端。《一个人的战争》中的N，就长期以独身主义为借口，一面贪婪地享用女性飞蛾扑火的情爱献祭，一面在女性怀孕后毫不负责地抽身而退。徐坤《厨房》中的男主人公松泽，面对女人真心诚意的投怀送抱，他内心想的却是：“白玩尚可，动真格的却不行……他不怕玩，他就怕认真。以假对假的玩，玩得心情愉快，彼此没有负担，同时毫无顾忌。以真对假的玩，那就没法子玩了。以真对真就更不能玩了。”^[4]这里反复出现的“玩”字，点明了他在情爱面前的游戏心态，比起认真严肃地建立起一段正式关系，他更倾向于不带感情地在性爱欢场上猎艳寻芳。这也充分体现了对自由的崇拜，会使个体拒绝严整的情感规范与社会秩序。潘向黎《兰亭惠》中的顾轻舟，为了家境优渥的李宝琴，轻易放弃了相恋多年的女友司马笑鸥，不仅面无愧色地向父母宣称“结婚选对人，可以少奋斗二十年”，对自己弃旧求新的行为毫无心理负担，而且在他的观念中爱情的位置俨然变得无足轻重——“反正就这样了，爱过，没爱过，有什么区别？”^[5]在这里，爱情从自由的重负变成可资利用的工具，用以实现性资源的猎取或现实利益的交换。

总之,无论出于何种立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小说叙事,记录了爱情作为一种消极关系的集体经验。正如法国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斯分析的那样,倘若将爱情放置在现代性的整体框架中来看,政治解放、理性主义、个人主义、道德多元主义、平等精神等现代性的核心价值,均不同程度地对爱情产生了影响,稀释了感情的强度,消解了爱的信念与魅惑色彩。这也就意味着,亲密关系在现代社会遭遇的巨大挑战,并不能简单归因于个体选择的失误,而根源于现代性的结构性困境^[6]。由此看来,徐坤《厨房》讲述的就不再是一个遇人不淑的恋爱失败故事,而是一则颇具隐喻色彩的现代性寓言,它预示了现代社会以自由作为终极目标必将面临的困境:经过理性启蒙的现代人对于独立和自由的渴求,与爱情所要求的主体性交融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何况在这样的价值排序中,以自由为代表的现代价值,始终要求凌驾于伦理、忠诚、责任等传统价值之上,二者之间必然爆发的根本性冲突,从根源上抑制了亲密关系的建构。

作为一种集体经验的表征——激情的衰退、爱欲的溃败、亲密关系纽带的解体,其实正是一代人精神世界的萎缩在爱情领域的反映。以苏童《已婚男人》为例,妻子指责丈夫:“你连无聊和苦闷也没有,你这人那么空,什么也没有。”^{[7]159}而主人公杨泊则自陈:“你说错了,我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就是不爱自己。”^{[7]175}这对白精准道破了现代人爱意衰退的另一症结:一个精神萎缩、心灵枯竭的主体,已丧失爱的能力。正如弗洛姆所言,爱是一种主动的能力,是对所爱的对象积极地表达关心、责任、尊重和了解^{[8]29},一个空洞、软弱、呆滞的心灵是生长不了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可以给予。小说表面写婚姻困局,深层实为一出现代主体遭遇精神破产的悲剧。杨泊的精神危机,个体方面源于公司倒闭、下岗失业后被抛出正常生活秩序的挫败体验;宏观方面,则植根于20世纪90年代末市场经济席卷后的社会现实。当任佳称赞读书涵养气质来表达对杨泊的好感时,杨泊却以害怕读书为由,“书读得越多,人就越发丑陋阴暗”^{[7]164},传达其在商品社会物质逻辑前的悲观与无力。既无旧信仰指引,又无新价值寄托,个体难免彷徨失措,既无底气领受任佳的好感,又无动力经营日常的婚姻。到了《离婚指南》中,为了逃避婚姻的庸常,杨泊转而向其他女人寻求情感慰藉,然而婚姻的围城既无法逃脱,婚外的情感逃逸亦不能承担救赎的使命,反而被证实指向同样的精神牢

笼——行为主体最后的疯癫与自戕,正是其内在精神萎缩、情感失序的必然结局。

二、灵性的消逝与爱情的性化:商品时代的爱欲编码

回顾人类的观念史,性与爱的关系长期处于一种价值层级上的紧张拉锯状态。无论是古希腊的灵与肉二分法,还是中国文人对“情”的崇尚、对“欲”的贬抑,性往往被视为对纯粹之爱的损耗或背离。陈寅恪的“爱情五等论”便是其典型体现——等级高低,正依据对“性”的排斥程度划定^[9]。在这一传统下,爱情因其指向超越性的美德或神性而备受礼赞,身体欲望则受到道德与宗教的压抑。现代性进程扭转了这一局面,经由世俗化、心理学和女性主义等多种力量的合力,欲望得以“去污名化”,并在对抗社会陈规、伸张个体自由的斗争中,获得了积极的伦理与美学地位。在中国新文学脉络中,对性的压抑与张扬,直接关联着对人性本身的压抑与解放。从郁达夫《沉沦》中性的苦闷、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情欲的挣扎,到张贤亮、王小波等人笔下大胆的欲望书写,身体的觉醒,成为人性觉醒最炽烈的符号。在这种价值反叛的逻辑下,性不再仅是爱的对立面,更成为爱的先锋与载体;对新时期文学而言,对身体欲望的坦然陈说,本身就成为爱情叙事中一种常见的表达方式。

1978年以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所释放的强大社会力量、经济活力与文化张力,深刻重塑了“性”的意涵。在这一进程中,一系列法律修订从制度层面清晰地记录了性从公共议题向私人选择、从法律规制领域向道德范畴、并最终与道德评价逐渐松绑的演进轨迹。例如,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对离婚条款的修订、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流氓罪”的调整、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对隐私权的确立,以及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关于无过错离婚的规定,共同推动了一种观念的普及:性作为一种个体自由,应免于外部的审视与干涉。由此,性得以从既往政治与文化的严密管制中逐步“脱嵌”,被视为个体自由的首要表征与身份认同的核心要素。叶弥的小说《不老》正是这一逻辑的文学映照,主人公孔燕妮早年因为离经叛道的情感追求,受到邻人的监视和社会的非议,其身体与意志仿佛始终处于无形的禁锢之中。她辗转于多段恋情,却始终固守男女之大防,直到一次看似偶然、甚至草率的性关系发生,年少时代受侮的创伤记忆才终于得到平复,冰冷的双

手才真正温热起来。这一情节极具象征意味：如果说情感的自由标志着人格与精神的独立，那么《不老》则进一步表达了与爱的自由相比，性的自由在更高的意义上实现了对自我身体的收复与解放。对孔燕妮而言，唯有通过这种彻底的身心交付，曾被侮辱与损害的生命才获得了救赎。

一个易被忽略的常识是，自由若无边界与节制，对自由本身的追求便会陷入悖论，性的自由尤甚。在价值反叛的旗号之下，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的性已经渐次脱离了政治、法律、伦理等传统框架，进而被还原为一种生物性本能，爱欲中的精神性和德性色彩由此被剔除，被扁平化为本能的欲望涌动。因此，爱被简化为性，性又被简化为纯粹肉欲，而爱情叙事中常见的灵肉纠葛，到世纪末几乎滑向了情色的沉溺与放纵。以卫慧《上海宝贝》为例，主人公倪可与男友天天和情人马克间的三角恋情，与其说是旨在表现莎菲式的灵肉冲突，不如说是在标榜一种“新新人类”的生活哲学。倪可远非丁玲笔下的莎菲，她熟练地在爱情与肉体欢愉间切换，并将这种分裂彻底合理化，骄傲地宣称：“爱与欲分开，并不与追求纯洁人生的态度相抵触。”^{[10]86} 小说结尾，天天之死、倪可飞往柏林寻找马克等情节，已经昭示了当代人在爱欲难两全的困境中选择放弃灵性追求、拥抱肉体欲望的躁动。朱文《我爱美元》中，“性”成为解释一切的逻辑前提，主人公认为，一切行动皆源于性欲，甚至认为，向父亲表达爱意的方式就是为他找一个性伴侣。随意的性爱，成为标榜个体解放的姿态。其实，这样更加深个体的孤独感，并进一步侵蚀爱的信念。

需要注意的是，爱与欲的位阶转换从来不应该被放置在情感领域中孤立看待。结合 20 世纪 90 年代的社会背景，肉体欲望对情爱主体的反向支配，意味着商品经济对情感领域的深层影响。商业逻辑不仅催生了高度功利化的婚姻与爱欲市场，也瓦解了婚姻、爱情、性高度一体化的传统家庭伦理，改写了两性之间的浪漫法则与交往方式。消费与性构成了两性关系的核心驱动力，人们以此来丈量他者，同时也形塑自身。消费社会一方面将身体转换成一种消费品，鼓励人们通过物品消费来增添性魅力；另一方面将性魅力定位为两性交往的决定性因素，以此来掩饰背后资本操控的非伦理性。性与大众消费文化的紧密依存，构成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爱情叙事的社会学背景。卫慧《上海宝贝》便是直观的例证，倪可面对前男友的智识与学历不屑一顾，却对能带

她出入高档场所、拥有“别克车”等消费符号的德国情人马克色授魂与。在这里，性魅力的有无，绝非纯粹的审美问题，而是更多取决于品牌衣饰和高档场所等消费符号的堆积。金仁顺的《桃花》亦揭示，母亲季莲心在婚恋市场上的无往不利，其秘诀正来自她满墙满架的品牌衣饰、皮包和鞋履。由此可见，消费能力与性魅力相互加持，共同垄断了爱欲市场。相比神秘且无法把握的爱，这种由商品加持的“性魅力”更可操控，也更契合消费社会鼓励即时享乐的法则。然而，这种建立在商品法则基础上的爱欲编码，势必会引发情感世界的价值混乱与主体异化。毕飞宇《相爱的日子》中，底层男女难得地由性生情，却难敌婚恋市场上“年薪三十万”这一标准的强势冲击而解体。鲁敏《六人晚餐》中也有类似情节：晓蓝舍弃青梅竹马的恋爱对象，选择金钱实力更强的男人作为配偶。魏微《化妆》则呈现了更复杂的心理图景，嘉丽试图通过礼物的价格，来确认自己在情人心中的地位，却屡屡陷入将爱恋贬值为交易的屈辱与拧巴之中——这正是消费逻辑对人性 and 情感本质的异化。当主体的精神世界被斤斤计较的权衡与算计所占据时，人性中飞扬的、神性的一面逐渐消解；人们不再被种种超越性的精神追求所吸引，只能向物质的欲望、肉体的欲望、享乐的欲望屈膝投降。没有崇高，没有责任，没有奉献，也没有牺牲，爱情魅力的消失已是意料之中。

三、爱情理想的守望，与重写爱情的努力

社交平台上“备胎”“恋爱脑”等网络用语的流行，一定程度上折射了爱情在当代语境中的尴尬与困境。时代在变，人们对于爱情的认知也在变，文学记录了这种变化，同时，也以重写爱情的方式，来反思、抵抗社会现实或达成与这个社会的呼应。在文学对爱情的唱衰时潮中，依然有为数不多的声音，在坚守着爱情理想，其中有两种常见的方式：一是时间层面的怀旧书写，通过对往昔岁月的回溯，来呈现传统爱情模式的稳定性；二是空间层面的乡土叙事，试图从至美至善的道德原乡中发掘未被都市文明浸染的人性 with 爱情光辉。

首先，在怀旧书写中，刘静《父母爱情》、严歌苓《陆犯焉识》、梁晓声《人世间》、铁凝《火锅子》、潘向黎《兰亭惠》等作品，皆以漫长的岁月跨度，细腻铺陈“风雨同舟、白首偕老”的婚恋图谱。无论是革命年代的甘苦与共，还是世俗生活里的爱情传奇，这种由“白头偕老”带来的稳定感与秩序感，必然会给漂泊不定的现代心灵带来温暖的情感慰藉。传统的

爱情模式之所以在今天依然有动人的力量,是因为主体对恋爱对象唯一性的终极认定,以及在守候“这一个”的过程中展示出的忘我牺牲与矢志不渝的忠诚,极大地彰显了人性的高贵与尊严,而这正是偏爱自由、个性、自我的当代人所缺乏的。当亲密关系中的承诺被当代人视作对个体自由的限制而轻率抛弃时,确保爱情关系稳定与秩序的力量也随之消失。与当代爱情松散、随意的形态相比,老一辈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稳固爱情,自然成为后辈缅怀与追忆的精神对象。如上文提到的《兰亭惠》,老夫妻顾新铭与汪雅君的相濡以沫、重情重义,与儿子顾轻舟择偶中弃旧求新的功利心态形成对比。张艺谋的电影《归来》,以爱情为主调,对严歌苓小说《陆犯焉识》中右派故事的重新演绎,其在影视市场受到的欢迎,也是出于相同的社会情绪。就像伊娃·易洛斯所说:“为了存活下去,人类需要一点神话、幻想,乃至谎言,好让社会关系中存在的暴力足堪忍受。”^{[6]269-270} 这种怀旧导向,对既往的两性伦理、家庭伦理给予充分肯定。如刘静《父母爱情》中,为丈夫生育七个子女、扶老挈幼并千里寻夫的妻子,在今天俨然已失去奉献、牺牲的价值光环,很难为青年女性提供价值参照;何况,他们的幸福生活与其说是爱情对世俗生活的胜利,不如说是海军政委及政委太太的阶层身份庇佑,二人的相处模式依然是“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婚配形态,似乎很难解答当下焦灼于自我与他者、自由与责任之间的青年男女的情感疑难。

其次,在乡土叙事中,乡村更多地受到作家们的情感偏爱,常被建构为与都市相对立的道德与情感乌托邦,并为良善人性与美好爱情的生长提供滋养。与《厨房》《上海宝贝》等作品中都市情欲的浮华易变不同,乡土社会的爱情质地往往朴素简白,更倾向于呈现一种温良敦厚且恒常的人性景观。魏微《乡村、穷亲戚和爱情》中的主人公,在都市中热衷于寻找刺激和享乐,走马灯似地更换男友,回到故乡后,却被“穷亲戚”陈平子的独特精神气质所吸引,在与乡村的情感联结中邂逅一段爱情。孙惠芬《生死十日谈》,关注乡村自杀现象——小老头患病后,不愿成为妻子的负担而选择自杀,这无疑洋溢着一种为爱赴死的英雄主义气息;而他四十年如一日地为知青妻子梳辫子,呵护她剪纸的艺术梦想,不让她从事任何农家劳作等举动,更赋予这则浪漫的乡村爱情童话以传奇色彩。及至最后,妻子从艺术梦想中觉醒,在丈夫死后毅然剪去大辫子,自觉承担起照护父

母子女的家庭责任——这不仅续写了这则乡野童话,更传递出一种相互付出、共同成长的现代爱情理念。迟子建的《银盘》中,一对相爱的男女因为进城而短暂分离,空间距离的阻隔与城乡财富的悬殊令一方短暂迷失,但经过一系列跌宕起伏的遭遇后,二人最终找回初心,约定共同返乡成婚。值得一提的是,迟子建的爱情叙事在当代作家中可谓异类,对爱情的诉说贯穿其创作生涯的始终——无论是《逝川》中渔妇吉喜对昔日恋人胡会长达五十载的秘密爱恋,《亲亲土豆》《清水洗尘》《花瓣饭》《塔里亚风雪夜》《白银那》中凡夫凡妇渗透在细密日常中的牵挂与体恤,还是《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我”与魔术师超越生死的情感牵绊,无不传递着某种大道至简的爱情信仰。这种近乎宗教宣谕般的“真爱至上”观念,在当代作家的思想光谱中非常少见。这背后,既有作家中年丧夫的创伤经历,更有东北独特地域文化的潜在滋养:无论是东北极寒天气孕育出的雄浑自然风景,还是民间文化对人情美、人性美的朴素坚持,乃至萨满教“万物有灵、灵魂不灭”信仰的神秘指引,凡此种种共同形塑了迟子建小说的人性景观,使她对人的灵性追求始终抱有温情与期望。她的爱情叙事不同于多数作家对爱情的质疑、否定态度,而是罕见地保留了爱情作为一种魅惑经验所具有的神秘与迷人。《逝川》中吉喜木盆里游弋的蓝色泪鱼,《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从丈夫的剃须刀盒内翻飞而出的蓝蝴蝶,《亲亲土豆》中从丈夫坟前滚落下来的跟脚的土豆,这些意象不仅是对失爱之人的精神慰藉,更昭示了一种心灵相通的美好爱情跨越生死、直达永恒的可能。如果说爱情的溃败和主体的失能,象征着时代精神与文学精神的双重萎靡,那么迟子建氤氲着浓郁地域文化气息的爱情故事,显然为茫然无措的现代人提供了一种疗愈与救赎的路径。

最后,检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爱情叙事,比起传统爱情观念对神圣、永恒之爱的推崇,作家们更倾向于描绘一种与永恒解绑的、片段的、瞬间的爱情体验。如金仁顺《云雀》,虽然也写到都市男女的出轨与移情,但并不满足于对爱情易逝、人性善变的简单化控诉,小说最后,姜俊赫对春风的包容与谅解,不仅维护了这段感情的体面,更传达了作家对人类情感世界的幽微与脆弱的深刻悲悯。毕飞宇《相爱的日子》中,男女二人虽由性开始、因钱结束,但相处过程中却饱含深情,两个身处底层的小人物在城乡变革的夹缝中漂泊离散,却不忘相互温暖,彼此照

亮。情感的介入,令这段萍水相逢的关系显得尤为动人。叶弥《不老》中,孔燕妮对待爱情的姿态,放在整个新文学史上都显得相当奇特:她信仰爱情,却在不同的男人间辗转;反过来说,她在不同的男人间辗转,却始终保持对爱情的热情。而这里的爱情已不再是红男绿女的情爱游戏,而是在忠实于自我的基础上,与他人建立的一种袒露身心的赤诚关系。放在“文革”刚结束的社会背景中,孔燕妮的爱情多棱镜,折射出的是新旧交替时代里个体对于真实人性、自由自我的不懈追求。还有鲁敏的《金色河流》,丁宁在遗产利益的驱动下,与无爱的丈夫“合作”生育,历尽千辛万苦后终于觉醒——当她尝试把自己和孩子当作人来对待,宣布不再为遗嘱、为赢回男人的爱而生育,却意外收获了丈夫的回心转意。这一情节走向无疑耐人寻味:情感的波动不仅是从亲密到断离,也可能相反,而这正印证了爱情的神秘。这种觉醒背后,是人性之善的复苏,也是作家对现代人精神困境的深切观照与悲悯。弗洛姆曾说:“在爱之中,存在着这样的矛盾状态:两个人成为一体而仍然保留着个人的尊严和个性。”^{[8]24} 丁宁与丈夫这两个千差万别的灵魂,各自成长并走向融合,这一情节安排既呼应了人性终善的价值追求,也体现了作家对于爱情和人性的朴素信心。还有张楚的《中年妇女恋爱史》,这里的爱情故事并不包含任何结果的允诺:它可能是喜剧,也常常以悲剧终场;它可能通往永恒,也可能只是片刻的体验;它可能象征着道德的至善,也可能与道德无关,只是一种确认个体存在的方式。

时代在变,人们关于爱情的观点也在变,能否写

出这种变化,同时不滑向浅薄的虚无或流俗、不丧失对人心人性的基本信心,对作家构成了一种严峻的挑战。从这个角度来看,作家们重写爱情的努力,在这个时代显得稀缺而珍贵。正如学者王文胜所说:“我始终认为爱情是不愿向无趣、平庸的现实妥协的一种表征,也是一种对人性美好尚有一些存留的信心,是对虚无主义最有力的反抗。越是在冷漠、虚无情绪主宰人们内心的时代,我认为作家越需要有一种使命感,带给人们对美好感情的咏怀和盼望。”^[11]

参考文献:

[1] 张洁. 爱是不能忘记的还有勇气吗[M].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7:370.
[2] 林白. 一个人的战争[M].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15:252.
[3] 乔叶. 她[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310.
[4] 徐坤. 厨房[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5:18.
[5] 潘向黎. 上海爱情浮世绘[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312.
[6] 伊娃·易洛斯. 为什么爱让人受伤[M]. 黄宛瑜,译. 新北市:联经出版社, 2019.
[7] 苏童. 婚姻即景[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
[8] 艾里希·弗洛姆. 弗洛姆作品系列·爱的艺术[M]. 刘福堂,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
[9] 吴学昭. 吴宓与陈寅恪[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2:15.
[10] 卫慧. 上海宝贝[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9.
[11] 王文胜. 新世纪以来学院型女作家两性关系书写[J]. 江苏社会科学, 2019(1):192-197.

(责任编辑 刘海燕)

A Study of Love Narrative in Chinese Novels Since the 1990s

CHEN Duo

(College of Literature, Nanjing Xiaozhua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171, China)

Abstract: Chinese novels since the 1990s have recorded the collective experience of love as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which foreshadows the dilemma that modern society must encounter with freedom as the ultimate goal. The classical ideal of unity between spirit and flesh and integration of sex and love has gradually given way to physical desire. The reverse domination of bodily desires over the subject of love also reflects the impact of commercial logic on emotional life. Faced with the current shrinkage of individual spirit and the grim reality of gender relations, some writers such as Pan Xiangli, Chi Zijian, Ye Mi, etc., try to break through this dilemma of expression and convey a precious effort to rewrite love with a positive emotional subject.

Keywords: Since the 1990s; Love narrative; Negative relationship; Rewriting love

历史的烟尘与命运的追问

——论孙瑜长篇小说《隐入高原》

查博文

(九州大学 人文科学府, 福岡市 819-0395)

摘要:《隐入高原》是一部以十七世纪固国王国覆灭为背景的历史题材小说。小说采用了多视角叙事——国王、修行者、王后、巫女、异乡来客乃至亡灵与鹰,每个叙事者都从自己被抛的处境出发,以各自的筹划去理解和回应同一个“固国将亡”的历史时刻。这种历史叙事的多元性,即诸多真实的视域之交织,对于历史、命运及人的本质的生动描述与深刻反省,使这部作品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历史题材小说,成为一面映照人之生存处境的镜子。

关键词:《隐入高原》;固国王国;存在论;海德格尔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2.003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2-0014-06

一、历史:作为发生的真实

我们惯常将历史理解为一连串已然逝去的事件,仿佛它只是编年史中的记录、文献里的墨迹、博物馆中供人凭吊的遗物。在这种理解中,历史成了某种可以被客观把握的对象,一个与我们当下的存在相隔离的“过去”。然而,作家孙瑜的长篇新著《隐入高原》所呈现的^[1],绝非这种对象化的、已死的“曾在”。这部小说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迫使我们重新追问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历史究竟是什么?

历史首先是一种发生。它不是静止地躺在那里等待后人检视的陈迹,而是“人的存在本身在时间中的展开与实现”^{[2]74}。固国的七百年兴衰史,不是一幅可以从外部冷眼旁观的画卷,而是一代代人在高原的烈风中呼吸、挣扎、抉择的切身之事。当我们阅读固国王国的覆灭史时,我们所面对的不是某个遥远时空中的异域奇观,而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处境在一个特定历史瞬间的凝结与显现。

这种“发生”的本质在于:历史从来不是死气沉沉的书本知识,而是只有在人的生存筹划中才成为历史。国王扎西在十七岁即位那一刻所面对的,不是抽象的“政治局势”或可供分析的“历史条件”,而

是他自己的存在被抛入了一个他未曾选择却必须承担的境遇之中。他是“诗人国王”,渴望像画匠般自由生活,却不得不在父权的遗产、僧团的压力、外敌的威胁之间寻找立足之地。这种被抛性正是历史性生存的基本特征:我们从来不是在一个空白的起点上开始自己的存在,而总是发现自己已置身于某种特定的历史处境之中,“背负着先于我们而存在的意义关联与责任”^{[2]29-38}。

小说采用的多视角叙事——国王、修行者、王后、巫女、异乡来客乃至亡灵与鹰——恰恰印证了这一点:历史从来不是单一的、客观的事实链条,而是诸多真实的视域的交织。每个视角都从自己被抛的处境出发,以各自的筹划去理解和回应同一个“固国将亡”的历史时刻。扎达看到的是佛法尊严受到的亵渎,王后卓玛看到的是家族存续的危机,异乡来客昂度看到的是福音传播的契机,而巫女鸾则守护着高原最古老的文明根基。他们各自的“看”,并非对同一客观事实的不同主观解读,而是历史本身在不同生存筹划中的多重敞开^[3]。

这种罗生门式的结构因而不仅仅是作者的叙事技巧,更是对历史本身的存在方式的揭示:历史总是

收稿日期:2026-02-20

作者简介:查博文(1987—),男,黑龙江哈尔滨人,九州大学人文科学府哲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象学,存在论。

作为被理解的历史而发生,总是在具体的人的操心与牵挂中才获得其意义。没有一种“上帝之眼”能够俯瞰全部的历史真相,因为历史的真相恰恰在于它只能从有限的、被抛的、筹划着的活生生的人的视角中显现。小说中那只翱翔于博壤城堡上空的鹰,看似提供了一个超越性的视角,但即便是这只鹰,也无法将固国的命运还原为一个自在的、现成的整体——它所见证的,依然是人的悲欢与抉择在时间中的展开。

因此,《隐入高原》所书写的,与其说是固国王国的覆灭史,不如说是一种历史性的敞开。它追问的是:当一个文明走向终结时,身处其中的人如何在有限性中把握自身?他们的抉择、爱恋、背叛与殉道,如何构成了那个时代的“真实”?那枚见证两代更迭的白色鹅卵石,那些打阿嘎的歌声、酥油花的芬芳、坛城的庄严,都不是历史的“背景”或“装饰”,而是人在世界中存在的具体方式,是意义关联的网络^①,是人们借以理解自身处境并做出回应的生存境域。

历史的“真实”,在此意义上,不是指符合某种外在标准的“客观事实”,而是指人的存在本身的展开与实现。固国的百姓在末日逃亡中穿越“求生密道”,消失在传说中的净土香巴拉——这一情节,或许在史学考证的意义上无法被证实,但它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可能,却比任何编年记录都更深刻地揭示了人面对终结时的生存状态:在一切坍塌之际,人依然筹划着超越,依然“朝向某种尚未到来的可能性而存在”^{[2]52-53}。

二、命运:承担与超越的辩证

如果说历史是人的存在在时间中的发生,那么命运便是这一发生的承担方式。在《隐入高原》中,“命运”并非那种笼罩在人物头顶的神秘力量,亦非早已写定、只待逐一应验的谶语——尽管小说中确实存在着“十六代而亡”的诅咒、老国王魂灵的徘徊,以及预言般的异象。真正的命运,恰恰在于人如何在其被抛的处境中认取并承担那属于自己的可能性。

命运的本质结构在于:它既是被给予的,又是被选择的。扎西没有选择成为国王,正如扎达没有选择三岁出家,卓玛没有选择成为政治联姻的筹码。他们各自的存在从一开始便被抛入了某种特定的命运轨道之中。然而,被抛并不意味着被决定。命运之为命运,恰恰在于此在如何在其有限性中回应这种被抛性,如何在已然给定的处境中筹划属于自己

的可能。

扎西的人物弧线最为清晰地展现了这一命运结构。作为一位“天资平平、内心浪漫”的诗人国王,他最初是命运的逃避者:渴望像画匠般自由生活,在对巫女鸾的痴恋中寻找自我,试图将那属于王权的沉重责任搁置一旁。这种逃避本身并非软弱的道德缺陷,而是人面对其被抛性时的一种本真反应——谁不曾渴望挣脱那些我们未曾选择却必须背负的重担^②?然而,正是在逃避的尽头,在固国覆灭的最后关头,扎西完成了决定性的转折:他选择以身殉国,掩护十万百姓撤离。

这一转折的意义不在于从“懦夫”变成了“英雄”——这种道德化的解读将会错失命运的真正深度。扎西的转变毋宁说是一种本真的决断:在死亡作为最本己的可能性向他敞开的那一刻,他不再逃避,而是先行到死中去,从而回过头来照亮了他此生的全部意义。他终于承担起了他的命运——不是作为外在强加的枷锁,而是作为他自己最本己的可能性。那个渴望自由的诗人,最终以最不自由的方式——献出生命——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在有限性中超越有限性,在终结中开启永恒。

与扎西形成对照的是他的弟弟扎达。扎达同样被抛入了一个他未曾选择的处境——作为王弟必须出家,作为修行者却无法摆脱世俗权力的纠葛。他在欲望中失足,在对佛法尊严的执念中越陷越深,最终勾结外敌,成为“引狼入室的悲剧推手”。扎达的命运是另一种类型的悲剧:他的筹划同样出于对某种超越性价值的追寻(护法),却因为未能整全地把握自身的处境,而沦为了命运的玩物。他以为自己在捍卫佛法,实则在摧毁固国;他以为自己在反抗兄长的“背叛”,实则在背叛自己的同胞。这并非简单的判断失误,而是一种“沉沦的”命运形态:将自身消散在当下的紧迫之中,失去了对整体处境的洞察与决断的可能。

而巫女鸾的命运则呈现了另一种维度。作为“宣教”——高原最古老的原始信仰——的守护者,她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传承:她承载着远比个人生命更为悠久的东西,是文明记忆的活的载体。她与扎西之间那场“近乎献祭般的纯洁爱情”,之所以能够成为“全书对抗黑暗、走向圆满的终极力量”,恰恰在于它指向了命运的另一重可能:在一切消逝之际,爱作为一种绝对的给予,超越了权力的虚妄、信仰的纷争、生死的界限。扎西对鸾那种“即使你不知道是我救了你,我也愿意付出生命”的无名式爱

情,本身就是一种命运的承担方式:它不求回报,不计得失,只是纯粹地朝向他者而存在。

小说中那句“一切终点,都将是起点”,或许可以被理解为命运的循环结构的隐喻^[4]。然而,这种循环绝非简单的重复或轮回,而是指向了一种更为深刻的时间性体验:在每一种终结之中,都蕴含着重新开始的可能。固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消失了,但那十万穿越“求生密道”的百姓,那些消失在传说中的香巴拉的人们,他们并非简单地“逃离”了命运,而是在终结中开启了另一种存在的可能。命运在此显示出它最为悖谬的面向:正是通过接受终结,人才能够超越终结;正是通过承担有限性,人才能够抵达某种无限。

这或许也是《隐入高原》留给读者最为深沉的追问:我们每个人,同样被抛入我们未曾选择的时代与处境之中,同样面对着各种各样的“诅咒”与“预言”——那些历史的重负、文化的惯性、结构性的不公。我们将如何承担我们的命运?是像扎达那样,在执念中沉沦,最终被命运的洪流裹挟而去?还是像扎西那样,在决断的瞬间认取自身,即使是以生命为代价?抑或像鸢那样,在爱与传承中,让某种超越个体生命的东西得以延续?

固国已隐入历史的尘烟,但关于命运的追问,依然在羊同高原的烈风中回响,也在每一个阅读这部小说的读者心中回响。

三、出路:裂隙中的微光

当王城的火焰映红了最后一个黄昏,当十六代的诅咒终于如期降临,人还能朝向什么?

《隐入高原》的残酷在于,它从不许诺廉价的希望。佛法没能拯救固国,那些金碧辉煌的寺院在权力的倾轧中沦为棋子;基督的福音同样无力回天,昂度带来的不是出路,而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甚至连最古老的宣教,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守护了千年的土地被铁蹄践踏。那不可见的力量缄默,圣殿倾颓。在这片高原上,没有任何超越性的力量从天而降,将苦难一笔勾销。然而,恰恰是在那不可见的力量退场之后,出路才以最朴素的面目显现^[5]。

它首先显现为爱。在尔虞我诈的王宫里,在生死悬于一线的末世中,扎西与鸢之间的爱情几乎是一个奇迹。这份爱没有海誓山盟,没有花前月下,甚至连一个完整的相守都不曾有过。它的全部内容,浓缩在那句近乎低语的告白里:“即使你不知道是我救了你,我也愿意付出生命。”这是怎样的一种

爱?它不求被看见,不求被铭记,不求任何形式的回报。它只是给予,纯粹地、无条件地给予,如同高原上的风,吹过便吹过了,从不询问被吹拂者的姓名。

正是这份爱,在一切道路都被封死的时刻,敞开了那条“求生密道”。鸢发现的不仅仅是一条地理意义上的逃生通道,更是一个存在论的隐喻:当权力的逻辑、算计的逻辑、利益的逻辑都走向死胡同,唯有爱的逻辑能够开辟出另一条路。这条路不通向任何现成的目的地,它通向的是可能性本身——那个被称为“香巴拉”的地方,与其说是一片净土,不如说是爱所许诺的未来:只要还有人愿意为他人付出生命,这个世界便不会彻底沦入黑暗。

出路也显现为记忆。固国亡了,但那些打阿嘎的歌声还在传唱吗?那些酥油花的技艺还有人承继吗?那些坛城的图式,是否仍在某个隐秘的山谷中被一笔一笔地描绘?小说没有给出答案,但它让我们看见了这样一幅图景:十万百姓穿越密道,消失在传说之中。他们带走的不仅是自己的肉身,更是整个文明的种子。只要这些种子还在,只要还有人记得祖先的故事、先人的歌谣、古老的仪式,固国就没有真正死去。它只是换了一种存在的方式——从历史隐入传说,从尘土升华为记忆。那枚见证两代更迭的白色鹅卵石,在此意义上便是整部小说的象征:它什么也不说,却什么都记得;它不参与任何一场阴谋或战争,却比所有的阴谋与战争都更持久。

最深的出路,或许还显现为某种穿越——穿越有限,抵达那无限之境。扎西在最后时刻选择殉国,这个选择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忠君爱国的道德范畴。当死亡不再是被动承受的厄运,而是主动认领的可能,它便不再是终结,而成为一种完成。那个渴望做画匠的诗人国王,终其一生都在逃避王冠的重压;但在火焰与刀剑中,他第一次真正成了自己。不是因为他英勇、高尚,而是因为他终于不再躲闪,终于直面那个从继位之日起便悬在头顶的问题:你愿意为什么而死?这个问题的反面,正是:你愿意为什么而活?

四、人:在深渊与星空之间

在《隐入高原》中,久久萦绕心头的,不是那些惊心动魄的宫廷阴谋,不是勃犍铁骑踏碎城门的轰鸣,甚至也不是香巴拉传说的神秘光晕——而是一个更为素朴的困惑:这些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

国王扎西,在诗意人生与王冠之间撕裂了一生;扎达,在佛法与权力之间迷失了方向;王后卓玛,在母性与心机之间编织着生存的蛛网;巫女鸢,在古老

的神谕与炽热的爱情之间守护着某种即将消逝的东西；昂度，在福音与征服之间走着一条自己也未必看清的路。他们如此不同，却又如此相似——都在挣扎，都在渴望，都在某个深夜辗转难眠时追问过同一个问题：我是谁？我为何在此？我该往何处去？

这或许是《隐入高原》最隐秘的主题：在讲述一个王国覆灭的同时，它也在追问人之为人的根本。

（一）裂隙中的存在

人是一种裂隙中的存在。这是小说反复呈现却从未明言的洞见。

扎西的裂隙最为显豁。他是国王，却渴望做画匠；他拥有整个王国，却只想要一个女子的心；他被赋予了最高的权力，内心深处却是一个渴望被理解的孩子。这种裂隙不是性格的缺陷，而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处境的缩影：我们从来不是一个浑然自足的整体，而总是在“是其所是”与“是其所不是”之间被撕扯。我们被抛入某种既定的身份——儿子、女儿、臣民、君王，却又永远无法与这身份完全重合。身份如一件穿在身上的衣服，有时合体，有时勒得人喘不过气来，但无论如何，它都不是皮肤本身。

扎达的裂隙更为幽深。三岁出家，他从未选择过僧侣的身份，却不得不将一生托付于此。他在欲望中失足——小说隐晦地暗示了这一点——这失足与其说是道德的沦丧，不如说是被压抑之人的必然反弹。人不是天使，无法将肉身连同它所有的渴望一并斩断；人也不是野兽，无法心安理得地随波逐流。人恰恰悬在天使与野兽之间，既不能上升到纯粹的灵，也不能下降到纯粹的肉，而只能在这两极的张力中艰难地维持平衡。扎达的悲剧，正在于他既无法真正舍弃尘世，又无法真正拥抱尘世，最终在两头落空中滑向了深渊。

王后卓玛的裂隙则呈现为另一种形态。作为政治联姻的产物，她的身体是交易的筹码，她的子宫是权力延续的容器。在这种彻底的工具化中，她本可以成为一个空洞的符号，一个没有内在性的棋子。然而，母性——那种对自己孩子近乎本能的守护——将她从符号的命运中打捞了出来。她撒谎、算计、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包括那个来自远方的来客。这些行为在道德的天平上或许难以称为“善”，但它们却证明了一件事：即使在最严酷的压迫下，人依然会挣扎、抵抗，依然会试图为自己夺回哪怕一丁点的主动权。卓玛的裂隙是工具与目的之间的裂隙：她被当作工具，却拒绝仅仅作为工具而存在。

（二）欲望与超越

人是欲望着的存在。这听起来像是一句老生常谈，但《隐入高原》让我们看到了欲望的复杂面貌。

最表层的欲望是对具体之物的欲望：权力、财富、肉体的愉悦、敌人的臣服。这种欲望在小说中比比皆是。老国王对王位执念深重，以至于死后魂灵依然在城堡中徘徊；勃葦国王森格凯觐固国土地，不惜以百姓为人盾围困博壤城；布让寺僧团对寺产和权势的贪恋，让他们忘记了佛陀当年舍弃王位出家的本意。这些欲望如同地心引力，将人向下拉扯，拉向更沉重、更黑暗的所在。

然而，人的欲望从来不止于此。在对具体之物的欲望背后，总有一种更幽微的渴望在涌动——那是对意义的渴望，对超越的渴望，对某种高于此时此地之物的渴望。扎西对鸢的爱，远远超出了肉体的层面；他渴望的不只是她的身体，而是与她一同抵达某个更纯净的所在，某个不被权力污染的角落。扎达对佛法的执念，尽管最终导向了灾难，但在其源头处，未尝不是一种对超越性价值的真挚向往——他只是在追寻的路上迷了路。甚至昂度，在他那些带着殖民色彩的传教行为背后，或许也有一丝真诚的信仰在闪烁；他真的相信，他正在拯救灵魂。

这就是人的吊诡之处：人被欲望驱动，却不满足于仅仅满足欲望；人活在有限之中，却永远朝向无限。人是这样一种奇怪的存在——扎根于大地，却仰望星空；囚禁于肉身，却梦想飞翔。这种“既……又……”的结构，正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标识。动物没有这种撕裂，因为它们完全沉浸在当下的需求之中；那不可见的力量也没有这种撕裂，因为它们已经抵达了圆满。唯有人，悬在动物与那不可见的力量之间，永远处于途中，永远在路上。

（三）面具与真容

在《隐入高原》的人物群像中，人还是一种戴着面具的存在，几乎没有人是“表里如一”的。每个人都有一张面对世界的脸，和一张只在深夜独对的脸。

扎西的面具是国王，真容是诗人。扎达的面具是高僧，真容是一个迷惘的、在欲望与戒律之间挣扎的普通人。卓玛的面具是温顺的王后，真容是一头护崽的母狼。鸢的面具是神秘的巫女，真容是一个渴望被爱也愿意为爱付出一切的女子。昂度的面具是上帝的使者，真容是一个野心、虔诚、困惑交织的异乡人。

人为何需要面具？因为赤裸的真容太过脆弱，禁不起世界的凝视。面具是我们的铠甲，保护着那

些柔软的、可能会受伤的部分。但面具戴得久了，有时会长在脸上，让我们忘记自己本来的模样。扎达的悲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面具与真容彻底割裂的悲剧：他太久以“佛法守护者”自居，以至于当这个身份受到威胁时，他宁可毁掉整个王国，也要维护这张面具的完整。他已经分不清究竟是他在守护佛法，还是“守护佛法者”这个身份在支配他。

而扎西的成长，恰恰是一个逐渐卸下面具的过程。在小说的开头，他躲在王子的身份背后逃避责任，躲在对鸢的爱情中寻找慰藉。他的面具不是强悍，而是软弱——一种精心营造的、让自己可以不必承担太多责任的软弱。但在最后的关头，当一切面具都变得毫无意义时，他露出了自己的真容：一个愿意为他者赴死的人。这真容是他此前从未向世界展示过的，或许连他自己也从未真正见过。唯有在终结的边缘，它才破茧而出。

（四）有限中的尊严

读《隐入高原》，最令人动容的，或许是那些在绝境中依然保有尊严的时刻。

十万百姓穿越求生密道，消失在传说之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名字，没有故事，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但他们没有跪下，没有投降，没有成为勃律国王展示胜利的道具。他们选择了离开——带着祖先的记忆、古老的歌谣、打阿嘎的技艺、酥油花的配方。他们带走了一切使他们成为“固国人”的东西，只把一座空城留给了征服者。

这是一种无声的抵抗，一种尊严的宣言：你可以占领我们的土地，却无法占领我们的灵魂；你可以摧毁我们的城池，却无法摧毁我们之所以为我们的根本。人的尊严，最终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在失去一切时依然能够直立行走。那十万人在密道中摸黑前行的身影，是整部小说最庄严的画面——比任何一场辉煌的胜仗都更庄严。

扎西的殉国同样是彰显尊严的时刻。一个一生都在逃避的人，在最后选择了面对。这个选择没有观众，没有史官在旁记录，没有后人会为他修建祠堂。他只是做了他认为应该做的事，然后死去。这种没有任何外在支撑的选择，恰恰是人的尊严的极致表达：不是为了荣耀，不是为了被铭记，只是因为，在那个瞬间，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五）人是一个“问题”

《隐入高原》并没有告诉我们“人是什么”，它只

是从不同的角度，不断地追问这个问题。

或许，这恰恰是小说的智慧所在。人不是一个可以被定义、被封装、被一劳永逸地解释清楚的对象。人是一个问题——一个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的问题。每一代人都要重新追问这个问题，每一个人都要用自己的一生去回应这个问题。答案不在任何一本书里，不在任何一位圣人的教诲中，也不在任何一座庙宇或教堂里。答案在追问本身之中，在我们每一次抉择、每一次爱、每一次面对深渊时没有闭上眼睛的勇气之中。

扎西是一个问题，扎达是一个问题，卓玛是一个问题，鸢是一个问题，昂度是一个问题，那十万消失在传说中的人是一个问题，读着这本书的我们也是一个问题。《隐入高原》所做的，不是回答这些问题，而是让这些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更加切身、更加无法逃避。

人是什么？人是一个在深渊与星空之间摇摆的存在，既可能堕入黑暗，也可能抵达光明^[6]。人是一个戴着面具寻找真容的旅者，终其一生都在路上。人是一个有限的存在，却在有限中向往无限；是一个必死的存在，却在必死中追问永恒。人是一个不断提问的存在……

五、结语：隐入与回响

写到这里，羊同高原上的风似乎穿过了纸页，带来了酥油茶的气息与玛尼堆的沉默。

《隐入高原》是一部关于消逝的书。一个王国消逝了，一种文明消逝了，无数的人与无数的故事消逝在历史的褶皱之中。我们不知道那十万穿越密道的人后来去了哪里，不知道香巴拉确有其地还是仅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小说悬置了所有确定的答案，只留下一片苍茫。但或许，正是这种悬置，让《隐入高原》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小说，而成为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自身的处境。曾经笃定的信念逐渐动摇，曾经明晰的前路日渐模糊。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体会过故乡失落带来的眩晕感：身处飞速变迁的时代，脚下的土地正在松动，全新的精神栖身之地，却尚未成型。

《隐入高原》传递给我们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那些古老却常新的问题：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命运？什么是出路？更切身的问题是：面对困境时，我们将如何选择承担？我们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求生密道”吗？我们愿意为什么而付出生命、又因此而真正地活过吗？

固国隐入了高原的云雾与烈风之中。那些王

公与僧侣、巫女与异乡来客,都已化为尘土。但读者翻开这本书的时刻,固国便从它的隐匿之所短暂地返回,带着它所有的悲怆与辉煌、阴谋与爱情、绝望与希望,在我们的意识中重演一遍它的兴衰。

而当我们掩卷,走向各自的生活,那些问题便也随我们一同离开书页,在我们的心底继续回响——如同羊同高原上永不停息的风。

注释:

- ①海德格尔认为,世界不是诸物的总和,而是意义关联的整体,是人在其中展开生存筹划的境域。打阿嘎的歌声、酥油花、坛城等文化物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构成了固国人的“世界”。
- ②海德格尔将这种对本真自身的逃避称为“沉沦”(Verfallenheit),这不是道德意义上的堕落,而是此在的一种基本存在方式:消散于日常的操劳与公众的解释之中,逃避对

自身有限性的直面。

参考文献:

[1] 孙瑜. 隐入高原[M].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26.

[2]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M].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1927.

[3] HANS-GEORG GADAMER. Wahrheit und Methode[M]. Tübingen: J. C. B. Mohr, 1960.

[4] 海德格尔. 尼采(上下卷)[M]. 孙周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5] MARTIN HEIDEGGER. Wozu Dichter? in Holzwege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50).

[6] FRIEDRICH NIETZSCHE.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Ein Buch für Alle und Keinen [C]. Chemnitz: Ernst Schmeitzner, 1883-1885:4.

(责任编辑 刘海燕)

The Remnants of History and the Inquiries about Fate

— On Sun Yu's Novels Collection *Vanished into the Highlands*

ZHA Bowen

(Faculty of Humanities, Kyushu University, Fukuoka 819-0395, Japan)

Abstract: *Vanished into the Highlands* is a historical-themed novel se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downfall of the ancient Gu Kingdom in the 17th century. The novel employs a multi-perspective narrative approach-the king, the ascetic, the queen, the witch, the foreign visitor, even the deceased souls and the eagle-each narrator starts from their own predicament and uses their own plans to understand and respond to the same "the country is on the verge of collapse" historical moment. The diversity of this historical narrative, that is, the interweaving of the perspectives of many real people, provides a vivid description and profound reflection on history, fate, transcendence, and the essence of human beings. This makes this work transcend the ordinary sense of a historical-themed novel and becomes a mirror reflecting the human existence situation.

Keywords: *Vanished into the Highlands*; the Gu Kingdom; Essence of the human being; Heidegger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区域协同路径研究

周书焕, 柴刘锦

(河南工程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郑州 451191)

摘要: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生态状况直接关乎调水水质安全、居民用水保障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对推进沿线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水源区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过程中仍存在治理主体权责界定模糊、区域协同联动机制薄弱、社会公众参与度不高等突出短板,需从多方面探索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区域协同创新路径:搭建统筹全局的顶层管理协同机制,构建权责清晰的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打造高效联动的跨区域协同共治机制,组建科学有效的区域协同立法保障机制,强化水源区主体责任与权益保障机制,建构水源区常态化长效治理管理机制,为实现水源区可持续发展目标奠定坚实的资源环境基础。

关键词:水源区;生态环境;区域协同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2.004

中图分类号:F124.5;X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2-0020-07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要“加强重要江河湖库系统治理和生态保护”“提高水资源集约安全利用水平”,四中全会公报作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部署^[1]。水资源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资源调配更是事关战略全局、事关长远发展、事关人民福祉的国之大事。截至2025年10月31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64.73亿立方米,工程惠及沿线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近1.18亿人^[2],为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支撑和水安全保障。

生态环境保护事关水源区生态安全、水质安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生态状况直接关乎调水水质安全、居民用水保障和区域经济发展,对推进沿线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丹江口水库时指

出,要把水源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守好这一库碧水^[3]。自正式通水以来,丹江口水库水质长期稳定在地表水Ⅱ类及以上标准,这得益于水源区有效的生态环境保护 and 治理,也有效推动了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动态平衡。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地跨陕西、河南、湖北等省份,水源区内周至、宁陕、栾川、镇坪、竹溪、竹山等县域生态效率整体偏低,且呈现“东北低—西南高”的空间分布格局^[4]。因此,推进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生态环境治理省际合作,实现水源区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治理,对于守好一泓清水、为美丽中国建设筑牢水生态屏障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区域协同的重要意义

(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良好的生态环境保障水资源战略安全

水资源是国土空间资源中重要的生产要素,在

收稿日期:2026-02-02

基金项目:2025年度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区域协同路径研究”(252400410656);2026年度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河南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测度及效能提升研究”(262400411423);2025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调研课题“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研究”(SKL-2025-2206)

作者简介:周书焕(1973—),女,河南泌阳人,博士,河南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管理科学。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安全、洁净的水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它离不开良好的生态环境。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位于伏牛山南麓与大巴山之间,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功能区,其生态环境状况关系着水质安全,是水资源安全的重要保障。水源区的湿地、森林等生态系统及水土保持措施能够有效减少水土流失,降低水体污染的风险。据统计,2022—2024年间,水源区水土流失面积逐年递减,累计减少613.02平方公里,减幅4.70%^[5],大大降低了泥沙入河对水质的干扰。水源区的水质净化、水源涵养能够有效增强水资源的调蓄与自净能力,显著提升水生态系统的承载力,监测表明,2022—2023供水年度,陶岔渠首断面水质均符合Ⅰ~Ⅱ类水质标准,其中达到Ⅰ类水质标准的天数达342天,占比94%^[6]。近年来,生态效益在北方地区持续显现,自2018年以来,京津冀治理区浅层地下水回升和稳定面积占比达92%,水位平均回升2.25米;深层承压水回升和稳定面积占比达97%,水位平均回升6.72米^[7]。2024年10月,河北沧州的深层地下水位同比回升1.68米,较2018年同期回升了9.46米^[8]。得益于水资源保障能力的提升,华北地区的白河、淇河、安阳河、滏阳河、七里河等50多条河流实现生态复苏^[7]。此外,水源区实施退耕还林、生态补偿等生态保护措施,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在地、核心水源区的淅川县,平均每年造林7万余亩,通水以来累计造林超60万亩,库区森林覆盖率达61.7%^[9],这些措施有效降低生态系统压力,进一步强化水源区水土保持功能,为水资源的开发和可持续利用奠定基础。

(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良好的生态环境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深刻阐明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生态保护和生产力发展并非对立关系,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良好生态环境能够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水源区县域摒弃传统粗放型发展模式,大力培育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形成“生态+产业”的发展新格局,带动人民收入稳步增长。据统计,水源区国民生产总值从1999年的546.71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7684.41亿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99年的3359.17元增长到2019年的40213.76元^[10]。生态补偿资金的落实、民生保障工程的推进,进一步巩固了脱贫攻坚成果,让居民在生态保护中切实感

受到获得感与幸福感,实现了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良性互动。此外,水源区各县域出台一系列生态保护举措,有效改善了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提升了生态效率。2008—2022年间,水源区卢氏县、竹山县大力降低烟(粉)尘排放量分别达17.6和11.1个百分点,竹溪县、汉阴县、房县、山阳县等加大废水排放治理力度,年均下降率均超过了11个百分点^[4]。河南省淅川县先后创成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县,“河南丹江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保护与修复”案例入选联合国“生物多样性100+全球典型案例”,丹江口水库获评2023年度“河南省美丽幸福河湖”第一名^[11],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筑牢生态根基。

(三)区域协同联动保障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生态环境安全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涵盖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规划中涉及商洛、洛阳、三门峡、南阳、十堰、汉中、安康等七市的区域。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的跨域性特征日益凸显,例如藻类暴发的风险增加,自中线工程投入运营以来,2015、2016、2018和2021年汉江中下游地区已发生四次大规模有害藻类水华^[12]。峰值流量的减弱甚至消失,严重损害了溯河产卵鱼类的产卵活动^[13],造成鱼类生物多样性下降,并危及中国四大鲤科鱼类的繁殖能力^[14]。研究发现,中线工程段藻类叶绿素a含量和细胞密度从丹江口水库向北京段逐渐增加^[14]。因此,传统“单打独斗”的治理模式因其治理主体责任界限模糊、资源要素分散等制约,难以适应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区域协同联动能够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从过去单纯依靠“内部协作”转变为“内外联通”,从“各自为战”的分散治理转变为“全域共治”的协同格局,有利于推动建立跨区域生态环境治理联防联控机制,补齐“单打独斗”模式下治理主体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治理短板,促进生态环境的整体性保护和系统性治理,进而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生态良性循环。此外,区域协同联动还能够破解跨区域深层次环境难题,保障生态环境治理效能。通过搭建跨区域治理平台,统筹推进全流域、跨区域的污染治理行动,从源头破解污染跨界传输难题,实现深层次环境问题的系统性解决,推进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区域协同存在的问题

(一)治理主体责任界定模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明确规定,水资源管理

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基本制度。作为跨区域重大水利工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涉及甘肃、陕西、重庆、四川、河南、湖北等6省(直辖市)49个区(县),管理主体众多、利益诉求交织,呈现典型的碎片化、分散化治理特征。从纵向看,治理主体涵盖受水区与供水区9省(直辖市)的省、地、县三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形成层级递进的监管链条;从横向看,水利部、生态环境部等中央职能部门依职责参与水资源调配、生态监测等工作,构成多部门协同治理格局。然而,由于行政主管部门间权责边界划分不够明晰,实践中存在权责交叉重叠与权责真空并存的困境。十堰市水利和湖泊局2025年的整改公示显示,在丹江口库区清漂工作中,库管单位与地方政府在清漂责任主体方面存在分歧,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导致清漂细则从市级层面暂未能印发^[15]。这种权责模糊状态,使治理过程中产生问题时容易陷入相互推诿、权责悬置的“避责性扯皮”困境。在监督执纪层面,平顶山市纪委监委2025年开展的专项监督共发现问题线索8条,党纪政务处分8人,涉及场所182处^[16],这一情况反映出权责不清背景下追责落实的复杂性。

权责界定模糊直接导致治理资源分散、治理行动难以协同。据调研,2025年库管单位为推动政企协同,向涉库5县市区政府提供2000万元资金支持地方建设清漂设施^[15],这一举措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权责划分的不足,但也折射出常态化的权责协同机制尚未健全的现状。这种治理格局显著制约了协同治理机制的运行效率,进而弱化了生态环境治理的整体成效。

(二) 区域协同联动机制薄弱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主要指汉江流域丹江口大坝以上地区,地域范围横跨甘肃、陕西、重庆、四川、河南、湖北等6省(直辖市),涵盖商洛、宝鸡、十堰、汉中、南阳、三门峡等多个地市。区域内涉河管理、生态保护、水资源调度等工作虽涉及水利、环保、农业等多个职能部门,但尚未建立起完善的跨区域、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各省(直辖市)之间的利益诉求难以有效统筹,导致跨区域治理缺乏深度合作,协同效能不足。据调研,在跨区域联动方面,南阳虽与商洛、十堰、洛阳、三门峡等9市签订了《跨界流域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框架协议》,但实际执行中仍存在协调不畅的问题^[17]。在水源区调度方面,目前尚未建立覆盖全流域的水工程联合调度机制,水资源调配与生态流量保障之间存在脱节,致使水源区生态保护与水资源管理呈现明显的碎片化、分散化特征,调度执行的监督力度也相对薄弱。据生

态环境部公开信息,目前仅在丹江口库区及其上游设置了75个水环境质量国控断面、22个水生态监测点位^[18],但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尚未健全。直至2025年,“三省七市”(豫、陕、鄂三省,洛阳、三门峡、南阳、汉中、商洛、安康、十堰七市)才通过协同立法构建起跨区域保护新格局,《关于加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共同保护的決定》于2026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标志着水源区保护从“各自为战”走向“协同共治”。在监测数据管理方面,各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重复采集数据,造成行政资源的浪费。十堰市在县域跨界水环境质量考核中虽已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全市每年归集3300万元用于水质考核奖补,但跨省层面仍缺乏统一的数据采集标准和共享平台^[19]。监测数据分散于多个职能部门,跨区域、跨部门的信息共享与协调联动不足,难以对水源区的生态环境、水文变化、农业用水等关键要素开展系统性综合分析。这不仅制约了监测数据的综合利用效率,也影响了职能部门在制定科学有效的综合管理决策时获得准确、全面的信息支撑。

(三) 社会公众参与度不高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惠及沿线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近1.18亿人。作为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直接受益者,社会公众不仅是协同治理的重要主体,更是推动治理成效不可或缺的监督力量。然而,当前公众在水源区水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治理中的参与度普遍偏低,这一短板已经成为制约区域协同治理效能提升的突出问题。公众参与度不高,首先表现为参与规模与受益人群极不匹配。沿线近1.18亿的受益人口中,真正参与到水源保护实际行动中来的比例微乎其微,绝大多数公众仍停留在“知道有这项工程”的认知层面,而未能转化为“参与保护工程”的实际行动。究其根本原因,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公众参与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尚不畅通。在当前的协同治理框架中,公众参与的边界模糊、权责不清。虽然在宏观政策层面屡屡强调公众参与的重要性,如2025年丹江口市创新构建“党建引领、党员带头、全民参与”的护水机制,设立826个党员护水示范岗、划定3947个责任区,7600余名党员带头保水护水^[20],但在微观操作层面,普通民众通过何种途径、在哪个环节、以何种程序参与水源保护,缺乏明确的法律指引和制度规范。目前的参与形式多停留在“事后监督”层面,如发现问题后进行投诉举报,而在政策制定、规划论证、项目审批等前端决策环节,公众意见表达的制度性通道严重缺失,导致公众难以从源头上介入治理过程。

其二,参与途径不够完善且可及性差。现有的参与平台往往信息分散、操作复杂,对参与者的专业知识、信息获取能力有一定要求。以水源地丹江口库区为例,仅丹江口市境内库岸线就长达约 2313.2 公里^[21],面对如此广袤的监督范围,普通公众即便有参与意愿,也往往因缺乏便捷高效的“随手拍”“一键反馈”等数字化工具,或因“不知找谁”“不知怎么提”而望而却步。

其三,环保责任意识与公共意识有待提升。2025 年 3 月,由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湖北省广播电视台、湖北省委网信办联合制作的重大选题《是这个理:我是“守井人”》,通过对京津冀豫中线沿线城市三个月的实地调研,访谈基层干部、水利工作者、社区居民等 67 人,回收有效问卷 2178 份,全面梳理了当前公众对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认知存在的短板。调研显示,仅 37% 的受访者能准确说出中线水源地为丹江口水库,高达 56.3% 的人误以为水源来自三峡水库,更有超过六成公众无法区分东线、中线和西线的功能差异^[22]。长期以来形成的“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环保是政府的事”的思维定式。在缺乏有效激励和引导的情况下,部分公众将自身定位为被动的受益者,而非主动的守护者,缺乏“同饮一江水,共担一份责”的共同体意识。

上述多重因素叠加,导致公众的意见和建议难以有效表达,即便表达了,也缺乏转化为治理决策的反馈机制。值得关注的是,202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安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共同保护的決定》,明确提出鼓励公民、法人、社会组织 and 新闻媒体等社会各方面对水源区保护工作进行监督。这释放了积极信号,但也从侧面印证了当前公众参与制度化建设的滞后——正因参与渠道长期不畅,才需要通过地方立法予以刚性保障。因此,如何将立法要求转化为可操作的参与路径,如何在更大范围内复制推广这一制度探索,仍是当前区域协同治理亟须破解的现实难题。

三、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区域协同路径

水源区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治理应超越属地主义模式,打破区域地方保护与行业壁垒,强化区域协调管理,建立常态化“以政府为中心,社会各要素多元参与”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路径体系。

(一)搭建统筹全局的顶层管理协同机制

搭建统筹全局的顶层管理协同机制,是水源区

生态环境保护区域协同治理高效运行的重要前提,是破解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发展之间矛盾博弈、确保区域协同治理高效运行的重要前提。水源区生态的敏感性与地方追求经济增长的现实之间客观存在张力,单纯依靠市场调节或地方自发行动难以实现平衡,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通过高站位的顶层设计,统筹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其一,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创新激励与约束并重的政策工具。政府应转变单一监管的角色,主动为企业等经营主体提供精准化的政策补贴与绿色金融支持,引导其践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同时,要运用好市场机制,通过排污权交易、生态标签产品推广等方式,激发企业及社会资本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内生动力,让保护环境者有利可得。其二,加快完善系统集成配套的配套政策体系。顶层设计需要细化的政策支撑。要加快出台针对水源区的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偿、绿色奖补等配套政策,明确各级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公众在协同治理中的行为规范与权利义务。通过健全的制度设计,调动各方参与协同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格局。其三,持续加大关键要素的保障投入力度。协同治理离不开坚实的资源基础。要强化政府的财政兜底作用,持续增加对水资源保护、环境治理的技术研发、人才引进、数据监测等方面的投入。同时,要积极拓宽社会资本融入的渠道,探索建立绿色基金、引入 PPP 模式等,推广应用先进的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技术,不断提升协同治理的科技含量与整体效能。其四,高度重视并发挥宣传教育的引导作用。长效治理离不开全社会环保意识的觉醒。应通过多渠道、多层次的宣传教育,普及水源保护知识,提升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担当。通过激励性政策,鼓励公众从身边做起,积极参与环保监督与志愿服务,为水源区协同治理奠定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构建权责清晰的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是一项涉及环境保护、水利、农业农村、林业、自然资源及工业等多个政府部门的系统性工程。由于各部门法定职责不同,长期形成的工作重点与业务目标也存在显著差异。倘若缺乏有效的横向协同与纵向联动机制,在实际工作中极易引发职能交叉、多头执法或监管真空,甚至在面对复杂问题时出现责任推诿,从而严重削弱协同治理的整体效能。因此,构建一套权责清晰、运行高效的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是凝聚部门合力、实现水源地系统治理和高效治理的关键举措。

一方面,要建立实体化的跨部门协同联动工作

小组或联席会议制度。针对水源区保护治理的综合性、跨界性特征,应成立由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牵头,生态环境、水利、农业农村、林业、住建等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合指挥机构。其核心任务是以清单形式科学划分并动态调整各部门在水源涵养、污染防治、岸线管理、农业面源控制等具体领域中的职责边界与管辖权限,确保每一项治理任务都有明确的牵头部门和配合单位。这是破解传统体制下管理碎片化、职能分散化问题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要加快构建标准统一、数据共享的水源区生态环境信息共享平台。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打破部门间的“数据孤岛”,推动各相关主体按照统一规范上传并实时更新水源区的水文水资源、水质监测、污染源普查、土地利用、生态红线等核心数据。通过构建跨部门的数据融合与分析系统,不仅可以提升对水源区生态环境风险的协同监测、精准预警和科学预防能力,还能联合执法、应急处置和成效评估提供可靠依据。以信息流的畅通带动业务流的协同,从而有力保障水源区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能够在统一的数据底座和认知框架下稳步、高效推进。

(三) 打造高效联动的跨区域协同共治机制

中线工程水源区涉及甘肃、陕西、河南、湖北等6省市49个区(县),人口超过1500万。这一区域行政区划众多,条块分割的管理特征明显,受此制约,各地在生态环境保护中易出现标准不一、步调不齐、资源调配不畅等问题,难以形成有效的协同治理合力。因此,必须着力强化跨区域协调管理,打造一套权责清晰、运行高效、多方联动的跨区域协同共治机制,从根本上破解“九龙治水”的困局。

一方面,要组建以水源区整体性保护为核心的高层级跨区域协调机构。鉴于水源区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利益诉求存在显著差异,单纯依靠地方自发协调往往难以达成共识。建议由国家相关部委牵头,联合流域管理机构及6省(直辖市)各级政府,组建具有权威性的水源区保护协调委员会或联席会议。该机构的核心职能在于制定统一的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和流域治理标准,通过顶层设计进行统筹干预,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对于跨界的资源分配、污染纠纷等难题,进行动态协商与裁决,确保各区域在保护目标、治理步调上的高度统一,实现区域间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跨区域协商对话机制和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保障跨区域协同治理的可持续运行。协商对话机制不仅包括定期的政府间会晤,还应拓展至联合巡查、信息共享、应急联动等具体层面,通过常态化的沟通协调,及时化解利益冲突,巩固各方的共同利

益基础。同时,要加快建立健全市场化、多元化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这意味着,受水区或下游发达地区应通过资金补助、产业转移、人才培养等方式,对水源区因保护生态而牺牲的发展机会给予合理回报。这种基于公平原则的利益反哺,能够有效激发水源区各县域参与治理的内生动力,将“要我保护”转变为“我要保护”,从而全面提升水源区跨区域协同治理的整体成效,确保一库清水永续北上。

(四) 组建科学有效的区域协同立法保障机制

水源区横跨多个省份的空间属性,决定了其生态环境治理的复杂性,这就必须突破地域局限,加快出台水源区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专项制度法规,为水源区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优质法律服务。因此,组建科学有效的区域协同立法保障机制,通过制定统一的立法规范,能有效破解区域间存在的制度差异、执法标准不一等问题,为区域协同治理提供刚性约束。其一,设立跨区域协同立法专门机构,保障治理规则制定和协同治理过程的公正性,推动水源区管理从传统的碎片化、分散化管理转变为整体化、系统化治理。其二,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明确协同治理主体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等,为协同治理机制的长效运行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其三,结合区域资源禀赋与发展实际,出台相应的地方性法规,并参照国内外治理经验科学编制协同治理开发规划,以保障协同治理工作有序推进。

(五) 强化水源区主体责任与权益保障机制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是一项涉及多层级、多主体的复杂系统工程,明晰的权责管理制度是确保区域协同治理有序、有力、有效推进的重要保障。因此,必须进一步强化水源区主体责任与权益保障机制,通过科学划分各区域主体的责权边界,构建起水源区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中责、权、利相统一的管理路径。

一方面,要科学划分各治理主体在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职责,构建清晰的权责体系。这需从法律和政策层面,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省、市、县、乡)在水源保护、污染防控、生态修复等方面的属地管理责任和支出责任;同时,细化对重点排污企业、农业经营主体、社会组织以及居民个人的环保义务规范。通过建立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确保每一项治理任务都有明确的主体负责,每一项环保要求都能落实到具体单元,避免出现责任交叉或监管真空。另一方面,要健全常态化的监督考核与追责问责机制,形成有力的倒逼机制。要将水源区生态环境保护成效纳入相关党政领导干部的综合考核评

价体系,实行严格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监督不能仅停留在政府内部的层级监督和审计监督,更要发挥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应畅通公众参与渠道,鼓励社会公众通过举报热线、网络平台等方式,对环境违法行为和治理过程中的失职渎职、敷衍塞责现象进行监督。对于群众反映强烈、反复出现的问题,要建立快速响应与核查处理机制,并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公开曝光,以此倒逼各方主体切实履行治理责任,确保各项治理措施落地见效。

通过明晰责权与严格监督,不仅能压实各主体的保护责任,也能为水源区争取更多发展补偿和政策倾斜,最终在保障“一泓清水永续北上”的同时,实现水源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六)建构水源区常态化长效治理管理机制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成效关乎亿万群众的饮水安全与受水区的可持续发展。鉴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复杂性和治理过程的反复性,这项工作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必须建构一套行之有效的常态化长效治理管理机制,确保保护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和持久性。

首先,创新风险排查技术手段,筑牢风险预警防线。要改变过去主要依靠人工巡查、效率低且存在盲区的传统模式,充分运用“遥感监测+无人机航拍+地面传感器监测”的天地一体化模式,构建“空天地”立体监测网络。通过高频次、大范围的遥感影像解译,及时发现库区及上游流域的疑似违规开发、面源污染加重等宏观态势变化;利用无人机航测对重点入库河流、消落带、隐蔽沟谷进行精细化核查,实现风险隐患的早期识别与精准定位,变被动应对为主动预防,切实保障水源区生态环境安全。

其次,强化源头管控,对排污行为实施长效化闭环管理。要持续深化并拓展河湖长制效能,将其作为核心抓手,对水源区各类排污口开展“查、测、溯、治、管”全链条闭环管理。不仅要管住点源污染,更要结合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系统治理农业面源和生活污水。通过建立动态更新的排污口台账和定期巡查制度,形成“发现—移交—整改—销号”的监管闭环,不断巩固和提升治污成效,切实提升水源区水环境的韧性与风险防范能力。

再次,推动数字技术赋能治理升级,提升管理效能。加快建立集数据采集、模拟分析、决策支持于一体的智慧水务监管体系。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水质、水量、水位及重点污染源进行实时监控、智能预警和趋势预测。依托数字化手段,

实现管理的精准施策与高效执行。同时,围绕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与人水和谐的目标,通过科学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增强河岸缓冲带、湿地等生态系统功能,提升水源区生态系统的自我净化、自我修复能力,构建健康稳定的高品质水生态系统。

最后,建立健全区域协同与补偿机制,夯实治理基础。水源区为保护水质牺牲了一定的发展机会,亟须推动建立制度化、规范化的水源区与受水区对口协作机制。这不仅应包括流域层面的联防联控,共同应对突发水污染事件,更应拓展至产业发展、生态补偿、人才技术交流等领域。通过积极争取国家及受水区的生态环保专项资金、横向生态补偿资金,支持水源区各县域建设环保基础设施、发展生态替代产业,从而促进区域生态效率的均衡提升与发展权利的公平共享,最终实现水源区生态高水平保护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共进。

参考文献:

[1]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 [EB/OL]. (2025-10-23) [2025-12-30]. <https://www.qstheory.cn/20251023/e8dcec192119413289225398639a7a80/c.html>.

[2] 许润亿. 南水北调中线年度调水任务完成 受益人口近 1.18 亿 [EB/OL]. (2025-11-05) [2026-03-06]. http://district.ce.cn/newarea/roll/202511/t20251105_2560399.shtml.

[3] 夏先清,董庆森,杨子佩,等. 共护一库碧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保护与发展情况调查[N]. 经济日报, 2024-05-06.

[4] 薛宝琪.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县域生态效率变化及驱动因素[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5, 34(9): 2066-2077.

[5] 陕西省水利厅. 2023 年陕西省水土保持公报 [EB/OL]. (2024-11-19) [2026-01-08]. https://slt.shaanxi.gov.cn/zfxgk/fdzdkgknr/zdgz/szygh/202411/t20241119_3197876.html.

[6] 保障“三个安全” 护佑一泓清水永续北上 [EB/OL]. (2024-01-19) [2026-01-08]. http://nsbd.mwr.gov.cn/zw/yxgl/202401/t20240121_1730619.html.

[7] 李鹏翔,李思远,张阳. 南水北调工程生态效益日益显著 [N]. 河北经济日报, 2024-12-13.

[8]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全面通水十年:显著改善沿线民生,持续发挥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EB/OL]. (2024-12-12) [2026-01-08]. https://china.cnr.cn/news/20241212/t20241212_527006601.shtml.

[9] 南水北调·十年十人 | 一江碧水 一片痴心 [N]. 河南日报, 2024-12-12.

[10] 李涛. 近 20 年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经济发展时空差异分析 [J]. 自然科学, 2024, 12(6): 1256-1262.

- [11] 中华,王怡潇.“美丽河湖”润泽幸福生活 河南上报丹江口水库等5个优秀案例争创国家级美丽湖[EB/OL]. (2023-06-02)[2026-03-06]. <https://www.henan.gov.cn/2023/06-02/2754449.html>.
- [12] 李建,尹炜,贾海燕,等. 汉江中下游水华防控生态调度研究[J]. 湖泊科学,2022,34(3):740-751.
- [13] YU M, WOOD P, VAN DE GIESEN N, et al. Enhanced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induced by a large scale water diversion project[J]. Stochastic Environ Res Risk Assess,2020,34(12):2125-38.
- [14] YAN H,LIN Y,CHEN Q,et al. 南水北调工程生态环境影响研究综述:跨流域调水的影响[J]. Engineering, 2023,30(11):161-169.
- [15] 十堰市水利和湖泊局. 关于南水北调中线湖北水源区水质污染防治协同监督检查反馈第19号问题整改完成情况的公示[EB/OL]. (2025-10-23)[2026-03-06]. http://slj.shiyan.gov.cn/sslsdj/sfgwgkml/gzdt/202510/t20251023_4838016.shtml.
- [16] 陈灿灿. 平顶山:铁纪守护千里水脉永续北上[EB/OL]. (2025-11-20)[2026-03-06]. https://www.hnsjw.gov.cn/sitesources/hnsjct/page_html5/jdzjzfyw/ztyw/article6062bdf9e1242f6be6b3190f899055d.html.
- [17] “理念—制度—行动”多维互动推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地协同发展[EB/OL]. (2025-06-18)[2026-03-06]. <https://rmlt.com.cn/2025/0618/733065.shtml>.
- [18] 生态环境部. 关于政协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00326号(农业水利类032号)提案答复的函[EB/OL]. (2025-07-22)[2026-03-06].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3/202511/t20251113_1133425.html.
- [19] 十堰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对市政协六届四次会议第42号提案会办工作的意见[EB/OL]. (2025-09-09)[2026-03-06]. http://sthjj.shiyan.gov.cn/shjbhj/sfgwgkml/qtzdgknr/jyhtabl/zxta/2025/202512/t20251215_4871761.shtml.
- [20] 丹江口市:“小水滴”扛起“大担当”全民同心护碧水[EB/OL]. (2025-08-22)[2026-03-06]. http://fgw.shiyan.gov.cn/xwzx/xsdt/202508/t20250822_4802809.shtml.
- [21] 陈周璇. 湖北丹江口:以流域综合治理绘就水安全画卷[EB/OL]. (2024-04-10)[2026-03-06]. <https://hb.cri.cn/n/20240410/71422442-95d7-3f14-cc6d-b51b63bfbefc.html>.
- [22] 胡文江.“南水北调”中线通水十年 公众认知亟待进一步提升[EB/OL]. (2026-02-03)[2026-03-06]. <https://www.hbskw.com/p/84935.html>.

(责任编辑 刘成贺)

Study on the Regional Collaborative Paths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Governance in the Water Source Area of the Middle Route of the South-to-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ZHOU Shuhuan, CHAI Liujin

(School of Marxism, Henan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Zhengzhou, Henan 451191, China)

Abstract: The ecological status of the water source area of the Middle Route of the South-to-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safety of water diversion quality, residents' water supply security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cities along the route and achieving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prominent shortcomings i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governance in the water source area, such as the vague definition of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governance subjects, the weak regional collaborative linkage mechanism, and the low participation of the public.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innovative regional collaborative paths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governance in the water source area from multiple aspects: establishing an overall top-level management coordination mechanism, building a cross-department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with clear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creating an efficient and linked cross-region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setting up a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regional collaborative legislative guarantee mechanism, strengthening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and rights protection mechanism of the water source area, and constructing a normalized and long-term governance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so as to lay a solid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foundation for achiev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water source area.

Key words: Water source area;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egional collaboration

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青年生育意愿的性别化图景： 基于 CFPS2022 的实证研究

郭璟璇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河南 新乡 453007)

摘要:我国正经历总和生育率持续低迷与人口负增长的严峻挑战,尽管生育政策已逐步放宽至三孩,但实际提升效果有限,这凸显了深入探究个体生育意愿的紧迫性。在此背景下,基于 CFPS2022 数据,综合运用描述性统计与分性别对比的线性回归模型、逻辑回归模型,系统解析男性和女性在生育意愿上的异同及其多维驱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家庭普遍存在压倒性的两孩偏好,但未来两年内有生育计划的家庭比例较低,反映出显著的意愿—行为差距。通过回归分析,我们发现在短期生育意愿上,年龄是两性共同的负向预测因素,但女性所承担的现有育儿负担成为抑制其近期再次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而这一点在男性群体中并未体现,深刻揭示了育儿责任在两性间分配不均对女性短期生育决策的现实影响。此外,研究还发现两性在理想子女数方面存在共性与特异性:年龄增长、育儿时间投入对两性均有正向影响,而教育水平提升和城镇户口则普遍抑制两性对理想子女数的期望;生活满意度对男性理想子女数呈负向关联,且未来信心对两性理想子女数的影响方向相反。

关键词:生育意愿;性别差异;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人口政策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2.005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2-0027-07

一、引言

当前中国正面临总和生育率低迷与人口负增长的严峻挑战。2024 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人口自然增长率已降至 -0.99% ,这种极低生育率与快速老龄化的叠加,正深刻冲击劳动力供给与社保体系的可持续性。尽管生育政策已由“全面二孩”转向“三孩”,但政策放宽并未有效扭转生育率下滑趋势,表明生育限制已非核心障碍,微观个体的决策逻辑成为理解人口困境的关键。然而,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宏观趋势,对两性生育意愿的细致差异及其驱动机制缺乏系统解析。本文基于 CFPS2022 数据,旨在揭示后三孩时代个体生育意愿与国家政策导向之间的真实张力。本文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通

过分性别的精细化视角,量化比较社会经济地位、文化心理与现实约束对两性生育考量的差异化作用,特别是识别出阻滞生育意愿转化为行为的关键因素。这种分析不仅能为理解中国超低生育率陷阱提供微观证据,阐明性别角色与家庭分工在其中的关键作用,亦能为政策逻辑从放开限制向社会支持的战略转型提供实证依据,以期精准缓解育龄人群,尤其是女性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二、文献回顾

(一) 生育问题的相关研究

在人口结构失衡的背景下,育龄群体的生育行为已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生育问题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学者们对生育

收稿日期:2026-01-28

基金项目:2024 年度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河南省青年女性生育意愿研究”(242400410347);2024 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计算传播视域下生育问题的话语建构与应对研究”(2024CXW015)

作者简介:郭璟璇(1991—),女,河南开封人,博士,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话语分析。

意愿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界定,并通过大规模调查描绘了不同群体的生育图景^[1],包括城市群体、乡村群体,以及双独夫妇、高学历人群、Z世代青年等特殊群体。第二,研究的重心在于探究影响生育意愿的复杂因素。现有文献既有对生育意愿综合影响因素的宏观分析^[2],也有对单一具体因素的微观剖析。国外学者早期基于生育成本的理性选择理论^[3],提出了子女数量—质量替代、生育率的收入影响以及“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等理论,这些框架在国内学界亦得到持续检验与拓展^[4]。这些研究强调,生育政策本身已不再是影响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唯一或主要因素,个体在面对生育所带来的多维度成本与负担时,会进行理性权衡与思考,进而做出自身的生育决策。育龄群体的生育行为受到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在客观影响因素方面,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收入、家庭规模以及失业风险等,都可能对育龄群体的生育行为产生抑制作用。例如,更高的教育水平往往伴随着更高的机会成本,可能导致生育意愿的下降^[5]。此外,住房负担、生活压力、教育成本等经济社会因素也被广泛证实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6]。在主观影响因素维度,青年生育效用价值观发挥着重要作用,家庭投资风险偏好也会对育龄群体生育行为产生影响,而主观幸福感则可能通过“幸福感”影响个体理想生育子女数。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媒介因素^[7-9]和平台算法推荐机制^[10]等新兴因素,以及养育方式^[11]等微观层面因素,也日益成为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研究视角。第三,针对生育问题的应对策略研究也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学者们积极探索构建多层次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12],并倡导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13],以期从宏观层面为提升生育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和环境支持。总体而言,与生育问题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育意愿的考察及其影响因素的探究,并逐步拓展至政策应对层面。

（二）性别视角下的生育意愿研究

尽管现有研究已对生育意愿与行为进行了广泛探讨,并从性别视角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其侧重和深度仍显不足。长期以来,大量研究围绕着女性的生育态度、意愿与相关影响因素展开,这使得女性在生育研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学者们对育龄女性生育影响因素进行了专门讨论,普遍认为教育是影响育龄女性生育的重要因素^[14]。此外,性别平等观念、幸福理念、习俗认同等主观因素也被发现对其生育行为具有显著影响^[7],而某些客观因素(如政策、收入等)的影响效果则可能不显著。这些研究为理解

女性在生育决策中的复杂考量提供了宝贵洞察,例如,女性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的“母职惩罚”及其对劳动力市场表现的负向影响,而对于男性却变成了“父职溢价”的正面影响^[15];育儿负担对女性短期生育意愿有显著抑制作用^{[14][16]}。同时,社交媒体在引导女性生育话题讨论、形塑其生育态度、影响其生育意愿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8],例如女性对生育身体痛苦的体会与想象、对生育成本的“计算生育”态度^[17],以及社交媒体对女性生育风险感知的放大作用^{[9][18]}。部分研究也关注了女性在生育过程中的身体经验与具身实践,强调女性并非完全被动,而是会积极调和传统、家庭与医学知识之间的关系,并在此过程中建构母职^[19]。此外,“男性凝视”和“数字女性主义”等理论框架也被用于分析女性生育观的话语建构与主体性表达^[20]。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生育意愿研究中普遍存在男性视角的缺失。以往的研究格局似乎传递出一种共识,即男性普遍具有较强的生育意愿,其在生育实践中作用的重要性不及女性。但事实恰恰相反,自2018年起,男性生育意愿已低于女性^[21],因此,针对男性生育意愿开展研究已迫在眉睫。尽管已有部分研究通过性别对比得出了一些建设性观点,例如相较于女性更容易受到媒介信息的负面情绪影响、更加关注生育所带来的身体苦痛、“母职惩罚”等因素,男性的生育意愿通常更易受到生活质量与工作稳定性的影响^[15],且经济压力是男性做出生育选择的最重要的考量因素^[21]。但是,这些研究尚未充分探讨男性对于生育问题的核心考量、担忧与需求等关键问题,也较少进行男性与女性生育意愿的系统性对比分析,以揭示两性不同的诉求。因此,本研究旨在弥补这一重要的研究空白,通过对男性和女性进行分样本分析,提供一个更加平衡和全面的视角来理解我国的生育动态。通过揭示两性在生育观念和实践中的独特挑战,本研究将为制定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生育支持策略提供坚实的实证基础。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定义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实证分析主要基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开展的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作为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综合性纵向调查,CFPS通过对中国家庭及个体层面社会经济状况的持续追踪,系统记录受访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结构、代际关系、健康福祉及生活方式等多维信息。更重要的是,CFPS问卷采用模块化结构,主要包括五个部分:家庭成员问卷、家庭经济

问卷、个人自答问卷、少儿家长代答问卷以及个人层面代答问卷。这种多维度的设计对于本研究至关重要,因为它能够支持对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全面考察,包括社会经济、文化和主观态度等多个层面,从而有助于识别性别特异性的影响机制。本研究从中选取了年龄在 18—49 岁的育龄女性和男性样本,并根据研究需要保留了相关研究变量,最终获得 6211 个(男性 2808,女性 3403)有效样本用于回归分析。CFPS 数据的全面性和代表性,为本研究深入分析中国生育图景以及男性和女性生育意愿差异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二) 变量定义

本文的变量定义涵盖了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一系列控制变量,旨在全面探究影响中国成年人生育意愿的各项社会人口学、经济及主观态度因素。

被解释变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理想子女数是一个连续变量,用于反映个体主观上认为理想的子女数量;未来两年生育意愿是一个二元变量,用于衡量个体在未来两年内是否有生育计划,其中“没有生育计划”赋值为 0,“有生育计划”赋值为 1;以及期望男孩数,这是一个连续变量,反映个体对子女性别的偏好,即期望拥有的男孩数量。

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则涵盖了个人和家庭两个层面的多项因素。核心解释变量为主观阶层提升感知,该变量通过比较受访者“目前”与“5 年前”的社会经济地位感知构建,主要包括生活满意度、婚姻满意度、养老满意度、未来信心等维度。为有效控制可能影响生育意愿的混杂因素,模型引入了以下控制变量:个人层面包括年龄(连续变量,反映受访者实际周岁)、教育程度(分类变量,例如以本科学历为参照组或使用虚拟变量表示不同教育水平)、民族、宗教信仰、户口类型(分类变量,例如农业户口或非农业户口)、婚姻状况(分类变量,例如有配偶或无配偶)。家庭层面则包括家庭规模(家庭实际人口数减去子女数量)、家庭人均收入(家庭总收入除以家庭总人口数并进行对数处理)、育儿时间等。最后,模型中还加入了省份固定效应,以控制不同地区间的异质性影响。

四、研究结果

基于上述数据与变量,本文首先通过整体描述性统计勾勒生育意愿的宏观图景,继而构建模型进行深入推断分析,从而系统揭示两性生育决策的差异化驱动机制。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中国家庭的生育意愿与行为呈现显著的特征。

在理想子女数方面,中国家庭普遍表现出压倒性的两孩偏好。调查数据显示,理想子女数的均值为 1.96,中位数为 2,众数为 2。这三项核心集中趋势指标明确指向“2 个孩子”,是受访者普遍认为的理想子女数。标准差为 0.643,表明在被调查的群体中,对于理想子女数的看法是相当集中的,个体之间的差异性不大。具体来看,如表 1 所示,高达 69.5%的受访者表示理想子女数为“2 个”,而选择“1 孩”(18.5%)和“3 孩及以上”(11.9%)的比例则处于次要地位。这表明,在当前社会背景下,独生子女家庭和多子女家庭(3 个及以上)的理想化程度相对较低,并非主流选择。从性别维度来看,男性和女性在理想子女数量上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p<0.001$),其中男性平均期望的子女数量略高于女性(男性平均 2.00 个,女性平均 1.93 个)。

表 1 中国家庭理想子女数分布

理女子数	人数	百分比
1	1232	18.5
2	4617	69.5
3 个及以上	793	11.9

然而,尽管多数青年仍抱有生育两个子女的理想期望,但这种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行为之间存在显著落差,当前中国社会仍面临严峻的生育挑战。数据显示,高达 88.6%的家庭明确表示未来两年内没有生育计划,仅有 11.4%的家庭打算生育。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即人们普遍期望拥有更多孩子,但短期内实际生育意愿却极低,是当前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症结。这表明,仅仅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或放宽政策限制是不够的,关键在于识别并消除那些阻碍现有生育意愿转化为实际生育行为的深层障碍。

通过深入分析不同群体,本研究发现已婚群体(尤其是女性)是生育意愿的绝对主力,但其生育意愿比例随年龄增长而急剧下降。例如,20—29 岁已婚女性生育意愿比例(21.25%)远高于 30—39 岁(9.04%)。相比之下,未婚群体(尤其是男性)表现出相对较高的生育意愿比例(如 20—29 岁未婚女性 50.4%,20—29 岁未婚男性 57.27%),但其受访人数较少,整体代表性仍值得商榷。性别差异在未来两年的生育意愿上同样显著。男性和女性在生育意愿的分布上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关联($\chi^2=38.142, p<0.001$)。其中,女性生育意愿与婚姻高度捆绑且受生理年龄影响明显,30 岁后生育意愿快速下降。男性生育意愿则相对平稳,受再婚意愿、经济能力、家庭完整性等社会因素影响更大。例如,部

分非婚状态(如同居、离婚)男性的生育意愿比例甚至高于同龄已婚男性群体(如30—39岁离婚男性生育意愿比例达60.0%,而同龄已婚男性的该比例仅为14.860%,而同龄已婚男性的该比例仅为14.8%)。这表明,提升生育率不仅需缓解女性的生育困境,更需深入理解并解决男性面临的育儿压力和经济顾虑,构建对男女都友好的生育支持环境。

在新生儿性别方面,如图1所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期望拥有“1个男孩”的偏好都高度一致且极为强烈(女性80.7% vs 男性80.9%)。这表明社会对拥有至少一个儿子的期望存在广泛共识,可能源于对平衡家庭结构(如一儿一女)的向往,或在生育受限背景下传统父系价值观的持续影响。然而,在极端偏好上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女性更倾向于“0个男孩”(女性9.4% vs 男性5.8%),这可能反映女性在直面生育和育儿现实时对女儿的偏爱、性别中立态度,或对养育男孩相关压力(如经济负担、传宗接代期望)更深的感知。而男性则明显更偏好“2个及以上男孩”(女性9.9% vs 男性13.2%),暗示传统“多子多福”或“重男轻女”观念在男性中影响更深,或男性对养育多个儿子的实际负担感受不及女性直接,这持续体现了重视男性血统的父权制影响。在期望男孩数上,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t=-6.8601, p<0.001$),男性平均期望男孩数略高于女性(男性平均1.088个,女性平均1.008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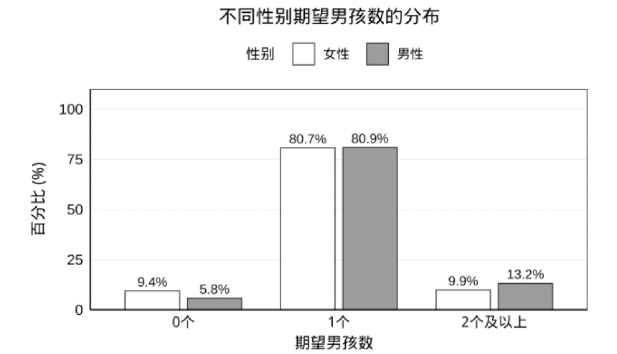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家庭期望男孩数分布

总体而言,中国家庭的生育意愿与行为呈现显著的特征。理想子女数普遍偏向两孩,然而,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仅有11.4%的家庭明确表示未来两年内有生育计划。在性别差异方面,男性在理想子女数、未来两年生育意愿上都略高于女性。此外,在期望男孩数方面,两性均强烈偏好“1个男孩”,但在极端偏好上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女性更倾向于“0个男孩”(女性9.4% vs 男性5.8%),而男性则明显更偏好“2个及以上男孩”(女性

9.9% vs 男性13.2%)。这些描述性发现为后续的回归分析奠定了基础,揭示了中国生育意愿的总体特征以及两性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异。

(二) 模型分析

为进一步揭示我国成年人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本文根据被解释变量的性质构建了不同的统计模型,并对男性和女性群体进行了分样本分析。具体而言,针对理想子女数(作为连续变量),本研究采用了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线性回归模型适用于分析连续型因变量与多个自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能够有效揭示各因素对理想子女数变异的解释程度及方向。针对未来两年生育意愿(作为二元变量,即有或没有生育计划),本研究采用了逻辑回归模型。逻辑回归模型适用于分析二元分类因变量,能够估计自变量变化对个体发生特定事件(如未来两年内有生育意愿)概率的影响,并以对数发生比的形式呈现。另外,为深入探究性别在生育决策驱动因素上的细微共性与显著差异,本研究对男性和女性群体进行了分样本分析。这意味着分别构建了针对男性和女性的线性回归模型和逻辑回归模型。这种分性别建模的方法至关重要,因为它能帮助我们识别那些仅对特定性别群体产生影响的因素,以及对两性群体均有影响但效应强度或方向存在差异的因素。通过系统比较两性模型的分析结果,本文得以深入理解不同性别在生育观念和短期生育规划中面临的独特驱动因素和约束因素。

1. 理想子女数的影响因素:线性回归分析

针对男性和女性理想子女数的线性回归模型均展现出高度的统计显著性(男性模型 F 统计量:6.727, $p<0.001$;女性模型 F 统计量:7.036, $p<0.001$),这表明模型中的自变量组合能够有效解释理想子女数的变异。男性模型、女性模型的调整 R^2 分别为17.38%和16.79%,均接近17%,提示所选取的变量对两性理想子女数的解释力程度相当,但仍有较大比例的变异未能被模型捕捉。

具体而言(如表2所示),两性在理想子女数方面呈现出显著的共性和差异。年龄的增长与两性理想子女数的轻微增加均显著相关(男性: $\beta=0.011, p<0.05$;女性: $\beta=0.017, p<0.001$)。这可能反映随着年龄增长,个体对家庭完整性和子女数量的认知或期望有所深化,抑或对早期生育数量的一种“理想化”回顾。教育水平的提升在两性中均与理想子女数的显著下降呈负相关。无论是男性(从初中至硕士学历,其理想子女数均显著低于小学及以下学历组,负向效应随学历升高而增强,如大学本科降低

约 0.58 个, $p<0.001$), 还是女性(从小学至大学本科学历,理想子女数显著降低),这一趋势均普遍存在。这有力地支持了现代化理论中教育普及对生育意愿的普遍抑制作用,其影响超越了性别界限。此外,户口类型也发挥着类似作用,非农户口在两性中

均与理想子女数的显著减少相关(男性 $p<0.01$; 女性 $p<0.001$),这可能反映了城镇化背景下生活成本、竞争压力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差异对生育期望的共同塑造。

表 2 理想子女数影响因素对比

影响因素	男性模型	女性模型	核心差异
年龄	正向显著($\beta=0.011^*$)	正向显著更强($\beta=0.017^{***}$)	两性均随年龄增长提升理想子女数,女性效应更强
教育程度(本科)	显著负向($\beta=-0.580^{***}$)	显著负向($\beta=-0.370^{***}$)	教育对男性的抑制效应更强
户口类型(非农)	显著负向($\beta=-0.251^{**}$)	显著负向($\beta=-0.243^{***}$)	城乡差异模式一致
育儿时间	高度正向($\beta=0.044^{***}$)	高度正向($\beta=0.027^{***}$)	育儿投入均提升理想子女数,男性效应更强
传统重男轻女观	正向显著($\beta=0.012^*$)	不显著	仅男性受传统文化偏好显著影响
生活满意度	显著负向($\beta=-0.078^*$)	不显著	仅男性生活满意度与子女数呈负相关
婚姻满意度	接近显著(正向)	不显著	仅男性潜在正向影响
未来信心	接近显著(正向)	接近显著(负向)	男性提升意愿,女性抑制意愿
养老满意度	不显著	接近显著(正向)	仅女性潜在正向影响
模型解释力	调整 $R^2=17.38\%$	调整 $R^2=16.79\%$	社会变量对两性解释力相当

注: * $p<0.05$, ** $p<0.01$, *** $p<0.001$;“接近显著”通常指 $p<0.10$ (边际显著),未在表格中标注星号;所有系数均为未标准化回归系数(β),表示自变量每变化一个单位,因变量(理想子女数)的平均变化量。

值得注意的是,育儿时间在两性模型中均表现出高度显著的正向关联。男性投入的育儿时间越多,其理想子女数平均增加约 0.044 个($p<0.001$);女性投入的育儿时间越多,理想子女数平均增加约 0.027 个($p<0.001$)。这提示亲身参与育儿可能增强个体对多子女家庭的价值认同和渴望。然而,在其他一些社会文化和主观态度变量上,两性间则出现分化。传统重男轻女观念在男性模型中显著正向影响理想子女数($\beta=0.012, p<0.05$),但在女性模型中不显著,这表明男性对传统性别观念的认同可能更直接地转化为对更多子女(尤其是儿子)的期望。生活满意度在男性模型中与理想子女数呈显著负向关联($\beta=-0.078, p<0.05$),这一反直觉结果可能暗示,在特定社会经济背景下,对当前生活状态越满意,个体越不倾向于通过增加子女数量来改变或完善生活,而在女性模型中此变量不显著。最后,婚姻满意度与未来信心在男性模型中均接近显著地正

向影响理想子女数(边际显著),提示积极的婚姻关系和对未来的乐观预期可能促进男性对更多子女的期望,而女性模型中婚姻满意度不显著,未来信心则呈现接近显著的负向关联(边际显著),这种差异值得深入探究。

2. 未来两年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逻辑回归分析

针对男性和女性未来两年生育意愿的逻辑回归模型均显示(如表 3 所示),年龄是两性共同且高度显著的负向预测因素。男性年龄每增加一岁,其在未来两年内有生育意愿的对数发生比显著下降($\beta=-0.156, p<0.001$)。女性年龄每增加一岁,其在未来两年内有生育意愿的对数发生比下降更为显著($\beta=-0.190, p<0.001$,且 t 值为-13.003,远高于男性模型的-4.643)。这突出强调了年龄对女性生育窗口和短期生育决策的决定性影响,其效应强度高

于男性,这与女性生育窗口期的紧迫性高度相关。

表 3 短期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对比

影响因素	男性模型	女性模型	核心差异
年龄	显著负向($\beta=-0.156^{***}$)	极显著负向更强($\beta=-0.190^{***}$)	年龄对女性抑制效应更强,反映生育窗口约束
育儿时间	不显著	高度显著负向($\beta=-0.061^{***}$)	关键差异:育儿负担仅抑制女性短期生育意愿
教育/收入/户口	均不显著	均不显著	社会经济变量对短期决策无直接影响
婚姻满意度	不显著	不显著	不影响两性短期决策
关键机制	年龄主导决策	年龄+育儿负担双重抑制	女性面临更复杂现实约束

注: * $p<0.05$, ** $p<0.01$, *** $p<0.001$;所有系数均为未标准化回归系数(β),表示自变量每变化一个单位,因变量(短期生育意愿)的平均变化量。

该模型中一个关键的性别差异体现在育儿时间的影响上:在男性模型中,育儿时间对未来两年生育意愿的影响不显著。然而,在女性模型中,育儿时间却与未来两年生育意愿呈现高度显著负向关联($\beta=$

-0.061, $p<0.001$)。这表明,尽管育儿时间投入可能增加女性对理想子女数的长期渴望(如线性回归结果所示),但在实际短期生育决策中,女性所承担的现有育儿负担(大量的时间投入)反而成为抑制

其近期再次生育意愿的显著因素。这一发现深刻揭示了育儿责任在两性间分配不均对女性短期生育决策的现实影响。令人意外的是,教育程度、户口类型、家庭收入、住房价值、对育儿/教育问题的感知以及未来信心等变量,在两性短期生育意愿模型中均未达到统计显著性。这可能意味着在紧迫的短期生育决策背景下,这些因素的影响可能被年龄和实际育儿负担(尤其对女性而言)所掩盖。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2年数据,深入探讨了中国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与行为,并特别关注了其中的性别差异及其驱动机制。研究结果揭示了中国当前生育面临的复杂挑战和两性在生育决策中的独特考量。首先,尽管中国家庭普遍存在两孩的理想偏好,但实际短期生育意愿却极低,这表明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显著的差距。这一差距并非源于生育意愿的缺乏,而是由于将意愿转化为实际行为所面临的现实障碍。其次,男性和女性在生育意愿上存在显著差异。男性在理想子女数和未来两年生育意愿上均高于女性。在影响理想子女数的因素中,年龄增长、教育水平提升、城镇户口和育儿时间投入等因素对两性均有影响,但传统重男轻女观念、生活满意度、婚姻满意度和未来信心等主观因素对两性的影响呈现性别特异性。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发现,在未来两年的实际生育意愿上,年龄是两性共同的强大负向驱动力,但对女性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更为重要的是,女性独有的、因现有育儿投入而产生的巨大负担,成为抑制其短期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而这一点在男性群体中并未体现。这深刻揭示了育儿责任在两性间分配不均对女性短期生育决策的现实影响,并强调了女性在生育决策中面临的独特且更为复杂的现实约束。

本文的发现对制定有效的生育支持政策具有重要启示,强调在制定人口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两性在生育观念和实践中面临的独特挑战,从而设计出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生育支持政策。首先,构建全社会范围内的生育支持环境。鉴于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化带来的生活压力普遍降低了两性对理想子女数的期望,政策应着眼于全社会范围内的生育支持环境建设。这包括通过完善公共服务、减轻养育成本等方式,减轻所有家庭的生育负担。具体而言,应大力发展普惠性、高质量的托育服务,重点发展社区嵌入式托育机构,有效减少育龄群体抚育顾虑。在教育方面,可以通过提供免费幼儿教育,完善教育专项税收抵扣等组合措施,系统性降低家庭教育成

本。在财政支持维度,建立育儿津贴制度,为育龄家庭提供生育补贴,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以此提振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其次,减轻女性育儿压力,推动育儿责任公平分担。鉴于女性实际育儿负担对其短期生育意愿的显著抑制作用,政策必须特别关注减轻女性的育儿压力,推动家庭内部育儿责任的公平分担。这包括完善产假和育儿假制度,并鼓励男性更广泛地参与育儿。同时,鼓励用人单位建立系统性的工作—家庭平衡机制,设置弹性化工作机制,以支持父母兼顾工作和家庭责任。最后,加强性别平等观念,重塑家庭生育文化。尽管传统观念对男性理想子女数有正向影响,但为实现更均衡的性别结构和减轻女性负担,社会应持续倡导新型生育观和家庭观,破除过度的性别偏好,促进性别平等。这可以通过大众舆论和社会教育等途径开展家庭价值观引导工作,注重将传统家庭文化与现代性别平等理念有机结合。此外,还需树立育龄群体正确的价值观与消费观,培育理性的消费决策能力,合理规划家庭消费,帮助其提升科学合理的生育成本认知水平。同时,由于育龄女性的社会阶层跃迁不仅需要更高的机会成本,还要承受职业中断带来的收入惩罚与职业发展阻滞风险,因此,需要持续加强性别平等观念的传播,通过立法保障与公共宣传等方式消除职场中的隐形性别歧视,拓宽育龄女性阶层流动渠道,促使女性获得公平的职业晋升机会与资源获取渠道。这些政策建议旨在从经济、社会、文化等多层面构建一个对两性都友好的生育支持环境,从而有效缓解中国当前面临的人口结构性矛盾,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毅杰,白杨. 物质—观念视域下育龄群体的多孩生育意愿:基于 CGSS2021 问卷实验的分析[J]. 社会科学, 2024(1):157-167.

[2] 杨柠聪. 全面二孩背景下人口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综述[J]. 重庆社会科学, 2020(1):94-105.

[3] LEIBENSTEIN H. Socio-economic fertility theories and their relevance to population policy[J].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974, 109(5-6): 443-457.

[4] 宋健,胡波. 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动机与生育意愿[J]. 社会科学文摘, 2023(2):103-105.

[5] 周晓蒙,裴星童. 高等教育对女性生育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J]. 人口与发展, 2022, 28(6):46-58.

[6] 魏万青,马静. 从安全规范到抚养体验:住房对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J]. 中国青年研究, 2023(8):5-13.

[7] 黎黎,熊宣,曹珊雨. “摇摆”的生育意愿:育龄女性生育

- 认知与信息传播的互动与博弈[J]. 新闻与写作, 2023(11):54-66.
- [8] 蒋俏蕾,王鸿坤,陈宗海. 社交媒体信息获取对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主动寻求信息和偶然接触信息的比较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23(1):39-55.
- [9] 刘娟,宋亭亭. “被渲染的焦虑”:社交媒体使用与女性生育风险感知[J]. 传媒观察, 2022(6):79-86.
- [10] 张良驯,赵丹丹. 网络群体极化效应对青年生育焦虑的影响研究[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22, 41(6):17-29.
- [11] 许玲丽,陈云菲. 家庭生育决策、儿童照料方式与女性就业:基于微观家庭调查数据的分析[J]. 公共行政评论, 2024, 17(2):157-175.
- [12] 史毅,韩润霖. 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构建:内涵、价值与路径[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3(6):116-126.
- [13] 余永跃,刘于兰.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实践路径[J]. 人民论坛, 2023(16):97-99.
- [14] 郑真真. 以性别视角分析人口新格局下的生育支持[J]. 妇女研究论丛, 2023(2):5-10.
- [15] 刘一伟. “母职惩罚”与“父职溢价”:二孩政策影响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异[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6):56-69.
- [16] 计迎春,郑真真. 社会性别和发展视角下的中国低生育率[J]. 中国社会科学, 2018(8):143-161.
- [17] 申琦,蔡耀辉. 计算生育:“小红书”平台都市女性生育话题的“爱与哀愁”[J]. 妇女研究论丛, 2024(5):61-72.
- [18] 万忆,周景怡. 社交媒体中女性“恐育”情绪的感染扩散与社会治理[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31(10):55-67.
- [19] 李彧白. 生育事件中女性的身体经验与具身实践:基于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调研[J]. 社会, 2020, 40(6):157-185.
- [20] SHEN Y, JIAO L. “Widow-style parenting”: the discursive formation of gendered parenting roles and popular feminism on social media in China[J].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24, 17(4):399-415.
- [21] 申琦,蔡耀辉. “新计划生育”:“虎扑”平台城市男性生育话题中的“钱与能力”[J]. 妇女研究论丛, 2025(1):66-77.

(责任编辑 刘成贺)

The Gendered Landscape of Fertility Intentions Among Chinese Youth in the Context of Low Fertility: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FPS2022

GUO Jingxua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453007, China)

Abstract: China is currently grappling with the formidable challenges of a persistently low total fertility rate and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Despite the incremental relaxation of fertility policies to the three-child limit, the actual pro-natalist effects remain constrained, underscoring the urgency of investigating individual fertility intentions. Utilizing data from the 2022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this study employ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long with gender-stratified linear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disparities and multidimensional driving mechanisms of fertility intentions between men and women. The findings reveal a predominant two-child preference among Chinese families; however, the proportion of households planning to conceive within the next two years remains low, reflecting a significant intention-behavior gap. Regression analyses indicate that while age serves as a universal negative predictor of short-term fertility intentions for both sexes, the burden of existing childcare responsibilities acts as a critical deterrent specifically for women—a factor notably absent in the male cohort. This divergence highlights the profound impact of the asymmetrical distribution of childcare labor on women’s short-term reproductive decision-making. Furthermore, regarding ideal family size, the study identifies both commonalities and specificities; age and time investment in childcare exert positive effects on both genders, whereas higher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urban residency generally suppress expectations for more children. Interestingly, life satisfaction i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men’s ideal family size, and future confidence exerts opposing effects on the two genders’ reproductive ideals.

Keywords: Fertility intention; Gender difference; CFPS2022; Population policy

数字经济背景下上海市跨境数字贸易发展对策研究

常燕军,张世尚,伍贺徽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030)

摘要:跨境数字贸易正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和未来贸易增长的新引擎。上海市正致力于发展跨境数字贸易,以期提升国际贸易中心能级,带动国内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梳理上海市跨境数字贸易的发展成效,剖析出数字经济背景下上海市跨境数字贸易现阶段存在的五大问题:交易平台影响力薄弱、数字核心技术供给不足、跨境数字贸易存在壁垒、政府对本土企业政策支持力度有待加强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上海市发展跨境数字贸易的对策,以期为推动上海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数字经济;数字贸易;跨境数字贸易;经济高质量发展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2.006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2-0034-05

数字贸易作为一种新型的贸易方式,逐步成为推动上海市贸易增长的新动力。这不仅可以帮助上海市拓宽贸易市场,还能够吸引更多的中外企业加入贸易合作当中,推动上海市的跨境数字贸易的发展,提高贸易的经济效益。作为我国数字贸易领域的先行城市,上海市应充分发挥标杆示范效应,引领并推动全国数字贸易行业实现规范、健康与可持续发展。据此,本文在梳理上海市跨境数字贸易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上海市跨境数字贸易市场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找出不足,提出决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一)国内文献综述

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在全球贸易体系加速迈向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跨境数字贸易作为数字经济与国际贸易深度融合形成的新型贸易形态,已成为推动全球贸易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数字经济下的新贸易体系促进我国商品、要素和服务在国际自由、顺畅、有序流动,可以更好地实现国内市场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全流程与国际联通^[1]。作为跨境电商的更高级形态,跨境数字贸易凸显了数字技术的核心运用,显著加速了各类贸易要素与

环节的数字化转化进程。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制度理论与权变理论的多重视角,相关研究重点探讨了信息技术与数字化转型对传统企业的影响,通过对比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前后的发展差异,总结得出:在数字经济发展浪潮下,企业加大数字技术投入并辅以科学合理的组织管理,能够为自身开拓市场、实现转型发展创造更多新机遇^[2]。

此外,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3]。2023年11月,国务院印发《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总体方案》,就率先实施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提出了十五条新要求。为进一步贯彻国家关于贸易中心建设的最新部署,持续强化上海国际贸易中心能级,2023年12月28日经上海市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审议表决,修订的《上海市推进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条例》正式通过,并于2024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都标志着政府对于未来无论是上海还是其他城市的跨境数字贸易会越来越重视。

收稿日期:2025-12-30

作者简介:常燕军(1979—),女,河南郑州人,博士,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

(二) 国外文献综述

西方学者对于数字经济、跨境数字贸易的探讨并不多,主要以“数字”本身概念为起点,数字经济的突出特征,在于其依托支撑信息经济的信息技术所具有的二进制数字属性。1995 年,美国复合技术联盟主席唐·塔帕斯科特(Don Tapscott)在其著作《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机遇与挑战》中提出,由信息技术驱动的数字革命,催生了以人类智能网络化联结为基础的新型经济形态,即数字经济。1998 年 4 月 15 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了以《浮现中的数字经济》命名的第一份研究报告,着重分析信息这一核心资源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决定性作用。美国商务部数字经济咨询委员会在 2016 年的《数字经济委员会第一份报告》中提出,从数字化对经济指标的影响、数字化对跨行业的扩展作用两个方向来度量数字经济发展。

2021 年,欧盟委员会经优化调整后正式发布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该指数依托人力资本、连接性、数字技术整合、数字化公共服务四大核心维度,综合研判数字经济的整体发展态势。也有国外学者利用电子分销渠道、在线价值创造、在线产品和服务以及在线基础设施四个变量,构建了印度尼西亚数字经济模型^[4],研究发现印度尼西亚的数字经济发展仍处于早期阶段。中国最近几年数字技术发展迅速,在数字贸易中逐渐显示出优势,但在国际上仍暂时无法拥有足够的话语权。

二、上海市跨境数字贸易发展成效

(一) 跨境数字贸易进出口持续增长

据统计,2018 年上海市跨境数字贸易进出口达 260 亿美元。其中,跨境数字贸易出口额高达 170 亿美元,同比上涨了 16%,比重占上海市服务贸易出口额近 30%;跨境数字贸易进口额达到 9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这奠定了上海市在全国跨境数字贸易领域的领先地位^[5]。在跨境数字贸易方面,2022 年上海市数字服务贸易和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均创历史新高,商务部统计口径下的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985.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跨境电商进出口额 1841.2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8.6%,增速显著高于整体贸易水平,成为跨境数字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6]。2024 年,上海市跨境数字贸易进出口规模持续领跑全国,全年数字贸易进出口总额达 1095.3 亿美元,同比增长 4.9%,规模占全国的 30.1%。其中,数字交付服务进出口额与整体数字贸易进出口额持平,凸显数字交付服务在上海市跨境数字贸易中的核心地位,“十四五”期间,上海市

数字交付服务贸易年均增速达 12%。如图 1 所示,从 2018 年到 2024 年,上海市数字贸易进出口总额实现了从 700 亿美元到 1100 亿美元的跨越^[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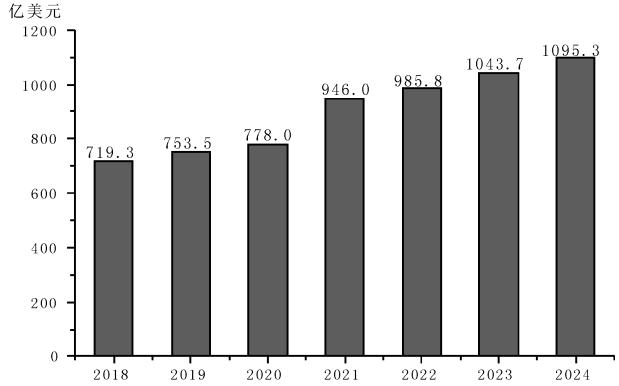


图 1 上海市历年数字贸易进出口总额统计

(二) 跨境数字贸易推动了技术创新

上海市对于跨境数字贸易极其重视。为了更好地推进跨境数字贸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而起,上海市正在支持贸易商加强人工智能、区块链以及各类数字技术的研发与应用,鼓励企业扩大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元宇宙、数字动漫等数字技术和产品的出口,以此提升跨境数字贸易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有研究报告指出,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企业的“卡脖子”技术很难依靠自身科技力量得到解决,而需要借力高校院所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成果加速发展^[8]。企业对于信息技术的需求会带动整个社会技术创新。此外,有研究者认为,跨境数字贸易可以助推非遗文化的传播^[9],以短视频、网络直播为代表的新媒体数字平台具有门槛低、用户多、便捷性、时效性和交互性强等特点,与大数据技术和精准算法技术有机融合,响应国家对于文化对外传播的需求。

(三) 跨境数字贸易推动了数字人才的培养

高速发展的数字经济背景下,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不再适应当下数字经济的大环境,为发挥数字人才支撑数字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加快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政府需要制定新的人才培养方案来推动数字人才的培养。

在上海市政府印发的《上海市关于提升能力完善体系创优环境引进培育贸易商的工作方案》中强调了对贸易商发展的人才支撑体系的全面完善,包括金融服务体系、专业服务体系和投资促进体系的建设,重点培养熟悉国际贸易规则的外贸人才。聚力打造规模稳步扩充、综合素养优良、结构动态优化、布局均衡合理的数字经济高端人才方阵,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高效的赋能支撑。上海市政

府努力通过各种方式,包括改进教育体系、增强实践经验、提升创新能力等来培养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型人才。

(四)上海自贸试验区引领跨境数字贸易发展

上海自贸试验区针对跨境数字贸易领域的政策需求,开展了一系列相关政策试点,探索推动跨境数字贸易发展的新路径。上海市政府发布的《上海市落实〈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总体方案〉的实施方案》提出了 117 项措施,率先实施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是实施方案的一大亮点,方案对规范和促进数据跨境流动、数字技术应用、数据开放共享等方面提出一系列举措,如在数据跨境流动方面提出率先制定重要数据目录、探索建立合法安全便利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在临港新片区建立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措施^[10]。

上海自贸试验区通过政策创新、优化服务、推动跨境合作等方式,通过推广跨境电商、推动数字化贸易单一窗口等举措,为企业提供更加便捷的跨境贸易环境,促进数字贸易的跨境合作与发展。

三、上海市跨境数字贸易存在的问题

(一)跨境数字贸易平台影响力有待提升

跨境数字贸易作为新型贸易模式,极大地降低了跨境贸易的成本和时间,催生出更多新型的贸易产品与服务形式,成为国际贸易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和全球经济新一轮发展的新引擎。尽管国与国之间的跨境数字贸易催生出了许多机遇,促进更多国内外的交易合作,但是进一步研究发现,上海作为我国重点发展地区,其数字交易平台在国际市场的话语权仍较为薄弱,国内业务也主要以中小型企业为服务主体^[11]。不过,上海已培育出拼多多、小红书、得物等具备全国乃至全球影响力的本土数字交易平台,形成了特色化平台集群。当前我国数字服务领域已告别传统 BAT 格局,形成以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为核心的多元平台生态,各类垂直领域与区域特色平台协同发展。腾讯将总部设于深圳,在北京设立核心业务枢纽,在成都布局技术研发与数据处理中心,上海机构主要承担华东区域的市场推广职能。阿里巴巴采用北京与杭州双总部模式,贵州承接集团数据处理业务,现阶段尚未在上海布局核心业务单元。从整体发展现状来看,上海市在跨境数字服务供给方面仍存在能力短板,相关支撑体系尚不完善,综合服务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二)跨境数字贸易核心技术水平有待提高

核心技术是推动跨境数字贸易发展的重要动

力,没有足够的核心关键技术,跨境数字贸易就无法实现高效运行和高质量服务,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是跨境数字贸易的基础,很大程度上限制跨境数字贸易的发展。核心技术的供给不足也影响着跨境数字贸易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12]。

我国在芯片、半导体这些核心技术上一直处于依赖他人的状态,始终无法突破技术封锁。随着美国对我国以芯片为核心的技术封锁与制裁的不断升级,彻底让我们感受到“缺芯少核”之痛,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方面的供给不足的问题也展露在世人面前。与此同时,这也证明了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核心技术短板会使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受制于人,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风险^[13]。

(三)跨境数字贸易壁垒有待突破

伴随跨境数字贸易的迅猛发展,传统货品贸易、服务贸易以及知识产权贸易的原有格局被彻底重构。与此同时,各类异于传统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新型跨境数字贸易壁垒也随之涌现,具体涵盖数据安全与隐私权益保障、技术标准体系构建、市场准入机制及公平竞争秩序等多重问题,此类问题的持续发酵,可能会对数字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进程产生阻滞作用^[14]。在跨境数字贸易发展中,需要涉及大量通信、能源、交通、水利、金融和公共服务部门的基础性信息数据。如果这些数据和信息流动没有被限制,很有可能会对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影响;如果遭受不法分子的攻击,个人财产也将面临巨大安全威胁,国家安全也会遭受潜在威胁^[15]。

很多国家为了自身数据的安全,出台政策限制数据流通,当众多国家在其国内法中规定数据流动限制时,这无疑不利于世界范围内的数据自由流动。这给依据数据流动开展商业运营和国际贸易的数字技术型企业造成极大的困扰,加大了其运营成本。这也是数字经济时代存在的新型跨境数字贸易壁垒。

(四)跨境数字贸易相关法律法规有待完善

中国现行立法体系未针对数据安全防护、数据资源开发、个人信息权益保障及合规利用等层面开展系统性统筹规划。与此同时,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权利界定与制度供给尚存在显著短板,相关规制体系仍有待完善^[16]。《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 45 条规定了个人信息删除权和信息更正权,但个人行使这一权利的前提是网络运营者违法或违反约定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或者网络运营者收集、存储的个人信息有误,而实践中广泛存在的问题是个人在使用网络软件时可能被迫做出同意收集的决

定,否则无法使用软件。除此之外,在司法实务层面,信息主体针对网络运营者违规搜集个人信息的行为依旧面临极为突出的举证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虽然规定了电子商务经营者根据用户申请处理用户个人信息查询、更正或删除的相关制度,但还无法覆盖实践层面大量的其他非电商软件或 App 运营者的个人信息收集、查询、更正或删除。

在版权管理体系层面,我国现阶段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的数量仅为 5 家,机构供给规模相对有限,难以充分匹配与支撑社会层面日益增长的版权集体管理服务需求。在信息技术水平和数据交易市场条件不一致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大量成立数据交易机构难避跟风之嫌^[17]。

(五)政府对本土企业政策支持力度有待加强

现阶段,上海市政府对企业准入壁垒较高,保护政策较少,本土企业在与外资企业竞争时面临潜在的困难。再加上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导致本土企业在贸易业务中面临知识产权侵权风险,影响企业创新和竞争力,极可能受到不公平竞争影响。在双重压力下,企业无法得到足够多的保障,不敢轻易地贸然进行对外贸易。

政府金融支持是企业发展的重要保障,目前本土企业在金融支持方面受到限制,很多时候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在疫情期间体会颇深,政府忙于对百姓基本生活的支持,忽视了本土企业的生产困境,企业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这限制了本土企业在贸易业务中的发展空间。政策支持也是本土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现阶段相关政策支持还存在不足和不明确的地方,本土企业在贸易中无法获得必要的政策扶持,影响其在贸易业务中的发展和竞争。

四、数字经济背景下上海市跨境数字贸易发展对策建议

(一)构建具有影响力的跨境数字贸易平台

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可以借助良好的数字经济环境改善平台影响力不足的问题。企业要想发展,自然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国家及上海市政府可以为上海企业提供财政资金支持,设立专项基金,如上海市商务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跨境数字贸易发展关键领域、重点区域和新赛道的公共服务项目建设。有了足够的发展空间,企业自然会从自身利益出发,积极推动产品创新,打造属于自己的专属数字科技,积极推广,提高知名度。

另外,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更多领域开放和项目落地,优化外商投资产业结构,引导外资更

多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和节能环保等领域,帮助上海本土企业创立的跨境数字贸易平台进一步完善提高,形成一个较为成熟的区域板块。

(二)提升跨境数字贸易的核心技术水平

核心技术是推动数字经济背景下跨境数字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没有足够的关键核心技术,跨境数字贸易就无法实现高效运行和高质量服务。所以,突破核心技术限制至关重要。

面对这一问题,首先要强化跨境数字贸易技术研发,重点布局数字经济底层技术研发,降低对国外关键核心技术的依赖程度,在保障产业安全的同时,避免我国跨境数字贸易走向以低端数字服务为主的老路;其次要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目前我国在芯片技术上仍依赖国外供应商,缺乏本国专属核心技术,一旦遭遇国际技术制裁,很可能被限制发展。因此,需培养专业人才开展核心技术研究,突破科技瓶颈,打造属于我国自己的芯片,不再依附于他人。

(三)完善治理体系,突破贸易壁垒

针对跨境数字贸易壁垒,应优化国内的数据流通机制,完善治理体系,加强系统安全性,建立健全跨境数字贸易统计监测体系,形成有标准、可操作、可推广的跨境数字贸易统计标准,确保中央和地方相关数据的统一和准确,规范发展秩序,保障国内企业在数据交流过程中不受外界不确定因素影响和侵害。另外,需尽快制定出台“跨境数字贸易法”,从法律层面对跨境数字贸易进行清晰界定,包括个人和企业跨境数字贸易的方式、范围,以及相应主体的合法权益和责任,将隐私保护、数据产权保护、数据跨境流动等纳入立法监管范畴。同时,要加强国际合作,推动规则建设,积极参与国际跨境数字贸易规则谈判和合作框架制定,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贸易规则,共商共建高标准、平衡、包容的“一带一路”跨境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在确保国内自身数据流通安全完善的基础上,坚持制度开放,扩大跨境数字贸易领域开放力度,大力推广我国成熟的系统机制,与其他国家建立相互信任关系,打破国与国之间现存的数据限制类跨境数字贸易壁垒。

(四)完善跨境数字贸易相关法律法规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和创建版权交易平台,是促进跨境数字贸易发展、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举措。建议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更新,针对跨境数字贸易中常见的侵权行为和技术创新需求,及时修订和完善相关法律,提高侵权违法成本,加大打击侵权行为的力度,强化知识产

权司法保护措施,提高知识产权案件的受理和审理效率,尽可能地保护知识产权所有者的合法权益。此外,需做好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推动企业自觉遵守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加强国际合作,建立跨境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积极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沟通交流,共同打击跨境侵权行为,保护知识产权全球价值。

创建版权交易平台可以促进版权在市场上的合理流通。对于平台建设及其运行,建议政府或行业协会建立专门的版权交易平台,提供版权交易、授权许可、版税结算等服务,推动跨境数字贸易版权的合法交易。在版权交易平台上为版权建立信息注册和管理系统,为版权所有者提供版权登记、交易管理、权利保护等服务,确保版权交易的合法性和权益完整性。此外,为企业建立信用评估体系,对参与平台交易的各方进行信用评估,提高交易的透明度和信任度。

(五)加大对本土企业跨境数字贸易的政策支持

针对本土企业“没安全感”的问题,建立数字保税区是一种重要策略。通过优化数据跨境流动机制,推动电子票据应用,推进数据开放,达到提高数字开放程度的目标。这种做法有助于促进数据跨境流动和跨境数字贸易开展,为数字经济治理打开新的空间。提高数字开放程度意味着要打破数据流动的壁垒,让数据能够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自由流动。这需要依托前文提及的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合规性;同时,建立相应的监管机制,防止数据被滥用或用于非法活动,更好地保障企业在交易过程中的安全性。

为实现这些目标,政府近几年不断出台政策完善数字化市场,通过一系列战略布局、政策指导,推动数字化市场稳步前进。具体措施包括:健全我国跨境数字贸易统计分类标准体系,构建独立运行的跨境数字贸易统计监测框架,培育领域专家队伍,搭建专业化跨境数字贸易专家智库,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统计支撑与智力保障;完善版权保护机制,创建版权交易平台,鼓励跨境数字贸易领域市场主体扩大投入力度,推动设立跨境数字贸易特色保税区,持续提升数字领域对外开放水平。依托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率先在试验区内设立跨境数字贸易试点保税区,待试点模式成熟、运营经验完善后,逐步向全市范围内推广落地,针对试点保税区内企业,推行增值税专项优惠政策,同步落实跨境版权交易、知识产权交易相关的专属保护政策,为企业开展跨境数字贸易业务营造合规有序、利好

高效的发展环境;建立专业化跨境数字贸易仲裁机构,统筹整合相关部门与行业机构的职能权责,深化跨部门协同配合,高效处置各类跨境数字贸易纠纷,切实保障企业合法经营权益,为跨境数字贸易有序开展筑牢安全保障。

参考文献:

- [1] 叶凌寒,翁东玲. 中国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研究:基于与其他数字贸易规则的比较[J]. 亚太经济,2023(6):116-126.
- [2] 于世海,王梦乐,孔令乾. 数字贸易发展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性的时空格局与收敛性[J]. 科技管理研究,2023,43(13):91-102.
- [3]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4] LILLYANA J D, MARTIN M. Digital trade in MENA: regulatory readiness assessment [R]. Washington, D. C.: The World Bank, 2020:1-108.
- [5]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2018 年上海市数字贸易进出口相关统计数据 [R/OL]. (2019-07-25) [2026-02-14]. <http://sh.people.com.cn/GB/n2/2019/0729/c176738-33191776.html>.
- [6]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2022 年上海市数字服务贸易与跨境电商进出口统计数据 [R/OL]. (2023-06-01) [2026-02-14]. <https://sw.sh.gov.cn/jyta/20230607/00c46885ca39447e84dc971b421c0b05.html>.
- [7] 上海市数据局. 2024 年上海市数字贸易进出口总额相关数据公开披露 [R/OL]. (2025-07-04) [2026-02-14]. https://www.gov.cn/zccfh/2025zccfh/20250704/jdzc/202507/content_7030684.htm.
- [8] 杨振. 企业技术需求挖掘的难点与解决对策[J]. 现代企业,2024(4):165-166.
- [9] 廖喜凤. 跨境数字贸易助推湖湘非遗文化国际传播的实践路径与体系构建[J]. 商展经济,2024(4):84-87.
- [10] 杨有宗. 上海自贸试验区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N]. 新华每日电讯,2024-02-07(3).
- [11] 黄敬一. 上海市数字贸易发展的问题与对策[J]. 当代县域经济,2024(1):85-87.
- [12]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数字贸易发展白皮书(2020 年):驱动变革的数字服务贸易 [R/OL]. (2020-12-01) [2026-04-23]. <http://www.caict.ac.cn/english/research/whitepapers/202012/P020201228566556820400.pdf>.
- [13] 张茹莹. 我国企业核心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研究[D]. 济南:齐鲁工业大学,2023.
- [14] 张国峰,郭宝来. 数字贸易壁垒的进口抑制效应[J]. 国际贸易问题,2025(11):134-155.

(下转第 102 页)

水利工程造价咨询职业风险与防范措施

贾连双

(新疆新能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新疆 乌鲁木齐 830022)

摘要:水利工程具有工程规模庞大、建设周期漫长、技术工艺复杂、参与主体多元等特点,使得相应的造价咨询工作也面临较多职业风险。造价咨询人员可以通过持续深化专业知识积累来提升自身专业能力,这是防控职业风险的前提条件。侧重于由社会因素引发的职业风险研究,通过对典型水利工程案例的分析,精准辨识造价咨询过程中的关键风险源,并从制度建设、流程规范、资料管理等方面提出系统性防范措施,以强化咨询服务的专业性与合规性,有效管控与降低职业风险。

关键词:水利工程造价咨询;职业风险;风险防范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2.007

中图分类号:F426.91;F2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2-0039-06

一、引言

水利工程作为一类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通常具有工程规模庞大、建设周期漫长、技术工艺复杂、参与主体多元等特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常面临复杂的地下水文条件变化、不确定的地质状况、宏观政策调整及极端气候事件等多重风险因素。从项目立项、环境影响评价、开工建设至竣工验收,各环节均需履行严格的审批程序。

与民间投资项目不同,水利工程基本依赖国家投资,投资和管理主体多为国有企事业单位,这亦决定了水利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的主要服务对象。水利工程需接受水利、财政、审计及纪检等多部门、多层级的独立审计。因此,从事水利工程造价咨询的专业人员,除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外,还需具备较强的职业风险防控意识。

总体来说,造价咨询职业风险主要来源于以下四个方面:自身专业能力、职业道德、企业管理和外部环境^[1]。造价咨询人员可以通过持续的专业学习与实践来提升自身专业能力,这是防控职业风险的前提条件。其余三者可以统称为社会性因素,不同的合作单位及业务类型,均会带来相应的职业风险,这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通过对典型水利工程

案例的分析,系统地归纳与梳理造价咨询过程中的风险源,并提出有针对性的防控策略,以期将社会性因素带来的职业风险降至最低,进而推动咨询工作的规范化与标准化。

二、典型水利工程案例分享

(一)规避招标案例

某国家投资项目,业主单位将未纳入总包合同的智能化系统以直接委托方式交由下属子公司施工,合同金额约500万元,其合同清单中设备价格显著高于市场价,且在施工过程中随意调整设备的品牌。该行为涉嫌规避招标程序,存在较高的廉政风险^[2]。

(二)总价项目未分解案例

某项目中,以总价列项的临时工程未进行工程量分解,进度款累计支付金额达4亿元,因缺乏相应计量文件,导致竣工结算工作难以开展。与房建工程相比,水利项目的临时工程金额较大,总价项目不按规定进行分解的现象较为普遍,由此带来巨大审计风险^[3]。

(三)工程量清单编制不合规案例

某项目将施工支洞列为总价项目,因实际地质条件变化引发计价争议。该做法既不符合《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工程量计算规定》(SL328—2005)第3.02条有关规定,也违背了《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

收稿日期:2025-10-20

作者简介:贾连双(1973—),男,河南新乡人,新疆新能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项目经理、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

价规范》(GB50500—2024)所倡导的量价分离、风险可控原则^[4]。总价项目通常适用于工艺相对简单且风险可控的施工临时工程,而对于施工风险较高或不可控的施工临时工程则应按一般项目进行计价。

(四)辅助工作清单计价不当案例

某项目招标工程量清单中将隧洞排水作为辅助性工作计入开挖单价内。一标段地勘报告预测水量较小,实际施工中地下水量极大,抽排水费用约100万元/月,对施工进度构成严重制约;另一预测水量较大的标段则情况正好相反。地下水普遍存在不确定性,将排水工作简化为辅助性工作而不单独计价,给后期管理带来较大的风险,该现象在水利工程中普遍存在。招标工程量清单应合理划分施工风险,并对一般性排水进行定量和定义。当地下水不确定性较大时,排水报价宜拆分为管道安装(“米”)和抽排水(“吨”)等子项。

(五)图纸与概算工程量偏差案例

某项目招标工程量清单采用设计概算工程量,直至项目收尾阶段仍未对施工图纸工程量进行全面核算,该现象在水利项目中普遍存在,对成本动态管理造成不利影响。最终竣工结算发现管理营地的建设规模 and 标准远超设计概算,且未履行重大设计变更报批手续,面临严重的审计风险^[5]。

(六)工程质量与廉政问题案例

某农田水利综合改造项目,各参建单位对普遍存在的覆土厚度不足现象视若无睹。后经过当地审计部门的调查,揭露出施工单位围标、业主单位主管领导腐败、施工质量低劣等诸多问题,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七)材料询价失控案例

某水利项目对工程量清单中未列材料进行了询价,但询价工作全程由施工单位主导,导致结算价格超出市场价数倍,给后期结算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八)设计变更故意拖延调价案例

某施工临时营地招标工程量清单为框架结构,按建筑面积单平方米包干。实际实施时变更为轻型钢结构,单方造价明显降低。施工单位以工期紧为由,仍按清单价办理进度款结算,造成了超额支付工程款。“报增不报减”现象在水利工程中较为普遍。

(九)关联交易价格审核案例

某项目施工单位与材料供应商同属同一集团子公司,存在利益关联,采购发票价格虚高。按照“公允、透明、合规”的关联交易原则,关联交易价格应等同于与非关联独立第三方进行的交易价格。经过协调,审计单位对供应商的招投标资料进行关联审核,在确认招投标过程资料真实合规后,按供应商进

项税发票价格执行。

(十)随意提高建造标准案例

某水利项目管理营地设计概算面积约为9000平方米,招标工程量清单面积约15000平方米,实际施工面积约21000平方米。概算单方造价约2400元/平方米,结算单方造价约3800元/平方米。营地规模及建造标准均远远超过设计概算,且未履行任何报批手续,属于违规使用政府财政预算资金,受到查处后,相关决策机构及领导均受到严厉处分。主管单位应完善预算管理考核制度,以杜绝基层管理方脱离实际工作需要随意提高装修标准的现象。

三、造价咨询工作中的主要职业风险源

通过对上述案例的梳理,可将水利工程造价咨询中的主要职业风险源归纳为以下几类:

(一)独立性风险

咨询单位过度依赖业主单位意愿或施工单位提供的资料,丧失专业独立性,是最大的风险因素之一。

(二)可溯性风险

审核过程缺乏书面记录,难以追溯审核工作。

(三)资料管理风险

发现基础资料错误后,未严格按照规定程序进行更正。

(四)合规性风险

主要包括业主单位规避公开招标、询价不规范、超量结算、重大设计变更不报批、施工临时工程类总价项目不分解、在建筑工程一切险保障范围内办理签证等。

(五)现场管控不到位风险

主要包括只报增项不报减项、甲供材浪费、动态成本管理工作缺失等。

(六)计价依据不当风险

合同清单计价依据一般为预算定额,采用概算定额时需注意二者适用性和定额子目工作范围差别。

(七)工程量清单风险

主要包括计价项目设置不合理、项目特征描述不完整、漏项、不平衡报价等。

(八)合同(技术)文件条款风险

主要包括条款模糊、前后矛盾或存在漏洞。

(九)道德与法律风险

主要包括基础资料造假、虚开发票等行为引发法律后果。

四、水利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职业风险源及防范措施

水利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职业风险源主要来源于自身专业能力、个人职业道德、咨询企业内部管理及外部环境。各种风险源的表现形式及主要防范措施详见表1。

表 1 水利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职业风险源及防范措施一览表

主要风险源	表现形式	主要防范措施
(一)自身专业能力		
工程量计算错误	· 工程量错漏	· 熟练掌握工程量计算规则。 · 熟练掌握算量软件,CAD 软件。 · 熟悉图纸和施工现场。
定额套用错误	· 错套定额 · 定额换算错误	· 熟悉定额,重点关注工作内容和换算规则。 · 熟练掌握预算软件。 · 熟悉施工工艺。
工程量清单列项不合理	· 一般项目错列为总价项目 · 清单项设置不便于计量	· 加强清单规范学习。 · 风险不可控的项目不可以列为总价项目,避免实施时缺乏可操作性。 · 不确定性较大的工作不应简化为辅助性工作,应单独计价。 · 计量单位、计量规则应便于计量和工程变更管理。
材料/设备价格失真	· 价格偏差过大	· 建立多渠道价格信息库,进行不同渠道价格对比。 · 熟悉合同中价格风险分担条款。 · 熟悉材料设备性能、规格。
费用计取错误	· 计费基数或费率错误	· 熟悉定额、政府文件及合同对费率的规定。
(二)职业道德		
缺乏独立性	· 咨询意见带有倾向性	· 对从业人员强化独立性教育。 · 严格按合同约定办理业务。 · 实行轮岗制,加强内审。 · 完善三级复核机制。 · 与委托方沟通,确定合理合规的咨询费定价机制。 · 鼓励咨询人员对于原则性问题坚持意见。 · 鼓励咨询人员发现错误及时改正。 · 当项目管理风险过大且无法改变现状时,应及时终止合作。
串通舞弊	· 高估冒算	· 增加人才储备,加强企业内部考核和淘汰机制。 · 完善三级复核机制。 · 咨询企业应强化重大事项专家决策制度
工作不负责任	· 不按规定审核,审核结果漏洞百出	· 增加人才储备,加强企业内部考核淘汰机制。 · 明确各岗位职责和责任追究机制。 · 将现场踏勘、资料核实列为内部强制性工作步骤。 · 完善三级复核机制。
保密意识薄弱	· 泄露标的或业主单位机密 · 随意转发过程文件	· 与全体员工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保密协议。 · 数据和文件进行分级授权管理,收发电子数据应采用加密技术。
(三)咨询企业内部管理		
三级复核制度流于形式	· 不按规定审核或只签字不审核。	· 明确各级复核人员的资质要求、职责、责任。 · 规范复核流程,编制复核记录单,逐项复核。
质量控制体系不健全	· 缺乏统一的作业标准和质量考核办法	· 制定企业级的《作业指导手册》和《质量管理办法》。 · 针对各种不同的业务类型,制定《审核过程标准化工作清单》,引导咨询人员逐项开展工作。 · 设立独立的质控部门或岗位,定期进行质量内审。
档案管理混乱	· 过程文件、计算底稿、审核记录缺失	· 推行“项目档案管理”制度。 · 统一档案格式,纸质档案与电子档案同步归档、备份。 · 明确档案管理责任人,确保资料可追溯。 · 在无法保证资料的可靠性时,原则上不直接接收施工单位提交的资料。 · 在接收资料时应由各参建方在资料移交清单上签字。 · 加强审核工作底稿督促和检查。
项目信息沟通不畅	· 内外沟通不充分 · 关键事项未确认文件	· 推行标准化沟通机制(如项目启动会、定期例会、书面纪要、管理建议书、审核意见单)。 · 所有重要沟通均应有书面记录,并经各方签字盖章。 · 会议纪要应对达成共识的部分进行书面确认,避免流于形式。
(四)外部环境		
委托方管理不规范	· 提供资料不全、不准 · 提出不合理要求或干预独立咨询 · 建筑工程一切险保障范围内办理签证	· 在业务约定书中明确委托方对提供资料的准确性负责,咨询单位对基础资料只做符合性审核。 · 将现场踏勘、资料核实列为内部强制性工作步骤。 · 资料移交清单应由委托人签字认可。 · 对委托方提出的不合理要求,要积极沟通解释,必要时出具书面风险提示。 · 审慎选择客户,对于市场信誉度低的委托方,除了适当提高咨询费用外,在签约时应增加对其行为的约束条款。 · 当项目管理风险过大且无法改变现状时,应及时终止合作。

续表1

主要风险源	表现形式	主要防范措施
承包商(施工方)风险	· 送审资料质量低劣、造假、不完整或高估冒算 · 核对过程中不合作或利用不正当途径施压	· 不私自接收承包方直接报送的资料 · 不合格资料拒绝接收或要求补正。 · 明显造假时,应向各参建方发起预警,提醒业主单位对施工单位加强考核。 · 所有核对和争议过程均详细记录,并定期向委托方汇报进展情况。 · 不平衡报价
业主单位规避招标	· 超出规定限额,业主单位未启动招标程序	· 熟悉有关招标制度。 · 及时向业主单位发出管理建议书。
临工临时工程总价项目不分解	· 总价项目没有进行分解,直接按比例办理支付	· 及时向业主单位发出管理建议书。
提前预结工程款	· 实际未施工,按年度投资差额办理结算	· 及时向业主单位发出管理建议书。
完工结算不及时	· 子项已经全部施工完毕并验收合格,不办理结算	· 按项目进度分期分批办理结算,及时修正付款偏差。 · 及时向业主单位发出管理建议书。
市场询价操作不规范	· 由施工单位主导,各方参与度不高,价格失真	· 协助业主单位建立背对背询价机制。 · 及时向业主单位发出管理建议书。
设计变更及报价不及时	· 减少金额较大时,施工单位不及时申请变更价款	· 提醒相关参建方冻结相应的付款。 · 及时向施工单位发出管理建议书。
成本动态管理不及时	· 动态成本管理工作未启动	· 施工图确定后,及时组织施工单位核算图纸工程量,修正合同估算工程量。 · 定期汇总设计变更、索赔、价格调整等数据。
超设计概算	· 设计规模或建造标准大幅提高	· 熟悉设计概算文件。 · 对设计过程进行跟踪,对重大设计变更进行预警。 · 出现大额超概时,及时向业主单位发出管理建议书。

五、防范职业风险的措施

(一)增强独立性意识

独立性是咨询企业的灵魂,是实现客观公正的基石。因工作性质及行业的特殊性,造价咨询单位除了要维护委托方的利益之外,更要体现客观公正的社会性。咨询单位只有独立自主、客观、公正地开展工作才能真正维护委托方的长远利益^[6]。实践中,一些委托方在咨询合同中刻意压低基础咨询费,拉高审减额提成,诱导咨询单位一味压低造价,造成咨询单位与对方处于敌对状态。这种一边倒的造价咨询工作,极易造成承发包双方对簿公堂,最终使发包单位商誉严重受损。

失去独立性将对咨询企业和个人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只有不受任何利益方的影响,独立开展工作,不以刻意压低(或抬高)造价为目的,其咨询结果才具有公正性,咨询企业才能经受市场的考验,提升企业公信力,提供更加优质的咨询服务。当承发包双方就价格或合同产生争议时,有公信力的咨询单位才能充当“润滑剂”角色,避免出现双输的糟糕结果。提高公信力,保持独立性的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引导委托方主管领导转变管理思维,以企业长远利益为目标,避免“刻意压低承包价格”,建立合理的咨询费定价机制,促进咨询工作的良性开展。

(2)除了收集资料信息外,不过度依赖委托方负责人的意见,遇到承发包双方争议时,能主动提出专业的处理建议。

(3)培养独立调查和核实的能力,而非过度依赖施工单位提报的资料,主动开展工作。

(4)在依据充分的前提下,要敢于发表并坚持不同意见。但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轻易表态或随口附和。

(5)全过程咨询项目的驻场负责人应进行定期轮换,以防止与某一客户形成过于密切的利益捆绑。

(6)咨询企业应充分保障造价工程师能在不受任何内部及外部非专业因素干扰的环境下开展工作。

(二)健全内部审核质量控制制度

造价咨询是一项系统性工作,审核内容往往涉及施工工艺、工程量、合同文件、定额、市场价格等多个因素和细节。许多刚入行的人员,往往不知如何下手,而一些老员工则更是跟着感觉走。目前咨询行业普遍缺乏工作指引文件,审核质量完全依靠个人工作能力和职业操守,风险较大。如何按步骤系统性地开展工作,需要我们针对不同的工作场景进行认真研究分析,强化内部审核质量控制体系。

(1)为了规范审核行为,避免出现漏审现象,咨询企业应根据业务类型分别制定《审核过程标准化工作清单》,指导员工有标准、有重点、有条理、有针

对性地开展工作。

(2)建立三级审核质量控制程序:编制人自查→审核人复核→项目负责人审核,重大事项由公司总工程师审定。

(3)对于现场管理混乱的项目,咨询公司应强化重大事项专家决策制度,以排除外界干扰因素。

(4)对于完全失控项目,应向委托人提示风险,根据实际情况出具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核结论。

(5)当风险过大且无法改变现状时,应及时终止合作。

(三)规范档案管理与资料交接

造价咨询业务比较繁杂,档案资料涉及工程量计量、进度款结算、合同、招标文件、设计变更、会议纪要等诸多内容。档案资料既是办理竣工结算的依据,又是审计工作开展的依据。档案管理混乱将严重影响咨询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在资料的流转和保存环节均需要加强管理。为避免职业风险,规范日常资料管理需要重点注意以下内容:

(1)在无法保证资料的可靠性时,原则上不直接接收施工单位提交的资料。

(2)计价资料应区分正副本,封面上应加注正副本标识。正本资料均为原件,副本内容应与正本一致。

(3)如委托事项基础资料繁杂,在接收资料时应由各参建方在资料移交清单上签字。

(4)应由专人建档管理,杜绝出现资料丢失现象。

(四)全面落实工作底稿制度

多数咨询从业人员对审核过程工作记录不够重视。由于审计工作的滞后性,往往因工作时间久远或人员更换,造成审核思路、方法等关键信息的缺失。审核工作底稿可以保证造价咨询工作的可溯性,在审核工作中应严格执行该制度。

(1)现场造价咨询工作期间,造价咨询人员应整理编制好详细的工作底稿,以便为撰写造价咨询报告和发表造价咨询意见打下良好的基础。

(2)咨询工作底稿是界定和免除造价咨询人员的相关责任、评价或考核造价咨询人员专业能力与工作业绩的依据。

(3)工作底稿应详细记录审核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处理办法。

(4)对重大复杂事项的审核工作底稿应进行整理,同一事项进行多次审核时,在出具最终审核意见时,应将历次审核意见进行统一归档。

(5)在审核意见中涉及其他单位的审批成果

时,应将有关审核意见抄送相关单位。

(6)应及时收集各参建单位对审核意见的回复,并做好有关修订记录。

(五)加强现场踏勘制度

水利工程不确定因素较多,当现场出现水文、地质等重大变化时,应注意搜集现场影像资料,形成《现场实勘实测记录》。

(1)现场巡视检查工作应符合咨询合同有关要求,需要注意与监理公司和业主单位的工作界限。

(2)日常踏勘:核实完成工程内容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或施工组织设计,核实完成工程形象进度情况,避免超量结算。

(3)重大事项检查:图纸外工程量签证、索赔事项、计日工等需进行现场查验,注意明确内容准确、完整、可追溯,避免重复计量。

(六)建立风险提示制度

水利工程多数是国家投资,咨询单位在工作中要严格贯彻真实、合规、合法、效益的原则。水利工程管理比较复杂,咨询业务除了受合同文件制约外,还必须满足委托方、主管水利政府部门、审计部门的各种规章制度要求。如在合规性上存在较大风险时,需在会议纪要或专文向业主单位进行风险提示。以下事项需重点关注:

(1)咨询单位驻场后应协调各参建方梳理合同文件、主管水利政府部门、审计部门的各种规章的强制性规定,编制本项目相应的“商务类强条手册”。并定期进行清理,避免出现重大违规。

(2)原始基础资料更换风险:不允许施工单位擅自更换资料。修改方法包括在原文件上进行修改并签字盖章,或提交补充文件;修改内容均需由业主及监理单位进行汇签。

(3)动态成本管理:施工图纸交付后,建议业主单位组织施工单位进行图纸工程量重新计量,避免出现超概现象。定期汇总变更、索赔、签证、调价等数据,对总成本进行预警。

(4)建立背对背询价工作制度:在统一报价文件的基础上,分别由业主单位、监理单位及施工单位独立询价,以保证结果可靠性。

(5)临时工程类总价项目应坚持先分解后支付的原则。

(6)合同范围外新增加工程,如超出规定限额应提醒业主单位进行招标。

(七)规范采购发票审核流程及原则

水利工程投资巨大,施工单位一般为大型国有企业,为了规模效应、提升效率、标准化管理,优化供

应链,许多大型企业专门设置一个子公司负责集中采购。现场施工单位与负责集采的公司属于同一集团的平行部门,相互之间的交易行为属于关联交易,相应的税务筹划给造价咨询业务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因此在按合同约定需采用采购发票价格时,应注意以下内容:

- (1)与施工单位有关联关系的供货单位应视为其采购部门,一般情况下,应采用外部第三方开具的进项税票为准。
- (2)发票数量应与工程实际用量一致,避免出现故意压低数量以抬高单价的现象。
- (3)交货地点与项目一致。
- (4)与施工单位有关联关系的供货单位,应要求其提供对应的进项税发票;
- (5)施工单位应提供相应的招投标(或询比价)资料、采购合同、支付凭证等;
- (6)发票价格应与信息价或网价进行对比,避免偏差过大。

六、结语

职业风险在任何一个专业领域都普遍存在,我们无法从根源上彻底消除,也更无此必要。职业风险不是洪水猛兽,其客观存在恰恰是工作价值的具体体现。相对于简单重复性工作,水利工程的复杂

性不仅给造价咨询工作带来了更大的职业风险,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创造性和社会价值。我们研究职业风险的目的不在于制造焦虑,而在于通过识别并管理这些风险,谨慎地跨越这些“坑”,实现个人与行业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规范:GB/T 51095—2015[S].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

[2] 水利部. 水利工程设计变更管理暂行办法:水规计[2020]283号[Z/OL]. 2020.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水利水电工程标准施工招标文件[Z].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9.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 50500—2024[S].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4.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水利水电工程标准施工招标文件技术标准和要求(合同技术条款)[Z].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9.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 50501—2007[S]. 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李玉玲)

Professional Risks and Preventive Measures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st Consulting

JIA Lianshuang

(Xinjiang Xinneng Engineering Project Management Co., Ltd., Urumqi, Xinjiang 830022, China)

Abstract: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re characterized by large scale, long construction periods, complex technical processes, and the involvement of multiple stakeholders, which result in considerable professional risks in cost consulting practice. Cost consultants can enhance their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through the continuous strengthening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which is a prerequisit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professional risks. This study focuses on professional risks arising from social factor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ypica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ases, key risk sources in the cost consulting process are accurately identified. Furthermore, systematic preventive measures are propos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process standardization, and documentation management, aiming to enhance the professionalism and compliance of consulting services and effectively control and reduce professional risks.

Keywords: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st consulting; Professional risk; Risk prevention

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出场逻辑、实践模式与优化路径

梁超锋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党的建设教研部,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基层治理处于国家治理的末梢环节,其效能直接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进程。新时代,党建引领成为基层高效能治理的核心引擎与根本保障。基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系统剖析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的生成逻辑,从理论、历史、现实三个维度揭示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的必然性与合理性;通过梳理国内典型实践案例,提炼出组织嵌入型、机制融合型、服务赋能型三类核心实践模式,并分析各模式的运行特征与适用场景;针对当前实践中存在的组织覆盖不全面、机制衔接不顺畅、服务供给不精准、数字赋能不足等问题,从强化组织建设、完善制度机制、优化服务供给、推进数字转型四个层面,提出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的优化路径,为新时代基层治理实践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2.008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2-0045-06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全面实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健全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乡村治理,完善社区治理。”^[2]……一系列部署持续发力,进一步为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指明方向。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单元,承担着政策落地、矛盾化解、服务供给、秩序维护等重要职能,治理效能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城镇化进程加快、人口结构变化以及数字化技术普及,基层治理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方面面临的问题

日益凸显,传统政府主导、行政推动的治理模式已难以适应新时代需求,亟须构建更具系统性、协同性、创新性的治理体系。

一、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的出场逻辑

(一)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是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的理论根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是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其性质决定了党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基层治理的核心目标是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这与党的根本宗旨高度契合。同时,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和强大的组织能力,

收稿日期:2025-12-12

基金项目:2026年度河南省科协科技决策咨询研究青年人才课题“数智赋能河南加强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的对策建议研究”(SKXJCZX-2026-38C)

作者简介:梁超锋(1993—),男,河南驻马店人,博士,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党的建设、基层治理等。

能够通过自上而下的组织覆盖与自下而上的群众动员,将党的主张转化为基层治理的具体实践,为基层高效能治理提供组织保障。

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为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提供了理论框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实现治理体系的系统性、治理能力的科学性、治理效能的最大化。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其现代化水平直接关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治理的领导核心,其领导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组成部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本质上是将党的领导嵌入基层治理体系,通过党的组织优势整合政府、市场、社会等各类治理资源,以制度优势规范治理流程、提升治理效率,以群众优势凝聚治理共识、激发治理活力,从而实现基层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治理效能的有效提升。

(二)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基层治理实践的传承与发展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其历史逻辑贯穿于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这一治理模式是对历史经验的继承与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原则,将党的组织延伸到军队基层,同时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在城市建立工人俱乐部,通过党的组织网络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形成了与群众的紧密联系,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基层基础。这一时期,党建引领的核心是通过组织嵌入实现对基层社会的动员与整合,相关实践形成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雏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区、乡、村三级基层政权体系,同时在农村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城市建立街道办事处与居民委员会,通过党的组织网络将基层社会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有效组织与治理。这一时期,党建引领的核心是通过制度建设实现对基层社会的组织与管理,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稳定的基层环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基层社会呈现出多元化、碎片化特征。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社区党建、农村党建等理念,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整合社区居委会、村委会、社会组织、企业等各类主体,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基层治理格局。这一时期,党建引领的核心是通过机制创新实现基层社会协同治理,推动基层治理从行政主导向多元协同治理转型。

新时代以来,面对基层治理中的新问题、新挑战,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强化党建引领的核心地位,提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大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3]党中央明确提出将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的各方面、全过程,通过“党支部建在网格上、党小组建在楼栋里”等组织创新,实现党的组织全覆盖;通过“党建+网格治理+志愿服务”等机制创新,实现党的领导与基层治理的深度融合。这一时期,党建引领的核心是通过系统变革实现基层治理的高效能提升,推动基层治理从协同治理向高效能治理转型。

(三)现实逻辑:新时代基层治理困境的破解需求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基层治理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传统治理模式已难以适应现实需求,亟须通过党建引领破解困境、提升治理效能。

第一,基层治理面临碎片化困境。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基层社会结构日益复杂,政府、市场、社会等各类治理主体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导致治理资源分散、治理责任不清、治理效率低下。比如,在城市社区治理中,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之间常因权责划分不清产生矛盾,影响治理效能;在农村治理中,村“两委”、合作社、社会组织之间缺乏协同,导致乡村振兴政策难以落地。党建引领能够通过党的组织网络整合各类治理主体,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各方协同联动的治理机制,破解碎片化困境。

第二,基层治理面临空心化困境。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城市社区居民流动性增强,基层社会的熟人特征逐渐弱化,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不高,导致基层治理缺乏群众基础。同时,部分基层党组织存在软弱涣散问题,组织力不强、凝聚力不足,难以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进一步加剧了空心化困境。党建引领能够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党组织的组织力、凝聚力、服务力,通过党员联户、志愿服务等方式密切联系群众,激发群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破解空心化困境。

第三,基层治理面临行政化困境。长期以来,基层治理存在重行政、轻服务的倾向,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将大量精力用于应付上级检查、完成行政任务,忽视了群众的实际需求,导致“政府干、群众看”的治理局面。同时,基层治理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突出,如痕迹管理过度留痕等,占用了大量治理资源,影响治理效能。党建引领能够通过强化党的宗旨意识,推动基层治理从行政导向向需求导向转型,通过“我为群众办实事”“群众点单、支部派单、党员接单”等服务模式,提升服务精准度,破解行政化困境。

二、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的实践模式

(一)组织嵌入型模式:以组织覆盖实现治理整合

组织嵌入型模式是指通过将党的组织网络嵌入基层社会各领域、各环节,实现党的组织全覆盖与工作全覆盖,从而整合治理资源、凝聚治理合力,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该模式的核心是组织建设,通过强化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整合与引领。组织嵌入型模式的适用场景:该模式适用于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治理主体分散、治理资源匮乏的地区,通过组织嵌入,能够快速强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整合各类治理资源,解决基层治理中的碎片化、空心化问题。

组织嵌入型模式的主要运行特征如下:一是组织覆盖全面化。组织嵌入型模式强调党的组织要延伸到基层社会的神经末梢,实现“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组织;哪里有党组织,哪里就有党的工作”。在城市社区,通过“党支部建在网格上、党小组建在楼栋里、党员中心户设在单元内”,将党的组织覆盖到网格、楼栋、单元;在农村地区,通过“党支部建在村上、党小组建在村民小组上、党员联系户覆盖农户”,将党的组织覆盖到村、组、户;在“三新”组织,通过单独建、联合建、挂靠建等方式,建立党组织,实现党的组织覆盖与工作覆盖。二是组织功能一体化。组织嵌入型模式强调基层党组织要发挥政治引领、组织协调、服务群众的一体化功能。通过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活动,宣传党的政策、传递党的声音,通过党组织牵头建立党建联席会议、党群议事会等平台,协调政府、市场、社会等各类主体,解决基层治理中的难点问题;通过建立党员服务站、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为群众提供政策咨询、生活帮扶、矛盾调解等服务。三是组织管理规范化的。组织嵌入型模式强调通过制度建设规范基层党组织的运行,提升组织力。这一模式的典型案例是北京市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北京市针对基层治理中街乡有责无权、部门有权无责的问题,推行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其核心是通过强化街道(乡镇)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将区直部门的力量嵌入基层治理体系。

(二)机制融合型模式:以制度创新实现治理协同

机制融合型模式是指通过建立健全党建引领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的制度机制,将党的领导贯穿于基层治理的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实现治理流程的规范化、治理主体的协同化、治理效能的最大化。该模式的核心是制度创新,通过机制设计实现党的领导与基层治理的有机融合。

机制融合型模式的主要运行特征如下:一是决策机制科学化。机制融合型模式强调建立党组织领导下的民主决策机制,将党的领导嵌入基层决策环节。通过民主决策机制,确保党的主张与群众意愿的统一,提升决策的科学性与可行性。二是执行机制高效化。机制融合型模式强调建立党组织领导下的协同执行机制,将党的领导嵌入基层执行环节。通过建立“党建+网格治理”机制,将党员编入网格,担任网格长、楼栋长,负责政策宣传、矛盾调解、服务代办等工作;通过建立“党建+部门联动”机制,整合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等力量,形成执行合力。同时,建立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岗等制度,明确党员在执行中的责任。三是监督机制常态化。机制融合型模式强调建立党组织领导下的多元监督机制,将党的领导嵌入基层监督环节。通过基层党组织对社区居委会、村委会、社会组织等主体的监督,确保治理行为符合党的政策与群众需求;通过党员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多元监督方式,形成监督合力。同时,建立整改落实机制,对监督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确保治理过程的规范化与治理结果的有效性。这一模式的典型案例是浙江省“党建+基层治理四平台”机制,浙江省针对基层治理中条块分割、权责不清、效率低下等问题,推行“党建+基层治理四平台”机制,即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四平台,其核心是通过机制融合实现党建引领与基层治理的深度协同。

(三)服务赋能型模式: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实现治理增效

服务赋能型模式是指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为导向,通过基层党组织提供精准化、个性化、多元化的服务,从而凝聚治理共识、激发治理活力。该模式的核心是服务创新,通过服务赋能实现党的领导和群众需求的有机统一。服务赋能型模式适用于人口密集、需求多元、群众参与意愿较强的地区,通过服务赋能,能够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激发群众参与活力、提升群众获得感,解决基层治理中的服务错位、群众疏离问题。

服务赋能型模式的主要运行特征如下:一是服务需求精准化。服务赋能型模式强调通过“群众点单、支部派单、党员接单、群众评单”的服务流程,精准识别群众需求。基层党组织根据需求清单,结合党员特长、资源禀赋制定服务供给清单,实现需求与供给的精准匹配。例如,针对留守儿童看护难问题,组织党员志愿者开展“四点半课堂”服务。二是服务供给多元化。服务赋能型模式突破传统政府单一供给的服务模式,整合党组织、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志愿者等多元力量,构建“党建+多元服务”体系。在服务主体上,通过党组织引领、社会组织承接、企业赞助、志愿者参与的方式,形成服务合力;在服务内容上,涵盖政务服务、生活服务、文化服务、健康服务等多个领域;在服务方式上,结合线上线下渠道,推行上门服务、预约服务、代办服务等灵活模式,提升服务便捷性。三是服务评价民主化。服务赋能型模式强调以群众满意度为核心的评价导向,建立群众评单、支部晒单、党委考单的服务评价机制。通过线上投票、线下座谈、问卷调查等方式,由群众对服务质量、服务效率、服务态度进行评价;上级党委将服务评价结果纳入基层党组织考核,作为评先评优、干部任用的重要依据,倒逼服务质量提升。这一模式的典型案例是成都市“党建+社区微治理”模式,成都市针对城市社区治理中群众需求多样、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推行“党建+社区微治理”模式,以微项目、微服务、微实事为载体,将党建引领融入社区服务。

三、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的现实困境

(一)组织建设维度:覆盖不全面与功能弱化并存

一是组织覆盖存在盲区。随着基层社会结构的变化,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业态不断涌现,但部分“三新”组织因规模小、人员流动大、党员数量少,未能及时建立党组织;部分城市新兴社区、城乡接合部社区,因建设速度快、人口导入多,党组织覆盖滞后于社区发展;部分农村地区因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党组织空心化严重,组织覆盖难以有效延伸。二是组织功能弱化。部分基层党组织存在重行政、轻党建,重形式、轻实效的问题,将主要精力用于应付上级检查、完成行政任务,忽视了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与组织功能;部分基层党组织活动形式单一、内容枯燥,“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活动流于形式,难以吸引党员参与。三是党员队伍存在短板。部分基层党员身份意识淡化,缺乏参与基层治理的主动性与责任感;部分党员年龄结构老化、知识结构单一,难以适应数字化治理、精细化服务的需求;部分流动

党员因管理难度大,长期游离于党组织之外,未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导致党员队伍的战斗力不足。

(二)机制衔接维度:协同不畅与责任模糊叠加

一是治理主体协同不畅。尽管“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格局已初步形成,但在实践中,政府、市场、社会等主体之间仍缺乏有效的协同机制。部分政府部门存在本位主义,不愿将权力下放给基层或社会组织;部分社会组织因资源匮乏、独立性不足,难以有效参与治理;部分群众因参与渠道不畅、参与意愿不强,未能真正融入治理过程,导致协同治理论为口号式治理。二是制度机制衔接存在断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涉及多个层面、多个领域的制度,但部分制度之间存在碎片化、冲突化问题。基层党组织考核制度与政府绩效考核制度缺乏有效衔接,导致基层干部重行政考核、轻党建考核;党建引领网格治理的制度与社区自治制度衔接不畅,导致网格治理与社区自治“两张皮”。三是责任划分边界模糊。部分地区对基层党组织、政府、社区自治组织的权责划分不清晰,导致多头管理、责任推诿问题突出。在农村治理中,村党组织与村委会之间因权责划分不清,常出现“两委”矛盾,影响治理效率。

(三)服务供给维度:精准不足与效能偏低交织

一是服务供给与需求错位。部分基层党组织在服务供给中存在自上而下的行政思维,忽视群众的实际需求,导致服务供给“大水漫灌”而非“精准滴灌”。部分农村党组织在服务供给中重形式、轻实效,开展的文化活动、培训活动与农民的生产生活需求脱节,导致服务无人问津。二是服务资源配置不均。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服务资源配置存在显著差距,城市社区的服务资源相对丰富,而农村地区、城乡接合部的服务资源相对匮乏;同一地区内部,不同社区、不同村组之间的服务资源配置也存在差异,优质服务资源向示范社区、示范村集中,普通社区、普通村组的服务资源不足,导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三是服务效能评估虚化。部分地区的服务效能评估存在重过程、轻结果,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将服务活动的次数、参与人数等量化指标作为主要评估依据,忽视群众的实际感受与满意度;部分评估过程由上级党委单向评价,缺乏群众参与,评估结果与实际服务效能脱节;部分评估结果缺乏有效的运用机制,未能与党组织考核、干部任用挂钩,导致服务效能评估流于形式。

(四)数字赋能维度:技术应用与治理需求脱节

一是数字平台碎片化。部分地区存在多头建平

台、重复填数据的问题,基层党组织、政府部门、社区自治组织分别建立数字平台,平台之间数据不互通、功能不兼容,基层干部多头登录、重复填报,加重了基层负担。例如,部分社区同时运行党建云平台、政务服务平台、网格治理平台等多个系统,每个系统都有独立的账号、密码与填报要求,基层干部需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应付数据填报。二是数字技术应用表层化。部分基层党组织对数字技术的应用停留在信息发布、数据统计的浅层阶段,未能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需求识别、精准服务、智能治理等方面的优势。如,部分农村地区的数字平台仅用于发布政策通知、公示村务信息,未能利用大数据分析农民的需求、预测农村治理风险;部分城市社区的数字平台缺乏互动功能,群众难以通过平台反映需求、参与治理,数字平台有名无实。三是数字素养不匹配。部分基层干部缺乏运用数字技术开展治理的能力;部分群众,尤其是老年人、农村居民数字素养不足,难以适应数字化服务模式。

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的优化路径

(一) 强化组织建设,筑牢党建引领的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5]一是推动组织覆盖无盲区。针对“三新”组织,采取单独建、联合建、挂靠建、选派党建指导员等方式,实现党组织应建尽建;对规模小、人员分散的“三新”组织,通过行业党建联盟、“区域党建联合体”等形式,将其纳入党组织管理体系。针对新兴领域,创新组织设置方式,例如,在城中村建立片区党组织、在网络社群建立线上党支部、在快递外卖行业建立流动党员党支部,确保党的组织覆盖基层治理的各个环节。二是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开展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专项整治,通过班子整顿、书记调整、党员发展等措施,解决基层党组织班子不健全、战斗力薄弱问题;严格落实“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等基本制度,推动党组织生活常态化、规范化;建立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制度,将考核结果与评先评优、干部任用挂钩,压实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的责任,提升党组织的凝聚力与战斗力。三是推动党组织与治理单元深度融合。在城市社区,推动党支部建在网格上、党小组建在楼栋里,将党组织与网格治理单元结合,实现“党建+网格”深度融合;在农村地区,推动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党小组建在合作社里,将党组织与乡村振兴重点任务结合,实现“党建+产业”深度融合;在“三新”组织,推动党组织建在业务团队上、党小组建在项目组里,将党组织与企业生产经

营、社会组织服务结合,实现“党建+业务”深度融合。

(二) 完善机制衔接,打通协同治理的堵点

一是构建党建与治理深度融合机制。建立“党建+治理”重点任务清单制度,将基层治理的重点任务,例如,矛盾化解、环境整治、民生服务等纳入党建工作内容,明确党组织在各项任务中的职责;推行党建项目化管理,将基层治理中的难点问题转化为党建项目,由党组织牵头负责,组织党员、群众、社会组织共同实施,实现党建与治理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二是健全多元主体协同联动机制。建立党建引领下的多元协同治理联席会议制度,由基层党组织牵头,定期召开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群众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协调解决治理中的难点问题;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持,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如委托社会组织开展养老服务、心理咨询、矛盾调解等工作;搭建群众参与治理平台,建立院落议事会、“社区居民议事厅”“线上议事群”,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激发群众参与热情。三是强化制度执行刚性约束。建立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制度执行监督机制,由上级党组织定期对基层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督查,对执行不到位、流于形式的党组织进行通报批评。

(三) 优化服务供给,找准群众需求的靶点

一是构建需求、供给、评价精准服务体系。建立群众需求动态摸排机制,通过入户走访、线上问卷、民情恳谈会等方式,每月收集群众需求,形成群众需求清单;根据需求清单,整合政府、市场、社会资源,制定服务供给清单,明确服务内容、责任主体与完成时限;建立群众满意度评价机制,服务完成后,由群众通过线上评价、现场测评等方式对服务质量进行打分,评价结果纳入党组织考核与党员积分,倒逼服务质量提升。二是推动服务资源均衡配置。加大对农村地区、城乡接合部等服务薄弱地区的资源投入,通过城乡党组织结对共建机制,组织城市优质社区党组织与农村党组织结对,共享服务资源、交流服务经验;建立基层服务资源整合平台,整合民政、卫健、人社等部门的公共服务资源,以及企业、社会组织的社会服务资源,实现资源一网通享;推行服务资源下沉制度,要求政府部门将政务服务、公共服务事项下沉到社区(村)党群服务中心,实现小事不出社区(村)、大事有人代办。三是推进服务方式数字化转型。整合现有数字平台,构建“智慧党建+基层治理”一体化平台,实现需求征集、任务派单、服务跟踪、评价反馈全流程线上化,避免多网并存、多头填

报;加强基层干部数字素养培训,定期开展数字化技能培训,提升基层干部运用智慧平台开展服务的能力。

(四)加强队伍建设,锻造治理攻坚的尖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都要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支持基层,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带头人队伍建设,确保基层党组织有资源、有能力为群众服务。”^[6]一是建强基层党务工作者队伍。推行基层党务工作者专职化,在社区(村)、“两新”组织配备专职党务工作者,明确薪酬待遇、发展空间,确保有人干事、有钱办事;开展党务工作者能力提升行动,定期组织党务工作者参加党建知识、治理能力、数字化技术等培训,提升专业素养;建立党务工作者激励机制,对工作突出的党务工作者,优先推荐为两代表一委员、优先提拔任用,激发工作积极性。二是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开展党员亮身份、亮承诺、亮业绩活动,组织党员在网格治理、民生服务、矛盾调解等岗位上挂牌服务,接受群众监督;建立党员特长库,根据党员的职业、技能建立特长档案,在群众有需求时,精准匹配党员提供服务;加强流动党员管理,建立流动党员微信群、“流动党员党支部”,组织流动党员在线学习、参与家乡治理,确保流动党员离乡不离党、流动不流失。三是引进培育专业人才队伍。制定基层专业人才引进计划,通过编制保障、薪

酬补贴、住房优惠等政策,吸引法律、社工、心理、数字化等专业人才到基层工作;与高校、职业院校合作,建立基层人才培养基地,定向培养基层治理专业人才;建立专业人才激励机制,对在基层治理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专业人才,给予资金奖励、职称晋升倾斜,确保专业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22-10-26 (01).

[2]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N]. 人民日报, 2025-10-29(01).

[3]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3: 55.

[4]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237.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4: 395.

[6]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132.

(责任编辑 谢春红)

Party Building Leading Efficient Grassroots Governance: Emergence Logic, Practical Model and Optimization Path

LIANG Chaofeng

(Department of Party Building,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Henan Provincial Committee, Zhengzhou, Henan 450000, China)

Abstract: Grassroots governance is the last mil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its effectiveness directly impacts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bilities. In the new era, Party building leadership has become the core engine and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efficient grassroots governance. Based on Marxist Party theory and modern governance theory,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emergence logic of Party leadership in efficient grassroots governance, revealing its inevitability and rationality from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dimensions. By reviewing exemplary domestic practices, it identifies three core operational models—organizational embedding, mechanism integration, and service empowerment—and examines their respec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tion scenarios. Addressing current issues such as incomplete organizational coverage, disjointed mechanisms, imprecise service delivery, and insufficient digital empowerment, the study proposes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or Party-led efficient grassroots governance across four dimensions: strengthening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improving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refining service provision, and advanc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se insights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Party building leadership; Grassroots; Efficient governance

“数治”赋能城乡协同的“法治”逻辑、困境与路径

牛锦红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城乡协同治理是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而“数治”赋能与“法治”保障,共同构成城乡协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数治”通过技术赋权打破地理与层级壁垒,推动“法治”从“形式平等”走向“实质平等”,同时,“法治”通过确认公民数字接入权、数据自决权等新型权利,为城乡居民提供平等参与治理的制度保障。我国在“数治”与“法治”推动城乡协同发展中取得一定成果,但也面临立法供给失衡、治理机制错位、权利保障不均、技术风险失控的现实困境。通过构建城乡数字治理的规则基石,为“数治”实践划定“法治”边界;破除城乡“数治”的条块分割壁垒,打通数据要素流转与城乡协同治理的关键堵点;实现城乡数字正义的均衡覆盖,让“数治”红利公平惠及城乡主体;建立健全风险防控机制,防范城乡“数治”中的技术滥用、数据安全等风险,有效破解“数治”赋能城乡协同的“法治”困境,为实现城乡高质量协同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法治”;“数治”;城乡协同;路径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2.009

中图分类号:D922.0;D4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2-0051-07

城乡协同发展是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其核心在于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资源优化配置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1]。在国家推进城乡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数治”与“法治”正成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提升城乡协同治理效能的关键支撑。数字技术的渗透性与普惠性,为治理流程高效协同提供了全新可能,推动城乡协同发展迈入数字化转型的新阶段。然而,“数治”赋能并非无序推进,其在城乡协同进程中,始终离不开“法治”的规制与保障。国家治理法治化的建设和发展,不仅要有效运用信息技术以提高法治效能,还必须从制度建设、司法控制、社会监管等多种途径,全面构建信息技术的规范体系^[2]。“法治”作为规范权力运行、协调利益关系、保障权利实现的根本手段,既是“数治”技术良性运行的制度基石,也是确保城乡协同发展公平正义的价值标尺,二者的深

度耦合构成了城乡协同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逻辑。在当今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数治”凭借其数字化、智能化等优势,“法治”依靠其权威性、规范性等特点,二者已然成为推动城乡协同发展不可或缺的两种重要方式。

当前,“数治”赋能城乡协同发展的实践已逐步展开,但“法治”供给与实践需求之间的适配性不足问题日益凸显,亟待从“法治”层面寻求破解之道。厘清“数治”赋能城乡协同的“法治”逻辑,剖析实践中的“法治”困境,探索有效的“法治”优化路径,不仅能为规范城乡数字治理秩序、保障城乡居民平等数字权利提供理论支撑,更能为推动“数治”与“法治”共同发力、助力城乡协同发展提供实践指引。基于此,本文立足“数治”与“法治”的互动关系,聚焦城乡协同发展的现实需求,深入探究“数治”赋能城乡协同发展的“法治”逻辑,梳理实践中的“法治”

收稿日期:2026-02-01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数治’视域下河南城乡协同治理体系法治化研究”(2022BFX002);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哀矜折狱’司法传统及其现代转化研究”(25AFX031)

作者简介:牛锦红(1974—),女,山东菏泽人,博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主要致力于城乡治理、城乡规划法史、司法史等领域。

障碍,进而提出兼具针对性与可行性的“法治”优化路径。

一、“数治”赋能城乡协同的“法治”逻辑

城乡协同的核心矛盾在于资源配置失衡与权利保障不均,数字技术的工具理性若缺乏“法治”规制,易加剧“数字鸿沟”与权利失衡^[3]。“数治”通过技术赋权打破地理与层级壁垒,推动“法治”公平价值从“形式平等”走向“实质平等”,“法治”则通过确认公民数字接入权、数据自决权等新型权利,为城乡居民提供平等参与治理的制度保障。

(一)“数治”重构“法治”实施的协同机制

“数治”即数字治理,是建立在工具理性基础上的治理模式,指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数字化技术治理公共事务的动态过程^[4]。数字治理系统通过对大数据的智能处理,生成相应的治理方案和模式,完成具体的治理任务^[5]。大数据有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配置能力以及配置精准度,对提升决策精准化、科学化水平具有重要作用。研究表明,“数字化程度每提高 10%,人均 GDP 增长 0.5%至 0.62%”^[6]。“数治”作为提升治理效能的新范式,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协同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与新手段。传统城乡“法治”实践存在“条块分割”与“碎片化”困境,县级执法与乡村普法、城市监管与农村服务难以有效衔接。以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智慧工具等为代表的新科技迅猛发展,日益嵌入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过程,重构了中国基层治理的环境条件^[7]。“数治”通过三大赋能机制破解上述难题:心理赋能唤醒城乡主体“法治”参与意识,如数字平台增强村民维权信心;资源赋能整合跨域“法治”资源,实现城乡法律服务均衡供给;结构赋能优化治理流程,打破部门数据壁垒^[8]。这种技术驱动的重构,使“法治”实施从“单向管理”转向“多元协同”。数字技术的应用提升了“法治”建设的效率和精准度,例如利用大数据分析法律实施效果,为立法和执法提供参考。

(二)“法治”规制“数治”的权力运行风险

城乡协同发展中的“数治”,需通过“法治”手段协调城乡利益关系,保障城乡居民在数字治理中的平等权利,促进城乡“数治”协同共进^[9]。“法治”即依法治理,意味着整个国家的运行、社会秩序的维护及公民权利的保障等均建立在健全的法律体系及对法律严格遵守与执行的基础之上。“法治”对中国城乡协同发展作用显著:保障城乡规划科学合理,依据相关法律规范建设布局、协调利益关系,避免矛盾

冲突;促进资源合理配置,规范市场秩序,保障公共资源均衡分配,助力经济与民生协同发展;维护城乡社会稳定,提供矛盾纠纷解决途径,规范社会行为,营造和谐环境;推动城乡治理现代化,明确各主体权责边界,提升治理科学性与民主性。“法治”是城乡协同发展的重要基石,贯穿发展各环节,保障发展可持续。同时,“法治”能确保数字治理在城乡协同发展过程中始终处于合法合规轨道。“法治”为“数治”划定了明确法律边界,具体体现为:其一,数据流通规范化。法律规范明确了“数治”主体的权力来源、行使范围及责任义务,防止权力滥用和不作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10]。例如,通过法律界定政府部门在数字治理中的数据采集、使用权限,保护公民个人隐私,要求政务数据共享需通过“安全可信通道”或加密措施传输。其二,责任追究法治化。“法治”保障“数治”中的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通过制定数据保护、网络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打击数据泄露、网络攻击等违法犯罪行为,维护数字治理的良好秩序。

二、“数治”赋能城乡协同的“法治”困境

在“数治”赋能城乡协同的“法治”逻辑关系中,“数治”可以重构“法治”实施的协同机制,“法治”可以规制“数治”的权力运行风险,其技术运行与法律保障互为依托,但是基于城乡“数治”实践与“法治”成果来看,“数治”赋能城乡协同的“法治”困境依然明显,主要体现在立法供给失衡、治理机制错位、权利保障不均、技术风险失控四个方面。

(一)立法供给失衡:制度适配性的城乡断裂

“法治”供给的结构性缺陷构成与“数治”城乡协同的首要障碍,这种失衡既体现在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限分配中,也显现在城乡资源配置的制度差异中。

在立法权限分配层面,数据权属界定、算法监管等“数治”核心议题属于中央立法保留范围,地方仅能制定实施细则,导致城乡协同中的新兴问题陷入“无法可依”的困境。数字治理的基础在于数据的采集、处理与应用,而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是其不可逾越的底线。国家层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构建了数据全生命周期的法律保护体系,明确规定数据处理需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2025 年国务院发布的《政务数据共享条例》第四条明确规定,政务数据共享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遵循统筹协调、标准统一、依法共享、合理使用、安全可控的原则”,同

时,要求政府部门在数据采集、处理、应用全流程中落实安全责任;第五条强调“政务数据共享工作,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履行政务数据安全保护义务,不得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不得损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这一制度安排直接体现了数据采集处理作为治理基础、安全隐私作为底线的核心逻辑。但在城乡数字治理实践中,仍存在诸多执行难题,在跨区域、跨部门数据共享时,安全责任界定模糊。例如,在城乡产业协同发展过程中,农业部门与电商平台的数据交互频繁,一旦出现数据泄露,难以明确责任主体。农村地区数据安全防护能力薄弱问题尤为突出,部分农村基层单位缺乏专业的数据安全管理人员和技术设备,村民数据安全意识淡薄,在参与数字治理过程中,个人信息易被非法收集和使用。如农户在注册电商平台、录入农产品信息时,可能因平台安全漏洞导致个人身份信息、农产品产量等敏感数据泄露,影响其合法权益。地方政府在数据采集范围、使用边界等关键领域缺乏明确法律依据,甚至出现地方政策与上级规章冲突的现象。这种权限约束在城乡跨域场景中尤为突出:当城市智慧平台需调取乡村土地流转数据、农业生产信息时,因缺乏全国统一的权属划分规则,地方只能通过临时协调解决,严重影响协同效率^[11]。

在城乡资源配置的制度差异方面,立法前瞻性不足进一步加剧制度滞后性。当前地方立法多采用“问题回应”模式,对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迭代速度应对乏力,形成“技术先行、规则追认”的被动局面。农业农村部2021年发布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化追溯管理办法(试行)》虽鼓励地方探索创新,但未强制要求设置过渡期。这导致乡村小规模生产者,如家庭农场、散户因技术能力不足被排除在追溯体系之外,形成“城市数据孤岛”与“乡村数据盲区”并存的局面。这种滞后在城乡间呈现差异化影响:城市可依托技术优势自行探索临时方案,而乡村因技术能力薄弱,只能被动承受规则缺失的风险。乡村地区数字法治宣传形式单一、居民认知度低,与城市完善的法治服务体系形成鲜明对比,根源在于地方立法未能提前规划城乡统一的法治适配框架。区域协同缺失则造成制度碎片化,城乡协同往往涉及跨行政区划的数据流动,但地方性法规适用范围有限且标准不一,形成“规则壁垒”。

(二)治理机制错位:条块壁垒与城乡协同的体制冲突

传统“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与“数治”所需的

“系统集成”范式存在根本矛盾,这种冲突在城乡协同场景中被进一步放大。首先,纵向层级壁垒阻碍政策落地。中央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的权责交叉,使得城乡“数治”项目陷入“上级系统难落地,地方平台难接入”的僵局^[12]。这种纵向层级隔阂的本质是法律未明确跨层级协同的权责清单,缺乏强制性的衔接机制。其次,横向部门分割加剧“数据孤岛”现象。城乡“数治”涉及公安、民政、农业农村等多个部门,但法定职责壁垒导致数据共享缺乏制度驱动。政府不同部门数据未实现实时同步,出现信息不对称、数据不一致等问题,严重影响决策权威性。例如,在城乡社保衔接场景中,城市人社部门的参保数据与乡村医保系统无法互通,导致农民工群体社保转移需重复提交材料,与“数治”高效协同的目标背道而驰。最后,城乡治理主体失衡削弱协同效能。“法治”本应塑造政府、市场、社会多方共治格局,但乡村地区因社会组织发育不足、企业参与度低,形成“政府独奏”的治理模式。

数字治理的高效运行依赖多部门、跨区域的协同配合,国家公布的《政务数据共享条例》明确强调加强数字政府协同治理,但数据共享标准不统一,不同部门的数据格式、存储方式各异,导致数据整合困难。例如,在城乡公共服务协同中,教育部门与卫生部门的数据难以有效对接,影响公共服务资源的精准配置,在城乡数字治理中存在部门职责不清、数据壁垒森严等问题。此外,城乡数字治理中还存在部门职责不清、数据壁垒森严等问题,协同机制法律约束力不足,使得部门间协同缺乏刚性约束。例如在处理城乡环境治理、交通规划等复杂问题时,涉及多个部门职责,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责任规定,部分部门存在推诿扯皮现象,降低了治理效率^[13]。城乡协同治理中,部门间数据共享标准不统一、协同机制缺乏法律约束力等问题依然突出,亟须通过地方性法规明确各部门在数字治理中的职责权限,建立常态化协同机制,规范数据共享流程与标准,以“法治”保障城乡数字治理的有序推进。

(三)权利保障不均:数字正义的城乡落差

城乡协同发展的核心在于缩小城乡差距,实现资源的公平分配与权益的平等保护。在数字时代,城市和农村之间数字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使城乡数字鸿沟成为社会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城乡数字鸿沟治理不仅是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还是打造数字中国的关键举措,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步骤^[14]。“数治”技术的普惠性未能有效落地,核心

症结在于“法治”未能构建均衡的权利保障机制,导致城乡居民在数字权利享有上出现显著鸿沟。首先,数字接入权的城乡差异构成基础性不公。乡村地区网络覆盖率低、智能终端普及率不足,部分村落甚至存在信号盲区,居民无法享受便捷的数字法治服务。这种硬件差距背后是权利保障的制度缺位:现行法律虽原则性要求公共服务均等化,但未明确将数字接入权纳入基本权利范畴,导致地方政府在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投入上缺乏刚性约束,与城市“千兆网络全覆盖”的投入力度形成鲜明对比。其次,数据隐私权与知情权保护呈现双重失衡。一方面,乡村居民的数据保护意识薄弱,部分基层组织在采集农业数据、村民信息时,未履行告知义务,甚至存在滥用风险;另一方面,城市“数治”系统的“技术黑箱”导致城乡协同中的决策透明度不足,现行法律对个人信息处理的范围、方法规定模糊,责任追究机制不健全,进一步加剧了权利保护的城乡差距。最后,算法歧视构成隐性不公。“数治”系统的训练数据多来源于城市,容易形成“城市中心”的算法偏见。在城乡信用评价体系中,部分平台因缺乏乡村数据样本,将“无城市社保记录”等同于“信用低下”,导致农户贷款、农产品电商入驻遭遇歧视,而现行法律尚未建立算法歧视的识别与救济机制。

2021 年我国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明确提出促进城乡融合、保障农民数字权益的目标。但在实践中,仍然面临着城乡互联网普及率差距、城乡居民数字素养差距、相关配套措施不完善等问题,导致农村居民在数字治理中处于弱势地位。城市居民能够熟练运用数字技术参与政务服务、享受数字公共服务,而农村居民因数字设备普及不足、数字技能培训缺乏,难以充分行使数字治理中的权利。城乡数字治理中的权益纠纷仍时有发生,如农村电商数据归属争议、土地数字化管理中的权益冲突等,亟须通过法治手段明确城乡居民在数字治理中的权利义务,构建公平有序的城乡数字治理环境。农村电商数据权属纠纷频发,成为城乡数字权益失衡的典型表现。在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农户、电商平台、物流企业等多方参与数据生成与使用,但现行法律尚未明确数据权属。农户提供的农产品生产数据与电商平台收集的销售数据,在产生经济价值后,各方对数据收益分配存在争议,却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进行裁决。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薄弱、居民数字素养较低,在数字治理进程中易陷入权益失衡的困境。

(四) 技术风险失控:“法治”规制的城乡能力鸿沟

“数治”技术的不确定性在城乡协同中衍生出新的风险,而“法治”对技术风险的规制能力呈现显著的城乡落差。首先,技术安全的规制体系存在城乡断层。城市地区已初步建立数据安全审查、应急处置等机制,而乡村地区因技术力量薄弱,成为数据安全的“薄弱环节”。地方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模式下,个人信息泄露风险突出,而乡村地区既缺乏专业的安全防护技术,也未建立相应的法律追责机制。如在城乡物流协同系统中,乡村站点因缺乏数据加密设备,导致农户个人信息、农产品交易数据频繁泄露,却难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其次,技术标准的城乡不统一加剧风险传导。城市“数治”系统多采用高端技术标准,而乡村因成本限制只能选择低端设备,这种“标准错配”在协同过程中极易引发系统崩溃。如城乡智慧交通平台,城市的智能调度系统与乡村简易打卡设备无法兼容,导致物流车辆调度混乱,而相关法律法规未规定技术标准的衔接规则,只能通过临时技术改造解决。最后,风险责任的划分机制尚未健全。当“数治”系统出现故障造成损失时,城乡主体面临不同的救济困境:城市企业可通过商业保险、行政诉讼等多种途径维权,而乡村农户因缺乏证据保存能力、法律知识,往往难以确定责任主体。

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等新兴技术在城乡数字治理中的应用日益广泛,但技术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伦理风险与法律挑战。人工智能的法律治理正处在规则形成期^[15],国家目前尚未形成完善的新兴技术应用法律体系,地方在实践中同样面临技术应用边界模糊、责任认定困难等问题。例如,在智慧农业领域,智能农机自动驾驶系统的事故责任划分缺乏明确法律依据;元宇宙技术的适时而生成为了推动乡村数字化多维转型的破局点^[16],但在元宇宙乡村建设中,虚拟资产确权、网络安全等问题亟待法律规范。此外,新兴技术的快速迭代使得法律制定面临挑战,现有法律难以跟上技术发展速度,导致新兴技术应用处于监管真空状态,存在较大的法律风险和社会风险。

三、“数治”赋能城乡协同的“法治”路径

针对“数治”赋能城乡协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法治”困境,首先要构建城乡数字治理的规则基石,为“数治”实践划定“法治”边界;其次需打破城乡“数治”的条块分割壁垒,打通数据流通、治理协

同的关键堵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城乡数字正义的均衡覆盖,让“数治”红利公平惠及城乡主体;同时要建立健全风险防控机制,防范城乡数治中的技术滥用、数据安全等风险。通过一系列举措,最终构建起“数治”赋能城乡协同发展的“法治化”体系,优化实践路径。

(一)立法供给:构建城乡数字治理的规则基石

立法供给的均衡性与前瞻性,是破解城乡“数治”失衡的制度前提。当前城乡数字治理面临“中央立法留白、地方立法错位”的双重困境:城市数据交易、算法监管等新兴领域缺乏细化规则,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据权益分配等问题更处于规范真空状态。对此,需构建“层级协同、动静结合”的立法体系。

在纵向协同层面,应明确中央与地方立法权责边界:中央层面应加快“数据产权法”“数字治理法”等基础性立法,界定城乡公共数据权属,建立数据确权登记制度。通过法律规范确定数据的所有权归属,对于公共数据,明确其归国家所有,由政府部门依法管理和使用;对于企业和个人数据,保障其合法权益。同时,建立数据确权登记平台,对数据的权属进行登记和公示,为数据交易和流通提供基础。加强数据安全保护,制定严格的数据安全标准和监管制度,要求数据处理者采取必要的技术和管理措施,保障数据的保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建立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和监测机制,及时发现和处置数据安全隐患;加大对数据泄露、滥用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地方层面依托立法权限,制定差异化实施细则,在国家法律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地方性法规,细化数据安全责任划分。明确跨区域、跨部门数据共享过程中,数据提供方、接收方、存储方等各方的安全责任,建立数据安全保障追溯机制,规定数据共享前需签订安全协议,明确各方权利义务,若发生数据泄露事件,依据协议追究责任。可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细则”,加大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力度;修订电子政务相关法规,适应数字时代政务服务的新要求。另外,要特别加强农村地区数据安全防护能力建设。一方面,加大对农村数字基础设施投入,为基层单位配备必要的数据安全设备;另一方面,开展数据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增强村民数据安全意识。同时,鼓励农村地区引入专业的数据安全服务机构,为农村数字治理提供技术支持。横向协同上,建立区域立法协调机制,针对地方城乡融合密集区,推动数据标准、隐私保护等

规则统一,避免“一城一策”造成的治理壁垒。

立法内容需兼顾技术前瞻性与民生适配性。一方面,将数据确权、算法审查等新型制度纳入立法范畴,为城乡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提供依据;另一方面,针对乡村特点,在立法中明确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保障比例,推动构建覆盖农村的高速光纤宽带网,确保技术资源向基层倾斜。

(二)治理协同:打破城乡“数治”的条块壁垒

传统“条块分割”的行政模式与数字治理的“系统集成”需求存在根本冲突,导致城乡数据壁垒、执法标准不一等问题突出。“法治”路径的核心在于通过规则重构,实现“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协同治理格局。

纵向协同需强化“法治”权威对层级壁垒的穿透力。以法规形式规范部门协同机制,统一数据共享标准。如制定“地方城乡数字治理协同管理条例”,明确各部门在数字治理中的职责权限,建立常态化协同工作机制与跨部门数字治理协调小组,统筹解决城乡数字治理中的重大问题,厘清职责分工,杜绝职责不清、推诿扯皮现象。同时,搭建城乡数字治理信息交流平台,促进经验交流与信息互通;对涉及多部门的城乡治理项目,明确要求成立联合工作组、制定协同方案,细化任务分工与时间节点。此外,构建全省统一的数据共享平台,规范数据采集、存储、传输、使用全流程标准,要求各部门按统一标准开展数据治理,保障数据一致性与兼容性,提升数据共享效率与质量。

横向协同要构建多元主体共治的“法治”框架。在政府层面,推进“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制定城乡统一的执法事项清单,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市场监管、生态保护等领域联合执法。在社会层面,以立法形式确认村规民约、行业章程的法律效力,建立城乡数字治理协同参与机制,引导企业、社会组织等积极参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服务供给及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同时,搭建公众参与渠道,通过民意调查、听证会等形式广泛吸纳城乡居民意见建议,提升数字治理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在市场层面,明确企业在乡村数字服务中的主体责任,要求互联网平台建立城乡统一的服务标准与投诉处理机制。

(三)权利保障:实现城乡数字正义的均衡覆盖

数字鸿沟本质上是权利鸿沟,城乡在数字接入权、数据隐私权、法律服务获取权等方面的差距,需通过“法治”手段予以弥合。权利保障的“法治”路

径应聚焦“机会均等、救济有效”两大核心。

在权利赋予层面,需细化城乡居民的数字基本权利。一方面,确立数字接入权的法定地位,要求地方政府将乡村网络建设、智能终端普及纳入民生工程,确保农民平等使用数字服务的权利;另一方面,针对性强化乡村居民个人信息保护,在立法中明确基层组织的告知义务,将个人信息保护知识纳入乡村法治宣传必修内容。同时,规范数据共享与开放,建立数据共享协调机制及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明确数据共享的条件、程序和范围,推动政企数据互通,按照“应开放尽开放”原则向社会开放公共数据,激发数字创新活力。此外,系统推进农村数字素养培训;政府加大农村数字教育投入,在农村中小学开设数字技术课程,培养青少年数字技能;针对农村成年人开展“数字技能下乡”活动,通过现场教学、线上课程等形式,普及数字设备使用、网络安全防护、数字政务办理等知识技能,持续缩小城乡数字鸿沟。

权利救济机制需实现“线上线下”无缝衔接。可通过立法构建“城乡一体”的纠纷解决平台,整合线上调解、远程诉讼等功能,让乡村居民足不出户即可获得法律服务。同时,强化救济的强制性保障,如规定算法歧视、数据泄露等行为的惩罚性赔偿标准,建立“公益诉讼”与“集体诉讼”的双重救济通道,破解乡村维权成本高、举证难的困境。

(四)技术适配:防范城乡“数治”的技术风险

技术工具的盲目应用可能加剧城乡失衡,“法治”需为技术发展设定“价值边界”,实现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适配路径应围绕“安全可控、普惠包容”两大原则展开。

技术安全的“法治”保障需建立全链条监管体系。立法应明确城乡数据分级分类标准,对涉及农业生产、乡村医疗等敏感数据实施更严格的保护措施,严格落实国家数据分类分级保护要求,建立健全公共数据资源一级开发安全管理制度。地方人民政府公共数据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确定本区域重要公共数据目录,对列入目录的数据进行重点保护。同时,建立技术风险预警机制,要求数字平台嵌入算法可追溯、可还原功能,对乡村信贷、电商等领域的算法决策进行合规审查,防范技术性歧视。

技术普惠的“法治”引导需兼顾特殊群体需求。针对乡村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立法应强制要求数字服务提供“适老化”“无障碍”版本,在优化政务服务平台时,保留线下办理渠道并明确办理时限。同时,通过“法治”手段推动技术资源下沉,要求司法、

农业等部门开发适配乡村的数字化服务产品,将法律讲解、技术指导等内容转化为通俗化形式,让技术真正服务于基层治理。

另外,要加快制定新兴技术应用地方性法规,明确技术应用边界与责任。针对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等新兴技术在城乡治理中的应用场景,制定专项法规或管理办法。例如,出台地方“智慧农业人工智能应用管理办法”,规定智能农机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标准、事故责任认定原则和赔偿机制;制定地方“元宇宙乡村建设管理规定”,规范虚拟资产确权、网络安全防护、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的要求。同时,建立新兴技术法律动态调整机制,加强对技术发展趋势的研究和跟踪,定期评估现有法律对新兴技术的适用性,及时修订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法律能够跟上技术发展步伐,有效防范技术风险。

四、结语

“数治”赋能城乡协同发展是数字时代实现城乡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必然选择和重要路径,而“法治”是这一过程的有力保障。通过对河南实践的研究发现,虽然“数治”在赋能城乡协同发展中具有整合资源、提升效能等逻辑优势,但也面临诸多“法治”的现实困境,“数治”赋能城乡协同发展过程中的“法治”问题不容忽视。“数治”赋能城乡协同的“法治”路径,本质是通过规则重构实现“技术向善”与“治理为民”的有机统一。从立法供给的制度奠基,到治理协同的效能提升,再到权利保障的价值回归与技术适配的风险防控,四维架构的核心在于以“法治”平衡城乡数字资源、规范技术应用、保障民生福祉。唯有如此,才能打破城乡二元治理格局,让数字技术真正成为推动共同富裕的“法治”力量。数字化和法治化是实现政府现代化必不可少的两重引擎,而数字法治政府则是现代化政府的重要形态。加快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必将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而重要的制度保障^[17]。

未来,应持续深化“数治”与“法治”的融合实践,不断总结经验,为全国城乡协同发展提供更具借鉴价值的模式与范例,推动我国城乡发展迈向更高水平。

参考文献:

[1] 吴亚斌,李芳威. 新时代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研究[J]. 中国产经,2023(21):152-154.
[2] 郑智航. 信息技术与国家治理法治化的互动机理研究

- [J]. 数字法学评论,2024(1):3-22.
- [3] 邓文,刘欢. 数字技术的公共价值审思:价值契合、偏离风险与重构进路[J]. 领导科学,2025(2):152-160.
- [4] 刘培功. 数字治理视域下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智治”逻辑与实践路径[J]. 理论探讨,2023(5):77-84.
- [5] 牛锦红,陈在上. “数治”新范式下的城乡基层协同治理:问题与对策[J]. 三晋基层治理,2023(2):76-80.
- [6] 张进财,卢艳香. 数字治理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N]. 光明日报,2025-03-19.
- [7] 卢福营,沈费伟. 中国基层治理的空间格局:历史演变与影响维度[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5):63-69.
- [8] 谢鹏程,杨永海. 数字技术赋能法治乡村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践向度:基于豫东X村“法治大讲堂”的扎根理论分析[J]. 党政研究,2025(5):30-41.
- [9] 李立娟. 2023“乌镇时间”助力数字治理现代化[N]. 法治日报,2023-11-17.
- [10] 孟薇. 大数据技术赋能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实践路径[N]. 法治日报,2025-02-19.
- [11] 黄建伟. 提升农村宅基地数字政务服务水平[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04-11.
- [12] 袁达松. 智慧城市法治现代化建设的现实挑战及应对策略[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5(11):36-45.
- [13] 彭贵才,姜金炜. 跨部门协同法治化:定位、困境与进路[J].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21(4):118-126.
- [14] 杨丽,孟文迪. 城乡数字鸿沟治理的战略意义、现实体现与优化路径[J]. 三晋基层治理,2023(6):54-57.
- [15] 张凌寒. 人工智能法律治理的路径拓展[J]. 中国社会科学,2025(1):91-110.
- [16] 胡奇. 元宇宙赋能乡村振兴的价值意蕴、发展态势与实践路向[J]. 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23(4):78-82.
- [17] 马怀德. 数字法治政府的内涵特征、基本原则及建设路径[J].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4(3):6-22.
- (责任编辑 刘成贺)

The Rule of Law Logic, Dilemmas and Paths of Urban-rural Synergy Empowered by Digital Governance

NIU Jinhong

(Law School,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 Henan 450046, China)

Abstract: Urban-rur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s a strategic deployment at the national level, and digital governance empowerment and legal protection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key support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collaboration. "Digital governance" breaks down geographical and hierarchical barriers through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promoting the rule of law to move from "formal equality" to "substantive equality". Meanwhile, "the rule of law" provides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for equal participation in governance by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by confirming new rights such as citizens' digital access rights and data self-determination rights. China ha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in promoting urban-rural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through "digital governance" and "the rule of law", but it also faces practical difficulties such as unbalanced legislative supply, misaligned governance mechanisms, uneven rights protection, and out-of-control technological risks. By establishing the rule foundation for urban-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delineating the "legal" boundaries for "digital governance" practices; breaking down the barriers of urban-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in terms of departmental and regional divisions, and removing the key bottlenecks in the flow of data elements and governance collaboration; achieving balanced coverage of digital justice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llowing the benefits of "digital governance" to be fairly shared by urban and rural entities; and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s to prevent risks such as technological abuse and data security in urban-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Effectively resolving the "legal" predicaments of "digital governance" empowering urban-rural collaboration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Keywords: "The rule of law"; "Digital governance"; Urban-rural coordination; Pathways

毛泽东《论持久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维创新及现实启示

张文^{1,2}, 石聪¹

(1.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2.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广东 广州 510925)

摘要:1938年,毛泽东为驳斥“亡国论”与“速胜论”撰写了《论持久战》,系统阐释中国抗战的持久性、必胜性及战略方针。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经典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剖析战争形势,创造性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以空间换时间、精神补物质、整体破局部的实践策略,实现了“理论——文化——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三维创新,为新时代应对风险挑战提供历史镜鉴。其“从实际出发”“政治动员是关键”“伟力在民”“得道多助”的战略思维,有益于深化“两个结合”、守牢意识形态阵地、筑牢执政根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键词:毛泽东;《论持久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现实启示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2.010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2-0058-07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样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纪念时刻,重读毛泽东《论持久战》这一纲领性文献,既是对伟大抗战精神的弘扬,更彰显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任何科学理论和制度,必须本土化才能真正起到作用。”^[1]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开拓者,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具体化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2],率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论持久战》正是毛泽东在党内率先以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自觉,立足中国具体实际对这一命题的鲜活诠释。充分挖掘《论持久战》的战略智慧,对新时代推进“两个结合”、保持战略定力具有重要启示,也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回应时代之问、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历史逻辑与实践参照。

一、理论创新维度: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深度剖析战争形势

毛泽东指出:“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3]447}要反对这两种错误论调,就必须坚持“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4],客观全面地去考察战争问题。《论持久战》贯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通过把握客观规律性与主体能动性的辩证统一,批判了片面的、主观的“亡国论”“速胜论”,以及唯心论、机械论等错误观点,科学分析了中日双方实力的优劣,以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质量互变规律为核心,阐明为何及如何持久抗战,并强调唯有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创造有利条件才能争取胜利。

(一)基于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揭示抗日战争本质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辩证法的宇宙观,

收稿日期:2025-12-12

基金项目: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红色精神的历史演进与传承创新研究”(20BKSI38)

作者简介:张文(1965—),男,湖南邵阳人,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广州城建职业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石聪(1997—),女,湖南邵阳人,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5]304} 这一哲学思想在其军事战略著作《论持久战》中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面对1938年抗日战争的胶着态势,毛泽东运用矛盾分析法穿透战争表象,准确抓住了抗日战争的基本矛盾: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决死的战争^{[3]447}。他以“一分为二”的辩证思维,系统分析了四组贯穿战争全过程的矛盾关系: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这四组矛盾关系并非静态不变,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暂时的、相对的东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5]330}。因此,中日的强弱对比将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而发生转变:日本的“强”将消解于中国战略纵深的“大”,其“退步性”将会加剧国际孤立,而中国暂时性的“弱”则通过持久抗战向“强”转化,中国必将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毛泽东由此深刻批驳了静止看待敌强我弱的军事对比、将中日双方力量视为永恒不变的“亡国论”和脱离客观实际、片面强调中国的有利条件的“速胜论”,强调要“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3]447}。这一基于矛盾分析的战争预见,不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也塑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方法论范式。

(二) 遵循质量互变规律分析战争进程嬗变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强调:“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转化为质的区别。”^[6] 这一规律贯穿事物发展进程,决定其阶段性特征。抗日战争同样遵循着质量互变规律,呈现出“量变——质变——量变”循环往复的发展过程,其根本矛盾的性质和本质贯穿发展全过程直至过程完结而消失,但被根本矛盾所规定和影响的诸多其他矛盾则呈现出动态发展,从而使得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显现出阶段性特征^{[5]314}。毛泽东据此分析“敌人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且“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从而将持久战科学划分为“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3]441}。在对持久战三阶段具体分析中,毛泽东聚焦敌我力量的演变,提出了“向上和向下、新和旧、量和质”三组对立关系。第一阶段,我方在土地、人口、经济、军事等旧的和质上表现为量的缩减,属向下的变化,但在战争经验、军队革新、政治动员等新的量和质上表现出质上的积累,属向上的变化。敌方则陷入量的扩张和质的

退化,虽暂时扩大了领土、人口和资源,却承受了战力损耗、士气颓靡、国人不满意、国际舆论责备等方面的向下的变化。第二阶段,双方变化持续,我方继续向上变化,敌方继续向下变化,敌我力量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将脱出劣势,日本则脱出优势,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优劣相反的地位”^{[3]468}。第三阶段,经过长时间的艰苦抗战,在我方力量增长、日本困难加深及国际对中国援助增强的条件下^{[3]468},量变积累终于引发质变,我方将展开战略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三) 强调人的自觉能动性影响战争走向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在于仅从客体或直观形式理解对象,“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7]499}。这一批判深刻揭示了人能够通过实践能动地改造客观环境。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创造性发展了这一思想。面对抗日战争中“亡国论”者拘泥于武器劣势的悲观论调与“速胜论”者忽视客观事实的盲目乐观,毛泽东认为“速胜只存在于头脑之中,客观上是不存在的,只是幻想和假道理”^{[3]459},同时强调“在中国面前摆着解放和亡国两个可能的前途”^{[3]458}。要深刻认识战争作为政治集团、民族、国家之间矛盾的最高斗争形式,其进程与结局根本上取决于是否反映历史进步要求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人民群众在客观物质条件制约下的自觉能动性实践来实现。因此,持久战的胜利必须立足客观条件展开实际分析,“引出思想、道理、意见”^{[3]447},以形成持久战的理论指导,进而发挥自觉能动性,“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3]447}以指导具体实践,依靠亿万人民的实践力量逐步转变敌我态势。毛泽东指出,战争胜负虽受制于政治、经济、军力等客观条件,但最终结果取决于人的自觉能动性。要想发挥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抗日战争的各级指导者既不能脱离客观条件“乱碰乱撞”,沦为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冒险主义者;也不能被动受制于客观条件,成为看不到历史主体能动作用的机械主义者。要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于战争的“舞台”上充分发挥“勇敢而明智”的指挥艺术,将战争打得有声有色、威武雄壮^{[3]478}。毛泽东的自觉能动性思想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以社会存在决定论奠基,以社会意识反作用破局,并以群众史观确立实践主体。这一思想既批判了“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3]477}的唯心论,又克服了将物质条件绝对化、忽视主体能动性的机械论局限,为抗日战争提供了科学的行动

指南。

二、文化融合维度: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创新发展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毛泽东同志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具体实际之‘的’的伟大实践,为我们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光辉典范。”^[8]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性贯通,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中国特色。

(一) 孙子兵学智慧的时代转译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9]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借鉴、运用和发展了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古代军事思想,使其焕发出新的时代价值。其一,毛泽东借鉴了孙子“五事七计”战略思维,强调“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5]182},客观全面地分析了敌我双方四组矛盾关系,并从军事、经济、政治组织力、文化、国土面积、物质资源、人力等方面剖析了敌我矛盾双方的特点,指出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3]450}。其二,基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以及中日力量优劣对比,毛泽东克服了孙子“兵贵胜,不贵久”^{[10]127}这一速胜思想的历史局限,明确提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3]453}的战略论断,将持久战划分为三个阶段: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3]462}。旨在通过持久作战实现敌我双方的强弱转化,奠定反攻基础,夺取最终胜利。其三,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孙子“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10]126}的慎战思想,严厉批评“有进无退”的拼命主义和“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主张“一切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坚决地进行决战,一切无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避免决战,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3]506},把握好战与不战的临界点。

(二) 传统民本思想的时代转化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从《尚书》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到孔子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从黄宗羲“天下为主,君为客”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始终贯穿着“重民”“安民”“利民”的价值主线。毛泽东深刻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3]534}因而,毛泽东立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科学论断,在革命实践中对传统民本思想予以批判性扬弃,实现了唯物史观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结合。在分析抗日战争战略时,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3]511}这种将战争胜负系于民心向背的战略视野既吸收了“民为邦本”的传统民本思想文化因子,又注入了“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7]287}的唯物史观内核。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3]512}这既是对传统民本思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时代表述,更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在战争动员中的具体运用。通过确立官兵平等、军民共生的新型关系,发动全体军民力量,使日本帝国主义就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四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3]512}。在抗日战争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毛泽东推动传统民本思想实现了基于唯物史观的创造性转化,既赓续了“民为邦本”的文化血脉,又确立了“人民创造历史”的科学自觉。

(三) 自强不息精神的时代演绎

“自强不息”精神源自《周易·乾卦·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经典论述,凝结着中华民族修己奋进的实践智慧。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秉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5000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11]这一原则,对“自强不息”进行了创造性转化。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正是这一转化的生动体现。他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将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积淀的自强基因升华为全民族抗战的精神武器。面对“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3]447}的强敌,一方面,毛泽东把“天行健”这一效法天道的运行规律转化为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分析,科学论证了中国抗战必胜的战争结果。他指出,这场战争既能“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3]457},在消耗敌人、瓦解其意识形态的同时,实现内部矛盾的化解与自我革新,使革命力量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完成自我升级,最终实现从局部优势到全局胜利的质变飞跃。另一方面,毛泽东将

“君子”修身层面的“自强”,提升为整个民族实现民族解放的集体意志。尽管国内外敌对势力给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困难,但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不仅锤炼了人民的意志与韧性,更是在斗争中重塑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必须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3]444},以战斗到底的决心去争取战争的最终胜利。

三、实践发展维度: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系统构建战争策略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2]57} 马克思这一经典论断揭示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辩证关系。以实践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超越解释世界的理论层面,更强调通过实践实现改变世界的飞跃。面对抗日战争中敌我力量悬殊的战争格局,毛泽东摒弃教条主义的桎梏,以实践观为指引,构建起创新战术体系、开展政治动员及联合国际反法西斯势力的战略布局,在抗日战争中开辟了一条“以空间换时间、以精神补物质、以整体破局部”的制胜之路。

(一) 战术体系的范式创新

毛泽东认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其以海洋隐喻战争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深刻揭示了战争规律与主观能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既需遵循客观规律,顺应水流方向,“不使自己沉没”,又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掌握“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3]478}。基于此,毛泽东就“怎样具体地进行持久战”展开了全方位的战略部署。一是提出了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的作战原则。主动性就是要掌握战场选择的主动权、作战形态的主导权和战争节奏的控制权,“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3]491},为我方争取更多的局部优势和主动地位。灵活性要求灵活地使用兵力,克服战争中的“纷乱、黑暗和不确实性”^{[3]493},做到战术随机应变、兵力弹性调配和战略方向的动态修正。同时,战争虽无绝对的确定性,却具有相对的确定性,因此,把握战争的相对确定性,要将战争的不确定性纳入可控范围内,以此作出战术、战争和战略的相关计划。二是系统阐述了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的结合运用和作战效果。在战略防御和进攻阶段,采取以进攻为主的运动战,以“几个师对他一个师,几万人对他一万人,几路对他一路”^{[3]485},以外线包围突袭歼敌,打击敌人的军事有生力量,辅之以分散、灵活、小规模的后游击战,依托敌后根据地和群众支持,对敌人进行袭扰、破坏和牵制,完成对敌

人的持久性消耗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歼灭作用。在敌我军事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应以阵地战作为辅助手段配合运动战,达到“消耗敌人和争取余裕时间之目的”^{[3]485}。

(二) 政治动员的智慧运用

面对国内“亡国论”“速胜论”蔓延的态势,毛泽东剖开了战争现象的政治内核,深刻指出战争的政治属性,强调抗日战争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3]479},并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和政策执行、政治和文化动员、政治原则、国际援助等方面提出了“六个离不开”。然而,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当时除了政府、各党派和少数爱国人士的觉醒外,广大民众尤其是政治文化相对闭塞、与社会存在隔阂的农村群众还在薄弱的民族意识中沉睡^[13],构成了民众政治参与的实质性障碍。因此,要唤醒沉睡的大多数,就必须根据当下时局的变化和不同阶层人民的需求,开展广泛而深入的政治动员,将分散的社会力量凝聚为改变历史方向的巨大合力。那么,如何开展全民性质的政治动员?毛泽东认为动员工作要避免“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3]481},须合乎民众口味,采取多样化的动员方式,“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3]481},去体察人民群众的生活,“关心人民群众的痛痒”^{[5]138},去解决人民群众的问题,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让他们意识到自己不是“马铃薯袋里的零散个体”^{[12]677},是能够“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3]480}。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关于“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2]9}的思想智慧,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转化为革命主体,创造性地发展出植根于中国实际的政治动员体系。

(三) 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联动建立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4],倡导国际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为实现阶级解放与人类自由而共同奋斗。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世界范围内的压迫与反抗不断升级,列宁进一步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15],丰富了国际统一战线理论的内涵。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统一战线的理论,将无产阶级国际统一战线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将中国抗日战争置于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范围内加以考察,明确指出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需要三个条件: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

起^{[3]443}。那么,如何建立起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积极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指出日本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这不仅关乎中国存亡,也威胁世界和平特别是太平洋地区的稳定。他强调,中国与世界各国及人民利益相连,号召“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团结起来”^[16],建立起广泛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毛泽东形象地将中国、苏联和其他可能的国家以及日本人民运动比作多个“战略单位”,共同织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那就是敌人死亡之时了”^{[3]473}。毛泽东这一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思想的实践,不仅为抗战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也为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方针的形成提供重要历史借鉴。

四、《论持久战》的战略思维:铸就强国复兴战略定力的当代启示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17]。作为运用这一思想武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典范,《论持久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著作。它不仅为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关键的战略指导和强大的精神支撑,更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以其“从实际出发”的磅礴思想伟力、“政治动员是关键”的战略引领力、“伟力在民”的深厚凝聚力、“得道多助”的文明感召力,为应对新时代挑战、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历久弥新的智慧。

(一)坚持“从实际出发”战略思维,深化“两个结合”理论实践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18]17}“两个结合”是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路径,也是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核心方法论。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把握中日战争的矛盾特殊性,为抗战胜利奠定了认识论基础。新时代要继续发扬这一战略思维,将“从实际出发”的战略思维贯穿始终,在扎根中国大地、回应时代课题中深化“两个结合”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一是要深刻把握“从实际出发”的历史根基,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毛泽东这一思维既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又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事求是”

是”“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等传统思想精髓中。新时代深化“两个结合”,必须自觉立足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深入挖掘、精准阐释和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其与马克思主义相融通并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回答时代之问、引领时代发展厚植文化根基。二是要强化“从实际出发”的实践导向,在回应时代课题的探索中锻造理论创新的实践品格。“从实际出发”的核心在于直面问题、指导实践、推动发展。新时代面临的风险挑战、发展任务之艰巨复杂前所未有的,因此,深化“两个结合”必须将“从实际出发”贯穿全过程,深入基层、扎根实践,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握世情国情党情民情新变化,辨别影响国家发展的关键问题;树立问题意识,敢于触碰深层矛盾,善于从群众实践中总结新经验、形成新理论,并将“两个结合”成果紧密联系于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实践,切实转化为应变局、破难题、促发展的有效路径。

(二)运用“政治动员是关键”战略思维,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

“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19]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的转变,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成就。但同时,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开始将对华政策由改革开放初期的“接触”转变为当前的“规锁”,这使得我国未来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更趋复杂,意识形态形势更加严峻^[20]。因此,要坚持“政治动员是关键”的战略判断,在把握历史规律、坚持守正创新中不断巩固意识形态阵地。一是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确保意识形态工作的正确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21]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民生关切为切入点,积极开展有益于人民群众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凝聚思想共识,不断夯实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二是要掌握思想宣传主动权,坚决遏制负面舆情。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态势,需精准施策、分类引导:要大力巩固和拓展“红色地带”,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社会最大共识,不断壮大积极健康的主流思想舆论;要坚决压缩和转化“黑色地带”,坚持法治化治理路径,有

力抵制错误思潮和负面舆情传播;积极争取和引导“灰色地带”,创新话语体系和传播方式,以更具感染力、渗透力的表达,促进其向积极方面转化,从而全面拓宽意识形态建设空间,提升整体引领效能。

(三)坚守“伟力在民”战略思维,筑牢党长期执政的群众根基

毛泽东深刻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3]511}这一论断不仅揭示了人民战争的制胜密码,也阐明了治国理政的根本力量源泉。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22],阐明人民才是党长期执政最深厚的力量根基和最大的底气所在。坚守“伟力在民”的战略思维,就是要求我们党必须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将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牢牢锚定于人民利益。一是必须时刻警惕和防范脱离群众的危险,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历史经验证明,执政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新时代,党内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脱离群众的危险依然严峻。这就要求全党必须深刻认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历史规律,持续增强忧患意识。要坚决整治危害党群关系的“四风”问题,向作风漂浮、贪图享乐、奢侈浪费的痼疾开刀,以作风建设实效取信于民。要坚持不懈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党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自觉做到与人民思想上同心、行动上同向,同甘共苦、风雨同舟,从而有效防范和化解党的执政风险,永葆党的生机活力。二是必须矢志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要始终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权力,“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2]。同时,要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自觉接受人民监督,让人民评判工作成效,使各项决策和工作更好地体现人民意愿、赢得人民支持,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

(四)赓续“得道多助”战略思维,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今国际格局正经历深刻演变,“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18]60}。如何认识和应对百年变局这一时代命题,早已在历史实践中写下了深刻答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汲取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传统智

慧,文中蕴含的斗争哲学与团结理念,为今天应对变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启迪。一是要着眼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与共生、共享、共担,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面对全球性挑战,必须坚持“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23]。要推动世界各国在尊重包容、相互理解、平等交流的基础上加强对话,凝聚合作共识,履行治理义务,构建优势互补、风险共控、互利共赢、公平正义的发展格局。同时,面对气候危机、能源短缺、公共卫生等跨国议题,必须摒弃独善其身的思维,秉持共生共享共担原则,携手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强权霸凌,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依存关系,共同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24]的世界。二是要提升国际话语权,以中国叙事增进价值认同与文明互鉴。针对当前“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和西方污名化打压,亟须践行“防御中的进攻”战略思维,加快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话语体系。在“防御”层面,要筑牢思想防线,有效抵御错误思潮渗透,并积极搭建跨文明对话平台,主动设置全球议题,寻求国际社会的价值共鸣点,推动中国故事的国际转化与共情传播。在“进攻”层面,应深入阐释“和合共生”“天下大同”等传统理念的时代价值,破解“文明冲突论”的话语陷阱,将我国在和平发展、共同富裕等方面的实践优势转化为理论优势和话语优势,增强中国叙事的道义感召力。通过构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打破西方话语霸权,为全球治理、凝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共识提供中国智慧。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8]《论持久战》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经典文本,为中国的抗战实践提供了科学的战略指导,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深入学习《论持久战》中的战略思维,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中,以强大的战略定力应对百年变局的巨大考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宏伟事业的稳步向前。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 (2016 年版) [M]. 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33.
- [2] 本书编写组. 中国共产党简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83.
- [3]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 共产党宣言[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3.
- [5]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6] 反杜林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32.
-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 习近平.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3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3-12-27(002).
-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6.
- [10] 孙武. 孙子兵法[M]. 刘建立,译.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
- [11] 习近平. 必须坚持守正创新[J]. 求是,2024(23):4-14.
-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3] 明佳睿,王立胜. 诠释毛泽东社会动员智慧的重重向度:从社会学角度重新解读《论持久战》[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2):145-150.
-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6.
- [15] 列宁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26.
- [16]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90.
- [17]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8-05-05(002).
- [18]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76.
- [20] 李厚羿.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意识形态建设[J]. 社会科学家,2025(1):159-164.
- [21] 习近平. 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N]. 人民日报,2013-08-21(001).
- [22]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1-07-02(002).
- [23] 习近平. 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N]. 人民日报,2021-01-26(002).
- [24] 习近平. 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N]. 人民日报,2024-06-29(002).

(责任编辑 谢春红)

Three-dimensional Innovation of Marxism Sinicization in Mao Zedong's *On Protracted War* and It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ZHANG Wen^{1, 2}, SHI Cong¹

(1. School of Marxism, Guil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uilin, Guangxi 541004, China;
2. Guangzhou City Construction Colleg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925, China)

Abstract:In 1938, Mao Zedong wrote *On Protracted War* to refute the "Theory of National Subjugation" and the "Theory of Quick Victory", systematically explaining the persistence, inevitability of victory and strategic guidelines of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s a classic work of the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arxism, it applies the Marxist philosophical world outlook and methodology to analyze the war situation, creatively activates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onstructs practical strategies of exchanging space for time, supplementing material with spirit, and breaking the part with the whole, and realizes the three-dimensional innovation of the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arxism in "theory-culture-practice", providing a historical reference for responding to risks and challenges in the new era. Its strategic thinking of "proceeding from reality"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s the key" "tremendous power lies in the people" and "A just cause enjoys abundant support" is conducive to deepening the "two combinations", firmly guarding the ideological position, consolidating the governing foundatio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ith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Keywords:Mao Zedong; *On Protracted War*;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arxism; Realistic enlightenment

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的多维建构

曲翊佼

(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的重要部署,标志着继承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进入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阶段,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赓续中华文脉上的高度文化自觉与历史主动。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的建构,是一项系统性的文化工程,它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以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为根本参照,旨在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命题。其实践展开则依托于学校教育、家庭教化、文化浸润与制度保障等关键领域的协同支撑,并需自觉运用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等科学思维方法予以推进。由此,建构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明确其核心构成与动力机制,从而为增强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培育时代新人提供坚实的道德基础与精神支撑。

关键词: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文化主体性;关键支撑;科学思维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2.011

中图分类号:D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2-0065-07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提出“构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1]这一重要部署,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传统美德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为,为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发展指明了方向。这是党中央从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对道德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标志着继承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华传统美德既蕴含家国情怀,也包含伦理温情。从历史脉络看,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积淀形成的道德结晶;从主体归属看,它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标识。珍视中华传统美德的最好方式,是让其当代焕发新的生机;延续中华道德文脉的最佳路径,是构建科学有效的传承体系。这种传承体系的建构,既要在历史进程中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布局,又要凸显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目的。因此,在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的构建中,必

须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明确其核心构成,以科学思维实现体系建构。

一、以文化主体性作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建构的具体参照

在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具体参照的作用与地位具有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双重规定性,它既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的内在逻辑提供了主体性的逻辑基点,又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的历史展开赋予了方向性的尺度。若无这一具体参照,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便可能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沼,或沦为外部文化范式的附庸,从而丧失其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本质规定性。作为一种活的精神现象,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并非机械的复制或静态的保存,而是在历史境遇中不断自我扬弃的辩证运动,这一运动的合法性与有效性,恰恰取决于是否存在一个能够锚定其文化自信的参照系。这一参照系的重要功能,在于确证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

收稿日期:2025-12-24

基金项目:202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大数据背景下的集体记忆与政治认同研究”(22AKS013);2024年度河南省研究生教育改革与质量提升工程项目(优质课程项目)“思想政治教育沟通论”(YJS2024KC03)

作者简介:曲翊佼(2000—),女,河南开封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系的主体资格与文化立场,使其既能够抵御历史虚无主义对传统价值的消解,又能够避免文化复古主义对现代性语境的拒斥,从而在连续性与变革性的张力中推动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文化主体性作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具体参照具有合理性

具体参照对于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来说,不仅规定着体系的边界与内涵,更决定着其在现代性场域中的存在方式与发展路径。而文化主体性集中体现了一个文化共同体对自身价值体系的自觉认同与自主建构能力,以它来作为中华美德传承体系的具体参照,其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一)文化主体性作为文化存在的自我确证,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建构提供本质依据。文化主体性的要义在于文化对自身本质规定性的自觉把握,这种把握构成了文化存在与延续的前提。中华传统美德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其传承体系的建构首先需要明确“传承什么”的本质问题,而文化主体性正是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它通过对中华传统美德内在价值逻辑、伦理精神特质的自我认知,确证其作为文化生命体基因的不可替代性,使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避免沦为形式化操作。马克思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525}文化作为“意识”的高级形态,其主体性并非主观臆断的产物,而是植根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物质生产方式所孕育的精神生产特质。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始终与中华民族的生产实践、社会结构相联系,文化主体性正是对这种历史联系的自觉体认,它既承认中华传统美德是历史实践的精神积淀,又通过自我意识将这种积淀升华为可传承的价值体系,使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建构获得了基于历史本质的合理性。(二)文化主体性的辩证否定性,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建构提供发展逻辑。文化主体性并非静态的自我封闭,而是包含着“自我扬弃”的辩证运动,这种运动性使其成为传统美德传承中处理“继承与发展”关系的内在尺度。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绝非简单的复制,而是需要在历史与现实的张力中实现创造性转化,文化主体性所蕴含的辩证否定逻辑,恰好为这种转化提供了方法论指引,文化主体性既坚守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的核心精神不动摇,又通过对自身时代局限性的自觉反思,推动其与现代社会伦理需求相契合。“在辩证思维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毁掉。”^[3]文化主体性的辩证性正体现为这

种“扬弃”,它否定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中与现代性相悖的具体规范,但保留并发展其蕴含的独特伦理精神。这种否定不是对传统的割裂,而是通过自我批判实现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的自我超越。(三)文化主体性的实践指向性,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建构提供价值坐标。文化主体性本质上是实践中的主体性,它不仅体现为精神层面的自我认知,更体现为将自身价值转化为现实实践的能动力量。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的建构,最终要服务于“如何传承”的实践问题,而文化主体性通过确立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在当代社会的价值坐标,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建构的路径选择、载体创新提供具体指引,使其从抽象的道德理念转化为可践行的生活规范。马克思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500}文化主体性的实践指向性,正是将传统美德的传承视为“人的活动”与“环境改变”的统一过程,这基于对当代社会伦理困境的把握,引导传统美德与社会实践需求相结合,使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不仅是历史记忆的保存者,更是塑造当代伦理秩序的能动力量。这种实践指向性避免了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的空泛化,使其在文化主体性的指引下获得介入现实、改造现实的价值生命力,从而完成从“传统存在”到“当代存在”的历史跨越。

(二)文化主体性作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具体参照具有重大意义

其一,激活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文化主体性作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建构的具体参照,需要确保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能够自觉承载、彰显并弘扬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与伦理特质。文化主体性指引下的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建构,超越了对传统要素的机械堆砌或外在移植,成为立足民族文化根脉、体现民族精神气质的实践过程。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成为民族精神的忠实守护者与时代转化者,使蕴含于传统美德中的精神标识在现代化进程中不仅得以存续,更能获得符合时代要求的崭新生命力,成为增强民族认同、彰显文化自信的深层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4]主体性参照下建构的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正是对这一“精神命脉”进行的时代激活。其二,解答时代发展的重大伦理课题。文化主体性深度融入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的建构之中,赋予这种传承体系以敏锐的时代意识与回应现实挑战的实践智慧。在文化主体性

的参照下,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主动面向社会转型、价值多元、伦理关系重构等时代重大命题,自觉发掘、阐释与转化传统美德宝库中蕴含的、对解决当代人类困境具有启示意义的理念与方法。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超越了历史语境限制,能够为应对现代性困境、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独特伦理资源和价值指引。“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以主体性为引领的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建构,正是致力于将传统伦理智慧转化为改变现实、引领时代的实践力量。其三,服务国家发展的战略全局。文化主体性贯穿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的建构过程,使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的价值内核与国家发展的根本目标、意识形态建设要求及文化软实力提升战略形成内在统一。以文化主体性为参照建构的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的核心内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成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共同思想基础的深厚道德滋养,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丰富的德治资源,并在国际交往中为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增强国家文化影响力,提供深具道义感召力的文化叙事和话语支撑。“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个民族。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6]文化主体性作为参照,正是引导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自觉服务于代表进步力量、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使之成为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坚实文化支撑。

二、以关键抓手夯实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建构的根本支撑

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的建构,不仅需要宏观层面确立其传承与创新的基本原则与方向,更需在实践层面依托学校教育、家庭教化、文化浸润与制度保障等一系列相互关联、协同作用的关键支撑。这些支撑共同构成了将中华传统美德从精神理念转化为社会现实、从历史资源中焕发当代活力的根本依托,它们系统性地确保中华传统美德能够深度融入国民教育、日常生活与社会风尚,从而在赓续传承中历久弥新。

(一)学校教育体系将传统美德融入教材与课程设置是其核心路径

学校作为系统化、制度化教育的专门场所,是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的主阵地与核心路径。其核心作用在于,通过系统性的课程设计与教学活动,将散见于经典文献、历史故事、民俗习惯中的传统美德,转化为结构化的知识体系和可内化的价值观念,实现对青少年价值观形成期的精准滴灌与系统塑造。马克

思指出:“教育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7]这一论述揭示了教育在塑造“全面发展的人”方面的根本性,而美德传承正是人的全面发展中精神维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学校教育体系的传承功能,并非简单的知识传授,而是通过课程这一核心载体,实现传统美德与青少年认知结构、情感体验和实践行为的深度结合。具体而言,实现这一核心路径需着力于两个层面。一是教材体系的深度重构。这意味着超越简单增设“国学”章节或穿插名言警句的碎片化模式,转向将中华传统美德的精神内核,如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等,有机融入语文、历史、思想政治,甚至自然科学等各类课程的教材编写逻辑之中。例如,在语文教材中,通过对古典诗文的选择与诠释,不仅赏析文学之美,更揭示其背后的家国情怀与人格理想;在历史教材中,通过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评析,彰显“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与“自强不息”的奋斗品格。这种融入,旨在使传统美德成为知识学习的价值底色,而非附加的装饰。二是课程教学的范式创新。单纯的课堂讲授易流于表面,需结合探究式学习、情境式体验、项目式实践等多种教学方法。例如,通过组织对本地家风家训、乡规民约的田野调查,引导学生在具体社会情境中理解“孝悌忠信”的现实体现;通过模拟古代礼仪或传统技艺的实践课程,让学生在“知行合一”中感受“格物致知”“敬业乐群”的深层含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8]²⁰³学校教育体系正是通过教材与课程这一核心路径的系统性改革,将这一要求落到实处,确保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获得最稳定、最广泛、最具深度的新一代承接主体。

(二)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通过日常教化承载美德传承的基本功能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相较于学校教育的系统性与规范性,家庭家教家风以其生活化、情感化、代际化的独特方式,构成了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最基本、最直接、最持久的功能承载单元。“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9]⁵⁴⁶家风的优劣,直接关乎个体德行的底色与社会道德的根基。中华传统美德中诸多规范,如孝亲敬老、勤俭持家、邻里和睦等,其原生场景与践行场域首先在家庭。因此,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实质是将宏大的美德体系微观化、具体化为每日每时的生活实践与情感互动,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日常教

化。

具体而言,家庭家教家风的运行遵循着独特的机理。其一,家教是美德的启蒙教育。父母及其他长辈的言传身教,是子女最早接触到的道德榜样和行为规范。长辈对子女孝行的期待、对诚信行为的赞许、对浪费行为的批评,都以最直观的方式定义了什么为“善”与“应当”。这种发生在日常生活细节中的教化,具有强大的情境感染力和行为塑造力。其二,家风是美德的生态场域。家风是一个家庭长期形成的稳定文化心理与行为模式,它作为一种“家庭文化氛围”,无形中规范着每个成员的行为选择。一个崇尚“忠厚传家久”的家庭,其成员自然倾向于诚实守信;一个讲究“诗书继世长”的家庭,自然会重视读书明理。家风构成了个体美德习得的初始文化生态,其影响深入潜意识,持久而稳固。其三,家庭是代际传承的关键纽带。传统美德通过家训、族规、祭祀、节庆等家庭仪式与活动,实现了从上一代到下一代的直接传递。这种传递伴随着血缘亲情,更易激发情感认同与文化归属感。马克思曾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0]家庭正是人最初、最核心的“社会关系”场域,在此形成的美德认知与习惯,构成了个体日后处理更广泛社会关系的伦理基础。因此,夯实家庭这一基础抓手,激活其日常教化功能,是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培育深厚的微观社会土壤。

(三)社会公共文化空间营造浸润式环境促进美德习得与践行

个体从家庭和学校走出,便进入广阔的社会公共领域。社会公共文化空间,包括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文化广场、公园、社区活动中心以及网络虚拟空间等,是美德传承从私人领域、教育领域走向公共生活领域的关键中介。其独特功能在于,通过营造一种浸润式的文化环境与舆论氛围,使中华传统美德从书本教条和家庭规训,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互动的公共文化产品与社会集体记忆,从而在潜移默化中促进社会成员的美德习得与自觉践行。

这种浸润式环境的营造,主要依靠两种机制。一是物质空间的符号化叙事。公共文化设施通过展览陈列、景观设计、雕塑铭文等物质载体,将传统美德价值观进行视觉化、场景化的呈现。例如,历史博物馆通过文物讲述“精忠报国”的故事、社区广场设置体现“邻里守望”主题的公益雕塑、城市公园融入“天人合一”理念的园林设计等。这些空间不再是中性的物理存在,而成为承载美德叙事的“无声课

堂”,公众在游览、使用过程中,不自觉地接受着价值熏陶。列宁曾强调:“艺术属于人民。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11]公共文化空间的营造,正是让蕴含传统美德的艺术与文化形式回归人民、服务人民。二是文化活动的情境化体验。通过举办与传统节日、历史纪念日相关的庆典、讲座、演出、实践体验活动,将美德教育嵌入生动具体的社会情境。如端午节组织龙舟赛体验“团结奋进”、重阳节开展敬老活动弘扬“孝亲敬老”、在国家公祭日仪式中深化“爱国情怀”等。这些活动创造了集体参与和情感共鸣的契机,使美德认知升华为情感认同和集体意识。尤其在网络空间,利用新媒体技术创作传播富含传统美德元素的动漫、短视频、网络文艺作品,更广泛、更鲜活地在青年群体中传播正能量。这种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共文化浸润,使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和公共参与中,时时处处感受到传统美德的现实存在与时代价值,从而将外在规范逐步内化为行为习惯,构成了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赖以运行的宏观社会文化生态。

(四)制度保障与政策引导为美德传承提供刚性支持与长效机制

无论是教育融入、家庭养成还是环境浸润,其持续性和有效性最终需要制度与政策的刚性支持与长效引导。制度保障与政策引导是确保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不因领导人的改变或注意力转移而改变,能够稳定运行、持续发展的关键支撑。它将柔性的道德倡导与刚性的社会规范相结合,为美德传承提供明确的激励、约束与资源供给。

制度保障的核心在于法治化与常态化。一方面,通过立法将中华传统美德中最核心、最具有共识的内容,转化为法律原则和公民法定义务。例如,将“孝”的精神具体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子女赡养的明确规定、将“诚信”原则深度嵌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契约精神与市场经济法律法规体系。这体现了“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为美德践行划定了底线,并提供了国家强制力的保障。另一方面,将美德传承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文化发展纲要和教育改革方案,建立相应的考核评价、经费投入、队伍建设等常态化工作机制,确保其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得到持续贯彻。政策引导的重点在于激励与整合。政府通过出台具体的政策措施,对践行传统美德的先进典型(如道德模范、最美家庭、诚信企业)给予荣誉表彰和物质奖励,树立可学可做的榜样,形成“好人有好报”的社会导向。同时,政策应发挥资源杠杆作用,

引导和鼓励企业、社会组织、社区等多元主体参与美德传承事业,如在文化产业政策中扶持弘扬传统美德的作品创作、在社区治理政策中支持开展优良家风建设活动。恩格斯说过:“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12]制度与政策正是上层建筑中能够主动、有力地对社会意识(包括道德观念)施加影响的关键部分。通过系统性的制度设计与精准的政策引导,能够有效协调各方力量,整合各类资源,克服传承过程中的自发性和碎片化弊端,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建构起稳固的“四梁八柱”,确保其行稳致远。

三、以科学思维推动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建构的实践方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9]17}。科学思维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清晰的指引与方法。

(一)坚持战略思维,以“两个灵魂”统筹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的整体建构

战略思维就是从“全局、长远、大势上作出判断和决策”^{[8]583}。坚持战略思维,要求从历史纵深与时代大势把握方向,既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确保传承的正确导向,又要依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坐标,从全局谋划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的建构,确保这一体系始终沿着正确的总体方向稳步推进,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民族复兴提供持久的道德滋养与精神动力。一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确保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建构的整体方向。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8]483},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的建构提供坚实的分析框架和战略指引。这种指引体现为对传承体系社会功能的宏观定位——既不是单纯的文化保存机制,也不是碎片化的道德教化工具,而是作为塑造社会精神气质、培育实践理性的系统性工程存在。其价值在于,通过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运用,使传承体系具备动态调适能力,能够在社会结构变迁中保持自身的逻辑自洽性与历史连续性。这意味着传承体系的建构是将传承过程本身视为一种实践性的文化生产活动,通过构建理论指导与实践反馈的闭环机制,使传承体系能够在与社会实践的互动中不断优化自身结构,实现传承方式的创造性转化。另一方面,注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建构的价值引领作用。“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

灵魂”^[13],作为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集中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个体之德,更是国家之德、社会之德与民族之德^[14],为传承体系提供了具有共识性的价值参照系,使其建构能够在多元文化语境中明确中华民族的价值边界与核心导向。通过核心价值观的引领,能够避免传承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功能失衡或目标偏移,确保传承体系能够在复杂的文化生态中保持自身道德文化的核心竞争力。

(二)坚持辩证思维,以“三对关系”把握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的建构机理

辩证思维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世界、把握规律、分析问题、解决矛盾的思维方式”^[15]。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的建构,需要以辩证思维剖析内在结构、把握运行规律。其一,把握党群关系的统一,夯实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的建构根基。传承的本质是人的精神活动的延续,在传承体系建构中把握党群关系,要掌握好党的引领性与群众的主体性的张力互动。党的引领性体现为方向把控与价值提炼,基于对历史规律的把握和时代需求的研判,确保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的建构不偏离社会发展的主流方向,避免自发性可能导致的核心价值离散化,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的建构提供理性框架与目标指引。群众的主体性则表现为在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的建构实践中的自主参与和情感认同,是基于生活体验的精神自觉,这种精神自觉赋予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以生命力与持续性。两者的张力互动构成传承体系的动态平衡,即党的引领不能替代群众的自主选择,需尊重群众在传承中的原生动力;群众的自发传承亦需在理性引领下提升境界,避免陷入经验主义的局限。这种边界清晰又相互呼应的关系,使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的建构既保持方向的确定性,又具备实践的灵活性,共同构成传承体系的稳固根基。其二,处理好“形神”关系的统一,明确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的建构体例。“‘形’‘神’一体,构成了文化生命体”^[16],“形神”关系的处理关乎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的形式与本质。“形”是传承体系的外在呈现形态;“神”则是传承体系蕴含的核心价值逻辑。“形”与“神”存在现象与本质的矛盾关系,即重“形”轻“神”,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会沦为形式的堆砌;重“神”轻“形”,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则失去可感的载体。辩证思维要求在对立中把握统一,让形式服务于内核的表达,让内核赋予形式以生命力。这种统一避免了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陷入表象化或抽象化的境地,使其既能通过具体形式被感

知、被践行,又能始终保持其精神实质的纯粹性。“形神”之间的张力,是建构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既守正又创新的内在引擎。其三,明辨“体用”关系的统一,确定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的建构方向。“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实现了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和理论认识下的实践应用相统一”^[17]。“体”是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自身的特质与伦理基因,是传承的本源;“用”是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在现实场景中的实践功能,是传承的价值体现。二者存在着本质与功能的矛盾运动,即守“体”不用,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会沦为僵化的历史遗存;弃“体”逐用,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则失去自身的独特性。坚持辩证思维要求在坚守本源的基础上拓展实践维度,让“体”为“用”提供根基,让“用”为“体”注入活力。这种处理既确保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不偏离自身特质,又使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能回应现实需求,保持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平衡。

(三)坚持创新思维,以“两个结合”建构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的“守变”品格

创新思维是“在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时,勇于超越常规,寻找新思路和新方法,是一种追求创新、善于创新、以创新引领突破性发展的思维方式”^[18]。以创新思维把握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建构的“守变”品格,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守”并非故步自封,而是对中华传统美德核心价值与精神内核的坚守。中华传统美德历经数千年沉淀,蕴含着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诸多宝贵精神。在构建美德传承的内容体系时,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依托,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拓展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的历史纵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19],需深入探究中华文明虽历经岁月洗礼,却始终绵延不绝的独特精神特质,借助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华传统美德进行精心提炼与系统阐释,让传承内容体系的核心价值愈发清晰明确,使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在构建进程中,始终保持鲜明的民族特色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另一方面,“变”是依据时代需求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进行创新发展。时代不同,美德传承服务于社会的具体目标要求不同,而且时代提供美德传承的方法手段也不尽相同,因此,要立足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既要在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的现代品格和

民族要求上图变,也要在技术方法手段上图变,借助人工智能新媒体等现代技术手段,为美德传承开辟新途径、创造新方式,在传承过程中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德的吸引力、生命力和影响力。

(四)坚持底线思维,以“两个破除”抵制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建构的不良阻碍

所谓底线思维,是指“确立最低目标,凡事从最坏处准备,防止坏的可能性发生,同时积极主动作为,努力争取好的可能性,取得最好结果的积极主动思维方式”^[15]。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与社会快速变革的当下,坚持底线思维是确保中华传统美德传承的内容体系实现现代化建构的基础保障。一方面,要破除传统道德中封建腐朽思想的影响。“中华传统道德中的思想糟粕在今日仍有残存”^[20]。从历史维度看,封建等级制度下衍生的“三纲五常”观念,虽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社会秩序稳定有一定作用,但其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过度强调单向服从,压抑了个体的自由与权利。在现代社会倡导平等、民主、自由的价值体系下,这类封建残余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若未加甄别地纳入现代传承体系,会导致体系内部出现价值冲突与逻辑断层。因此,要确立批判性继承的底线,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对传统道德资源进行严格辨析,明确将“压迫性等级观念”“无条件人身依附”以及“扼杀个体合理权利”的封建伦理残余,设定为不可逾越的现代价值底线。以平等、自由、尊严的现代文明准则为标尺,对传统道德规范进行彻底的理性检视与价值剥离,确保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内核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高度一致,消除体系内部的逻辑断裂与价值冲突风险。另一方面,要破除现实生活中的错误思潮影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坚决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1]。当前社会思想多元活跃,一些与中华传统美德核心价值相背离的观念,如历史虚无主义对民族英雄与道德典范的解构、极端个人主义对集体责任与奉献精神消解、拜金享乐主义对勤俭诚信与精神追求的冲击等,正潜移默化地侵蚀着社会道德土壤。这些错误思潮的存在,模糊了是非善恶的界限,弱化了社会成员对中华传统美德的内心认同与实践动力,成为建构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的无形障碍。因此,要筑牢主流价值的防线,旗帜鲜明地加强理论辨析与舆论引导,持续揭露错误思潮的理论谬误与现实危害。通过强化正面价值供给,巩固社会成员对中华传统美德核心精髓的理性认同与情感归属,有效抵御错误思潮的渗透,维护中华传统美德

传承体系所需要的思想共识与社会道德环境。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24-07-22.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149.

[4]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19.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136.

[6] 列宁全集:第 24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25-126.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710.

[8]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9]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139.

[11] 列宁全集:第 27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376.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649.

[1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163.

[14] 王维国. 新时代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战略思考[J]. 思想理论教育,2019(12):47-53.

[15] 梁露行. 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科学思维方法[J]. 社会主义研究,2024(4):1-10.

[16] 朱贻庭. 再论“‘形神统一’文化生命结构”及其方法论意义:古典中国哲学“形神之辨”的文化哲学精义[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7(2):1-13.

[17] 惠子馨,张舒婷. 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科学思维方法[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4(3):37-46.

[18] 马建青,游志纯.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思维方法[J]. 教学与研究,2024(4):5-15.

[19]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236.

[20] 朱继东,李建鑫. 构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溯源探微、核心要素及实践方略[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5(1):12-21.

(责任编辑 谢春红)

The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ion of the Inheritance System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rtues

QU Hongjiao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put forward the important deployment of "building the inheritance syste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virtues", which marks that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raditional Chinese virtues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fully demonstrates the CPC's high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historical initiative in continuing the Chinese cul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heritance syste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virtues is a systematic cultural project. It is based on the strategic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culture as the fundamental reference, and aims to respond to the era proposition of Chinese style modernization. The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relies on the collaborative support of key areas such as school education, family education, cultural infiltration, an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and requires the conscious use of scientific thinking methods such as strategic thinking, dialectical thinking,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bottom line thinking.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heritance syste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virtues must adhere to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clarify its core components and driving mechanisms, and provide a solid moral foundation and spiritual support for enhancing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cultivating new generations of the times.

Keywords:Chinese traditional virtues; Inheritance system; Cultural subjectivity; Key support; Scientific thinking

焦裕禄精神的传统文化意蕴与当代启示

马伟胜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1100)

摘要:焦裕禄精神诞生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的光辉典范。这一精神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意蕴,其核心内涵既承袭了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的亲民情怀、“经世致用”的求实作风、“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攻坚克难”的大无畏气概、“修身律己”的廉洁道德情操与“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等重要元素与价值理念,又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焦裕禄精神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不仅为深刻理解其丰富内涵提供了文化根基,也为其在新时代彰显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奠定了重要基础。

关键词:焦裕禄精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2.012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2-0072-0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民族之根和魂,传统文化的基因早已深深融入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之中,成为世代中国人的文化滋养。中国共产党始终推动传统智慧与时代精神相融合,可以说,“百年党史也是一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1]。焦裕禄精神的孕育与形成,既植根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特定时代土壤,也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滋养与浸润。这一精神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交融共生的生动典范,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有机结合的鲜活范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2]焦裕禄出生并成长于齐鲁大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成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潜移默化间塑造了他的精神品格。焦裕禄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彰显。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究焦

裕禄精神背后的文化渊源,不仅有助于深刻把握其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更能为新时代传承和弘扬这一精神提供学理支撑。同时,这一研究对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助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重要意义。

一、“民为邦本”的亲民情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自先秦以降便一脉相承、源远流长。《尚书·五子之歌》首倡“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确立了“民为国家之根基”的核心命题。《文子·上义》强调“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将“利民”明确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准则;《晏子春秋·内篇·问下》更是直言“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一语道破执政者立身行事的核心准则:以爱民为至高追求,以乐民为根本旨归;此外,《大学》中“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的论断、《孟子·尽心下》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以及《荀子·王制》中“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的权力譬喻,这些论述共同构成了春秋战国时

收稿日期:2026-01-23

作者简介:马伟胜(1981—),男,河南南阳人,硕士,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从事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等研究。

期民本思想的理论雏形,使民本观念成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主张之一。

传统民本思想主张民心向背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将赢得民心视为治国理政的关键要义,彰显出朴素的重民价值取向。这一思想具有合理内核,饱含着对民众的深切关怀与重视,在历史上起到了缓和阶级矛盾、减轻民众负担、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也带有明显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它虽承认民众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但其提出初衷却多是为巩固专制统治、维护封建秩序服务,本质上并未承认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历史主体与创造者的核心地位。毛泽东指出:“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开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3]

近代以来,伴随时代进步与社会转型,中国传统民本思想逐步突破封建桎梏,向现代民主理念转型。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革命性改造与创造性转化,提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实现了民本理念的历史性飞跃。

源远流长的民本思想不仅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更深度塑造了焦裕禄的公仆情怀,为其精神品格的形成提供了深厚文化土壤。焦裕禄深受传统民本思想影响,他始终与群众同甘共苦,为人民谋福祉,既赓续了“民惟邦本”的文化精髓,更突破了传统士大夫“为民请命”的阶级局限,将民本思想转化为共产党人的实践自觉。焦裕禄赴兰考工作的初心,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传统文化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在他身上升华为共产党人无私奉献的公仆境界,这正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传承与超越。他坚持将民本理念转化为具体实践,深入田间地头察民情、集民意、解民忧,始终坚守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准则,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智慧与力量。每逢恶劣天气与自然灾害来袭,他最先牵挂的永远是群众安危,风雪铺天盖地之时,他带领干部顶风冒雪访贫问苦,其甘当人民之子的赤子情怀,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实现了中华传统美德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高度统一。

焦裕禄夙夜在公、勤政为民,所思所行皆围绕民生疾苦与群众期盼。他心中始终装着人民、唯独没有自己,这种公仆情怀既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为贵”

的民本思想既一脉相承,又在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指引下,实现了从传统“为民做主”到共产党人“由民做主”的价值升华。这一根本转变,使他的“亲民爱民”情怀既传承了民本精华,又超越了时代局限。焦裕禄精神深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熠熠生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政之要,在顺民心。”新时代学习和弘扬焦裕禄精神,核心要义在于传承其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始终把站稳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遵循。这就要求我们要像焦裕禄那样,在群众最困难时挺身而出,在群众最需要时主动担当,以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务实的工作韧性,深深扎根基层,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依靠人民群众破解发展难题,让焦裕禄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更为强劲的生命力。

二、“经世致用”的求实作风

经世致用思想发轫于先秦,是儒家入世哲学的核心,主张深耕实务、考察山川形势、谙熟政务民情,摒弃脱离现实的空谈虚论,其本质在于务实笃行。从古训“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到赵括纸上谈兵的惨痛教训,再到两晋学士“虚谈废务”的时代弊端,无不印证着实干对于为政安民的决定性作用。正如唐甄所言“以实则治”(《潜书·权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从躬行实践中求得真知,以实实在在的作为回应民生关切。

传统实干思想是焦裕禄精神的重要文化渊源。无论是“务求实效,不务空谈”的自省之论,还是“为政之道,贵在实干”的施政之要,抑或“不图虚名,不务虚功”的立身要义,这些重实践、戒空谈的思想传统,共同为焦裕禄精神的孕育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

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引,充分吸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作了科学阐释,深刻揭示了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辩证关系,“‘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4]。传统实事求是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深度融合,共同熔铸了焦裕禄求真务实的实践底色。面对兰考风沙、内涝、盐碱“三害”肆虐的困境,焦裕禄清醒认识到,改变落后面貌不能仅凭一腔热忱,必须依靠科学方法、尊重客观规律。治理“三害”过程中,他坚决摒弃蛮干作风,秉持“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信条,将“凡事探求就里”的求实精神贯穿始终,坚持从兰考的实

际情况出发谋划施策。他极少坐守办公室听取汇报,长期深入田间地头,风里来雨里去,置身于群众之中,主动向群众请教治沙治水的实践经验,起风时顶着风沙追查风口分布,下雨时冒着大雨摸清水路走向,最终探索出“淤泥盖沙、挖河排水、深翻淤土压碱、种泡桐挡风固沙”的综合治理方案。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大力推广适应性强、生长迅速、成材性好的泡桐树,以科学系统的方法破解“三害”难题,用实打实的治理成效回应群众期盼。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焦裕禄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始终坚守“不唯书、只唯实”的实践准则。面对兰考的实际,他冲破本本主义的桎梏,不依赖教条理论,而是以客观事实为依据,通过深入调研收集第一手资料,在找准问题症结的基础上精准施策。这种“凡事探求就里”的求实作风,既呼应了古人“大人不华,君子务实”的实干传统,让经世致用思想在现代焕发生机,又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高度契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理论相结合的生动典范。“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弘扬焦裕禄精神,核心在于秉持其求真务实的实干品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要把调查研究作为基本功,尊重客观规律,“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以“马上就办”的行动力,在务实功、求实效上下功夫,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业绩,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周易·乾卦·象传》经典凝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倡导君子立身行事当锐意进取、奋斗终生。从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弘毅,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奋发;从《孟子》“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磨砺,到《荀子》“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坚守,这些跨越时空的古训,共同凝练成一个民族的精神信念:唯有自强不息,方能行稳致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焦裕禄艰苦奋斗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深厚滋养。焦裕禄自幼浸润传统美德,承袭了自强不息的精神特质,更在共产党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熏陶下,将这份精神升华为干事创业的动力。他至死不渝、奋斗不息的精神,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传统进取精神一脉相承,又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为攻克兰考“三害”、改变贫困落后面貌,他夙兴夜寐、废寝忘食,直至肝病让他痛得无法挺直腰身。那把顶出一个大窟窿的藤椅,不仅是焦裕禄奋斗一生的物证,更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在当代最震撼人心的注脚。

奋斗是焦裕禄生命中鲜明的底色,他在兰考带领群众与风沙、内涝、盐碱等自然灾害做斗争,下定决心不改变兰考面貌决不离开,其奋斗精神贯穿工作始终,彰显出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焦裕禄精神继承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基因,更将传统自强精神升华为共产党人直面风险挑战的力量,其中“艰苦奋斗”的内核,既是对传统文化的赓续,更是对革命精神的发扬。

自强不息、艰苦奋斗是中华文明历经千难万险而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柱。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深重,无数有志之士胸怀救国自强之志前赴后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凭借自强不息、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拼搏奋斗,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唯有自强不息的民族,方能拥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无论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突破“卡脖子”技术瓶颈,还是战胜各类风险挑战,都迫切需要传承和发扬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5]新时代的奋斗者当以焦裕禄为榜样,始终坚守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价值追求,以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力、自立自强的精神品格,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勇毅前行,用实干实绩续写中华民族新的荣光。

四、“攻坚克难”的大无畏气概

知难而进、迎难而上是中华民族赓续传承的宝贵精神品格。从大禹治水的担当、愚公移山的执着,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的坚韧,再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淬炼之理、“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的进取之姿,这些跨越时空的典故与箴言,凝练为一个民族的深层共识:唯有直面困厄、向难处攻坚,方能成就非凡之业。这一精神传统,为后世面对危难时局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支撑。焦裕禄同志曾言:“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请组织放心,不改变兰考面貌我决不离开那里。”^[6]面对兰考“三害”肆虐的重重困境,焦裕禄以共产党人的大无畏英雄气概,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始终不在困难面前低头,不在挑战面前退缩。

在兰考调研途中,自行车在沙土地里寸步难行,他便弃车步行,渴了就喝一口河水,饿了就啃几口干粮。怀揣着“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焦裕禄带领人民群众向兰考“三害”发起猛攻。面对内

涝、风沙、盐碱的肆虐与贫困落后的现实,他没有丝毫等待、犹豫与退缩,而是毅然决然带领群众迎难而上、奋勇攻坚,全力破解自然灾害困局,逐步扭转了兰考贫困落后的面貌。这种不畏艰险、攻坚克难的精神品质,为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滋养。

焦裕禄审时度势、科学施策,为国家与兰考百姓办成了一件件难事、实事。这份深沉的为民情怀与强烈的担当意识,正是新时代党员干部躬身践行的典范。我们要特别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攻坚克难的大无畏气概,敢于奋勇争先、善于克难制胜。历史征程并非坦途,中国共产党在历经磨难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发展壮大,越是伟大的事业,越充满艰难挑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各类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层出不穷,我们既要有直面困难的充分准备,更要有战胜困难的坚定决心与顽强意志。狭路相逢勇者胜,惟其艰难,方显勇毅;惟其磨砺,始得玉成。新时代新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阶段,我们应当深刻体悟焦裕禄精神的时代价值与丰富内涵,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坚韧不拔的顽强毅力,秉持“越是困难,越要有雄心壮志”的奋进姿态,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尽心尽力、奋勇前进。

五、“修身律己”的廉洁道德情操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而支撑我们攻坚克难、不懈奋斗的,正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崇高精神,尤其是廉洁自律的品格。中华大地孕育了深厚的廉政文化,传统政治文化历来要求为官者清廉自持。《管子·牧民》明确定论:“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晏子春秋·内篇》强调“廉者,政之本也”。《汉书·宣帝纪》直言“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从君子修身倡导的“慎独”之德,到为官从政恪守的“清廉自守”“两袖清风”“为政戒贪,养廉惟俭”之则,廉洁自律在传统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长河里,更是涌现出无数廉政典范:战国西门豹革除弊政、清正自守,宋代包拯铁面无私、清廉刚正,明代海瑞一身正气、秉公执法,清代于成龙严于律己、清廉终身。这些先贤的廉政佳话千古传颂,深刻塑造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与价值取向。

焦裕禄一生都秉持着清正廉洁、光明磊落的行事准则。他坚决反对装潢办公室,宁肯住进老旧民房,也不迁入县委大院,对送上门的救济款一概拒收,衣食住行处处彰显简朴本色,被褥之上更是补丁摞补丁。他始终严守党纪党规,从不用手中的权力

为自己、子女及亲属谋取半点私利,既以高标准严格要求家人,更以自身言行率先垂范,终其一生两袖清风。秉持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信念,焦裕禄亲起草《干部十不准》,明确划定全县干部在任何时候都不得搞特殊化的纪律红线。这份规定将儒家“修身齐家”的传统理念,转化为共产党人的纪律遵循与制度规范,与“廉者,政之本也”的传统清廉理念一脉相承。他公而忘私、国而忘家,为人民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与道德风范。“吾日三省吾身”,新时代党员干部当以此为镜,时刻牢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嘱托,不断加强党性修养,严守廉洁自律底线,始终以高标准约束自身言行,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坚决抵制贪欲诱惑,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六、“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焦裕禄精神的丰富内涵也契合了古人尊重自然、永续发展的长远考量。中国传统文化秉持“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核心理念,《庄子·齐物论》有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中庸》亦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些经典论述阐明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荀子提出的“制天命而用之”则进一步诠释了顺应规律、利用自然的辩证智慧。从“道法自然”的哲思到顺时劳作的实践,古人始终强调尊重自然、敬畏自然,追求人与万物和谐共处的生存之道。

焦裕禄在治理兰考自然灾害的过程中,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坚持以系统思维统筹全局,通过植树造林防风固沙、翻淤压沙改良盐碱地、疏浚河道开挖排水沟渠、落实水土保持举措等一系列行动,改善了生态环境。这种尊重自然规律的系统性治理模式,既是对“天人合一”传统自然观的现代践行,更生动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

焦裕禄和兰考人民在治理“三害”、改善自然环境过程中,多措并举构建起相对完整的生态治理体系,生态修复、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成效显著。兰考泡桐的种植,不仅有效发挥了防风固沙、改善生态的作用,更创造了惠及后世的多重价值:泡桐作为多种民族乐器与家具的优质原料,加工木制品畅销海内外。焦裕禄在生态治理中秉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借鉴,启示我们必须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坚定不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与发展,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践行者,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与弘扬者。焦裕禄精神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其公仆情怀传承传统民本思想,求实作风延续经世致用传统,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淬炼升华奋斗底色,以高尚道德情操践行传统廉政修身理念。

焦裕禄精神并非对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刻,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传统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既保留“民惟邦本”等核心价值基因,又注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时代内涵,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重塑。对待传统文化,我们既要摒弃“文化复古论”的照单全收,也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割裂态度,在批判继承中实现传承发展。焦裕禄精神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成为“两个结合”在实践中的生动典范。这种既扎根传统又超越传统的文化自信,不仅赋予焦裕禄精神跨越时空的精神生命力,更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自觉与实践自觉。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中,焦裕禄精神将继续激励我们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与党的初心使命、新时代伟大实践深度融合,为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持久稳固、坚实有力的精神支撑与价值引领。

参考文献:

[1] 王易.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考察与时代要求[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2(3): 123.
[2]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 求是, 2023(17): 5.
[3] 毛泽东文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57-58.
[4] 毛泽东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801.
[5] 邓小平文选: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306.
[6] 焦守云. 我的父亲焦裕禄[M].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6: 138.

(责任编辑 谢春红)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Contemporary
Inspirations of Jiao Yulu Spirit

MA Weisheng

(School of Marxism,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1100, China)

Abstract: The Spirit of Jiao Yulu was born in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is a brilliant model of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Marxism and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Rooted in the fertile soil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t contains profound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notations. Its core connotation not only inherits the important elements and value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such as the people-friendly feeling of "the people a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untry", the realistic style of "applying knowledge to practice", the striving spirit of "constantly striving for self-improvement", the fearless spirit of "overcoming difficulties", the honest moral sentiment of "self-cultivation and self-discipline" and the concept of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but also realizes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y the Spirit of Jiao Yulu not only provides a cultural foundation for deeply understanding its rich connotation, but also lay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era value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Jiao Yulu Spirit;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困境与破局：新媒体时代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

许振波^{1,2}, 曾晓敏²

(1. 蚌埠学院 文学与教育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2. 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作为中国传统村落保存面积最大、最完整的区域,徽州地区的传统村落在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全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当前,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同时,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临,出现村落文化认同危机、文化持有者新媒体素养不足、村落文化媒体传播贫乏与传播渠道局限等困境。借助田野调查及问卷调查,对安徽省黄山市黟县宏村、西递村、宣城市绩溪县龙川村等典型徽州传统村落开展调研。基于调研数据与访谈结果,提出保护徽州文脉、共筑文化认同,政校协同赋能、延续文化基因,传承徽州精神、协同联动创新,打造新媒体矩阵、搭建数据平台的破局路径,为徽州地区文物保护利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及相关研究者、实践者提供参考与理论支撑。

关键词:徽州传统村落文化;新媒体;传承;破局路径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2.013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2-0077-06

一、引言

传统村落原称古村落,于2012年9月经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更名,并将其定义为: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1]。2012年以来,我国抢救性地启动了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经过多方努力,传统村落快速消失的局面得到有效遏制。仅就安徽省而言,目前共有470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818个村落列入省级传统村落保护名录,中国传统村落总数已位居全国第七^[2]。其中,安徽南部的徽州地区是中国传统村落保存面积最大、最完整的区域^[3]。徽州,并非行政地理概念,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府六县”的文化概念。在空间上,由现安徽省黄山市全境、宣城市绩溪县和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共同组成。受到徽文化的影响,徽州地区分布着大量起源于宋元时期、兴盛于明清时期的地域性传统村落,这些村落成为一种由社会经济、自然哲学、宗法礼制等诸多元素互动而形成的宝贵文化遗

产。截至2023年底,徽州地区共有六批371个中国传统村落被列入保护名录^[4],该区域村落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聚族而居,拥有如古民居、祠堂、牌坊等特色建筑和完善的水系等基础设施,并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习俗、生活方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村落集合。

近年来,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保护工作在政府、业界、学界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通过建设“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实施“黄山市村落徽州文化特派员制度”等,取得了一定成效。与此同时,通过近期对安徽省黄山市、宣城市部分徽州传统村落的村民抽样问卷调查、实地走访发现,较多村落出现文化认同缺失至村民参与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缺位、村落文化传播中新媒体素养不足及融入不够造成的传播单一低效的问题。徽州传统村落文化传承创新发展中的内生动力不足,文化基因的延续与传递令人担忧,相关问题亟需关注。

学界有关传统村落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研究成果数量丰富,知网

收稿日期:2025-11-24

作者简介:许振波(1974—),男,安徽蚌埠人,硕士,蚌埠学院文学与教育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传播学;曾晓敏(2000—),女,江西宜春人,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传播。

收录各类相关文献已逾万篇。就本研究关注的区域(徽州地区)及具体方向(村落文化)来看,以“徽州传统村落文化”为篇名在知网检索,截至2025年10月,共获取中英文各类文献共25篇,均发表于2016年之后。按其研究内容,大体可归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较多集中于徽州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传承路径方面的研究。如路幸福通过实证研究,提出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生态保护路径和多元模式,认为借助旅游业发展优势能够带动传统村落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5]。朱焕武、贺海敏等提出以产业振兴为核心、加强文化载体创意产品研发、组建文化人才队伍等对策,以期激活古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的生命力^[6]。贾芳芳则立足数字化保护与传播,聚焦打造徽州村落文化传播的数字沉浸感,实现徽州传统村落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和创造性转化^[7],并探讨以大数据技术推进传统村落文化资源产品的转型与创新,推动大数据时代传统村落文化新业态发展^[8]。二是部分涉及徽州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特征与保护方面的研究,如顾大治、孟庆贺等从建筑、场所、聚落、环境、行为五个方面解析诗词中的徽州村落文化景观^[9]。刘欣慰、郑志元等以黄山市徽州区潜口镇唐模村为研究对象,以物质景观特征和非物质景观特征为分类标准对其景观要素进行分类,对其景观特征进行了系统地阐述^[10]。三是少量有关徽州传统村落文化旅游意象方面的研究。如顾大治、孟庆贺等以绩溪县龙川村为个案,分析游客在徽州传统村落旅游体验中的情感认知与文化感知,梳理徽州传统村落文化旅游的意象体系,从乡愁意象的发展角度,提出龙川村在挖掘与合理保护意象元素、提升意象文化空间营造、优化意象转达与体验三个方面的文化旅游发展策略^[11]。综上,前述相关研究成果为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全面视角与系统参考,但基于新媒体视域的探讨相对较少,尤其是关于传统村落文化传承的新媒体机制、路径的研究几为空白。本研究以此为切入点,结合实地调研与深度访谈,剖析新媒体时代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的现实困境并提出破局路径,以期填补该领域研究空白。

二、新媒体时代徽州传统村落文化传承的困境

近年来,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保护工作在政府、业界、学界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临,徽州传统村落文化传承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变。为深入了解徽州传统村落文化在当前媒介时代环境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2025年8月,研究团队赴安徽省黄山市黟县宏村、西递村及宣城市绩溪县龙川村等6个典型徽

州传统村落开展问卷调查及入户访谈。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240份,回收有效问卷213份,有效回收率88.75%。问卷内容主要涵盖村民对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的认知与认同程度、新媒体接触与使用习惯、新媒体素养水平以及村落文化传播现状与需求等要点,回收数据采用SPSS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差异性分析与相关性分析。同时,对8位村民、3位非遗传承人及2位地方文化工作者进行深度访谈,围绕村落文化传承、新媒体融入状况等方面展开,每段访谈约25分钟,全程录音并转录为文本资料,形成访谈实录,对其进行编码分析,提炼核心观点。运用上述问卷调查、访谈及现场观察等混合研究方法,综合分析得出:较多村落出现文化认同缺失导致村民参与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缺位、村落文化传播中新媒体素养不足及融入不够造成传播单一低效的问题,徽州传统村落文化传承创新发展中的内生动力不足,文化基因的延续与传递令人担忧,相关问题亟须关注。

(一)现代化冲击下的徽州传统村落文化认同危机

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人口跨区域流动等因素冲击着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使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熟人社会形态、“人情”“面子”等观念均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形塑了我国农村的新面貌和新常态^[12]。同时,经济大潮中部分强势的外来文化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广泛渗透,对徽州本土文化形成强烈冲击。在全球化传播语境下,文化同质化现象日益凸显,不同地域文化特色在媒介传播的趋同性影响下逐渐模糊,面临被消解的风险。入户访谈中,黟县宏村一位63岁的受访者直言:“这些老房子、老规矩是祖上传下来的没错,但现在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这些东西跟他们生活没啥关系。”另一位返乡创业的青年村民则表示:“游客喜欢拍照,但他们不了解这些祠堂和牌坊背后的文化。不过我们自己也讲不太清楚”。可见,徽州传统村落留守村民的生活模式、观念体系以及价值取向正经历着深刻变革。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迅速转型,淡化了村落与村民之间基于地缘与血缘所构建的情感联结,降低了村民对村落的身份认同与归属感。认同作为“在社会情境中,个体对其他个体或群体的意向方式、态度观念、价值标准等,经由模仿内化,而使其本人与他人或团体趋于一致的心理历程”^[13],是文化保护传承的前提,只有在对地域文化充分认同的基础上,形成文化“认识共同体”,感受到其文化精神内涵与魅力,才会产生自觉的文化追求,进而萌发保护传承的原动力。在现代化进

程加速的背景下,徽州传统村落的村民在多元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中,对传统文化的意蕴内涵不再清晰,认识欠缺统一,逐渐丧失对本土文化的深度认同与文化自信。徽州传统村落文化在大众传播的文化洪流中被边缘化,其独特的传播符号与文化内涵难以在新的传播生态中有效传承与扩散,进而威胁到文化生态的稳定与传承。

(二)文化持有者的新媒体素养不足

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的文化持有者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村民,作为传统村落文化的参与者和实践者,“他们用自己的眼睛观察本村每天的日常生活,又用自己的语言叙述本村发生的大事小情”^[14],在文化传承的传播链条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他们犹如文化传播的“信使”,承担着对徽州传统村落文化进行编码、传递,赋予其鲜活生命力的重要使命。然而,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村落中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就业创业,造成“空心村”“空壳村”现象。在传统村落空心化的同时,传统文化也难以保全,传统文化的保存与传承也不得不囿于空心化之中^[15]。实地走访发现,目前徽州乡村留守的文化持有者的年龄断层问题较为突出,呈现“原住民老幼化”^[16]特征,该群体受教育年限不足、知识结构单一、新媒体领域知识匮乏,特别是在媒体信息获取、文化内容创造和社会参与表达等方面,相关意识和知识储备严重不足。当前,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临,各类移动媒体、智能媒体等新兴媒介已成为文化传播的主要阵地,但由于文化持有者的新媒体素养不足,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播在媒介选用上显得极为滞后与低效。作为文化传播“终端”的受众者,长期缺乏多样化、高质量传统村落文化传播产品的滋养,对其文化内涵与价值的认知与理解也会变得有限,如此反复使得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的困境。

(三)村落文化媒体传播的贫乏与局限

时下,层出不穷的智能新媒体给文化传播带来从内容到形式的巨大变革,加速推进传播生态的演进。但令人遗憾的是,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播未能充分把握这一时代机遇,推动自身的传承与创新。对照拉斯韦尔传播过程的“5W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对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的深层次价值和内涵认知不够,缺乏对徽州文化元素的现代解读和创新表达,众多具有文化价值的元素隐匿于大众视野之外,未能借助新媒体手段转化为具有传播活力与文化感染力的内容素材,导致传播终端对这一珍贵本土文化知之甚少。在传播渠道上,线上渠道开发不足,仍主

要依赖传统的实地参观、导游讲解等方式,单向的信息传递无法构建起传受双方的有效互动与反馈机制。从传播形式方面来看,站在传播受众视角,其传播形式流于表面和单一,缺乏互动性、体验感和创新性;系统化、矩阵化的新媒体传播平台建设严重不足,难以契合年轻群体的信息接收偏好与传播参与诉求。

三、新媒体时代徽州传统村落文化传承的破局路径

(一)保护徽州文脉,共筑文化认同

一是打造徽州传统文化特色“民俗村”,发挥示范引领作用。2025年7月1日起施行的《安徽省传统村落保护传承利用条例》提出:“鼓励原住村(居)民在原址居住,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利用、当地特色产业的生产经营等相关活动,促进村落原有形态、生活方式的延续传承”。今后,赣皖两地相关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强化政府的这一主导角色,发挥好财政支持的资金效益,选取若干基础条件较好、文化认同度较高的古徽州村落作为示范重点打造,引领形成更适宜的徽州传统村落文化传承生态环境。徽州传统文化特色“民俗村”的打造应围绕其文化核心播布区,选择适合村落,稳步开发。在维护、整饬部分徽州传统民居的同时,引导当地村民穿着徽州传统服饰日常生活,努力保有村落的原生态性,吸引游客前来进行融入性的文化体验。要紧密结合乡村振兴、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政策引导,不断拓展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的播布范围。同时,政府主导并非简单地制定政策、下拨款项,更要关注政策执行中的实际情况,考量资金的使用去向与效益。田野调查发现,目前绝大多数徽州传统村落文化核心保护区在道路修建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工作尚可,但部分代表性民居、祠堂等特色建筑的实际开发利用率仍然不高,或存在对传统文化过度包装、巧立名目的商业化现象。对此,相关部门应加强实地调研,在已出台《安徽省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2020)、《江西省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2019)等法规的基础上,联合制定完善徽州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专项管理细则,切实解决当前保护与开发中的现实问题。

二是充分发挥新媒体传播价值共筑认同。徽州文化所在的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文化机构和传媒单位,应发挥主导作用,通过搭建公共新媒体平台,如徽州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持续发布徽州传统村落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相关内容。如叙述徽州传统村落的形成过程、历史文化脉络,展现民俗风情和民间技艺;策划徽州传统村落

技艺系列直播活动,沉浸式体验村落的日常百态、节日庆典和手工艺制作;举办“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知识竞赛”“徽州传统村落文化征文”等群众性活动。同时,通过农家书屋、社区(村居)组织、文化场馆等多种渠道,采取集中宣讲、培训、非遗传承人传习等形式,强化本土居民对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的身份认同与价值归属,使其从文化传播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与传播者。为进一步激活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的内生传播动力,还应着力培育本土村民的数字媒介素养,帮助其掌握新媒体视频内容创作、传播等基本技能。面对面辅导村民以其亲身经历与独特视角讲述村落故事,展示村落文化习俗的丰富内涵与深厚底蕴,增强村落文化在多元传播语境中的感染力与吸引力,重塑传统村落文化自信。如利用智能手机拍摄记录村落传统节日的筹备与庆祝过程,剪辑制作成短视频在新媒体平台分享,以质朴真实的情感表达与浓郁的乡土气息吸引更多受众关注村落文化,引发情感共鸣,推动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的新媒体传播生态的构建。

(二) 政校协同赋能,延续文化基因

徽州传统村落文化所在地相关政府部门、教育机构应致力于这一珍贵文化遗产的传承延续,发挥政校协同的效用,构建长效化文化传承机制。《安徽省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明确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整合文化、教育等多方资源,推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纳入当地国民教育体系,编写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普及辅导读本,在区域内的中小学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乡土课程,开展徽州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活动”。放眼国际,在此方面也有可资借鉴的经验。如韩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制定了专门的规章制度,要求中小學生到“民俗村”学习和体验生活,并将这一经历纳入中小学教育体系。通过在“民俗村”中收集、保存、展示本国民族、民俗资料和文化遗产以及体验传统韩国民族民间生活,也进一步强化了年轻人弘扬优秀文化、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17]。

基于上述,首先,徽州传统村落文化播布区的地方政府应充分认识徽州传统村落文化推广的重要意义,发挥教育培养人才的作用,在基础教育阶段开发徽州传统村落文化校本课程,如“徽州文化导览课”“徽州非遗体验课”等,融入实地考察、情景模拟等实效学习方式,让学生充分感受徽州传统村落的文化美学;在中高职院校中开设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相关公共选修课,鼓励学生成立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相关艺术社团、共建校地合作“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研习基地”。其

次,教育、文化相关部门应通过财政保障或广泛筹措社会资金,设立“徽州传统村落文化保护发展基金”,用于支持学校课程开发、文化活动组织、非遗技艺传承等项目;精心选择切入点与报道方式,选准选优媒体平台,对徽州传统村落的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人适度包装宣传,放大其“明星效应”。此外,还应注意加强学生新媒体素养的培育,在计算机通识教育课程中增设短视频创作、直播脚本设计、跨平台传播策略等板块,鼓励学生运营徽州村落文化短视频账号、开发徽州文化主题IP、制作微纪录片等,培养用新媒体知识转译传统文化的能力。通过上述广泛、高频的日常化接触,让年轻一代沉浸于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的习得氛围,更好地实现徽州传统村落文化优质基因的活体传承,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

(三) 传承徽州精神,协同联动创新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能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单独存在,它总是需要通过相应的物质载体得以呈现,然而,我们更要关注的并非这一遗产的物质层面,而是隐含在物质层面之后的宝贵的精神内涵和历史传统^[18]。徽州传统村落文化中蕴含着的独特精神内涵,在时代的变迁下本质始终不变,但在不同时代被赋予了不同的诠释。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的内涵表达不应再拘泥于之前的农耕文明特质,应不断融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推陈出新,将徽州传统村落文化与时代使命相结合,迸发出属于新时代的智慧。

一是实施徽州传统村落文化与影视、动漫等媒介衍生产业的联动创新。学习央视大型文化节目如《记住乡愁》《村庄故事》等的运营模式。通过广泛协同,推出以徽州传统村落文化为主题或线索的综艺节目,吸引新媒介环境下受众尤其是年轻受众的关注与参与。如央视综艺频道2021年11月播出的《欢乐城市派》节目之“宝藏黄山”,通过时尚的综艺形式融合新媒体传播,不仅在电视荧屏亮相,更在抖音、微博、小红书及微信视频号等多个平台引发关注,收获了较高的网络传播流量。节目探寻藏在黄山市屯溪区黎阳老街“黎阳in巷”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徽州漆器、竹雕,以及徽味毛豆腐、臭鳃鱼等,全方位展现了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的丰富和多元,加深了公众对徽州文化的认识和兴趣。今后,应系统谋划、协同攻关,争取更多在国家级媒体“出圈”的机会。此外,还可与动漫产业联动,创作富含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特色的漫画作品,或设计创作蕴含徽州传统村落文化元素的文创玩偶,研发上市精巧的相关艺术衍生品,并开通线上直播售卖渠道,结合线下旅

游场景进行销售,在实现文化活态传承的同时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延长徽州传统村落文化传承、发展的产业化链条。

二是开展徽州传统村落文化和旅游、康养等产业的协同创新。通过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建议筹建徽州传统村落文化主题公园。主题公园是为了满足旅游者多样化休闲娱乐需求与选择而建造的一种具有创意性游园线索和策划性活动方式的现代旅游目的地形态^[19],未来的徽州传统村落文化主题公园建设,可开发更多以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特色为主题、内容的游玩设施,并开通线上 APP 或小程序,精心设计线上徽州传统村落文化景点游玩攻略和相关定制化、个性化服务。还可在旅游目的地酒店、康养机构开辟具有徽州传统村落文化韵味的住宿区或休息区,设置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体验环节,搭设可感知的传统村落文化交互场景,使游客身临其境,深化其在文化记忆性、象征性和审美性三个维度上的体验。

(四) 打造新媒体矩阵,搭建数据平台

一是构建徽州传统村落文化全媒体数字传播网络。首先,在充分把握不同新媒体媒介属性的基础上,放大媒介融合的优势,整合互联网、移动通信、社交网络平台等多元数字渠道,开发徽州传统村落文化旅游主题 App,创设云展览、云演艺、云直播等数字化场景,实现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构建“数字全媒”徽州传统村落文化推广体系。其次,积极运用 VR、AR 以及数字成像和三维立体技术,构建动态交互且立体模拟的文化传播情境。2023 年 5 月,位于黄山市歙县的“徽州古城”景区推出实景沉浸式 AR 剧本游《徽州画梦录》,将歙砚文化、徽州画派、鱼灯等徽州文化元素融入游戏中。游客通过智能手机参与游戏,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深刻体会到徽州艺术的深邃内涵和独特精神。后续,应进一步开发更多融入徽州传统村落元素的移动媒体、智能媒体互动文化产品或项目,并不断扩展其应用场景。再次,线下协同发力,在徽州乃至更多地区的博物馆、文化馆、展览馆、城乡文化宣传栏等公共文化机构和场所,举办以徽州传统村落文化为主题、融入新媒科技的特色展览、非遗传承活动,使更多的人有机会感受、认知这一文化瑰宝。

二是推动徽州传统村落文化艺术数据库建设。将分散于徽州各地村落的多元文化信息资源,加以分类整理,打造融合现代科技的徽州传统村落文化信息存储与交互平台,吸引更多人群尤其是青少年对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的了解与探索。在数据库的架构设计上,运用数字化采集技术全面收录徽州传统村落的多维度信息,涵盖村落的历史沿革、建筑风

貌、民俗风情、传统技艺、家族谱系等丰富内容。通过标准化的数据录入规范与分类体系,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与可检索性。在数据库日常维护、更新中,借助物联网、大数据分析等前沿技术手段,实现库内数据的实时校准与动态监测。例如,可结合徽州传统村落相关古建筑修缮工程的实施,利用传感器实时采集建筑结构、材质变化等数据,并及时上传至数据库,以便文化保护工作者、学者以及公众能够及时了解修缮进展与建筑状态变化。其具体过程,可采用 3D 可视化呈现方式或在线直播形式,将原本抽象、繁杂的数据信息转化为直观生动、易于理解的视觉内容,激发公众对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的兴趣与探索欲望。

四、结语

通过上述研究,基于问卷数据与访谈结果发现,新媒体时代徽州传统村落文化所面临的困境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呈现出相互影响的特征:村民对本土文化认同感的下降削弱了其参与传承的内在动力,新媒体素养不足又进一步限制了其文化表达与扩散能力,加之在传播内容、渠道、形式等方面的贫乏与局限,最终层层递进,导致徽州传统村落文化在当前新媒体传播环境中处于边缘化境地。为破解上述困境,提出共筑文化认同、政校协同赋能、协同联动创新、打造新媒体矩阵等路径。其中,文化认同是传承的核心基础,政校协同是人才与机制保障,产业协同联动为活力源泉,搭建新媒体矩阵则为实施载体。通过多主体、多维度、多渠道的协同发力,共同推动徽州传统村落文化在新媒体时代重焕光彩。

随着社会变迁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发展变化,民族传统村落面临着原有生产空间、公共生活空间、文化信仰空间等逐渐萎缩,承载传统民族文化和集体记忆的公共空间逐渐消失等现实问题^[20]。究其原因,是生产方式、生活习俗、思维观念等多方面作用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传统村落文化自身造血能力不足、文化认同缺失、不能很好适应当前的外部发展环境,是重要原因之一。处在多元媒体交叉融合的时代路口,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弘扬既面临新的困境,也迎来新的机遇,这对传承工作提出更高要求。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推广工作应重在树立并增强文化持有者、传习者的文化自信,帮助他们保持文化生命力;以接受对象的立场、视角、话语体系,融入性地延续文化基因。文化传承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的“深入人心”需要足够的时间。只要各方坚定信念信心,遵循文化发展规律,积极探索实践,善用新媒体传播优势,定将不断开拓徽州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传承更广阔的空间,为我国

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提供徽州样本与实践经验。

探究与保护:以徽州区唐模村为例[J]. 华中建筑,2022 (12):164-168.

[11] 顾大治,孟庆贺,吴杨.“乡愁”视角下徽州传统村落文化旅游的意象认知研究:以绩溪县龙川村为例[J]. 古建园林技术,2022(6):67-70.

[12] 杨华. 陌生的熟人:理解 21 世纪乡土中国[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13] 车文博. 弗洛伊德主义原理选辑[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14] 何明. 文化持有者的“单音位”文化撰写模式:“村民日志”的民族志实验意义[J]. 民族研究,2006(5):51-60.

[15] 王志芳. 切勿让传统村落失去文化生命力[J]. 人民论坛,2019(8):138-139.

[16] 蒲娇,马怡霄.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十年(2013—2023)研究综述:概念确认、学科研究与策略深探[J]. 民间文化论坛,2024(5):23-39.

[17] 莫代山. 韩国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的实践与经验[J]. 中华文化论坛,2015(4):34-38.

[18] 刘魁立. 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 河南社会科学,2007(1):25-34.

[19] 陈才. 区域经济地理学[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20] 姜乃煊,候兆铭. 基于文化记忆的民族村落公共空间重构:以石佛寺锡伯族村为例[J]. 重庆建筑,2020(7):13-17.

(责任编辑 林川)

参考文献: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文化部 国家文物局 财政部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EB/OL]. (2012-04-16)[2025-11-16]. <http://dmctv.cn/zxShow.aspx?id=119>.

[2] 安徽 470 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EB/OL]. (2023-04-12)[2025-11-19]. <http://ah.people.com.cn/GB/n2/2023/0412/c358428-40372654.html>.

[3] 刘沛林. 徽州古村落的特点及其保护性开发[J]. 衡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1997(1):86-91.

[4] 李早,成庚,汪强等. 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目标下徽州传统村落数字化感知技术研究[J]. 自然资源学报,2025(2):402-422.

[5] 路幸福. 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生态变迁、保护与发展模式研究[D]. 安徽师范大学,2016.

[6] 朱焕武,贺海敏,刘瀚. 乡村振兴视角下古徽州传统村落文化保护和传承路径[J]. 乡村科技,2020(1):61-62.

[7] 贾芳芳. 数字视觉文化语境下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的创新利用[J]. 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21(6):86-90.

[8] 贾芳芳. 大数据时代徽州传统村落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水平提升研究[J]. 信阳农林学院学报,2019(1):72-76.

[9] 顾大治,孟庆贺,洪百舸. 解构场景:诗词中的徽州传统村落文化景观[J]. 古建园林技术,2023(2):115-118.

[10] 刘欣慰,郑志元,汤铭,等. 徽州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特征

Dilemma and Breakthrough: The Inheritance of Huizhou
Traditional Village Culture in the New Media Era
XU Zhenbo^{1,2}, ZENG Xiaomin²

(1.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Education, Bengbu University, Bengbu, Anhui 233030, China; 2.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Anhui 235000, China)

Abstract: As the region with the largest and most intact preservation area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China, Huizhou traditional villages hold a significant position in the overall protec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At present, the work of inheriting and protecting Huizhou traditional village culture ha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However, with the advent of the new media era, challenges such as a crisis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villages, insufficient new media literacy among cultural bearers, and the inadequacy and limitations in the media dissemination of village culture have emerged. Through fieldwork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ypical Huizhou traditional villages including Hongcun and Xidi in Yi County, Huangshan City, and Longchuan Village in Jixi County, Xuancheng City, Anhui Province. Based on the collected data and interviews, the study proposes strategies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in the new media era, including: protecting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izhou and jointly fostering cultural identity; promoting government-school collaboration to sustain cultural genes; inheriting the Huizhou spirit through coordinated and innovative approaches; and building a new media matrix and establishing a data platform. The findings are intende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the safeguarding and transmiss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Huizhou region, as well as for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involved in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village culture.

Keywords: Huizhou traditional village culture; New media; Inheritance; Breakthrough path

传统吉祥纹样数智化生成与应用优化进路

杨杰, 潘媛媛

(安徽工业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安徽 马鞍山 243032)

摘要:针对数智化技术革新与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传统吉祥纹样传承应用中出现的文化符号失语、技术与文化适配断层、跨媒介创新不足等现实困境,弥补 AIGC 技术生成与纹样内涵之间的文化断层,探索传统吉祥纹样数智化创新的可行路径。首先通过文献梳理,理清传统吉祥纹样的演进历程、核心特性、应用场景与当代创新环境,分析 AIGC 技术的发展趋向及其与传统吉祥纹样融合创新的可行性;面对传统吉祥纹样数智化创新的核心隐忧与挑战,从文化解构、人机协同、规范建构三个维度,提出数智化生成与应用的优化进路。在现代设计场景的实践应用与验证下,研究中提出的关键词驱动机制与人机协同创作模式,可有效实现传统吉祥纹样文化内涵的精准表达,提升其在现代设计中的视觉呈现效果与跨场景传播效率。研究中构建的数智化创新路径,可实现传统吉祥纹样文化内核与现代化创新设计的协同平衡,为传统视觉文化符号的数智化传承与跨媒介创新提供了可落地的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中国传统吉祥纹样;AIGC 技术;关键词驱动机制;人机协同;数智化创新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2.014

中图分类号:J5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2-0083-08

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建萍在 2026 年全国两会中提出“建议实施非遗数智化赋能行动,重点支持 AI 辅助纹样生成、深化数字赋能与人才培育双轮驱动,培育既懂“老手艺”又通“新算法”的非遗传承人”。数智化创新已经成为当下的热门议题与发展趋势,本文以传统吉祥纹样为核心研究对象,聚焦 AIGC 技术语境下传统吉祥纹样的数智化创新路径研究,意在破解当前 AIGC 创新转换过程中重技术形式、轻文化内核的困境。针对传统吉祥纹样面临的语义理解偏差、文化转译不足、人机协同逻辑模糊、创作规范与版权体系缺失等核心困境,本文将梳理其发展脉络与应用场

景,分析技术赋能的机遇与挑战,解构数智化创作的核心障碍,最终从文化解构、人机协同、规范搭建三个维度提出优化进路,为传统吉祥纹样数智化传承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方案。

二、传统吉祥纹样与 AIGC 融合创新分析

(一)传统吉祥纹样的特性与应用场景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种艺术形式,传统吉祥纹样包含了中国民众的生活习俗、美学追求、文化特质及其对美好生活的精神向往,传统吉祥纹样融合了各个时代不同的文化特色,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原始社会吉祥纹样的艺术特征多以抽象的几何符号和简化的动物形象为主,造型质朴粗犷,线条简洁,通常装饰于陶器、岩石上,如原始岩画中的狩猎图和舞蹈图,原始彩陶上的人面纹、鱼纹、几何纹等^[1]。春秋战国时期,纹样题材转向现实生活,动物纹样摆脱程序化束缚,出现灵动多样的蟠螭纹、蟠

收稿日期:2025-12-30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科规划项目“数字文旅赋能芍陂水利遗产活化传承与推广路径研究”(AHSKY2025D135)

作者简介:杨杰(1982—),男,安徽舒城人,安徽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数字艺术与民俗文化。

虺纹等。秦汉时期受宗教神学影响,吉祥纹样与祈求祥瑞直接挂钩,风格雄浑大气,融合了写实与夸张手法;云气纹、四神纹盛行。隋唐时期社会经济跃升,纹样题材从神秘动物转向花卉草木、祥禽瑞兽,卷草纹、宝相花纹等流行。宋元以花禽纹为主,风格典雅含蓄、注重意境营造。明清是传统吉祥纹样鼎盛期,题材最广,确立“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核心创作原则。

通览传统吉祥纹样的演进历程,其从原始粗犷造型发展为以象征、谐音、隐喻为核心手法,融合自然物象与人文理想的视觉体系,形成四大核心特性:一是核心的象征性与寓意性,将吉祥祝愿具象为可视化文化符号;二是文化传承性与民族包容性,承载民族文化基因,兼具地域与民族特色变体;三是意象化艺术装饰性,以“以形写神”为准则,重气韵而非写实;四是社会功能性与心理承载性,是大众美好祈愿的视觉外化。这些特性既是纹样的传承根基,也是其当代创新必须坚守的文化内核。如八达晕纹的放射性脉络隐喻《道德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家思想,中心柿蒂纹象征“气”的永续循环,其光影晕染效应表达“法力无边”之意,为织物在宗教场景下的应用,赋予其神圣性^[2]。传统吉祥纹样还会用到取象的方法对审美创造和审美经验进行直观概括与形象喻示,从而构成具象化的图式符号^[3]。

传统吉祥纹样的艺术特性,使其可以适应丰富的应用场景,并以不同工艺形态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表现形式。剪纸工艺的吉祥纹样造型简洁夸张,以鱼纹为例,通常简化轮廓、强化特征以适配剪刻工艺,传递“连年有余”的吉祥寓意;陶瓷工艺的纹样精致细腻、规整对称,契合器物实用与观赏兼具的属性;漆家具工艺的纹样与家具结构功能紧密结合,兼顾装饰性与实用性;桃花坞年画经典的“一团和气”纹,已大量应用于春节文创、品牌联名等领域,成为桃花坞年画数字化创新的核心IP符号。传统吉祥纹样的生命力核心源于其文化内涵的开发与创新,在当代文化语境下,部分核心寓意完整、视觉体系成熟、传承脉络清晰的经典吉祥纹样,凭借文化普适性,在文创开发、数字传播等多元场景实现广泛应用与活态传承。

(二) 传统吉祥纹样的创新环境分析

1. 文化创新与文化消费需要传统文化赋予新的内涵

随着时代发展,文化创新不可局限于传统形式与内容,需深挖传统文化深层价值,结合当下社会需求、

大众思维与审美注入新内涵。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根基,原有的呈现方式难以契合当代人认知与情感诉求,唯有创造性赋新,方能焕发活力、赋能文化创新。

消费层面,消费者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日趋多元、个性化,不再仅满足于物质层面消费,更追求精神层面的满足与文化内涵的体验。传统文化若要在消费市场获得广泛认可,必须适应市场变化,以新内涵满足消费者的文化价值追求。这种“新”并非否定传统内核,现代设计结合产品定位与目标群体审美需求,对传统吉祥纹样进行变形、重构与色彩调整,在保留其传统寓意的基础上融入适配当代的创新点,使其既延续文化基因,又真正融入现代生活。

2. 新工艺与新语态需要传统吉祥纹样呈现新的表达形态

技术进步推动艺术表现形式走向多元化,新工艺、新语态层出不穷,生产效率与精细度均实现大幅提升。但诸多新兴IP与创意产品往往昙花一现,暴露出部分当代产品过度追求形式创新、缺乏文化深度的核心问题。现代工艺虽可精准复刻纹样外在形态,却难以复刻其承载的历史底蕴与文化内涵,需为新工艺注入传统文化内核,让科技成为文化叙事的载体。

数字化创新设计已在多个实践领域产生影响,如武当山风景区结合NFT数字藏品,成功提升了文化版权保护与转化效率,推进武当山旅游数字化转型^[4]。传统艺术石湾陶艺,借助3D打印技术实现创新,不仅精准还原设计细节,还能增加艺术家的创作空间^[5]。AIGC技术可产出风格多元的创意作品,与传统艺术结合,既能丰富艺术表现形式、挖掘传统吉祥纹样的文化内涵,也能提升设计效率与精度,为传统艺术传承创新探索全新路径。

3. AIGC的技术应用需要传统设计方式遵循新的转译范式

传统设计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的模式与规范,面对AIGC带来的冲击,需遵循新的转译规范以适配变革,将其文化内涵、符号意义、美学规律转化为算法可理解、运用的形式,精准传递其本质与韵味。

具体来说,传统设计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符号意义和工艺逻辑,而AIGC技术虽能快速生成大量视觉方案,却容易只模仿传统设计的表面形式,忽略其背后的文化内核。因此,传统设计方式只有遵循新的转译范式,才能在这一变革中实现创新与发展。通过将传统设计的文化内涵、技艺精髓和情感表达有效地转译到AIGC生成的设计中,使最后的作品

不仅能够保留传统设计的魅力,还能借助 AIGC 的强大能力,创造出更具价值和文化深度的设计作品。

(三)AIGC 技术的发展趋向与内容生成

AIGC 即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是人工智能 (AI) 技术体系中,专门面向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内容创作场景的生成式 AI 分支,与本文研究的传统纹样数智化生成方向高度契合。2022 年 OpenAI 推出 ChatGPT 后,AIGC 技术凭借强大的创意能力与低门槛特性快速普及,国内外科技企业陆续推出自研 AIGC 创作工具,国外代表有 Bard、Grok-1.5,国内包括文心一言、豆包、DeepSeek-R1 等。伴随多模态大模型发

展,AIGC 应用场景从文本生成拓展至图像、视频、动画等复杂创作任务,大幅提升创作效率、降低创作门槛,激发了大众创作热情。

在传统纹样的数智化生成中,AIGC 主要由 AI 辅助人类进行内容创作,特点是生产效率更高,可以定制风格,满足个性化需求,同时拥有无限规模的创作灵感^[6]。其凭借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为纹样创新与产业化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不仅大幅缩短设计周期、降低时间成本,还能让设计者通过多轮提示词优化生成效果;AIGC 模型可基于设计师的反馈持续优化生成内容,最终实现设计目标(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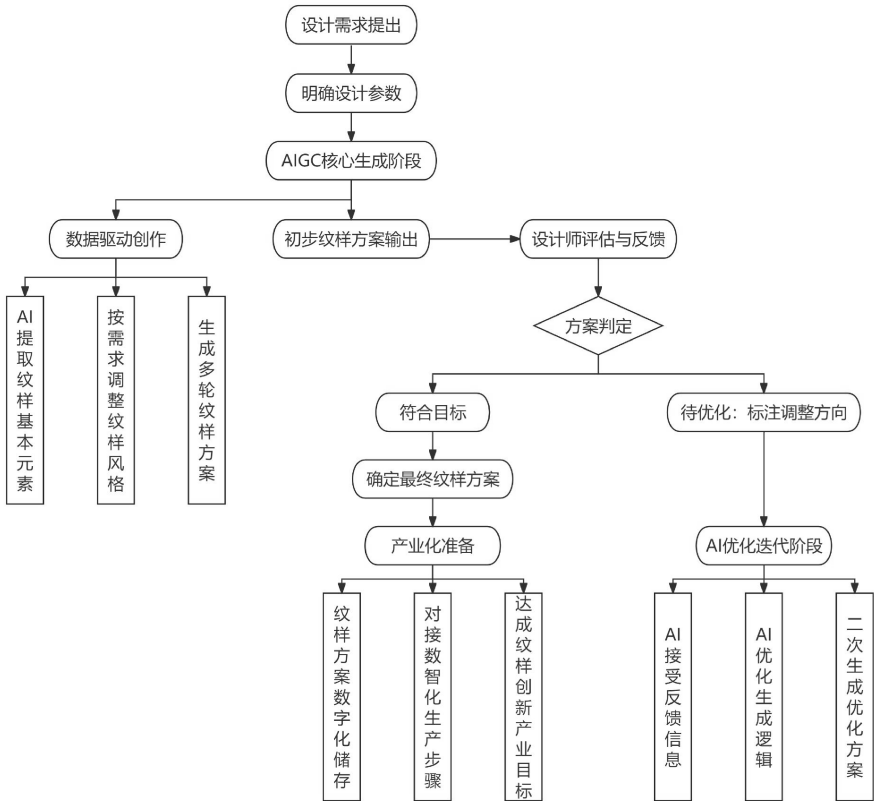


图 1 AI 生成与优化流程图(图片来源:作者自制)

纵观 AIGC 技术的发展历程,其早期演进始终以技术迭代为核心导向,行业重心多集中于模型算力提升、生成精度优化等技术层面的突破,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技术先行、内容后置”的发展惯性。但从文化内容生产的本质逻辑来看,技术始终是服务于内容表达与价值传递的工具载体,脱离了内容内核的技术迭代,最终大概率会失去可持续的应用价值与文化生命力;若一味追求技术参数的突破而忽视内容本身的品质把控与价值传递,不仅会导致 AIGC 生成内容出现同质化泛滥、文化语境丢失、内涵误读等共性问题,更会造成技术与实际应用场景的严重脱节。对于传统吉祥纹样这类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内核与民俗寓意的内容生产而言,过度的技术导向极易消解纹样的文化寓意、模糊其地域与工艺特征,使其沦为无文化内核的视觉符号堆砌。

三、传统吉祥纹样数智化创新面临的隐忧与挑战

(一)传统与现代审美的冲突与语义融合

传统吉祥纹样的表现形式与当代审美趋向之间往往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削弱了传统吉祥纹样对新的受众群体的吸引力,导致受众呈现固化趋势,此问题不但阻碍了传统吉祥纹样的有效传播,也制约了其进一步的创新发展。

同时,传统表现技法在适配现代生产条件与应

用场景时存在明显局限。如蜀锦织造依赖纯手工操作,培养成熟工匠耗时长,且制作流程复杂、产能低,高昂的人力与时间成本难以满足现代工业化量产需求。传统手工艺品多侧重观赏性,功能性较单一,与现代需求更注重实用性的特点不匹配,部分传统技法也难以完全通过数字技术还原,比如年画“填丹”工艺里,朱砂颜料在宣纸上的渗透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工匠的人工经验,数字手段无法精准复刻。因此,如何实现传统吉祥纹样在数智化语境下的有效融合,成为当前有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目前广泛采用的 AIGC 数智化生成方法,创作底层逻辑主要由技术参数主导。这种技术为主的生成方式可能会带来两方面的缺憾:一方面,生成作品丧失了传统吉祥纹样固有的美学特质;另一方面,作品深层的文化意蕴与象征生命力也无法完全表现出来,画面内容死板,导致最后作品的效果显得奇怪、不协调。在 AI 生成内容导致风格趋同的背景下,我们需要重新解读传统吉祥寓意,使其更具个性化。鉴于此,推动 AIGC 生成模式由表层的“形态模仿”转向深层的“文化理解”,就显得尤为重要。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建立有效的“关键词驱动”与“人机协同”机制。通过精准构建蕴含文化语义的关键词体系,引导 AIGC 理解纹样的象征内涵,创作的过程以及结果都由设计师全程参与,才能生成既蕴含传统文化精髓又契合时代审美的作品,进而促进公众对传统吉祥纹样的理解、认同与喜爱。

(二) 语义理解偏差与技术表达局限

数智化工具通过高效的生成能力,能够显著辅助设计师在短时间内产出大量创意方案。这种功能有效地推动了传统吉祥纹样数据库的规模化建设,也增加了其在多元化场景中的应用方式,展现出巨大的实践潜力。然而,该技术在实际应用中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主要体现在 AIGC 对关键词的语义识别存在偏差,以及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存在技术性的局限。

此类不足清晰地展现出,“数智化生产”和“数智化创意”这两者在本质目标和实践路径上的根本区别。前者更偏向一种直接的生成模式,核心是追求技术效率,整个流程主要是靠着向 AIGC 系统输入相对基础的关键词指令直接得到结果。而后的立足点是对传统吉祥纹样深厚文化底蕴的深入理解。在这条路径里,设计师起着核心作用,他们不仅要仔细提炼和优化那些更具文化敏感性的关键词指令,更要在生成结果的基础上进行有创意的后期精加工和重构。这么做的核心目标就是在尊重和保留

传统纹样文化精髓的前提下探索 and 实现数智化工具在创新表达上的可能性,进而在厚重的文化历史积淀和前沿的数智化创意之间,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

因此,在传统吉祥纹样设计的数智化创新探索中,大致能区分出两种实践方向,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冲突:一条路径主要是靠数智化技术提高生产效率、扩大应用规模;另一条则更注重激发和实现那些更有人文与历史深度的创意表达。此两条路径侧重于不同的应用场景中,如在服装行业中更侧重于借助数智化技术提高生产的效率与规模,AI 技术能够通过深度挖掘和分析大量时尚数据,预测未来流行趋势,并且可以利用 AI 技术,使设计草图制作实现自动化,大幅提升设计效率,并激发更多创意灵感,而在类似于数字艺术展览作品的创作中,则更偏向于激发并实现更具人文与历史深度的创意生成与表达。部分数字艺术展中会用到数字化交互技术,此技术可以让观众与传统吉祥纹样进行互动,增强观众的参与感和体验感,使他们能更深入感受吉祥纹样的魅力。在此情景下,对于人文与历史深度的要求则会提高。

通过上述案例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传统吉祥纹样设计的数智化创新中,提高生产效率与规模以及实现人文与历史深度的创意表达这两个方向,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中发挥着各自独特的作用,共同推动着传统吉祥纹样在现代社会的传承与发展。

(三) 创作的艺术表达与创作主体的协同

在传统理念中,数智化创作模式更偏向“由设计师主导,机器仅执行”的模式,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这一模式正面临着许多复杂的挑战。

从设计师对 AIGC 的认知角度来说,不少设计师对 AIGC 技术的理解和掌握,其实仍然还有提升的空间。如有些设计师仅了解 AIGC 可以辅助生成图像,但并不清楚该怎么用准确的指令,让 AIGC 生成符合自己创作想法的传统吉祥纹样。在设计以传统吉祥纹样为基础的现代作品时,设计师可能希望 AIGC 生成的纹样既带有特定寓意、具有特定风格,又能符合现代审美需求。如对 AIGC 算法不熟悉,最后得到的结果往往风格差别很大,和预期相差较远,这就影响了传统吉祥纹样数智化创新的效率和质量。传统吉祥纹样与地域、民族、认知等诸多因素相结合,往往存在多种解读的可能。AIGC 算法在生成纹样时,更多是基于形式上的模仿与组合,对于文化内涵与情感进行深度融合并以独特的方式解读出来等方面的要求则较为困难。AIGC 可以生成无数

种形态各异的吉祥纹样形式,但这些形式往往缺乏内在的灵魂与情感意蕴。

因此,在创作主体中创作者与 AIGC 的权衡与协同过程中,一方面,设计师担心过度依赖 AIGC 会导致自身创作能力的退化。在传统的创作过程中,设计师通过长期的学习与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和独特的审美。而在数智化的创作环境里,如果过度依赖 AIGC 去做创意构思、图案生成这些关键步骤,设计师可能会慢慢丢掉独立思考和手工创作的能力。另一方面,关于创作过程中人和机器怎么合理分工,目前仍没有明确的模式。如果这层关系没有被处理好,很可能会导致创作过程中出现混乱,最后作品的质量也会受到影响。

在传统吉祥纹样数智化创新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正视人和机器在创作中的地位与存在的问题。只有解决好设计师对 AIGC 技术的认知与应用、提升 AIGC 的文化理解和表达能力,明确人与机器的协同模式等问题,才能实现传统吉祥纹样在数智时代的创新发展。

四、传统吉祥纹样数智化生成与应用的优化进路

(一)解构传统纹样,优化关键词驱动机制

优化关键词驱动,主要是从三个重要的角度对纹样展开细致拆解,转化为关键词传递给 AIGC,帮助 AIGC 更好地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

首先是视觉形态的维度,即感知层面。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关注纹样的外在视觉特点。如纹样的几何形状,不管是规则的圆、方,还是不规则的自由形态,不同形状给人的视觉感受是不同的。线条是流畅的曲线还是硬挺的直线,线条的风格也常常能决定纹样的整体调性。色彩方面,浓烈的配色和淡雅的色调,传递出的情感和氛围完全不一样。此外,纹样的构成同样重要:是对称的规整布局,还是不对称的灵活组合,这些都直接影响着纹样带给观赏者的整体视觉感受。抓住这些视觉形态上的要素,我们就能对纹样有直观的认识。

其次是符号隐喻维度,即阐释层面,核心是解读纹样视觉外形与文化寓意的关系,将抽象文化内涵

转化为 AIGC 可识别的标准化规则。以“牡丹纹”为例,它在传统文化中“富贵”的象征寓意,是在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代代传承形成的,需通过“外形特征——核心寓意”绑定的关键词体系确定内涵,经形意匹配后完成 AIGC 筛选,才能精准挖掘并传递纹样的文化寓意。

最后是精神观念维度,即信仰层面。该层面要求进一步探索符号背后的深层社会文化观念、信仰体系内涵。仍以“牡丹纹”举例,它不光象征着“富贵”,其中还有着“社会阶层的隐喻”。在古代,牡丹因为其高贵的形象,常被用在皇家或贵族的衣服、建筑装饰上,成了划分社会阶层的一种视觉标识,是当时社会等级制度以及人们对身份地位的追求和认同。由此深入研究,就能探索到传统文化里更核心的精神观念和信仰体系了。在当代设计语境中,精神内核转向民族文化自信、盛世繁荣的集体认同,完成了从阶级标识到大众文化精神载体的转型。在数智化创作中,需精准把握纹样精神内核时代的嬗变,以此作为生成内容文化准确性与时代适配性的重要标准。

通过这三个维度的系统拆解,我们能够为 AI 提供更全面、深入理解传统纹样丰富内涵的训练思路。再加上关键词驱动,能够精准有效地引导 AI,使其更好地运用到文化创新领域的各种场景里。以“暗八仙纹”为例(表 1),传统暗八仙纹是用葫芦、扇子等八仙法器组成的纹样,常出现在古典家具、祭祀用品上,现在日常用品里很少见,直接使用会面临场景受限等问题。按三个维度拆解的话,视觉上提取“简化法器轮廓、几何化重组”,符号隐喻保留“吉祥如意、祈福消灾、护佑平安”的核心,精神观念转化为“现代生活守护”,用于智能家居产品的 UI 设计或祈福类文创上,可以看到 AIGC 生成的新纹样脱离了传统祭祀的陈旧感,适配了当下对“美好生活”的精神需求。这种方法的核心价值是通过系统拆解吉祥纹样符号的深层隐喻,找到一条能够把文化内涵转化成可操作步骤的路径。其中最关键的点在于人机协作语义的动态调控体系的支撑。

表 1 暗八仙纹(葫芦纹)三维度关键词拆解指令集及设计实践应用

纹样原图	关键词 1 (视觉形态)	关键词 2 (符号隐喻)	关键词 3 (精神观念)	生成效果	应用场景 (祈福文创)
	简化为单葫芦圆润轮廓,几何化重组,构图对称,低饱和度配色	保留葫芦“福禄双全”“吉祥保佑”传统寓意	日常祈福主题,适用于祈福类文创的矢量图		

(图片来源:https://k.sina.cn/article_5776829712_p158536d1002701hlmd.html,作者自制)

为了让不同场景下的语义能动态适配,在前文提出的方法基础上,继续构建动态语境驱动的调控机制。设计师在不同应用场景里,输入对应的信息。比如在文创场景下,加重模型在符号层对“趣味性”“社交价值”的解读权重,以及语义层对“情感共鸣”相关符号隐喻的解读比重。在建筑场景中,则在语义层加重“空间叙事性”“仪式感”类的精神观念维度参数,作为生成时的约束条件;国际传播场景,则启动符号层和语义层的跨文化映射规则,找出并主动替换掉那些在特定文化里容易引起误会的符号元素——如蝙蝠、西方的数字 13 等等,替换成目标文化能接受的视觉符号和艺术表达。

通过这种“三级解析”和动态语境调控方式,实现基于深层文化解构的、语境感知的关键词驱动机制,确保在不同应用场景下文化内涵的精准表达与安全地传播。

(二) 重构互动逻辑,优化人机协同的创意方式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秉持“人本智能”的科技发展观尤为重要。这种发展观强调在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始终将人的价值、需求和创造力置于核心位置,同时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优势,实现人与技术的协同与进步。在此前提下,我们有必要打破传统理念中“人主导创意、机器仅做执行”这一根深蒂固的模式。

长久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创意是人类独有的,机器仅仅是执行人类指令的工具。然而,随着 AIGC 技术的迅猛发展,这种传统认知正面临挑战。如今,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和构建人与 AIGC 在创意产生过程中的协作关系与互动逻辑。这意味着设计师不能再仅仅把机器视作辅助工具,也应将其视为创意的共同参与者;设计师不再把机器仅当作助手,而是让人和机器成为创意的共同参与者:设计师提供灵感、价值观、文化内核,机器则通过数据学习、快速迭代、跨界联想等能力反哺创意,甚至提出设计师想不到的思路,最终形成一种设计师与智能工具共同协作的深度协作的融合创新模式。

此外,在不同的设计场景里,人和 AIGC 的角色也会随之改变。一些简单重复的设计工作,比如基础排版,AIGC 效率高且精准,能快速处理大量文字和图片,除能节省时间和人力外,以大数据为支撑的 AIGC 在诸多设计模板中,往往能在短时间生成更为美观与适配的版式或布局。如果遇到需要体现文化内涵、表达情感的设计场景,设计师的主导作用就更为重要。如设计一个要传达特定情感的品牌标识,设计师得深入理解品牌的价值观、目标受众的情感

需求,还有相关的文化背景,再通过细腻的创意表达,把这些元素都融入设计里,使作品真正能打动人。这种对文化内涵的精准把握,情感上的细腻表达的设计场景中,综合素养良好的设计师发挥主导作用就显得特别关键。

这一差异化人机角色分配逻辑,本质上推动了数智时代设计师的核心角色转型,也对从业者核心素养与设计教育体系的适配调整提出了前瞻性的要求。传统设计语境下,设计师的核心价值集中于创意与执行的全流程把控,AIGC 对基础重复性设计环节的高效替代,使得设计师从“视觉生产执行者”向“文化内核的把控者、创意方向的决策者、人机协同的架构者”的复合角色转型,核心价值从视觉形态的创作转向文化内涵的把控。适配传统纹样数智化创新需求的设计师,须具备传统纹样跨维度文化解读、人机协同创意统筹、文化内涵辨别把控与跨场景落地的核心素养。与之对应,设计教育也需完成前瞻性调整,需开设文化研究与数字技术融合的跨学科课程体系,弱化重复性技法训练,将教学重心转向文化研究、创意决策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创作观,为传统纹样数智化传承提供人才支撑。

(三) 规范创意语言,优化数智化流程与渠道

1. 创作内容的规范化

创作内容的规范,核心要求设计师必须成为 AIGC 协同创作的第一责任人,对创作全流程的文化内涵、边界、合规要求做到心中有数,绝不能将文化把关的责任完全交给算法,必须在协同 AIGC 创作前,深度介入文化规则的前置预设环节,通过严谨的纹样内涵考察与创新转化研究,提前构建起不可逾越的文化底线与合规框架。

例如在传统吉祥语义层面,“鹤纹”承载的长寿祥瑞核心寓意,必须严格规避“断颈”“残翅”等不符合民俗吉祥规制的形式,杜绝负面隐喻出现;在宗教符号层面,佛教“卍字纹”必须严格遵循右旋的规范形制,彻底规避逆旋符号的混淆风险,守住宗教符号的历史与伦理底线;在民俗情感主题的纹样创作中,如“鸳鸯戏水纹”必须恪守双禽依偎的成对空间构图,规避单体构图造成的吉祥语义消解与歧义,确保符号寓意准确传递。

设计师在筑牢自身对传统纹样规范的认知,做到对创作边界心中有数的时候,更要将这些隐性的文化规则、民俗禁忌转化为算法可识别、可执行的标准化约束,明确符号的应用范围与场景边界,为创新形式划定安全创作区域,从生成源头规避文化误读

与合规风险,保障 AIGC 生成内容的文化真实性、语义准确性与应用合法性。

2. 生成策略的规范化

生成策略的规范化,核心在于为传统吉祥纹样这类强文化属性内容的创意生成过程,建立统一、可复用、可校验的规则与标准化流程。这种规范不是对创意的束缚,而是为文化类内容的 AIGC 创作划定安全边界、搭建高效路径,核心价值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大幅降低创作门槛,让非专业用户也能完成符合文化规制的纹样创作,便于技术大规模应用与推广;二是通过明确的数据处理标准、模型优化路径与指令规范,大幅简化模型训练与内容生成流程,减少反复试错的时间与人力成本;三是从生成源头锁定文化内核,规避传统纹样创作中形意脱节与文化误读的核心问题。

例如豆包的 AI 生图功能,其发现页设置了大量标准化创作模板,用户点击例图右下方的“做同款”按钮,对话框会自动填充该例图对应的风格、内容、构图、色彩等标准化关键词,用户仅需按需微调关键词,无需从零搭建创作逻辑与指令框架。将这套逻辑延伸至传统吉祥纹样创作中,便可把纹样的形意绑定规则、文化禁忌、形制规范全部固化为标准化模板,既能让非专业用户快速生成符合传统规制的吉祥纹样,也避免了开发者重复训练基础模型。

这种规范化的核心本质,是把设计师、非遗研究者的专业经验,转化为算法可识别、大众可共享的技术语言,让传统纹样的创意生产从专业圈层的创作,走向兼顾标准化与个性化的规模化创作,在提升创作效率的同时,牢牢守住传统吉祥纹样的文化根基。

3. 版权规范与伦理传播问题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AI 在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其传播渠道中的版权问题日益凸显,尤其是 AIGC 创作的艺术作品。AIGC 驱动下的内容涵盖文章、图片、音频、视频、动画等多种内容形式,代表着 AI 技术发展的新趋势^[7]。而这一创作模式的革新,也直接冲击了传统著作权体系下的版权规则。传统视觉设计作品的版权归属、侵权认定均有清晰的边界,核心围绕人类创作者的成果展开;但 AIGC 生成的图形图像,其创作过程涉及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合规性、提示词输入者的贡献界定、模型开发方的权责划分等多重复杂问题。生成内容能否获得著作权保护、版权归属如何划分、商业使用中的侵权责任如何认定,均形成了与传统创作模式截然不同的全新版权争议。在我国,面对 AIGC 技术兴起而产生的版权保护问题尚处于发展的初期,仍

存在着诸多需要处理的问题。

目前伦理传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内容质量和真实性问题、隐私和个人信息泄露风险,前者有较大的概率会对用户造成误导,后者则会涉及用户的安全问题。在使用 AIGC 进行内容生成和传播时,会涉及大量个人信息和隐私数据,这些信息可能包含用户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地址、社交媒体账号、浏览记录、消费习惯等^[8]。

除上述风险外,针对传统吉祥纹样这一特殊创作对象,AIGC 的规模化应用还产生了专属的版权规制难题,现有的学界观点与通用法律规定,很难完全适配这类纹样创作的合规需求。传统吉祥纹样的版权归属有着清晰的区分:已超出著作权保护期的暗八仙纹、缠枝莲纹等经典纹样,属于全社会可无偿使用的公共文化资源;但当代非遗传承人、设计师基于传统纹样完成的、具有独创性表达的二次创新作品,是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严格保护的原创成果。可当前多数 AIGC 大模型在训练环节,并未对这两类内容做合规区分,未经授权就大量抓取受保护的原创纹样、专属设计稿用于模型训练,既未向原创者支付报酬,也未标注作品来源,这直接侵害了非遗传承人与设计师的合法著作权。

学界普遍认为 AI 作品是指由人工智能算法独立创作或参与创作的作品^[9]。这一观点的核心是为通用场景下的 AI 生成内容划定了著作权保护的范围,但其默认的“以独创性为核心的著作权认定规则”,在传统吉祥纹样的创作中难以完全适用。传统吉祥纹样的核心特征,是传承千年的固定符号形制、吉祥语义与视觉范式。AIGC 仅对公有领域基础纹样做细微调整的生成内容,往往达不到著作权法要求的独创性高度,其能否受著作权保护、权利归谁所有,本身存在争议;而当生成内容与他人的原创吉祥纹样构成实质性相似时,侵权责任应在模型方、提示词输入者、商用主体之间如何划分,目前也没有适配非遗衍生内容的统一裁判标准,不仅大幅提高了原创者的维权成本,也制约了传统吉祥纹样数智化创新的健康发展。

五、结语

本文从三方面提出传统吉祥纹样数智化优化进阶。先从视觉、符号、精神等维度解构纹样,结合动态语境调控,让 AI 精准理解文化内涵;再打破“人创意、机执行”模式,依据场景调整人机角色,把控协作中的潜在问题,落实“人本智能”;最后讨论了规范创作内容、生成策略,应对版权与伦理传播难题。由于传统吉祥纹样体量较大,内涵丰富,需要准

确指导其数智化创新创作仍有很多工作需要推进,后续的研究进程中仍将不断完善,在传统吉祥纹样“数智化生产”与“数智化创意”的研究方向继续拓展与深入,为传统吉祥纹样的传承与创新提供新思路。

参考文献:

[1] 李欣华,潘思宇. 中国传统吉祥纹样意象表达的数字化诠释路径[J].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54(1):94-103.

[2] 高源,万卉,胡卫军. 现代视觉传达视域下蜀锦色彩纹样的活态传承研究[J]. 文艺争鸣,2025(6):205-208.

[3] 张一. 从取象说看中国传统纹样的形意表达[D]. 北京印刷学院,2009.

[4] 汤澄,王心雨. “拂尘于野”:武当山 NFT 数字藏品与周边设计[J].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2022;3.

[5] HONGTAO F, YOUYOU L. The Application and Innovation of 3D Printing Technology in Shiwan Ceramic Art[J]. *Scientific and Social Research*,2024,6(11):242-248.

[6] 蔡子凡,蔚海燕.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的演进历程及其图书馆智慧服务应用场景[J]. 图书馆杂志,2023,42(4):34-43+135-136.

[7] 赵凯. 版权、伦理与价值观审核: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对编辑职业能力的新挑战[J]. 科技与出版,2023(8):62-68.

[8] 王海科. AIGC 驱动下的版权保护与伦理传播[J]. 中国传媒科技,2024,36(6):49-54.

[9] 严念慈,刘欣然. AI 创作法律保护:知识产权法的挑战和应对策略[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22(10):111-116.

(责任编辑 林川)

Digital-Intelligent Generation and Application Optimization Approach for Traditional Auspicious Patterns

YANG Jie, PAN Yuanyuan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anshan, Anhui 243032,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intellig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ultural globalization, this paper aims at the practical dilemmas in the inheritance and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uspicious patterns, such as cultural symbol aphasia,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culture adaptation, and insufficient cross-media innovation, to make up for the cultural gap between AIGC technology generation and pattern connotation, and explore feasible paths for the digital-intelligent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auspicious patterns. Firstly,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evolution process, core characteristics, application scenarios and contemporary innovation environment of traditional auspicious patterns, and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AIGC technology and the feasibility of its integrated innovation with traditional auspicious patterns. Facing the core hidden worries and challenges of digital-intelligent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auspicious pattern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optimized approaches of digital-intelligent generation and application from three dimensions: cultural deconstruction, human-computer collaboration and standard construction. Verified by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modern design scenarios, the keyword-driven mechanism and human-computer collaborative creation model proposed in this study can effectively realize the accurate expression of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raditional auspicious patterns, and improve their visual presentation effect and cross-scenario communication efficiency in modern design. The digital-intelligent innovation path constructed in this study can achieve the collaborative balance between the cultural core of traditional auspicious patterns and modern innovative design, and provide implementabl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methods for the digital-intelligent inheritance and cross-media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visual cultural symbols.

Keywords: Chinese traditional auspicious patterns; AIGC technology; keyword-driven mechanism; Human-computer collaboration; Digital-intelligent innovation

和谐社会视域下大学生生命观教育内容的充实和发展

张培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和谐社会视域下,大学生生命观教育内容要以生命观教育目标的实现为依据,对生命观教育提出的认知、情感与价值诉求要与时俱进。深入剖析大学生生命观教育内容的局限与不足,提出:拓展生命认知内容,加强生命认知教育;完善生命情感内容,加强生命态度教育;升级生命价值内容,加强生命价值教育等维度探索生命观教育内容和发展方向,提升大学生生命观教育质量,助力和谐社会建设。

关键词:和谐社会;大学生;生命观教育内容;充实发展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2.015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2-0091-06

和谐社会的构建,有赖于个体与自我、他人、社会及自然之间的良性互动。而这种互动关系的底层逻辑,正是健全的生命观。青年大学生正处于生命认知成型与价值取向确立的关键阶段。面对学业压力、人际交往困境与就业竞争等多重挑战,部分群体的生命状态呈现出盲从与不适特征:具体表现为对生命认知模糊、生命意识淡薄,乃至滋生生命无意义感。极端个案,如自残、暴力冲突等,不仅严重损害个体生命健康,更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构成潜在破坏。传统生命观教育,多聚焦于生命安全与死亡认知的基础启蒙,内容呈现碎片化特征,体系性不足,从而难以有效回应和谐社会建设对青年大学生生命发展提出的现实诉求。故此,以和谐社会理念为根本指引,持续丰富与拓展生命观教育内容,系统构建“生命认知—生命情感—生命价值”三位一体的教育内容体系,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才培养工作中亟待深化的重要课题。

一、和谐社会对大学生生命观教育的核心诉求

(一)认知诉求:树立生命至上的认知理念

认识和理解生命是和谐社会的伦理基石,也是

生命观教育的前提和基础。生命是自然生命、社会生命与精神生命的统一体,和谐社会对生命观教育的认知诉求,在于引导大学生树立对生命“三种属性”的明确认知。人首先是自然的、肉体性的存在,具有生物性;同时,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生活在特定社会环境中,具备实践性,需不断调适自我以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成为有意识、有关系的存在;此外,人具有精神性,能够以自身意识主导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生命观教育内容应依据生命的这三种属性,向学生传递保护自然生命安全、维系社会生命关系、成就精神生命价值的相关知识,使学生掌握基本生存技能,勇于追求生命价值。

(二)情感诉求:塑造理性包容的生命态度

和谐社会并非无矛盾、无冲突的社会,而是能够以理性方式处理和化解矛盾的社会。这就要求生命观教育必须回应“情感培育”的诉求,助力大学生塑造理性包容的生命态度。生命态度涵盖对自我生命、他人生命及自然界一切生命的态度。生命观教育应培养大学生积极乐观的心态,引导其勇于面对人生挑战,不悲观、不消极,将困难与挫折视为人生

收稿日期:2025-12-20

基金项目:2025年度郑州市委宣传部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共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生命观教育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2025PYXM5)

作者简介:张培(1980—),女,河南许昌人,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历练。既要对自己生命负责,也要对他人及自然界的生命负责,尊重他人生命,平等对待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学会与自我、社会及自然和谐共处。

(三) 价值诉求:培养责任担当的价值自觉

和谐社会对生命观教育的价值诉求,在于培育大学生责任担当的价值自觉,实现个体生命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每个生命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有生命价值存在,自然就有人们对这种价值的主观判断、情感体验、意志保证,即生命属性与主体需要之间的价值关系在意识中的反映。”^[1]在家庭层面,应培养大学生的感恩意识与家庭责任感,引导其以实际行动履行家庭义务,筑牢和谐家庭的情感纽带;在社会层面,应引导大学生认清个体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将个人需求与社会需求相结合,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在奉献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在国家层面,应培育大学生的爱国情怀,引导其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把生命理想融入民族复兴伟业,成长为勇于担当的时代新人。

二、当前大学生生命观教育内容的局限与不足

(一) 生命认知维度

当前大学生生命观教育内容多聚焦于理论认知层面,围绕生命起源的科学阐释、生命伦理的基本规范等方面展开,重点强调生命安全与生存常识。大学生虽掌握了必备的生存技能,但对死亡的认知却持回避态度,部分大学生存在“死亡焦虑”或“死亡脱敏”现象:要么刻意回避思考死亡话题,要么受网络碎片化信息的影响,对生命逝去缺乏应有的敬畏之心,难以通过对死亡的认知反向领悟生命的珍贵。同时,生命观教育内容未能深入阐释个体生命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联,忽视了生命在情感、关系联结等维度的丰富性,导致一些大学生对生命的社会属性认知模糊,习惯以“自我为中心”思考问题,片面追求个人利益,缺乏对自然、社会及他人的关心与敬畏。人是意义和价值的存在,具有超越性,但当前生命观教育对生命的精神内涵、意义价值以及其与和谐社会的关联等深层次内容挖掘不够,使得大学生难以从更宏观、更深刻的角度理解生命的意义,无法将个人生命与社会整体和谐发展紧密结合。

(二) 生命情感维度

在大学生生命观教育中,“生命情感”培育相关内容相对薄弱。对生命健康的关注、生命喜悦的感知、对苦难挫折的接纳以及对他人生命的共情等情感维度的内容,往往简化为抽象的道德说教,未能转化为可感知、可共鸣的教育素材。部分大学生虽然知晓要珍惜生命,却无法从内心深处真正领悟生命

个体从诞生到存在的独特价值与神圣意义,熬夜打游戏、暴饮暴食等损害生命健康的不良习惯屡见不鲜。同时,“生命实践”类内容供给不足,缺乏将生命认知转化为具体行动的指引,诸如如何通过志愿服务践行生命价值,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现自我生命与他人生命的共荣,如何在困境中开展生命自救与他救等实践性内容的缺位,导致教育内容与生活实际脱节,难以将理论认知内化为自觉的生命行动。在人际关系处理方面,教育内容多停留在技巧指导层面,未能上升到“生命平等”“共情理解”的价值高度,难以培育学生的情感共鸣与责任意识。有的学生处于情绪低落期时,其他同学不能感同身受,甚至作出不当言行,加重其负面情绪。

(三) 生命价值维度

生命是意义与价值的统一体。当前生命观教育内容多聚焦于生命自然属性的传递,缺乏对生命精神内涵、意义价值的培育,导致大学生对“奉献、创造、情感联结”等非功利性价值的认同度较低。部分大学生缺乏清晰的人生目标与职业规划,不清楚自身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在大学阶段随波逐流:他人考证自己便盲目跟风,他人参加社团活动自己便被动参与,却从未深入思考这些行为对自身生命价值实现的意义,缺乏主动规划人生、通过努力实现自身价值的意识。一些大学生片面追求个人利益,将金钱、地位、名利等物质层面的获取视为生命价值实现的唯一标志,过度看重外在荣誉,忽视了从个人成长、社会贡献等更具深度的角度衡量和实现自我生命价值。还有部分大学生不注重自身综合素质与能力的提升,为获取个人利益不择手段,最终偏离了生命价值实现的正确轨道。

三、和谐社会视野下大学生生命观教育内容的充实和发展

(一) 拓展生命认知内容,加强生命认知教育

1. 生命意识教育

“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2]生命意识教育旨在帮助个体认识生命本质、尊重生命价值、提升生存能力,建立对自身与他人生命的珍视之心。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逐渐增多,忽视生命、逃避困境的现象时有发生。如何培育人们面对困难与挫折的积极心态,引导其珍惜生命存在、防范极端行为,生命意识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尤其对涉世未深的青年大学生而言,他们缺乏逆境磨砺,更需要补齐生命意识教育这一课,帮助其塑造健全人格。

生命意识教育首先要培育大学生正确的生命认知,帮助其准确理解生命的存在与发展规律,明晰生

命的脆弱性与顽强性。对生命的认知应从生命存在的基础性认知出发,不能仅停留在表层,而应通过实践方式探寻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其次,还要强化大学生的生命责任意识。生命责任意识是大学生在认知生命存在、理解生命责任、感悟生命价值后,对国家、社会及他人产生的自觉职责与义务。马克思曾指出:“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都是无所谓的。”^[3] 缺失责任意识,大学生易过度关注自我,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特征,或因无法找到生命的支撑点而产生心理挫败感,甚至走向放弃生命的极端。“责任的最高原则就是竭尽全力维护自己的生命、发展和提高自己的生命,使他具有最大的道德价值。”^[4] 因此,需加强大学生生命责任意识教育,培育其社会责任感,引导大学生以责任为行动出发点,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实现自我价值。

2. 生存技能教育

生存技能教育是培育大学生在不同环境中应对风险、保障自身安全与基本需求的教育,其核心是提升大学生的“自救”与“适应”能力。生存技能教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传授基础生存知识,如自然灾害的前兆识别,环境、气候、地形对生存的影响等;二是传授实用生存技能,如野外临时庇护所搭建,水源寻找与净化,可食用植物识别,狩猎与生火技巧以及地震、火灾等突发灾害来临时的城市紧急避险方法和基础急救技能;三是培育大学生心理健康成长技能,在极端环境下,向大学生传授保持冷静、应对恐惧与压力的心理调节技巧。

掌握生存技能,就如同为大学生穿上了一套“防护服”,既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大学生陷入危险境地,又能让其在危险来临时快速作出正确反应,有效保护自身及他人安全,提高应对危险的成功率。开展生存技能教育,能够增强大学生的独立生活能力。当前部分大学生独立生活能力不足,生活中各类问题频发,掌握基本生存技能可减少其对他人的依赖,帮助其更从容地应对校园生活及未来社会生活。同时,生存技能的获得不仅关乎个人,更关系到他人、集体与社会。例如,学习急救知识后,大学生可在同学或他人遭遇意外时及时伸出援手,保障他人生命安全,同时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收获幸福感、价值感。此外,开展生存技能教育还能提升大学生的抗压能力,促进其心理健康,如遇事保持冷静,制定周密计划,可有效缓解焦虑、恐惧情绪,增强心理韧性。生存技能教育的形式可灵活多样,可通过课堂教学、社会实践演练、书籍或视频学习等方式开展,但需注

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确保大学生掌握真才实学,既能造福自身,也能回馈社会。

3. 死亡教育

生命认知教育绝非简单的生存技能传授,而是帮助个体从认知、情感到实践层面,建立对生命完整理解的教育体系,最终让个体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安身立命的意义。生命终将走向死亡,正视并接受死亡,才能彰显生命的伟大。开展死亡教育是引导大学生正视死亡,从而让其更清醒、更有意义地“活”。死亡教育主要包括认识死亡、应对死亡时的情绪调节及死亡相关的实际准备等内容,通过探讨生命与死亡的关系,引导大学生积极思考“如何活”的核心问题;当意外或死亡来临时,帮助大学生沉着应对,减轻或消除死亡带来的恐惧、悲伤等负面情绪,学会与情绪和解,学会告别与哀悼;通过临终关怀、遗嘱规划、殡葬方式等相关内容的讲解,让大学生对生命终结有更全面的认知与准备。

开展死亡教育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生死观,打破传统观念对死亡的恐惧与回避,深刻领悟生命的宝贵与唯一性,树立“健康第一”的理念。有助于增强大学生的心理韧性,使其理解临终者的需求,能够坦然面对亲友离世、校园意外等与死亡相关的事件,保持身心健康。开展死亡教育还能引导大学生珍视生命,认清生命的短暂与死亡的必然性,从而积极面对有限的人生,追求有意义的生活。死亡教育涵盖临终关怀、殡葬文化、生命伦理等内容,通过系统学习,可让大学生了解社会在临终关怀环节的相关做法,增强其同理心,为未来照顾家中长辈、职业中承担相关照顾责任奠定基础。高校开展死亡教育,可通过开设专门课程、举办主题教育活动、将其融入现有课程体系、提供心理咨询等配套服务等方式推进;可鼓励大学生参与临终关怀志愿服务,在实践中体验生命的宝贵;还可邀请医生、殡葬从业人员、心理学专家等举办死亡相关讲座,组织学生前往重症监护病房、殡仪馆、墓园等场所,现场感受生命的终结。广州大学胡易安老师开设的“生死学”课程,涵盖生死本质与尊严、死亡意识、个体死亡、社会死亡等内容,旨在以死观生,帮助学生优化自我生命;山东大学医学院王云岭老师开设的“死亡文化与生死教育”课程,涉及安宁疗护、殡葬文化等内容以帮助大学生减轻死亡焦虑。

(二) 完善生命情感内容,加强生命态度教育

1. 健康生活方式教育

健康生活方式教育包含健康理念及其影响因素,饮食、睡眠与运动和健康的关系,不良习惯的危

害及环境卫生等内容。开展健康生活方式教育,核心在于帮助大学生认清影响健康的各类因素,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树立现代健康意识。当前,部分大学生存在作息不规律、熬夜打游戏等问题,长期睡眠不足会导致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甚至增加心脏病、中风的发病风险,既影响学业发展,也严重损害身心健康。一些大学生毕业后在生活、人际交往中遭遇困惑,这与健康生活方式教育缺失导致的基本生存技能不足、社会适应能力薄弱有着密切关系。在饮食方面,部分大学生暴饮暴食,偏好油腻、重口味食物,加之长期缺乏运动,身体健康出现隐患,肥胖、哮喘、高血压等疾病呈现年轻化趋势。还有部分大学生吸烟、酗酒成瘾,进一步侵蚀身心健康。

健康生活方式教育可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道德与法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劳动教育”等高校思政课程,系统传授健康生活相关知识。可通过“运动营养学”等特色课程,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养成健康生活习惯。高校还可定期举办专题讲座,邀请相关专业人士开展宣讲。河南科技学院组织健康教育宣讲员为全体新生开展为期一周的“健康由你不由天”知识讲座,从“吃、动、烟、酒、心”五个内容引导学生养成健康生活方式;河南医专邀请专家开展“体重管理与健康促进”专题报告,助力学生树立科学的体重管理理念。

2. 人际交往教育

人际交往教育是通过系统的知识传授、技能训练和实践引导,帮助个体学习如何与他人建立、维护和发展健康关系的教育活动,主要包含人际交往基本原理、不同场景社交能力培养、健康交往心态培育等内容。人际交往是幸福感的重要来源,大学阶段的人际交往教育,能够帮助大学生建立长期有效的交往模式,为未来社会关系、家庭关系的维护奠定坚实基础,长期处于和谐人际关系中的大学生,其幸福感与获得感也会显著提升。

随着社会加速发展,大学生肩负着家庭、学业、人际交往等多重压力,易产生不良心理情绪。开展人际交往教育,能够帮助大学生掌握必备的沟通技巧,学会以平等、宽容、尊重的心态与人相处,减少校园人际冲突,营造和谐的校园环境,还能提前培育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为其未来职业发展筑牢基础。大学生人际交往教育可通过课堂教学、社会实践、搭建心理辅导平台、发挥榜样示范作用等途径推进,其中课堂教学是主阵地、主渠道。高校可开设“人际交往心理学”“沟通技巧”等必修或选修课程,系统

讲解人际交往原则、非语言沟通等相关知识;开展小组合作、志愿服务等多样化实践活动,为大学生提供真实的交往场景,让其在协作中不断提升社交能力。

3. 挫折教育

“挫折教育通过对受教育者进行知识与技能的培训,使受教育者认识挫折、驾驭挫折、战胜挫折,最终提高受教育者的身体素质,增强他们的心理承受力。”^[5]开展挫折教育,并非刻意制造挫折与磨难去“打击”学生,而是在个体生命成长过程中,结合其年龄、认知水平和生活环境,通过理论引导、实践体验、心理支持等方式,帮助个体树立对挫折的理性认知,掌握应对挫折的技巧,在承受挫折、战胜挫折的过程中实现生命的成长。挫折教育主要包含挫折认知教育、情绪管理与心理调适能力培养、问题解决能力训练、价值观与意志力塑造等内容。

挫折教育是破解大学生心理问题的关键。当前,多数大学生成长过程中经历的挫折与磨难较少,心理素质相对薄弱,遇到问题易产生不良情绪,甚至采取极端行为。开展挫折教育,有助于增强大学生的心理韧性,帮助其自觉抵制不良情绪的影响,树立积极乐观的人生心态。挫折教育需结合大学生的专业特点、社会实践、职业规划等具体场景,针对性帮助大学生应对考试失利、人际冲突、求职失败等现实问题。经过挫折历练的大学生,能够更清晰地认识自身的优势与不足,激发自身潜能,磨炼意志品质,增强责任担当,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栋梁之材。开展挫折教育,还能有效弥补家庭与学校教育的短板,进一步完善高校育人体系。高校可将挫折教育纳入必修课或选修课,帮助大学生建立系统的理论认知;通过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互动式教学,让大学生在模拟场景中练习挫折应对技巧;通过组织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创业模拟等活动,让大学生在实践中经历挫折、解决矛盾,积累经验、锤炼人格。

4. 心理健康教育

生命具有趋向和谐的本质,和谐意味着稳定、平衡与宁静,生命只有在和谐的环境中才能健康快乐成长。心理健康教育是解决心理问题、疏通心理淤积、促进生命和谐的有效途径,是围绕个体心理健康开展的教育活动,其核心任务与目标是:“帮助大学生了解心理知识、拨开心理迷雾、疏通心理淤积、预防心理疾病、提高心理素质,促进身心健康。”^[6]

大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其心理健康状况呈现出复杂性与特殊性:一方面,大学生的自我认知不断提升,独立生活、自主学习等能力逐步增强,创造活力与抗挫能力显著提高;另一方面,面对

学业、就业、人际交往等多重压力,部分大学生会出现焦虑、拖延、厌学等负面情绪,少数大学生性格内向、敏感多疑,易产生孤独感或社交恐惧,还有部分大学生沉迷网络游戏,导致社交能力退化,甚至因网络信息过载加剧心理压力。近年来,高校普遍加大了心理健康教育的投入力度,多数高校设立心理咨询中心,开设心理健康必修或选修课程,开展心理普查与危机干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学生的心理压力,但仍面临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学生主动求助率偏低等问题,亟须家庭、学校、社会形成合力,共同助力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家长应主动学习心理健康知识,积极配合学校班主任、辅导员的工作,密切关注孩子的心理需求;学校可通过心理健康课程、心理普查、心理咨询、主题班会等形式,引导学生树立健康的心理观念;社区应积极开展心理健康宣传活动,普及心理健康知识,为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居民提供基础心理服务。同时,高校可借鉴周口师范学院“三三心育”模式,整合专业队伍、朋辈队伍、家长队伍三方力量,构建“全员参与、全程覆盖、全域联动”的协同育人机制,通过开设家长课堂、推送心理微课、走进社区提供咨询等方式,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格局,为大学生心理健康保驾护航。

(三) 升级生命价值内容,加强生命价值教育

1. 生命意义教育

生命意义教育的核心在于引导大学生持续思考“有意义的生命”,深入探索生命价值的内涵——这里的“有意义的生命”,既包含对自身生命健康、安全的珍视,也涵盖对他人生命的责任与奉献,引导人们接纳生命中的挫折、痛苦与不确定性,锤炼面对困难的决心与毅力。生命意义教育并非提前“给出标准答案”,而是着力培养个体“寻找意义的能力”,让大学生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逐步形成“珍视自己、尊重他人、敬畏自然”的生命态度,找到安身立命的精神根基。

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具有鲜明的主观性,因此生命意义教育需尊重个体差异,摒弃单一化、灌输式教育,引导大学生结合自身成长经验、家庭环境、文化素养自主探索,允许不同生命意义认知的存在。生命意义教育可结合鲜活生动的现实案例与生活实践开展,增强教育的感染力与实效性。如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与人文传播,虽自幼残疾、历经磨难,却以坚韧的意志力追求生命的深度与厚度,留下了跨越时代的精神财富,用一生诠释了生命的意义。职教高考首日,18岁的姜邵鹏与司机

并肩搭建7分钟黄金救援通道,虽然错过考试,却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对他人生命的责任与担当。这类事迹均可作为课堂生动案例,触动大学生的心灵,引导其思考生命的价值。此外,还可通过志愿服务、生命教育主题班会、沉浸式生命体验等实践教学形式,让大学生在亲身参与中感悟生命意义。生命意义教育需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格局,发挥父母作为家庭第一责任人的作用,通过言传身教传递生命温暖与责任。面对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冲击,社会应强化正向引导,共同营造“崇尚奉献、敬畏生命”的正能量氛围。高校也可借鉴上海师范大学“生命教育实践营”的经验,组织学生走进人文纪念公园,通过探访英模故址、聆听生命故事等沉浸式活动,让学生在追思中感悟平凡生命的伟大,深化对生命意义的理解。

2. 生命信仰教育

生命信仰教育是引导个体认识生命本质、理解生命价值、确立生命意义的教育活动,主要包括引导个体认知生命的独特性与有限性,培育对生命的珍惜与感恩之心,将对生命的理解转化为尊重生命、守护生命的自觉行为。通过引导大学生深入思考“生命是什么”“为何而生”等根本问题,筑牢对生命的敬畏之心,学会尊重他人生命、关爱自然生命。通过引导大学生寻找自我价值与社会需求的结合点,摒弃将“成功”等同于物质利益获取的片面认知,减少因意义感缺失引发的心理问题,突破传统纯粹知识教育的局限,将生命、信仰与责任紧密联结,引导大学生认清个体与社会、自然的辩证关系,为构建和谐社会培育有温度、有担当的“建设者”。

课程教学是高校生命信仰教育的核心载体。高校可构建“通识—专业—选修”多层级课程体系,开设生命哲学、生命伦理学等必修或选修课程,系统传授生命信仰相关知识。也可将生命起源、生命特征等内容融入各类课堂教学,潜移默化引导大学生敬畏生命。可邀请哲学家、伦理学家、临终关怀医生等行业专家,结合具体案例解析生命信仰的实践形态,如“从癌症患者的抗争看生命意义”“宗教信仰中的生命观”等,让抽象的生命信仰知识变得具体可感。同时,强化实践教学,组织大学生参与临终关怀志愿服务,到医院陪护晚期患者,直面生命的脆弱与尊严或者通过蒙眼行走、轮椅出行等体验活动,感受残疾人生活的不易,体悟生命的坚韧。校园文化作为生命信仰教育的“隐性课堂”,可通过环境营造、活动开展等方式传递价值导向:如设置“生命长廊”,彰显生命的宝贵与唯一性;举办“生命艺术节”,通过绘画、征文等形式,深化大学生对生命的理解;开展

“信仰故事会”,邀请校友、社会人士分享“支撑自己走过低谷的生命信仰”,传递向上力量。此外,需强化家庭生命启蒙教育,加强家校联动,构建协同育人机制,形成生命信仰教育的合力。

3. 人生幸福教育

人生幸福教育的核心在于帮助受教育者感知幸福、体验幸福,进而具备追求幸福、创造幸福的能力。开展人生幸福教育,对大学生成长与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其一,有助于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引导其积极应对学业、就业、人际交往带来的压力,有效调节负面情绪,提升幸福指数,减少焦虑、紧张等不良情绪的影响;其二,有助于推动大学生全面发展,将幸福教育融入高校课堂教学,培育学生的创新能力、道德品质与健全人格,助力其成长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其三,有助于营造和谐校园环境,增进大学生之间的交流沟通,形成互帮互助、共同追求和谐幸福的校园风气;其四,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引导其以积极心态面对未来多变的社会,为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

人生幸福教育可通过课堂教学、实践活动、校园文化建设、家校社协同育人等多种途径推进。在课堂教学方面,可开设幸福学、积极心理学等必修或选修课程,系统传授幸福理论与实践方法;将幸福教育融入思政课程,重点讲授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引导大学生认识到“劳动创造幸福”“奉献成就幸福”,在做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中收获幸福。在实践活动方

面,可组织幸福体验分享会、志愿服务、户外拓展等活动,让大学生在帮助他人、突破自我中释放压力、增强心理韧性,提升幸福感受力。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可举办以幸福为主题的文化艺术节、摄影展、主题宣讲等活动,营造浓厚的幸福教育氛围,让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知幸福、追求幸福。在协同育人方面,需加强家校合作,开展家庭幸福教育指导,引导家长营造和谐幸福的家庭氛围,做智慧父母;整合社会资源,邀请专家学者进校园开展讲座,组织大学生走进社区开展幸福主题调研、志愿服务等活动,形成家庭、学校、社会通力合作的幸福教育格局。

参考文献:

[1]梅萍.当代大学生生命价值观教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8.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6.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29.
[4]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1.
[5]李海洲,边和平.挫折教育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5-10.
[6]梅宪宾.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16.

(责任编辑 许峻)

Enric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Life Outlook Education
Cont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ZHANG Pei

(School of Marxism,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era background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this paper first puts forward the core deman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for college students' education on the outlook on life. By deeply analyzing the limitations and deficiencies in the content of college students' education on the outlook on life, it proposes to explore the enrichment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s of the content of education on the outlook on life from such dimensions as expanding the content of life cognition and strengthening education on life cognition, improving the content of life emotions and strengthening education on life attitude, and upgrading the content of life value and strengthening education on life value. It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ideas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education on the outlook on life and facilit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Keywords:Harmonious society; College students; Life outlook education content; Enrichment and development

应用型本科高校化学化工类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究

李玉玲¹, 张琳¹, 王焕锋¹, 赵建波², 王利平¹

(1.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2. 郑州轻工业大学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 聚焦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化学化工类专业, 深入剖析当前人才培养中存在的课程体系滞后、实践教学薄弱、产教融合不足、师资结构不合理以及评价方式单一等问题。结合区域产业发展需求与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 从课程体系、实践教学、产教融合、师资队伍、评价体系五个维度, 构建“课程—实践—产教—师资—评价”“五位一体”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旨在为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提升化工类人才培养质量、推动产教协同发展提供实施路径, 助力化工产业的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

关键词: 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 化学化工类专业; 创新型人才; 培养模式; 产教融合

DOI: 10. 13783/j. cnki. cn41-1275/g4. 2026. 02. 016

中图分类号: G647; O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715(2026)02-0097-06

一、引言

化学化工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支柱性产业, 覆盖能源、材料、医药、食品等关键领域, 其发展水平直接关乎国家产业竞争力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1]。近年来,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绿色化工技术的突破以及智能化生产设备的普及, 我国化工产业正加速摆脱传统高耗能、高污染模式, 迈向绿色化、精细化、智能化发展新阶段^[2]。在这一转型进程中, 产业对人才的需求已从传统技能操作型人才, 转向具备创新思维、工程实践能力与跨学科素养的创新型人才。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作为连接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重要桥梁, 肩负着为地方产业培养“留得住、用得上、能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重要使命^[3]。据教育部数据, 我国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数量占本科高校总数的60%以上, 其化学化工类专业毕业生占该领域本科毕业生总量的70%

左右, 是区域化工企业人才供给的核心来源。然而, 当前多数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化学化工类专业仍沿用“理论教学+实验教学+毕业实习”的传统培养模式, 存在课程内容与产业技术脱节、实践教学环节形式化、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缺乏系统性等问题, 导致毕业生难以快速适应企业岗位需求, 人才培养质量与产业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4]。

国内外应用型高校在化学化工类人才培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德国应用科学大学以“双元制”教育模式为核心, 将企业实践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 学生30%—50%的学习时间在企业完成, 课程内容直接对接企业生产需求, 着重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与岗位适应能力^[5];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提出的“工程教育创新计划”、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项目式学习”模式, 均将创新能力培养融入课程教学, 通过跨学科项目、科研训练等环节, 有效激发学生的创

收稿日期: 2025-12-20

基金项目: 2024年度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金课背景下依托大学化学课程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2024SJGLX0569), “教育数字化背景下以自主学习为中心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创新与实践”(2024SJGLX0566); 2024年度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教学名师项目(郑工[2024]9号); 2023年度河南省教育厅研究性教学示范课程《分析化学》(教高[2023]36号)

作者简介: 李玉玲(1979—), 女, 河南信阳人, 博士,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配位化学和高等化学教育与实践研究。

新思维^[6]。2020年,国内学者党亚固等搭建教竞联合平台,构建化工设计课程群,通过组建指导队伍、组织竞赛、改革教学内容与方法,实现教竞融合,提升学生工程设计与创新实践能力,竞赛成果反哺教学,达成化工人才培养目标^[7];2021年,冯丽娟等依托“互联网+”构建化工专业协同育人实践创新平台,通过校企协同整合资源、开展项目化教学,提升师生及校企相关能力,实现三方共赢^[8];2022年,陈蔚燕等对绿色化学与化工课程进行改革,通过内容模块化、任务驱动教学、融入思政元素及开展社会实践,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提升教学效果^[9]。

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明显不足:一是多数研究聚焦课程改革、实践教学等单一环节,缺乏对人才培养模式的系统性构建;二是部分研究提出的策略过于宏观,与区域产业需求的深度结合不够,可操作性不强;三是对创新能力培养的评价体系研究不足,难以有效衡量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效果。鉴于此,本文力求在系统梳理国内外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化学化工类人才培养现状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深入分析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并结合区域产业需求与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研究从课程体系、实践教学、产教融合、师资队伍、评价体系五个维度构建“五位一体”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策略,以期为同类高校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改革提供参考。

二、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化学化工类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一)人才培养定位模糊,与区域产业需求脱节

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根本职责在于服务区域发展,但部分高校化学化工类专业未充分调研区域化工产业的发展趋势与人才需求,盲目照搬研究型高校的培养模式,导致人才培养定位模糊。例如,理论课程占比超60%,绿色化工技术、化工设备运维等产业相关应用课程开设不足;对地方精细化工、生物化工等特色产业关注欠缺,未设置特色课程模块,造成毕业生难以适配区域化工企业的岗位需求。问卷调查显示,仅35.2%的区域化工企业认为该类专业毕业生完全符合岗位需求,48.6%认为基本符合但需二次培训,16.2%认为不符合;62.3%的学生表示不了解区域化工产业发展趋势,58.7%认为所学课程与未来工作岗位的关联度较低。

(二)课程体系滞后,与产业技术发展不同步

课程体系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载体,其先进性与实用性直接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目前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一是课程内容陈旧。部分高校“化工

原理”“化学反应工程”“化工热力学”等核心课程仍采用十年前的教材版本,内容侧重传统理论与工艺,对绿色化工、智能化工、生物化工等新兴领域涵盖不足,也缺少“碳捕获与封存”“化工过程模拟”“化工大数据分析”等产业急需内容,导致企业后续培训成本增加。二是课程结构不合理。实践课程学分占比普遍为20%—25%,未达到教育部“不低于30%”的要求;课程之间衔接不畅,存在内容重复或断层现象。例如“化工实验”与“化工原理”教学进度脱节;跨学科课程明显不足,“化工+材料”“化工+环保”“化工+计算机”等复合课程模块缺失,制约学生跨领域思维能力的发展。三是教学方法单一。多数课堂仍以“板书+PPT”讲授为主,缺乏互动与实践环节。问卷调查显示,72.5%的学生认为教学方法枯燥,难以激发学习兴趣;68.3%的教师因教学负担重、培训机会不足,难以有效开展项目式、案例式等新型教学模式。

(三)实践教学薄弱,学生创新能力培养不足

实践教学是培养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的核心环节,但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化学化工类专业的实践教学普遍存在“形式化”与“浅层化”问题,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实验教学内容单调。基础验证型实验(如“酸碱滴定”“蒸馏实验”等)占比超70%,综合性、设计性与创新性实验占比不足30%。学生大多仅按照既定流程操作,缺少自主设计实验方案、分析实验数据和解决实际问题的系统训练,严重制约创新能力的发展。二是实训基地建设滞后。校内实训设备老化,部分设备仍沿用20世纪90年代的装置,与企业当前智能化、自动化生产水平差距较大;校外实训多停留在“挂牌合作”层面,以参观学习为主,缺乏沉浸式、实操性训练,难以有效提升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三是创新实践平台不足。学生参与科研项目与学科竞赛的机会有限,问卷调查显示,仅28.6%的学生参与过教师科研项目,35.7%的学生参加过学科竞赛(如“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等),而能够参与企业实际研发项目的学生占比不足12.3%。

(四)产教融合不深,协同育人机制不完善

产教融合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关键路径,但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化学化工类专业的产教融合工作目前仍面临三方面突出问题:一是校企合作层次较浅。多数合作仍停留在提供实习岗位等浅层模式,仅23.5%的高校邀请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18.7%的高校与企业合作开发课程,企业在人才培养全过程中的整体参与度不高。二是协同育人动力

不足。地方化工企业以中小型企业为主,自身资源有限,难以在人才培养方面进行大量投入。同时,校企双方利益诉求不统一:企业偏重短期效益,不愿让学生接触核心生产环节;高校则因缺乏企业资源支持,实践教学质量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三是保障机制尚未健全。多数地方政府未出台化工领域产教融合专项扶持政策,高校内部也缺少专门的管理机构与配套考核机制,导致产教融合相关工作缺乏有效统筹与持续推进。

(五)师资队伍结构不合理,“双师型”教师比例偏低

师资队伍是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保障,但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化学化工类专业的师资队伍目前仍存在明显短板,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教师来源单一,实践经验不足。多数教师毕业于研究型高校,理论知识扎实但缺乏行业一线工作背景,仅 31.2% 的专业教师拥有 3 年以上化工企业工作经历,25.8% 的教师未曾参与企业技术研发项目,导致教学内容与产业实际脱节。二是“双师型”教师比例偏低。地方应用型高校化工类专业“双师型”教师占比平均仅为 28.7%,未达到教育部“不低于 50%”的要求。部分教师虽取得相关职业资格认证,但缺少实际工程实践经验,证书“含金量”不高,难以满足应用型人才需求。三是科研与产业需求之间的结合不够紧密。教师科研方向多偏重理论研究,仅 22.4% 的科研项目来自企业委托;35.6% 的教师不了解区域化工企业的技术难题,难以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用的教学资源,无法有效衔接教学与产业需求。

(六)评价体系单一,难以衡量创新能力培养效果

当前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化学化工类专业的人才评价体系仍以“知识考核”为主导,存在明显局限,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评价内容单一。考核重点集中于理论知识掌握情况,对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创新思维及团队协作等综合素质缺乏有效评价手段。实验课考核仍主要依据实验报告完成质量,毕业设计(论文)选题与企业实际需求关联较弱,整体呈现“重理论、轻应用”的倾向。二是评价主体单一。评价工作以校内教师为主,缺少来自企业、行业协会等外部主体的参与。例如在实习评价中,企业导师的评分权重通常仅占 20% 左右,难以客观、全面反映学生的实践表现与岗位适配度。三是评价方式静态化。过度依赖期末“一次性”考试,过程性评价占比偏低(平时成绩约占 30%),且平时成绩多依据考勤与书面作业评定,未能对学生的学

习过程进行持续、动态跟踪,无法全面反映学生能力的发展过程与创新素养的提升情况。

三、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化学化工类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一)课程体系的融合创新与改革实践

1. 构建模块化课程体系。模块化课程体系由以下四个模块组成:通识教育模块涵盖人文社科、自然科学、体育艺术等领域课程,旨在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人文素养、沟通协作能力与社会责任感,拓宽学术视野。专业基础模块包括化学、物理、数学等基础理论课程,为学生后续专业学习奠定坚实基础,培养科学思维与逻辑分析能力。专业核心模块聚焦专业核心知识与技能,按专业方向设置针对性课程。例如,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开设“化工原理”“化学反应工程”等核心课程,使学生系统掌握化工生产、设计和研发所需的核心理论与关键技术。拓展创新模块开设创新创业、前沿技术与跨学科课程,如“化工创新实践”“绿色化学”等,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实践能力与跨学科视野,增强学生综合竞争力。该体系打破传统学科界限,课程结构清晰,有助于增强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与灵活性。各模块相互支撑、有机衔接,协同促进学生构建系统的知识体系,发展综合能力与创新思维。

2. 强化实践课程与创新创业教育相结合。以具体项目带动实践教学,切实提升学习实效。例如,在“化工工艺设计”课程中,以“乙酸乙酯合成工艺设计”为实际任务,指导学生完成从原料选择、反应原理、流程规划、设备选型、车间布局到成本分析的全流程设计。学生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制定并优化设计方案,通过团队协作,在解决实际工程问题中提升工程实践能力、合作意识与创新思维,并积极探索更绿色、高效的工艺路径。

同步强化创新创业教育,开设《化工创新创业实践》课程,邀请企业专家与创业者入校分享行业动态、创业经验与市场趋势;建立创新创业实践基地,为学生提供项目孵化、技术支持和资金帮扶,鼓励学生开展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实践。例如,有学生团队在实践基地支持下开发出新型环保水处理剂,与当地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实现了技术转化与商业应用。此类教学与实践联动的模式,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活力与创业意愿,切实提升了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3. 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在化学化工专业课程中,有机融入思政元素,实现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的协同育人目标。例如,在“有机化学”课程中,介绍

我国科学家黄鸣龙对“沃尔夫-凯惜纳还原反应”的改进与突出贡献,引导学生感悟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勇于创新的精神与深厚的家国情怀,增强学生的科技自信与文化认同;讲解有机合成实验时,着重强调实验安全、环境保护与职业道德,培育学生的安全意识、绿色发展理念和职业责任感。在“化工原理”课程中,阐释化工行业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作用,结合企业节能减排、绿色生产等实践案例,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与家国担当;在设备设计与操作教学中,注重严谨作风和工匠精神的培育,让学生理解工程规范的重要性,树立认真负责的学习态度与职业素养。同时,鼓励教师采用小组研讨、案例教学等多元化方法融入思政内容,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在专业知识学习中实现价值塑造,培养兼具扎实专业能力和高尚品格的创新型化工人才。

(二) 多元化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的创新实践

1. 项目式教学与案例式教学。以“化学反应工程”为例,设置“年产 10 万吨乙酸乙酯反应器设计”项目任务。学生需综合考虑反应条件、工艺流程与经济性等多重因素,完成反应器选型、尺寸计算及操作参数确定。通过小组协作开展调研、资料整理和方案设计,教师定期组织讨论并提供过程指导。学生在项目实施中巩固专业核心知识,提升分析解决问题与团队协作能力,并可针对提升能效、降低排放等实际问题提出创新思路。在“化工分离工程”中引入案例教学,以某化工企业“乙醇-水分离工艺”为实际案例,引导学生分析物系特性与分离难点,自主设计分离流程及设备参数。通过案例分析,加深理论理解,提升工程设计与实践应用能力。

2.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整合线上教学资源丰富、学习便捷与线下教学互动性强、实践体验好的优势,以“物理化学”为例构建混合式教学模式。课前,教师通过在线平台发布教学视频、电子教材、预习任务等,学生自主观看视频、学习基本概念和理论,完成预习任务,并通过讨论区与师生交流疑问、分享见解。课堂教学中,教师针对预习反馈的重点、难点集中讲解,结合课堂互动、小组讨论、案例分析等方式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掌握知识。例如,讲解“热力学第二定律”时,联系生活现象引导学生开展小组研讨,促进知识内化。课后,教师布置在线作业、测验与拓展任务,帮助学生巩固所学;通过平台跟踪学习情况,动态调整教学安排。学生可利用线上资源拓展学习,如观看讲座、查阅文献等,提升自主学习能力与学科视野。

3.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为克服传统实验教学中

设备受限、操作风险高、成本较大等问题,可广泛应用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模式。以“化工原理实验”中的“精馏塔实验”为例,学生可在仿真平台中自主设定进料组成、流量、回流比等条件,操控虚拟设备,实时观察塔内温度分布、浓度变化及塔板效率等参数,深入理解精馏原理与操作特性。该平台还可模拟进料突变、回流泵故障等异常工况,帮助学生掌握突发问题的处理方法,增强实践操作与应急处置能力。虚拟仿真实验具有安全、可重复、低成本等优势,学生可反复练习以加深理解,有效避免设备损坏与安全隐患。结合线下实际实验教学,形成“虚实结合、相辅相成”的实验教学体系,进一步提升实验教学的整体质量与效果。

(三) 产学研协同育人视角下实践教学平台建设

1. 校企合作共建实习实训基地。学校与当地大型化工企业共同投入资金,建设配备现代化实验实训设施(如化工生产装置、分析检测仪器等)的实习实训基地。企业配备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担任实习指导教师,与学校教师共同指导学生实习。实习实训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岗位认知实习,学生初步了解企业生产工艺流程、组织架构和企业文化;二是岗位实习,学生直接参与企业实际生产与研发项目,应用所学知识,提升实践能力与职业素养。该模式实现校企资源共享、协同育人,达成互利共赢。

2. 共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学校与企业、科研机构共建联合研发中心、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等产学研合作平台,整合各方资源优势,共同开展科研项目,针对化工行业关键技术问题(如节能减排)进行攻关。产学研合作平台为学生提供了参与科研项目和实践创新的机会,学生可跟随教师和企业技术人员参与研究工作,了解学科前沿动态和行业发展趋势,培养科研兴趣和创新能力;同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推动地方化工产业升级创新,实现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

(四) 产学研协同视角下“双师型”师资队伍培育与建设

1. 提升教师实践能力。学校积极推动教师深入企业进行实践锻炼,定期选派教师前往化工企业开展为期半年至一年的挂职锻炼,深度参与企业生产、研发及管理工作。通过此类实践,教师能够切实了解企业需求与行业动向,掌握前沿生产技术及工艺。例如,一位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教师在挂职期间参与企业工艺改进项目,系统学习了实际生产问题的解决路径,熟练掌握了相关先进设备操作技能。此外,学校还组织教师参与行业技术研讨会、专业培训

等交流活动,持续更新教师的行业知识,拓宽技术视野。同时,鼓励教师与企业合作开展横向科研课题,推动科研成果向实际生产转化。例如,某教师主持的“化工企业废水处理技术研发”项目,成功帮助企业解决了废水处理难题,在此过程中,该教师自身的科研与实践能力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2. 引进企业人才担任兼职教师。学校聘请来自化工企业不同岗位的高级技术及管理人才担任兼职教师,以其扎实的专业知识与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将企业实际案例与行业最新动态融入教学,显著提升教学的实用性与针对性。以某化工企业高级工程师讲授《化工工艺学》为例,该教师结合自身多年工作经验,深入讲解实际生产流程、操作要点及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法,通过真实案例帮助学生理解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进而激发学习兴趣、提升学习效果。此外,兼职教师还参与指导学生的实践教学与毕业设计,为学生提供实践指导与职业规划建议,助力其解决实际问题、提升职业素养;同时,积极提供就业信息与职业发展机会,帮助学生顺利实现从校园到企业的角色过渡。

(五) 综合评价方式的优化与改革

构建多元化、全过程的人才培养评价体系,全面衡量学生的综合能力与创新素养。一是丰富评价内容。在理论知识考核基础上,增加工程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职业素养等评价维度。例如,实验课程采用“实验设计+操作规范+数据处理+报告质量”综合评定;毕业设计(论文)提高企业实际选题比例,重点评价学生的工程应用能力与创新成果。二是拓展评价主体。建立“校内教师+企业导师+行业专家”多元评价机制,合理设置各主体评价权重。以实习评价为例,可设定企业导师评价占比 50%、校内教师占比 30%、行业专家占比 20%,使评价更客观地反映学生的实践表现与岗位适应能力。三是优化评价方式。提高过程性评价比例,将平时成绩占课程总评的比例提升至 50%,涵盖课堂参与度、项目完成情况、实践表现等方面;建立学生成长档案,全程记录其在学习、实践、创新等方面的表现;采用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动态地反映学生能力发展过程。

四、总结与展望

本研究在系统分析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化学化工类人才培养现状的基础上,指出当前存在培养定位与区域产业需求脱节、课程体系滞后、实践教学薄弱、产教融合不深入、师资结构失衡及评价方式单一等突出问题。为应对上述挑战,研究提出了“课

程—实践—产教—师资—评价”“五位一体”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在课程方面,构建模块化课程体系,融入创新创业教育与课程思政元素,增强与区域产业需求的衔接度;在教学方法上,运用项目式、案例式教学方法,结合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与虚拟仿真实验,提升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参与度;在实践环节,通过校企共建实习实训基地与产学研合作平台,拓展学生实践与科研资源;在师资建设上,强化教师实践能力培训并引入企业兼职教师,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在评价机制上,建立多元化、全过程的评价体系,全面考查学生的综合能力与创新素养。

面向未来,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化学化工类人才培养应持续关注行业绿色化、智能化、数字化发展趋势,进一步深化与产业界的协同合作,动态调整专业方向与培养目标。同时,高校需持续推进教学改革,创新教学方法,加强师资队伍与实践平台建设,完善人才培养评价体系,从而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化工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参考文献:

[1] 蒋利超. 化工企业生产工艺中的安全管理与环保措施研究 [J]. 山东化工, 2024, 53(1): 233-234+237.

[2] 余卫昌. "双碳"目标下化工检验分析技术创新与市场前景分析 [J]. 中国化工贸易, 2025, (31): 4-6.

[3] 郑先锋, 刘永勋. 产业转型与新高考双驱下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专业结构调整优化探索 [M]. 新乡日报. 2025: 004.

[4] 张振凤. 地方本科高校教学文化的建构 [D]. 宁波: 宁波大学, 2014.

[5] 孙鸿, 王杰, 张稳婵, 等. 德国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启示 [J]. 广州化工, 2018, 46(3): 166-167+170.

[6] REEDY A K, GUERRERO FARIAS M L, REYES L H, et al. Improving employability skills through non-placement work-integrated learning in chemical and food engineering: A case study [J]. Education for Chemical Engineers, 2020 (33): 91-101.

[7] 党亚固, 章鹏, 费德君, 等. 搭建教竞联合平台, 深化化工设计课程教学改革 [J]. 化工高等教育, 2020, 37(1): 100-103.

[8] 冯丽娟, 宋继梅, 杨志勇, 等. 化工专业协同育人实践创新平台的构建 [J]. 广州化工, 2021, 49(4): 162-164.

[9] 陈蔚燕, 颜世海, 李建忠, 等. 绿色化学与化工课程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J]. 化工高等教育, 2022, 39(6): 59-67.

(责任编辑 许峻)

Research on Innovative Talent Training Mode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LI Yuling¹, ZHANG Lin¹, WANG Huanfeng¹, ZHAO Jianbo², WANG Liping¹

(1. School of Materials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2. School of Materials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 Zhengzhou, Henan 450000, China)

Abstract: Focusing on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majors in local appli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alent training, such as outdated curriculum system, weak practical teaching, insufficient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unreasonable faculty structure and single evaluation method. Combined with the needs of reg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he orientation of applied talent training,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tegrated five-in-one" innovative talent training model of "curriculum, practice, industry-education, faculty and evaluation" from five dimensions: curriculum system, practical teaching,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faculty team and evaluation system. It aims to provide an implementation path for local appli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talent training and promote industry-education synergy development, and help the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chemical industry.

Keywords: Local appli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majors; Innovative talents; Training mode;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上接第 38 页)

[15] 戴龙. 数字经济产业与数字贸易壁垒规制: 现状、挑战及中国因应[J]. 财经问题研究, 2020(8): 40-47.

[16] 易永豪, 唐俐. 我国跨境数据流动法律规制的现状、困境与未来进路[J].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40(6): 135-147.

[17] 莫琳.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数据交易及其法律制度构建[J].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1): 117-127.

(责任编辑 刘成贺)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of Cross-border Digital Trade in Shanghai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Economy

CHANG Yanjun, ZHANG Shishang, WU Hehu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 Cross-border digital trade is becoming a new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a new engine for future trade growth. Shanghai is commit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digital trade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leve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and promo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digital economy. The article first summarizes the achievements of Shanghai's cross-border digital trade. Secondly, this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initial situation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Shanghai's cross-border digital trade development, and summarizes the five major problems of Shanghai's cross-border digital tra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economy: weak influence of trading platform, insufficient supply of digital core technology, cross-border digital economic trade barriers, government's policy support for local enterprises to be strengthened, and imperfect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market. In view of these problem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Shanghai to develop cross-border digital trade.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hanghai's economy.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Digital trade; Cross-border digital trad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黄河文化融入化工专业社会实践协同育人研究

孙浩冉¹, 杨 格², 王宇飞¹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1.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2. 音乐舞蹈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黄河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代表。它不仅蕴含着深奥的哲学思想,更蕴藏着丰富的课程思政资源与元素。在新时代背景下,黄河文化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为化工专业社会实践注入了深厚的动力源泉。化工专业社会实践是专业实践育人的重要途径。然而,在将黄河文化融入化工专业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仍存在对黄河文化的内涵认识不足、文化育人的氛围不够浓厚、化工课程思政的育人链条尚不健全等问题,亟须探索黄河文化融入化工专业社会实践的协同育人路径。通过构建思政引领与知识传授、专业理论与实践操作、校内课堂与校外实践、大众化需求与个性化培养的同频共振机制,最终实现协同育人的根本目标。

关键词:黄河文化;社会实践;协同育人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2.017

中图分类号:G122;TQ0-4;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2-00103-05

奔腾不息的黄河不仅润泽了广袤大地,更孕育出闻名遐迩的黄河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典型代表,黄河文化滋养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奋发图强、振兴中华^[1]。高校肩负着贯彻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使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承担着培养以交叉学科知识、创新思维和实践技能为核心的应用型人才的重任。中共教育部党组2017年12月印发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中提出“十大育人”体系,实践育人作为其中重要一环,在提升大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塑造健全人格、提升综合素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

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化工产业已迈入“绿色、智能、安全、高端”的全新发展阶段。在此背景下,社会对化工专业人才的需求日益呈现出复合化与多样化的趋势,对人才的实践能力尤其是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

求。社会实践是支撑化工专业高质量人才培养的重要着力点,将黄河文化融入化工专业社会实践,不仅有助于丰富化工专业实践教学的文化底蕴,对提升专业教学成效、实现毕业要求、达成人才培养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能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为化工产业输送大量具备扎实专业知识与高尚人文素养的复合型人才,具有重要现实价值。

一、黄河文化融入化工专业社会实践的价值意蕴

社会实践作为高校实践育人的关键路径,是指大学生凭借所学专业知识和在共青团组织与教师的指导下,走出校园、迈向社会,运用专业知识解决社会生产实际问题。就化工专业而言,社会实践形式涵盖统计观察类、志愿服务类和创新创业类等多种类型。在教育方法上,化工社会实践借助循循善诱

收稿日期:2025-11-27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新时代背景下以研究性教学模式为依托的创新型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研究”(2024SJGLX0565);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黄河文化育人专项系列项目“黄河文化融入应用型本科高校社会实践育人研究”(ZGJG202406HJB);2024年度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教学名师项目(郑工教[2024]9号);2025年度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学生工作研究课题“立德树人背景下辅导员与班导师协同育人机制探索与实践”(ZGXSGZ2025024)

作者简介:孙浩冉(1979—),男,河南南阳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教学方面研究。

的说理教育、躬身践行的实践教学以及润物无声的心理引导等方式,以潜移默化的手段促进大学生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品质,塑造求真务实的专业素养。从实际效果来看,化工社会实践巩固和深化了大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学习与掌握,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成效,强化了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与践行,引导大学生深入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并自觉落实于行动。而且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大学生将个人融入集体、把小我融入大我,其学习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均得到显著提升,对促进大学生全面成长成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3]。

黄河文化蕴藏着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思想政治教育元素,例如生生不息、耕耘不辍的奋斗精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情怀,甘于付出、不求回报的奉献精神,追求理想、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4]。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高校实施“三全育人”,要把立德树人的理念渗透到教育教学全过程。作为黄河流域本地化的特色思政教育资源,黄河文化更容易实现立德树人理念的渗透,使学生产生情感和精神上的共鸣。

因此,黄河文化融入化工专业社会实践,有着多重意义。首先,能够极大地丰富社会实践的内涵。黄河文化的融入,使得社会实践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专业性实践活动,而是被赋予了更加深厚的文化意义。例如,引导大学生从黄河文化的奋斗精神中,感受企业攻克各类技术难关、冲破国外企业技术垄断、实现多个“第一”并成长为行业佼佼者的艰辛历程;从包容情怀出发,鼓励大学生在实践中充分调动团队每名成员的聪明才智,接纳不同教育背景成员的观点意见,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形成最佳实践方案。其次,黄河文化的融入有助于显著提升青年大学生的文化自信。通过参观黄河流域相关古文化遗址、聆听黄河文化与化工产业发展渊源的学术报告等活动,帮助大学生深刻理解和认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深刻认识到黄河文化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重要贡献,进而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最后,黄河文化中的思政教育元素对青年大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塑造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以黄河文化的奉献精神为引领,教育大学生身处复杂的实践环境、面对艰苦的实践条件时,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斗志,坚守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品质,不计个人名利得失,全心全意投入到为人民服务中;以黄河文化的爱国情怀为激励,引导大学生将个人成长轨迹融入国家民族发展的宏大蓝图,与国家民族的未来紧密

相连,及早树立为国家化工事业贡献青春力量的远大志向,促进青年大学生在专业学习与社会实践中,实现思想道德素养与专业技能的协同发展,成长为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二、黄河文化融入化工专业社会实践的困境

(一) 黄河文化育人的氛围不够浓厚

在化工社会实践中,黄河文化育人的良好氛围尚未有效形成,这是制约黄河文化融入化工社会实践的最大障碍^[5]。沿黄高校的化工专业课程主要围绕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培养设置,缺乏与黄河文化相关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活动,在实践环节也未能将黄河文化有机融入其中,使得学生在化工实践中无法接触和感受到黄河文化的独特魅力与价值。例如,在化工实验教学中,教师往往只注重实验操作技能和理论知识的传授,忽视了引导学生从黄河文化的角度思考化工生产与环境保护、社会责任等方面的关系,导致学生对化工行业的认识较为片面,缺少文化底蕴和社会责任感。黄河文化育人氛围的缺失,使得化工专业学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难以将黄河文化的精神内涵与化工实践相结合,不利于化工行业的文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在企业层面,大部分沿黄化工企业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生产经营、市场拓展和技术研发上,对黄河文化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认识不深刻,缺乏将黄河文化融入企业发展战略和日常运营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这导致在化工企业内部,黄河文化的传播和教育活动开展较少,员工对黄河文化的了解和认知程度较低,无法充分发挥黄河文化对员工价值观塑造和行为引导的作用。

此外,公众对黄河文化在化工领域的应用和价值了解甚少,缺乏对黄河文化与化工社会实践融合的关注和支持。这进一步阻碍了黄河文化育人氛围的形成,使得黄河文化融入化工社会实践面临更大的困难。

(二) 对黄河文化的认识不足

从对黄河文化的内涵理解来看,大多数学生对黄河文化的认识仅停留在相关历史故事和传说上,或将其简单等同于黄河流域的一种地域文化,而对其深层次的精神内核——蕴含的哲学思想、道德观念、审美情趣等缺乏系统的认知。例如,黄河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对于化工行业的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大多数化工从业者和青年学生并未深刻领会这一思想的内涵,在实际生产中难以将其转化为具体行动付诸实践。

从黄河文化的价值认知来看,大多数人更多关

注化工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技术创新,对黄河文化在化工行业发展中的重要价值,尤其是在行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重视不够。黄河文化所蕴含的奋斗精神、创新精神,能够显著激发化工从业者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提升他们的职业素养和责任感。然而,由于对这些价值的认识不足,化工行业在文化建设方面相对滞后,缺乏文化底蕴的支撑,难以形成独特的企业文化和行业精神。

此外,对于黄河文化与化工社会实践关联性的认识也较为模糊。化工社会实践是一个涉及化工技术与安全、管理、环境等多方面的复杂活动,黄河文化中的诸多理念,如开放包容的文化胸怀、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与化工生产追求的“绿色、安全、创新”不谋而合。但青年大学生很难将黄河文化的这些理念与化工社会实践中的具体环节联系起来,更无法在实际生产中运用黄河文化解决问题、推动发展。这种对黄河文化认识的不足,制约了黄河文化在化工社会实践中的融入与发展,大学生取得的社会实践成果也缺乏应有的认可和重视^[6]。

(三)化工专业课程思政育人链条不健全

目前,虽然沿黄高校化工专业课程中均融入了思政元素,但化工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的结合不够紧密,存在“两张皮”现象。由于不同专业课程各自设计思政元素,彼此间缺乏统筹规划,黄河文化在化工专业课程体系中呈现碎片化、零散化状态。从专业整体角度看,黄河文化的融入更是缺乏全局性和连贯性,课程之间未形成协同效应。例如,“化工原理”课程中引用了黄河文化中关于勤劳智慧的思政内容,而在后续课程“化工工艺学”中,没有进一步深入挖掘黄河文化与化工工艺创新、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联,使得两门课程的思政内容没有建立系统联系,学生无法全面、系统、深入地学习黄河文化在化工领域的价值和应用。这种缺乏系统性的课程思政,难以构筑起完整的育人链条,更无法充分发挥黄河文化的育人功能。

三、黄河文化融入化工专业社会实践协同育人的路径探析

(一)加强黄河文化思政教育,实现思政引领与知识传授的同频共振

黄河文化为社会实践源源不断地注入了丰富多彩的思政教育元素。将黄河文化的往昔峥嵘岁月、蓬勃发展的现状以高清图片、视频等形式生动鲜活地呈现在学生面前,吸引学生深入研学黄河文化漫长的发展脉络、中国化学工业史(尤其是从古代传统化工技艺到近现代化学工业体系逐步完备的历

程),以及近代爱国实业家们在风雨飘摇的时代背景下,为实现实业兴国、实干兴邦理想而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河流域凭借其丰富的资源,成为我国重要的化工、能源、原材料和基础工业基地,该流域的稀土、煤炭等矿产资源储量在全国名列前茅,这条“能源流域”为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充足的能源保障。黄河流域的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黄河几字湾都市圈、兰州——西宁城市群等五大城市群以煤油气开采、有色金属、氯碱化工等重化工产业为主导,辐射延伸至石油化工、精细化工、化工新材料等领域,在全国化工产业中占据领先地位,并在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领域积极布局,且初显成效。

大学生在深入学习中,专业自豪感油然而生,专业自信不断增强,学习热情被持续点燃,参与社会实践的动力也日益提升。在黄河文化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全方位浸润下,学生的个人定位与奋斗目标逐渐明晰,勇于将个人价值的实现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中,在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的过程中找准自身位置,充分展现个人价值,赢得社会的尊重与认可。

(二)优化教学和课程设置,增强专业理论与实践操作的同频共振

通识课、专业课、实践课构成了高校化工课程教学体系。通识课承担价值引领的主旋律作用,专业课和实践课分别承担知识传授和实践能力培养的任务。为实现思政引领与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的有机统一,需通过通识课把控思政方向、专业课穿插课程思政、实践课检验思政效果,实现德育与智育的协调发展。

高等院校尤其是地处黄河流域的高校,应深入探究黄河文化基因,在深度挖掘黄河流域能源化工典型案例的基础上,将黄河文化所蕴含的思政元素有机融入校本特色课程,进而纳入化工专业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之中。以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为例,该校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紧密结合专业特色,围绕黄河文化开设“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人体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化学与社会”“中国饮食文化”等通识课程,将黄河文化相关的课程思政元素融入“有机化学”“化工安全与环保”“碳减排与资源化利用”“绿色化工”等专业课程,获批河南省课程思政样板课程2门、校级课程思政样板课程3门。继而将黄河文化作为一个模块有机融入化工专业人才培养体

系,多角度、全方位深化学生对黄河文化、可持续发展理念、生态文明与环境保护、绿色发展等领域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增强理论知识对社会实践活动的指导效能,提升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7]。

在实践实施层面,围绕提升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的目标,对社会实践的教学目标、实践内容、组织形式以及考核与评价方式进行优化。采用小组合作和基于问题的学习(PBL)教学模式,在项目策划、实践培训、项目实施、成果展示与汇报等全流程环节,秉持“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着力培养和锻炼学生的团队协作、组织协调、语言表达、动手操作、问题解决和工程创新等素养。通过社会实践,使学生清晰地发现自身不足,进而完善知识结构、不断提高实践能力。同时深入了解并切身体验当前化工领域的重点、难点问题及发展前景,加深外部势力对化工领域“卡脖子”问题的认知,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大事、民生民情,聚焦国家科技与社会发展,积极投身国家经济建设之中。

(三)加强校外实践基地建设,形成校内与校外的同频共振

充分挖掘并高效利用属地资源,构建并强化校地联动长效机制,是提升化工专业社会实践教学质量的关键路径。河南高校应积极与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河南心连心化工集团等一批在化工领域具有显著影响力与资源优势的企业展开深度对接,双方基于人才培养、技术研发与产教融合等多维度需求,协同共建校外实践基地。一方面,通过校外实践基地建设,将社会实践范围逐步拓展至企业的研发生产、运营维护、物流配送等多个关键环节,帮助学生更全面地了解典型化工企业的生产运营流程;另一方面,制定社会实践长期规划,合理安排学生在不同学期、不同学习阶段进入相关企业开展社会实践,解决单次实践时间短、浅尝辄止的问题,确保学生有足够的机会和时间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深度融合。针对实践项目单一的问题,精心设计多元化实践项目,包括化工工艺优化、新产品研发、环保技术应用等,满足不同专业方向学生的实践需求。同时,聘请企业专业技术人员担任实践指导教师,与校内教师组成指导团队共同指导社会实践,既能充实实践指导团队的师资力量,又能发挥校内外导师的各自优势,更好地引导学生从实践表象观察深入到对技术原理、产业发展规划的深度探究。

以产学研合作项目为依托,对宁夏、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沿黄区域的能源化工企业开展系统调研。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助力企业优化生产布

局,推动化工联产技术发展,帮助企业从单一化工生产模式向“煤、电、化、热”一体化生产模式转变,推进化工产业链的补链、延链与强链,有效提高资源利用率和能源转化效率。例如,将煤液化、煤气化、煤制烯烃等大型煤化工装置与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有机整合,实现煤化工、电力、热力的联产及负荷的双向调节,同时积极开展技术革新,致力于节水减排、降低能耗,进而有效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此外,积极开展沿黄生态环境调查、沿黄化工企业污染调查、水土保持、垃圾分类等实践活动,助力沿黄流域城镇开展环境综合整治,美化乡村卫生环境,提升区域公共服务质量。采用“基地+项目”的模式,一方面可为企业解决生产技术难题,帮助提高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缓解高校在社会实践资金投入紧张的困境。同时,还可锻炼学生的专业能力与综合素质,激发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积极性,引导大学生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促进他们以实际行动提升自我、服务社会,最终实现高校、企业与学生三方共赢。

(四)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大众化与个性化需求的同频共振

在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蓬勃发展的背景下,第四次科技革命已悄然兴起。以 ChatGPT、DeepSeek 为典型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正深刻影响和改变着高等教育的进程。高校应顺应人工智能与高等教育融合的趋势,借助人工智能所拥有的海量数据,匹配与之对应的黄河流域化工实践资源,同时充分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通过依据个体的知识掌握程度、学习兴趣、学习习惯等因素,运用智能评测手段对学生的学习风格进行评估,采用贝叶斯网络方法推测学习风格,并以 Felder-Silverman 学习风格模型设定相应维度,经过多维度的分析与推测,为学生量身打造个性化的社会实践方案。此外,人工智能辅导系统能够全天候为学生提供帮助与多元评价,针对学生在各个阶段提交的作业、实践成果报告等,给予及时、准确、客观的评价与反馈。

虚拟现实技术(VR)和增强现实技术(AR)具备即时性、沉浸感以及系统集成度与整合度高的优点。在多数课堂教学中,黄河流域不同历史时期化工生产的场景难以再现或模拟,而借助 VR/AR 技术则能够轻松实现此类场景的重现。例如,模拟重现侯氏制碱法的工艺过程——原料准备、氨化、碳化、过滤洗涤、加热分解以及纯碱的分类与干燥,让学生仿佛身临其境,得以近距离观察和体验侯氏制碱法的

生产流程、工人劳作的场景。结合当时时代背景,学生能够沉浸式地感受其历史意义,进而触发对科技与文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深度思考,提升自身的职业道德素养与社会责任感。在合成气制备甲醇实践中,学生首先学习相关基本概念、工艺流程和操作步骤,例如换热、固定床反应器的分类、列管式反应器特点、传热特点等,随后通过手柄完成实践操作,即从甲醇分离器得到的液相产物减压后送入闪蒸罐完成闪蒸,蒸气通过闪蒸出口排出,进入燃料气网或火炬系统,粗甲醇则进入精馏塔进一步纯化^[8]。学生能够近距离观察和记录甲醇完整的精馏过程,有助于强化学生的逻辑思维,增强其探究实践能力,从而更有效地培育学生的创新思维。

四、结论

黄河文化作为中华文明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将黄河文化深度融入化工专业社会实践,持续深入挖掘黄河文化的丰富内涵,探究其在实践育人方面的价值,形成思政引领与知识传授、专业理论与实践操作、校内与校外、大众化与个性化需求之间的同频共振,能够提升化工专业的育人效果,实现协同育人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李灵芝. 基于《黄河文化》探索黄河文化的教育价值[J]. 人民黄河, 2023, 45(2): 166.

[2] 张玉启. “三全育人”视域下教育对口支援联合社会实践育人长效机制建构研究[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2(3): 153-160.

[3] 任然. 黄河文化的精神特质与传播路径研究[J]. 传播与版权, 2024(4): 87-90.

[4] 余景波, 高娜娜, 曲巧鹏. 基于黄河文化的沿黄高职院校专业课程思政育人探究[J].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4, 24(1): 40-44.

[5] 豆叶青, 马潇潇, 郑昕昱. 黄河文化精神融入课程思政育人教学研究: 以河南高职院校土建类专业为例[J]. 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21, 35(4): 87-90.

[6] 李文涛, 鞠永干. 地方工科院校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新探: 以南京工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为例[J]. 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11(3): 23-25.

[7] 霍婧, 赵卫东. 对黄河流域现代煤化工产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建议[J]. 科技中国, 2021(8): 22-24.

[8] 亚力昆江·吐尔逊, 买尔哈巴·阿不都热合曼, 黄河. VR技术在化工专业“认识实习”课程中的应用探讨[J]. 化学工程与装备, 2024(1): 162-164.

(责任编辑 许峻)

Research o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of Integrating Yellow River Culture into Social Practice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Majors

SUN Haoran¹, YANG Ge², WANG Yufei¹

(1. College of Materials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2. College of Music and Dance,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Yellow River Culture is vast and profound, and is an excellent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 culture. It not only contains profound philosophical ideas, but also contains ric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sources and elements in the curriculum. In the new era the Yellow River Culture has been endowed with new significance, injecting a profound source of strength into the social practice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It is an important way to cultivate students through professional practice for social practice in chemical engineering.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ng Yellow River Culture into social practice in chemical engineering,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Yellow River Culture, weak atmosphere of Yellow River Culture education, and incomple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hain in chemical engineering courses. To explore the path of integrating Yellow River Culture into social practice and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in the field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we try to form a resonance betwe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guidance and knowledge imparting, professional theory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on campus and off campus, popularization and personalized need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Keywords: Yellow River Culture; Social practic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人工智能时代中国就业市场“英语+”能力需求分析与 英语专业人才培养范式转型探析

——基于“智联招聘”数据的实证研究

何芳, 张国强, 黄河玥, 郭晋茹, 殷洁

(浙江农林大学 暨阳学院, 浙江 诸暨 311800)

摘要: 基于智联招聘平台 4677 条英语相关岗位有效数据, 运用文本挖掘及可视化方法, 考查人工智能时代我国就业市场对“英语+”能力的需求特征, 并提出英语专业人才培养范式转型路径。数据显示: 基础语言处理类岗位呈明显下降趋势, 听说类基础能力仍是职场刚需, 与技术相关的新兴能力需求显著增长, “英语+”复合型能力日益受到市场青睐。当前英语专业教学在基础能力培养、技术融合及复合能力建构等方面, 与市场需求存在明显脱节。提出“双轨并行”的“三维”课程体系, 通过夯实语言能力、融入行业内容、整合技术素养, 构建“语言—专业—技术”协同的能力培养链, 为人工智能时代英语专业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关键词: 人工智能; 市场需求; “英语+”能力; 技术融合; 转型

DOI: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2.018

中图分类号: G434; H31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715(2026)02-0108-07

生成式人工智能出现之前, 英语听说能力的工资回报显著高于读写能力^[1], 且口语表达能力的溢价远大于听力能力^[2]。但随着 AI(如 ChatGPT) 的出现, 基础英语技能的价值被大幅削弱, 仅具备基础语言能力者极易被自动化替代。以市场对英语人才的需求为例, “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 原本引以为傲的外语技能、翻译技能, 在很大程度上、很大范围内被人工智能超越”^[3]。例如, “ChatGPT 发布后, 平台上受影响较大的写作类相关自由职业者月工作量减少 2%, 月总收入下降 5.2%”^[4]。Wang et al. (2023) 的实证研究预测, “未来几十年内, 中国 54% 的工作将被 AI 取代”^[5]。

在此背景下, “大批量单纯培养仅懂外语的人才显然已成为过去时, ‘外语+’或‘+外语’的多样化复合型专业人才培养, 是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机遇”^[3]。《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上)——英语类专业教学指南》(2020) 均指出, 外语类专业应适应我国对外交流需求, 注重培养外语人才的国际视野、协同合作能力、跨文化理解与表达能力、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 造就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沟通能力和人文素养的复合型外语人才。其中, 在全球胜任力维度上, 跨文化协作与技术创新等能力需求尤为突出。因此, 适应形势发展需要, 探索英语专业人才培养范式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一、研究综述

人工智能带来的英语能力需求变化已引起学术界的密切关注。早期研究, 如 Azam et al.^[6] 和 Guo & Sun^[7] 指出, 英语的经济回报强烈依赖具体语境。但 Yan et al. (2024) 的研究(虽未涉及英语专业学生)显示, AI 时代求职者的英语能力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依然发挥重要作用^[8]。随着科技及生成式人

收稿日期: 2026-01-15

基金项目: 浙江农林大学高教研究项目“人工智能驱动下英语专业‘语言智能+人文素养’复合型人才培养路径探索”(GJYY202518)

作者简介: 何芳(1971—), 女, 河南罗山人, 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英语教学研究。

工智能的发展,标准化程度高、流程固定的任务因技术成熟而迅速被自动化,“包括会计、编辑、销售及程序等知识密集型白领工作,工作内容涉及大量的文本处理和资料整合”^[9],具有较高替代率。Zhou et al. 的实证研究预测:“到 2049 年,中国将有 2.78 亿劳动力被人工智能取代,占当前中国就业人口的 35.8%。”^[10]这表明,人工智能的发展必将导致市场对纯语言技能需求明显下降。

然而,Huang & Rust 认为:“需要语境解读、文化敏感性或情感影响的任务(如心理治疗、谈判等)仍由人类主导,因为 AI 目前在同理心智能方面还存在一定局限。”^[11]此外,“尽管翻译知识在翻译工作中至关重要,但市场大多要求毕业生具备与业务和职位相关的通用专业知识和技能”^[12]。这表明,在 AI 替代基础语言任务的背景下,市场需求转向“英语+”复合能力。LinkedIn 2023 年报告显示,雇主越来越倾向于寻找具备人工智能专业知识的人才,过去八年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招聘需求激增 323%。

但行业不同,需求差异也较为显著,“跨境电商人才需兼具英语沟通能力、国际商法基础及数字营销技能,三者缺一不可”^[13]。智慧课堂要求教师“将 AI 工具(如语音识别、写作批改系统)与语言教学目标深度融合”^[14]。这些都充分说明,语言能力已不再是孤立技能,而是整体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英语专业人才培养范式转型已是必然趋势。目前,高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范式转型已形成三大实践路径:一是课程重构,如新增商务英语写作、商务英语选读等专业方向必修课,并将绝大多数金融商务方向必修课程改造为全英文课程,力求实现金融、商务方向知识与英语专业知识的有机融合^[15],增设“AI 辅助翻译”“本地化工程”等课程,结合案例教学与虚拟仿真平台,强化技术应用能力。二是复合能力培养。刘湘丽提出“‘批判性思维+跨文化设计’的复合能力,通过跨学科项目制学习实现能力整合”^[16],并借助数字化技能应用提升人机协作水平。三是校企协同育人模式构建,例如:陈璇和施力文主张校企合作共建跨境电商实训基地,通过真实项目协同育人,培养复合型人才^[17]。

以上路径,尤其是前两条更适用于商务英语、翻译专业,缺乏普适性。总体来看,当前高校英语专业存在技能培养与知识、能力割裂,思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等高阶能力训练不足等问题。更为关键的是,课程设置无法满足市场专门需求、与地方经济发

展需求脱节、社会服务功能缺失、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错位,因此,英语专业人才培养范式转型亟须以市场和行业需求为导向,构建动态调整机制。

综上,以往研究揭示了人工智能对市场英语岗位需求的重塑作用,但对中国劳动力市场英语及“英语+”能力需求特征的呈现不够全面,行业需求差异缺乏系统量化分析;现有转型方案多建立在个案基础上,缺乏大规模数据支撑,且对策不具备普适性。鉴于此,本研究突破传统问卷调研的局限,采用文本挖掘方法,对智联招聘平台相关数据进行深度解析,着重回答三个问题:人工智能背景下,中国就业市场及不同行业对英语及“英语+”能力的需求特征如何?其行业差异体现在哪些方面?人工智能时代英语专业应如何实现转型?力图清晰呈现人工智能背景下市场、行业对英语及相关复合能力的需求,为构建与 AI 共生、与产业同频的英语人才培养机制提供实证依据。

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智联招聘”平台依托大数据和 AI 技术,能够提供全面的人才市场信息。因此,本研究选取“智联招聘网”作为主要数据来源,借助八爪鱼软件,以“英语”“国际”“国贸”等为筛选关键词,采集的字段主要包括“岗位名称”“岗位描述”“公司名称”等。初步获取与英语相关的职位招聘信息共 4823 条。

为提升分析的准确性,本研究首先运用 Python 中的 Pandas 库,清理初始数据中的空白条目、重复记录、内容不完整及无效信息等,随后通过人工筛查,进一步排除与英语专业关联性较弱的职位,最终得到有效招聘信息 4677 条。

(二)分析方法

为深入探究招聘市场对英语专业毕业生的能力需求,本研究采用 KH Coder 软件开展文本分析。具体步骤如下:第一,以“英语”“能力”为核心词,提取其左侧 5 个、右侧 5 个共现词的频率,并以词云图形式直观呈现招聘市场对求职者英语语言能力及综合能力的需求特征;第二,为进一步厘清不同行业对英语专业毕业生能力需求的差异,本研究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 版)》,结合政策热点与市场实践,将招聘条目归类为 9 个行业,分别为:信息互联网、房地产建筑、批发与零售、教育与培训、金融保险、贸易与进出口、制造业、服务业及其他。

在分析各行业对毕业生的能力需求时,本研究采用“概念合并映射法”:例如将“听说”“听力”“听”“说”“口语”等关键词统一映射为“听说能力”,将“数据分析”“数据处理”“统计”等关键词映射为“数据分析能力”,以此提取各行业对英语专业毕业生的具体能力需求。

三、市场对求职者英语及相关能力需求的多维分析

以“英语”“能力”为核心词的词频共现可视化结果显示,当前就业市场对英语及其关联技能的需求呈现出鲜明的分层特征:语言不再是孤立的考核项,而是被嵌入职业场景,与无形的职业素养一起构成了“合金能力”。与此同时,职业能力需求呈现出以沟通能力为核心、专业化能力为主导、数字化素养为延伸的立体化特征。

(一) 英语能力需求:从语言工具到复合能力

在以“英语”为核心词的词云图中,“口语”(1067次)、“听说”(774次)、“读写”(789次)等高频词,反映出市场对语言交际能力的重视。在企业中,“英语听说和阅读能力的工资溢价分别介于20.5%~27.9%和25.9%~35.8%之间”^[18]。与“英语”共现的其他高频词,如“教学”(819次)、“培训”(143次)、“国际”(750次)、“商务”(658次)等,说明市场要求求职者在具备英语技能的同时,还应具备相关行业知识,如教育教学、商务、贸易等领域知识。这表明,市场需求不再局限于语言基本技能,而是转向专业化与场景化应用,例如在跨境商务、外贸谈判等场景中,要求求职者具备“英语+”复合能力。Ren Xiaobin & Wang Lin 关于外语专业研究生起薪影响因素的研究证实,在外语类毕业生中,“专业硕士(如MTI翻译硕士)的平均起薪显著高于学术硕士,尤其当专业技能与市场需求高度匹配时,薪资优势更明显”^[19]。

此外,“翻译”(269次)的频次明显低于听说读写技能,这可能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对语言服务行业的影响密切相关。欧盟委员会报告(DGT,2024)显示,机器翻译的广泛应用导致基础笔译岗位缩减,但译后编辑岗位却增长了40.7%。中国社会科学网2025年的一篇报道指出,2024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受生成式人工智能影响,超过四分之三的翻译人员收入出现下降。诚然,人工智能时代不仅呼唤具备“翻译批判性、翻译创造性、翻译沟通和翻译情感”^[20]等高阶思维能力的翻译人才,也使翻译行业的“技术转向”愈加显著。

总之,以上分析表明,英语基础技能仍然是求职者进入职场的必备工具,但提升专业技能复合水平与应用能力,才是英语类求职者保持市场竞争优势的关键。

(二) 职业能力需求:沟通为核,专业为翼

以“能力”为核心词的词云图显示,与“能力”共现排前10位的高频词有:沟通(2415次)、英语(1452次)、听说(1119次,其中口语出现438次)、表达(869次)、读写(729次)、团队(757次)、协作(706次)、协调(685次)、学习(604次)、谈判(349次)等;其次是相关专业技能,如管理(282次)、教学(259次)、商务(240次)、外贸(131次)、销售(125次)、翻译(78次)、数据分析(76次)等。从中不难发现,市场对英语相关技能的需求呈现“语言基础与行业能力并重”的双轨态势。

首先,语言能力仍是市场的基本需求。然而,沟通能力作为基础性核心语言能力,其内涵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语言表达,而是扩展到跨文化协调、协作与冲突处理等多维能力素养。这种需求的转变,与当下中国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决策高度一致。也即是说,“中国外语教育必须使学生具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要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发展其全球胜任力”^[21]。

其次,管理、教学、商务、外贸、销售等专业技能的市场需求充分说明,相较于单一语言能力者,“英语+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更具竞争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数据分析”能力虽仅出现76次,但这种AI时代的新型能力需求,体现了数字化发展正改变着职场对专业素养的需求构成,表明技术适应能力已成为当代职业素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再次,传统翻译能力出现频率虽较低,但并不代表其价值消失,而是反映了市场对翻译能力需求的转变。AI时代市场需要的不再是简单的语言翻译,而是能够运用技术工具,具备跨领域知识整合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王华树 & 刘世界构建的译后编辑能力模型显示,“译后编辑服务者除语言能力外,还须具备工具、策略、管理、主题领域、心理和生理等多种能力”^[22]。

总之,数据表明,语言与职业能力正呈现三大转型趋势:从孤立技能转向能力融合,从通用标准转向场景分化,从纯人工操作转向人机协同。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英语相关职位中“语言+领域知识”型岗位必将逐年增加。因此,注重学科交叉、创新培养模式,是革新我国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的路径之一。

四、行业对求职者的能力需求分析

基于 4677 条有效招聘信息的行业归类与能力需求的热力图显示,当前就业市场对英语及相关复合能力呈现出差异化的需求格局。各行业对英语“沟通”能力的需求最为显著,其中房地产与建筑行业的需求占比达到 84.4%,而教育与培训行业最低,为 67%。这与前述两个词云图显示的结果一致,即听说读写的综合语言能力依然受到各行业的普遍重视。

数据还显示,“听说”能力的行业需求均值为 53%,在房地产与建筑(84.8%)及贸易与进出口(82.5%)行业表现突出,说明语言基本功与沟通效能高度依赖话语互动的职场实践中具有关键作用。而“读写”能力需求水平则较低,除批发与零售行业(52.5%)外,行业均值仅为 32.4%,这与 AI 技术在文本自动处理领域的应用不断增强密切相关。此外,“翻译”能力在多数行业需求占比低于 30%,仅房地产与建筑(37.9%)和金融与保险(37.5%)略高,该趋势与此前数据反映的翻译能力需求整体回落相一致。

该热力图还揭示了 AI 时代“英语+”能力需求的三项显著结构性特征。第一,基础技术素养呈现跨行业普遍需求,如办公软件、视频会议系统操作等办公技术。“技术(办公软件操作)”能力在各行业需求均值为 33.1%,其中金融与保险(38.5%)、信息技术(37.5%)等行业需求更为突出,体现了数字技术对基础工作方式的重塑,推动市场对数字素养与相关技能需求的提升。然而,在技术融合层面,英语专业人才培养尚无法满足市场需求。2023 年教育部调查显示,70% 的外语专业本科课程未涉及 AI 相关内容,如机器翻译或语料库技术,说明高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中的技术赋能机制存在明显短板。第二,数据能力在行业间呈现显著差异。“数据分析”能力需求在信息技术(9.1%)与批发零售(8.5%)行业较高,约为教育与培训行业(1.3%)的 7 倍,显示“数据驱动型语言服务”正形成新趋势。已有研究表明,“人工智能水平每提高 1 个单位,高技能劳动力就业率上升 1.6%”^[23]。然而,高校英语专业仍偏重学生语言技能训练,尚未形成“语言—专业—技术”三维融合的能力链条。尽管国内绝大多数高校英语专业开设了商务英语类课程,但行业模块与语言训练往往呈现“两张皮”的割裂状态,势必导致毕业生在“英语+”岗位的胜任力偏低。第三,AI 能力需求初见端倪,并呈现行业分化特征。

尽管“人工智能”相关能力当前整体需求较低(均值 3.2%),但信息技术行业(5.8%)的需求具有前瞻指向性。这一趋势表明,行业智能化需求正重塑市场能力需求结构,技术融合将持续推动能力体系的动态演进。

此外,从热力图中可明显看出,行业对语言能力的需求具有明确的实践导向。例如,房地产与建筑行业的岗位不再侧重文学文本阅读与分析能力,而是强调听说等面向实际应用场景的沟通技能。尽管市场愿意为高度匹配的能力支付额外溢价,但现有英语专业培养体系尚不能有效供给此类人才。高校英语专业仍以课堂讲授为主,语言应用能力训练不足,制约了学生在真实职场场景中的沟通能力。加之英语专业教学极少融合技术类课程,致使学生技术能力缺失,难以适应智能化工作环境。更为突出的问题是,“英语+”复合能力培养缺乏深度融合,复合培养模式下学生学习负担加重,既未能扎实掌握语言技能,专业知识也流于表面,整体竞争力不足。

五、英语专业人才培养范式转型路径设计

(一)英语专业人才培养范式转型方向

为适配市场对英语人才的需求,英语专业人才培养亟待完成从学科导向向能力导向的范式转变。束定芳也曾明确指出:“英语专业的出路,不在于坚守纯文学领域,而在于融入产业发展的价值链。”^[24]可见,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重新确立语言教育的价值定位,专业目标也须从强调“人文素养培育”转向注重“职业效能提升”。

首先,“突破理论主导的教学传统,增强语言的实际应用效能”^[25]。这需要在教育教学中引入企业谈判、跨国项目协作等真实语料,替代传统文学阅读,强化学生在专业语境中的话语实践能力。这就要求英语专业重新定位培养目标,建立以职场能力为中心的教育范式,使英语专业教育精准对接职场能力需求。

其次,为适应 AI 时代市场对数字化素养的强劲需求,高校英语专业应构建人机协同的数字化教学体系,推动技术类课程深度融合。以翻译专业为例,可将计算机辅助翻译(CAT)、Python 数据分析等纳入必修实践环节,使学生掌握工具操作技能,从而更好地适应“人机协同”翻译等相关岗位。此外,译后编审工作对技术伦理素养要求较高,因此,英语专业还需开设“翻译技术伦理”课程,强化学生对算法偏见的判别能力,培养技术伦理素养,提升

未来职场胜任力。更重要的是,“AI 提示设计”“多语种语料处理”等已成为翻译编审岗位的必备能力。同时,建议采纳“敏捷课程模式”,每学期依据招聘市场数据更新相应教学内容,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最后,由于各高校办学定位与英语专业培养目标差异较大,高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范式转型应依据院校特点“突出人才特色,避免人才培养同质化问题”^[26],即采取差异化发展路径:具有行业背景的高校应着力推进“英语+专业领域”深度融合;综

合性大学可侧重培养国际组织所需的高端人才;地方应用型高校则可采用“微专业+学徒制”模式,主动对接区域产业需求,将实际项目融入教学过程。

(二)“双轨并行”的“三维”课程体系构建

为实现转型目标,本文提出“双轨并行”体系(图1)与“三维”课程框架(图2)协同整合的改革方案,以期通过重构能力培养链、提升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的适配度,解决英语专业教育中存在的基础能力不足、技术素养缺失及复合能力薄弱等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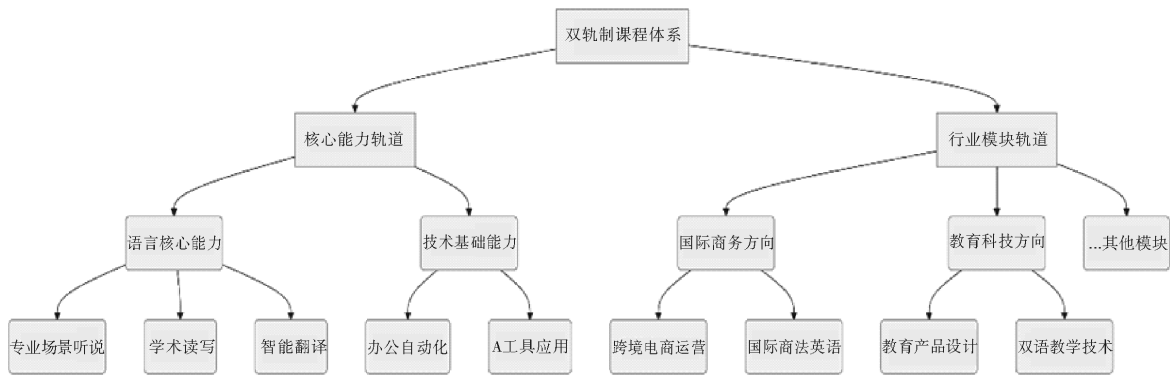


图1 “核心能力+行业模块”双轨制课程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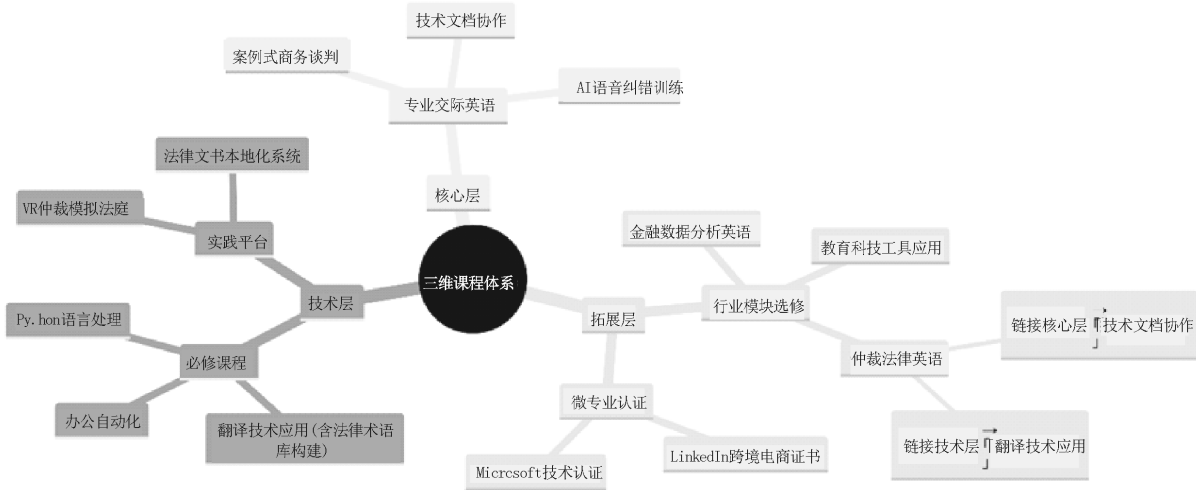


图2 英语专业“三维”课程体系架构图

“双轨”指“语言核心技能”与“行业技能”两种能力并行发展、同步提升,可从教学内容与结构层面解决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错配问题,确保高校英语专业教学沿着正确方向推进转型。“三维”框架则是基于“基础技能—技术融合—赋能教学”梯度进阶设计的教学架构,以期逐步破解英语教学效能难以适配 AI 时代市场快速变化的瓶颈。具体如下:

“双轨”中的左轨即“语言核心能力轨道”,重点培养学生高阶听说能力,以满足市场对语言基础技能的持续需求。教学中,教师应调整原有文学阅

读文本,增加专业场景听说材料,强化听说训练,并依托 VR 模拟等技术,培养学生在真实场景中的沟通能力。此外,教学中还应开设 AI 语言工具应用相关课程,通过各类技术平台实操,提升学生人机协作水平。与语言技能轨道并行的是“行业技能”轨道,其核心是强化学生专业应用能力。例如,若英语专业学生未来职业方向为国际商务,教师在讲授国际商务知识的同时,应增加行业实践素材,如阿里巴巴国际站、Amazon 等平台的销售报告与数据分析材料,指导学生阅读、理解与分析实际商业数据,提前

开展行业实战演练,实现“英语+”能力的深度复合,切实提升学生专业能力与市场竞争力。此外,为减轻学生学习负担,两轨之间可通过弹性学分机制实现有机衔接,推动语言技能与行业知识深度融合。

“三维”课程结构包含核心层、技术层与拓展层,主要服务于“双轨”教学的实践需求。其中,核心层通过引入真实行业语料与案例、还原行业真实场景,着重强化基础技能的实践运用,同时辅助培养学生的技术能力。夯实基础后,学生在技术层课程的学习中将更为顺畅。技术层开设技术必修课、实践课等课程,结合翻译、法律、商务、贸易等专业方向构建智能化教学支持体系;依托 Python 语言处理等技能课程,提升金融英语等专业领域的数据分析能力;借助“法律文书本地化系统”等实践平台,模拟合同智能审查流程,推动数字化素养与行业实际需求有效对接。具备“基础技能+行业技术”能力后,学生可顺利进入专业拓展层学习,接受多维能力训练与培养。拓展层作为多维能力整合体系,衔接核心层与技术层,融合语言基础与专业能力,实现“英语+”复合能力培养。以“仲裁法律英语”模块为例,其向上衔接核心层的技术文档解读能力(如 ICSID 条款解析),向下引入技术层法律术语库构建工具的实操训练,横向结合 VR 仲裁法庭模拟以提升抗压能力,形成多维贯通的能力培养链路。

总之,“双轨”+“三维”的转型路径构建起“双闭环”机制,通过动态连接与具体化“语言—专业—技术”三维能力链,培养兼具扎实语言能力、国际视野与领域专长的“英语+”复合型外语人才。

六、结束语

智联招聘数据分析表明,人工智能时代我国就业市场对“英语+”能力呈现出结构性需求特征。尽管语言技能仍是职场必备能力,但单一语言技能已不再具备竞争优势,融合语言、技术与行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更具竞争力。因此,英语专业人才培养范式的转型,必须走“基础能力+专业技能”的二元培养路径。此外,新兴能力的市场需求日益凸显,这要求英语专业从根本上打破偏重语言单一技能的培养模式,重构人才培养体系,建立能够敏捷响应市场变化的动态调整机制。基于此,本文提出的“双轨”课程体系,构建了语言核心、智能技术与专业拓展的“三维”能力框架,以期化解传统英语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之间的适配矛盾。

然而,本研究存在一定不足之处:数据来源较为单一,且缺乏横向数据的历时分析。未来应该:扩大

招聘数据收集范围,丰富数据来源,增强研究结论的普适性;结合技术演进建立持续追踪机制,获取更全面的市场需求演变信息,开展横向数据的历时分析与纵向数据的共时研究。

总之,AI 时代英语专业人才培养范式的转型已迫在眉睫。但转型并非局限于课程层面的简单调整,而是需要将语言教育全面融入产业动态与技术发展的大环境中,系统变革外语人才培养范式,精准对接人工智能时代新型外语人才的市场需求。

参考文献:

[1] 霍灵光, 陈媛媛. 英语技能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溢价测算[J]. 南方经济, 2017(12): 81.

[2] 赵颖. 语言能力对劳动者收入贡献的测度分析[J]. 经济学动态, 2016(1): 32.

[3] 王克非. 外语学科面向 AI 时代的转型与发展[J]. 外语电化教学, 2023(6): 3-7.

[4] HUI X, RESHEF O, ZHOU L. The Short-term Effects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an Online Labor Market [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24, 35(6): 12-13.

[5] WANG C, ZHENG M, BAI X, et al. Future of Jobs in China under the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J].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2023, 55(5).

[6] AZAM M, CHIN A, PRAKASH N. The Returns to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in India [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13, 61(2): 335-367.

[7] GUO Q, SUN W. Economic Returns to English Proficiency for College Graduates in Mainland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4 (30): 290-300.

[8] YAN X, CHUNG P L, Zhang C. Economic return of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Do English proficiency scores predict employee income in China? [J]. Studies in Language, 2024, 13(1): 108-140.

[9] 张丹丹, 于航, 李力行, 等. 中国人工智能技术暴露度的测算及其对劳动需求的影响: 基于大语言模型的新证据[J]. 管理世界, 2025(7): 60.

[10] ZHOU G, CHU G, LI L, et al. The Effe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China's Labor Market [J]. China Economic Journal, 2020, 13(1): 30.

[11] HUNG M H, RUST R 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Service [J]. Journal of Service Research, 2018, 21(2): 160.

[12] LI L, DANG Q, ZHAO K. Embracing Transdisciplinarity to Prepare for the Future: Revisiting the Gap Between the Labour Market and Translator Education [J].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2023, 19(2): 473.

[13] 陶泽邦. 外贸行业岗位能力需求分析和研究: 以中国进

出口商品交易会为例[J]. 商展经济, 2021(24):94.

[14]张敬源, 赵红艳.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大学英语教学创新路径[J]. 外语学刊, 2024(2): 87.

[15]胡开宝. 复合型、研究性和国际化英语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理念与实践:以上海交通大学英语专业教学改革为例 [J]. 中国外语, 2010(6):13.

[16]刘湘丽. 人工智能时代的工作变化, 能力需求与培养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4): 103.

[17]陈璇, 施力文. 产教融合视域下跨境电商微专业建设研究[J]. 中国教育技术装备, 2023(17):46.

[18]程虹, 刘星滢. 英语人力资本与员工工资:来自 2015 年“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的经验证据[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1): 34.

[19]REN X, WANG L. A 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Starting Salary of Foreign Language Postgraduates[J]. Journal of Humanities, Arts and Social Science, 2025, 9(2): 331.

[20]张静. 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翻译高阶思维教学模式构建[J]. 中国翻译, 2024(3):71.

[21]梅德明. 新时代外语教育应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N]. 文汇报, 2018-02-09.

[22]王华树, 刘世界. 人工智能时代机器翻译译后编辑能力探究[J]. 中国科技翻译, 2022, 35(4):22.

[23]张美莎, 曾钰桐, 冯涛. 人工智能对就业需求的影响:基于劳动力结构视角 [J], 中国科技论坛, 2021(12): 130.

[24]束定芳. 高校英语专业“复兴”之三大路径 [J]. 中国外语, 2015(5):6.

[25]柴湛涵. 英语专业转型是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 [J]. 当代外语研究, 2018(6):64.

[26]曾健坤. 地方院校英语专业的危机症候反思及其转型发展 [J]. 大学教育科学, 2015(4):51.

(责任编辑 许峻)

Analysis of "English+" Competency Demands in China’s Job Market and
Exploration of Talent Training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for English Majors in the AI Era

——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Zhaopin. com Data

HE Fang, ZHANG Guoqiang, HUANG Heyue, Guo Jinru, YIN Jie
(Jinyang College, Zhejiang A&F University, Zhuji, Zhejiang 311800, China)

Abstract: Using a data set of 4677 English-related job postings from Zhaopin. com platform, this study employs text mining and visualization techniques to investigate the demand for "English+" competencies in China’s labor market during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ra and proposes pathways for transforming the talent training paradigm for English majors. The findings reveal a marked decline in positions requiring basic language processing skills, whereas foundational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bilities remain essential. Concurrently, there is growing employer demand for technology-related emerging skills and integrated "English+" competencies. However, current English programs exhibit a clear misalignment with market needs in foundational skill development,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and composite competency cultivation. In response, this study proposes a dual-track, three-dimensional curriculum framework designed to construct an integrated "language-discipline-technology" capacity-building chain through enhanced linguistic training, industry-specific content integration, and digital literacy development, providing strategic insights for reforming English major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rket demand; English-plus competencies; Technology integration; Transformation

黄河文化融入“西方经济学”课程的价值意蕴及路径研究

彭云龙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商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黄河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根基,其时代价值与经济学教育的融合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以“西方经济学”课程为载体,探讨两者融合的价值与实施路径,有助于推动文化传承与专业教育的协同创新。在价值层面,挖掘黄河文化的精髓可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实现传统智慧与经济理论的有机融合,激发学生在多元文化视角下的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在实践路径上:一是创新课程内容,推动黄河文化与经济理论深度交融;二是革新教学方法,通过多元手段提升教学实效;三是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增强教师的文化转化能力。这些举措既能丰富经济学教学的文化视野,提升课程思政成效,又能培养兼具专业素养与文化自信的人才,为传统文化传承与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提供有力支撑。

关键词:黄河文化;西方经济学;课程融合;教学改革;人才培养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2.019

中图分类号:G122;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2-0115-05

黄河文化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各类历史机遇有机融合的产物,更是世代中华儿女不懈拼搏、共同创造的伟大硕果^{[1][2]}。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3]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要深入传承黄河文化基因,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4]。

在新时代背景下,将黄河文化融入高校课程教学,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具有重要意义。“西方经济学”是经管类专业的基础课程,旨在帮助学生理解经济学的整体框架和基本理论,同时借鉴西方国家在市场发展方面的有益经验^[5]。然而,当前该课程

在教学中往往侧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忽视了文化内涵的融入。将黄河文化融入“西方经济学”课程,不仅能够丰富教学内容、拓宽教学视野,还能为学生提供独特的文化视角,帮助其更好地理解经济学原理、提升综合素养。本文探讨黄河文化融入“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具体路径,以期为高校课程教学改革提供有益参考。

一、黄河文化融入“西方经济学”课程的价值意蕴

(一) 传承与弘扬黄河文化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根基,构成中华文化核心与主干,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与全球华人的文化归属。黄河文化具有包容、开放、创新、连续等鲜明特征^[6],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泉与精华。将黄河文化融入课程教学,对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7]。在教学过程

收稿日期:2026-01-20

基金项目: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黄河文化”育人专项系列项目教学改革项目“‘黄河文化’融入‘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全过程的途径探索”(ZGJG202429HJB);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重点学科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彭云龙(1988—),男,河南郑州人,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国民经济管理。

中,通过梳理黄河流域经济发展脉络,如古代农业文明孕育的早期经济形态、历代王朝在黄河流域的经济治理实践等内容,可使学生深刻认识黄河文化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

在成效评价环节,可在考试中设置与黄河文化相关的案例分析题目,例如要求学生运用经济增长理论,分析黄河流域某地区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下的经济增长潜力与可持续发展路径。此举既能检验学生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掌握程度,又能引导学生深入探究黄河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联,加深对黄河文化的理解与认同,从而推动学生主动了解、自觉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

(二)提升课程思政教育效果

为更有效地培养新时代所需的经济学专业人才,思政教育在经济学课程教学中至关重要^[8]。“西方经济学”课程虽侧重于经济理论传授,但融入黄河文化,可巧妙地将思政教育元素渗透其中。黄河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政教育资源,如“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团结协作”的治河精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等,这些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在讲解经济学外部性理论时,可引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案例,阐述人类经济活动对黄河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政策引导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平衡,进而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在效果评估方面,可通过学生讨论黄河文化相关议题时的课堂表现来获得。如讨论黄河文化对当地消费观念的影响时,学生能否积极发表观点、从不同角度分析问题以及在小组讨论中能否有效沟通等,可直观看到学生思政素养的提升。同时,从学生完成的与黄河文化结合的作业情况来看,也能发现学生在分析实际问题时,会将黄河文化中蕴含的思政理念融入其中。这充分说明,黄河文化的融入使思政教育与课程内容紧密结合,有效提升了思政教育效果。

(三)培养学生综合素养

“西方经济学”课程与黄河文化的融合,对提升学生综合素养具有重要作用。黄河文化的多元性与丰富性,能够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在探讨黄河流域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模式时,学生可从古人的智慧中汲取灵感,思考如何在现代经济环境中创新发展模式。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可通过调研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现状、参与相关课题研究等方式,将所学经济学理论应用于实践,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课程教学效果评估方面,通过对案例教学法、小组讨论法及实地考察法等教学方法的评估,可发现这些方法能有效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的经济学理论,激发学习兴趣,增强对黄河文化与经济关系的直观认识。对课程内容设计的评估则表明,黄河文化相关案例与特色模块的融入,使课程更加生动有趣,有效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此外,黄河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象征,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占据独特地位。将其融入课程教学,可帮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在全球文化中的价值,增强其文化自信和爱国情感。这种文化认同,将激励他们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积极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9]。

二、黄河文化融入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实践路径探索

(一)创新课程内容,使黄河文化与经济学理论深度交融

1.精选黄河文化典型案例

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结合具体知识点,引入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案例,能够使抽象的经济学理论变得更加生动形象,易于学生理解。在讲解供给与需求理论时,可以黄河流域的特色农产品“宁夏枸杞”为例。

宁夏地处黄河上游,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使其成为优质枸杞种植区。《宁夏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宁夏平原的引黄灌溉已有两千多年历史,黄河水为枸杞种植提供了充足的水源。随着健康养生意识的提升,市场对枸杞的需求不断增加。根据《宁夏九大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宁夏致力于建立完善的现代枸杞产业体系,以满足市场需求。这些措施推动产业发展,在2015年至2024年间枸杞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呈现明显增长态势。但随着产量增加,市场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导致价格波动。例如,《2023年中国宁夏枸杞发展趋势简析:价格逐年走低》一文提到,由于供应量增加,宁夏枸杞价格呈现下降趋势^[10]。这种情况正反映了基本经济原理:当市场上某种商品的供给超过需求时,该商品价格往往会下跌;反之,若需求超过当前供给能力,则可能导致价格上涨。

此外,古代黄河流域的水利工程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典型案例。郑国渠始建于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元年),由韩国水工郑国主持修建,初衷是实施“疲秦之计”,意在消耗秦国资源。然而,这一工程最终成为秦国富强的关键因素之一。郑国渠的成功修建,极大改善了关中地区的灌溉条件,将不

适宜耕种的土地改造为肥沃农田,增加了粮食产量、稳定了农业生产,降低了干旱带来的歉收风险^[11]。从经济学角度分析,郑国渠作为农业基础设施投入,解决了水资源短缺问题,提高了土地产出效率。通过引入泾河水进行灌溉,不仅改良了土壤结构,还推动了作物多样化种植,尤其是实现了小麦的大面积种植。这充分表明,有效的生产要素投入(如水利设施)能够显著提高农作物产量,体现了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2. 开发特色专题教学模块

设置专门的黄河文化与经济发展课程模块,系统介绍黄河文化中的经济元素、发展模式以及对当代经济的影响与作用。在该模块中,可深入探讨黄河流域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形态,如原始社会时期黄河流域的渔猎经济、采集经济,以及随着生产力发展逐渐演变而来的农耕经济等。通过对这些经济形态的分析,让学生了解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不同经济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与演变规律。同时,还可介绍黄河流域独特的商业文化,如晋商、豫商等商业群体的经营理念、商业模式和商业网络。以晋商、鲁商、豫商、陕商为代表的商帮,经营领域从商业向金融延伸,实行多元化经营,敢为人先,纵横全国,甚至走向境外,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均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12]。通过分析这些商业文化对当代企业经营和商业发展的启示,引导学生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与智慧。

该模块还可探讨黄河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黄河流域横跨多个省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受黄河文化影响各具特色。通过对黄河流域各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分析,如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中原经济区等,研究黄河文化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机制,以及如何利用黄河文化资源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13]。同时,可结合当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探讨新时代背景下黄河流域经济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路径,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的发展观与生态观。

(二)革新教学方法,以多元手段提升教学实效

1. 运用案例教学,深化理论理解

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运用案例教学法,通过引入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的具体案例,引导学生运用所学西方经济学理论对案例进行分析,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讲解市场失灵理论时,可引入黄河流域的环境污染问题案例。在黄河流域,部分工业企业存在污染环境的行为,例如河南省封丘县龙润公司,自

2018年1月至2019年5月期间,非法处理危险废物并将其倾倒至黄河主河道,累计达2800余吨,最终该公司因违法行为受到法律制裁。这一行为不仅直接污染了黄河水质,还影响了沿岸农业灌溉和当地动植物生存环境^[14],是典型的负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的案例。教师可进一步引导学生分析,此类企业行为为何会导致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应采取哪些措施解决这一问题。学生可运用外部性理论、公共物品理论等经济学知识,提出政府可通过征收排污税、制定严格环保法规、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等手段,将企业外部成本内部化,进而纠正市场失灵,实现资源有效配置。

再如,在介绍宏观经济政策时,以黄河流域的山东省滨州市为例,该市通过实施一系列扩张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推动区域经济增长。2024年,滨州市积极落实扩张性政策:财政层面,春秋两季推动488个项目开工建设,总投资达2057亿元,超683个重点项目年度投资计划的27.5%;争取“两重”项目资金12.09亿元,发行债券140.25亿元,为企业办理退税31.51亿元、减免契税6.35亿元;货币层面,发放再贴现90.04亿元,惠及各类企业与新市民^[15]。引导学生分析这些政策措施如何影响该市的总需求、总供给、就业及物价水平,以及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问题与挑战。通过该案例分析,学生能更深入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机制与实施效果,提升运用宏观经济理论分析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

2. 开展小组讨论,激发创新思维

组织学生分组讨论黄河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可有效培养其合作探究能力与创新思维。教师可提出启发性讨论话题,例如“黄河文化中的哪些元素对当代企业创新发展具有促进作用”“黄河文化对黄河流域居民的消费观念和行为有哪些影响”等,鼓励学生在小组讨论中积极发表观点,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结合所学知识与实践经验,提出创新见解与解决方案。

在讨论“如何利用黄河文化资源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文化产业”时,学生可从多个角度展开探索。部分小组可能提议开发以黄河文化为主题的旅游线路,将历史遗址、自然风光和民俗风情有机结合,吸引游客沉浸式体验;另一些小组可能建议设计黄河文化特色文创产品,例如基于传统手工艺的实用艺术品;还有小组可设想拍摄黄河文化背景的纪录片或微电影,通过影视媒介传播黄河文化,提升其影响力。

讨论过程中,学生可运用经济学中的产业发展理论、市场营销理论等,对提出的方案进行可行性分析与经济效益评估。每个小组推选代表分享讨论成果,接受其他小组的提问与评价,形成良好的课堂互动氛围。这不仅拓宽了学生的思维视野,还培养了其团队合作精神与沟通表达能力,为深入理解黄河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联奠定基础。

3. 组织实地考察,增强直观认知

组织学生前往黄河流域相关地区开展实地考察,让学生亲身感受黄河文化的魅力与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增强对黄河文化与经济关系的直观认知。教师可带领学生参观黄河流域的历史文化遗址,如西安兵马俑、洛阳龙门石窟等,让学生了解黄河流域悠久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感受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参观黄河流域的现代企业,如郑州宇通客车厂、济南钢铁企业等,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技术创新成果及市场竞争中的发展策略;还可组织学生考察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如黄河湿地保护区、黄河水利工程等,理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

实地考察过程中,教师可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经济学知识进行观察与思考。参观企业时,让学生分析企业的生产要素投入、成本结构、市场需求等情况,探讨企业发展模式是否符合经济学原理;考察生态环境时,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在经济发展中实现生态保护,如何运用经济学手段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学生可通过与企业管理人员、当地居民、相关专家交流,获取第一手资料,深入了解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与存在的问题,并尝试提出解决方案与建议。实地考察结束后,要求学生撰写考察报告,总结考察收获与体会,进一步深化对黄河文化与经济的认识。

(三) 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增强教师文化转化能力

1. 系统学习黄河文化知识

教师作为教学主导,其文化素养直接关乎教学成效。为将黄河文化深度融入“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师需着力提升自身黄河文化底蕴。

一方面,通过阅读《黄河文化史》《黄河文明的历史变迁》等学术著作、研究论文及历史文献,系统掌握黄河文化的内涵、发展脉络与核心特征;另一方面,积极参与黄河文化相关学术研讨会、专题讲座及专项培训,与相关领域专家深入交流,紧跟黄河文化研究前沿。此外,可利用假期赴黄河流域开展实地调研,亲身感受黄河文化的独特魅力,收集第一手教

学素材,为课程融入奠定坚实基础。

2. 定期开展教学研讨活动

学校或学院应定期举办教学研讨会,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与一线授课教师,共同探讨黄河文化与“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深度融合路径。教师在研讨会上分享课程融入的成功经验,如黄河文化案例的选取技巧、教学环节的设计方法及引导学生深度思考的策略;共同剖析融合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如文化元素与经济理论的衔接难点、避免内容生硬拼凑等问题,并协同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同时,常态化开展集体备课活动。教师依据“西方经济学”课程大纲与教学目标,明确课程中可融入黄河文化的章节与具体知识点,精心设计融入方式与教学环节;共同编写黄河文化相关教学案例、制作配套课件、设计课堂互动活动,整合优质教学资源,形成教学合力。通过常态化教学研讨与集体备课,促进教师相互学习、彼此启发,推动黄河文化与课程深度融合,切实提升教学质量。

三、结语

黄河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根基,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智慧、治河精神和奋斗基因,其时代价值与经济学教育的融合具有深远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从价值维度看,黄河文化的融入不仅丰富了“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内容,更实现了文化传承、思政教育与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有机统一。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如宁夏枸杞产业的供需波动、郑国渠的经济效益等,让学生能够从经济学视角理解黄河文化中的实践智慧。而黄河流域生态治理、区域经济发展等议题的引入,则进一步强化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认同感。

在实践路径上,本研究提出课程内容设计、教学方法创新和教师素养提升三大核心策略。通过开发黄河文化特色教学模块、运用案例教学与实地考察等多元方法,使抽象的经济学理论具象化、生活化;教师加强黄河文化系统学习,通过研讨交流不断优化教学设计,确保文化元素与专业知识自然衔接、深度融合。这些举措不仅有效提升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也培养了其创新思维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

展望未来,黄河文化与经济学课程的融合仍有广阔的深化空间。高校可进一步加强跨学科研究,整合经济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资源,开发数字化教学资源。还要建立文化传承与课程改革的长效机制,持续优化融合路径与教学模式,让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在教育实践中持续焕发新生,为培养兼

具专业素养与文化底蕴的新时代经济学人才提供更坚实的支撑。

参考文献:

[1]李麦产.黄河文化的蠡测维度:黄河文化本体论及相关问题[J].陕西开放大学学报,2023,25(3):47-55.

[2]徐光春.谈谈黄河文化与炎黄文化[N].河南日报,2020-08-18(6).

[3]习近平.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19(20).

[4]中共中央国务院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J].中国水利,2021(21):3-16.

[5]吴晓艳,韩瑞欣.西方经济学中思政元素的挖掘与实践路径[J].现代商贸工业,2024,45(14):205-207.

[6]张敬燕.郑州讲好黄河文化故事问题研究[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22(4):88-92.

[7]刘亚辉.坚定文化自信,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黄河”成驻豫全国政协委员围绕重大国家战略建言献策高频词[J].协商论坛,2020(6):22-23.

[8]张广来,朱晶晶.高校经济学课程思政教学研究[J].西部素质教育,2024,10(21):47-51.

[9]田燕梅.基于 ADDIE 模型的黄河文化融入国际经济学课

程路径研究[J].对外经贸,2024(11):120-123.

[10]乔志.2023 年中国宁夏枸杞发展趋势简析:价格逐年走低,品牌化和品质化是关键动力[EB/OL].(2025-02-03)[2024-01-06].<https://www.chyxx.com/industry/1169905.html>.

[11]王双怀.“疲秦之计”成就统一大业,这位间谍失算了[EB/OL].(2025-02-04)[2023-09-13].<https://www.neac.gov.cn/seac/c103391/202309/1167718.shtml>.

[12]胡俊.“中国黄河商文化”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EB/OL].(2025-02-04)[2022-12-09].http://zw.china.com.cn/2022-12/09/content_85004163.html.

[13]于善甫.打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的路径研究[J].当代经济,2022,39(4):43-49.

[14]第十批涉黄河流域典型案例[EB/OL].(2025-02-05)[2022-09-01].<https://www.hncourt.gov.cn/public/detail.php?id=192072>.

[15]滨州:让 79 项政策真正惠企惠民[EB/OL].(2025-02-06)[2024-02-05].http://www.shandong.gov.cn/art/2024/2/5/art_116200_627790.html.

(责任编辑 许峻)

Research on the Value Implications and Paths of Integrating Yellow River Culture into the "Western Economics" Course

PENG Yunlong

(School of Business,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The Yellow River Culture, as a vital found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hold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when integrated with economics education. Utilizing the "Western Economics" course as a vehicle, exploring the value and implementation paths of this integration helps promote synergistic innovation i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t the value level, unearthing the essence of the Yellow River Culture can strengthen students' cultural identity, achieve an organic fusion of traditional wisdom and economic theories, and stimulate students'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practical abilities from a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 For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firstly, curriculum content innovation will foster a deep integration of Yellow River Culture with economic theories; secondly, pedagogical reform will employ diverse methods to enhanc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nd thirdly, strengthening the faculty will improve teachers' capacity for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These measures will not only enrich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economics education and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ut also cultivate talent possessing both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providing robust support for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Keywords:Yellow River Culture; Western Economics; Curriculum integration; Teaching reform; Talent cultivation

浅部缩径对 2x2 群桩竖向承载特性影响的 透明土模型试验研究

杨庆年¹, 郭兆翔²

(1.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土木工程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2. 河南工业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桩基在施工和使用过程中易发生缩径现象, 导致其承载力降低。然而, 缩径对群桩承载力产生削弱作用的内在机理尚不明确。本研究通过开展含缩径缺陷群桩的透明土模型试验, 系统分析了缩径尺寸(径向尺寸和轴向尺寸)对群桩承载力的影响, 揭示了缩径群桩的桩-土相互作用机制, 阐明了缩径削弱群桩承载力的内在原因。试验结果表明: 径向尺寸对承载力的影响远大于轴向尺寸; 当径向尺寸减小至桩径的 30% 时, 承载力损失高达 43.9%, 且损失率随径向尺寸的减小呈指数上升。缩径的存在会使桩周土体形成斜向下的集中剪切带, 扩大土体扰动范围, 造成桩侧摩阻力损失, 最终导致群桩承载力降低。

关键词:缩径; 群桩承载力; 桩-土相互作用; 透明土试验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2.020

中图分类号:TV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2-0120-04

0 引言

在各类重大工程建设中, 常采用密集布设的群桩基础以承受上部结构传递的竖向荷载。然而, 在施工过程中, 尤其是在饱和软土、粉土等敏感地层中, 易产生显著的挤土效应与超孔隙水压力, 进而导致桩身出现缩径^[1]。缩径是显著影响桩基承载特性的主要缺陷之一, 会给工程带来安全隐患并造成经济损失^[2]。在我国, 缺陷桩的发生概率约为 9.1%, 这在工程中是难以接受的^[3]。因此, 研究缩径群桩的承载特性十分必要, 而群桩的桩-土相互作用是评估其承载特性的关键。

国内外学者已对缩径桩的承载特性开展了相关研究。Petek^[2]等研究发现, 对于缩径桩, 缩径位置距桩顶越近, 承载力损失越大, 与完整桩相比最大损失可达 33%。Albuquerque^[4]等研究发现, 缩径桩的破坏时间早于预期, 其承载力较完整桩降低近

50%, 且缺陷区域出现结构破坏。桩-土体系在竖向荷载下的破坏是一个从桩顶向桩端逐渐发展的过程, 需考虑桩周土体的位移变化^[5]。然而, 传统岩土工程测试方法仅能获得离散点的位移数据, 难以获取完整的位移场^[6]。由于透明土具有与天然土体相似的物理力学特性, 透明土技术已在土木工程领域得到广泛应用^[7, 8]。Hird^[9]团队采用透明黏性土开展试验, 研究了钻孔过程中桩周土体的位移变化, 模型试验观测到的位移规律与现场观测结果总体趋势一致。Kong^[10]等采用透明砂研究桩基沉降对倾斜上拔荷载作用下土体变形的影响, 结果表明透明砂适用于研究倾斜上拔荷载下桩-土相互作用引发的土体变形。徐志军^[11]等通过透明土模型试验, 揭示了带承台缩径单桩的桩-土相互作用规律。综上, 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单桩, 因此亟须开展缩径群桩的桩-土相互作用研究。

收稿日期:2025-09-20

基金项目:2025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水位波动下倒锥形仓底地下粮仓-土相互作用机理及仓体稳定性分析方法(52578399)”

作者简介:杨庆年(1977—), 男, 博士,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土木工程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岩土工程数值分析。

鉴于此,本研究旨在通过透明土模型试验,分析缩径群桩的承载特性与桩周土体变形规律,系统研究缩径群桩的桩-土相互作用,揭示缩径削弱群桩竖向承载力的内在机理。

1 透明土模型试验

1.1 试验系统

透明土模型试验系统由透明土模型箱、面激光装置、图像采集系统和位移千分表组成。透明土模型箱由 6 mm 厚的钢化玻璃制成,其尺寸为 320 mm (长) × 180 mm (宽) × 350 mm (高)。图像采集系统由 400 万像素的工业相机和采集软件组成。位移千分表的量程为 20 mm,误差为 0.001 mm。

1.2 模型桩设计和土体物理参数

本文以 2×2 群桩基础为研究对象,考虑到该型式基础呈对称布置,可简化为 1×2 群桩基础,见图 1。模型桩的桩径 D 为 20 mm,桩长 L 为 200 mm,缩径尺寸见表 1。承台的尺寸为 100 mm (长) × 40 mm (宽) × 15 mm (高)。研究表明^[7-8],缩径位置越靠近地表,其对桩基承载特性的削弱作用越严重。为此,本文选取缩径最不利位置,即缩径底部距桩端的距离为 160 m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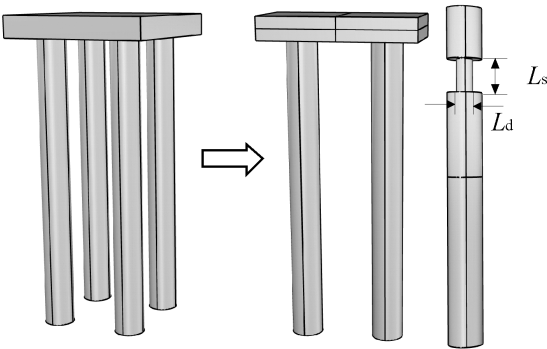


图 1 群桩及缩径示意图 (L_s 为缩径的轴向长度;
 L_d 为缩径的径向尺寸)

表 1 缩径的尺寸

桩编号	L_s/mm	L_d/mm
完整桩	0	20
1	20	16
2	20	8
3	20	4
4	10	16
5	10	8
6	10	4
7	5	16
8	5	8
9	5	4

透明土由熔融石英砂和折射率与熔融石英砂相同的混合孔隙液制成。熔融石英砂的纯度为 99.5%,折射率为 1.4583 (温度为 20℃),粒径为

0.5~1 mm;孔隙液由正十二烷和 90# 白油混合制成,其体积比为 1 : 9^[7, 8, 11]。透明土的配制步骤为:首先,将配制好的孔隙液倒入模型箱中;随后,将熔融石英砂以落雨法倒入孔隙液中,直至熔融石英砂的高度达到指定高度;接着,将模型桩放入熔融石英砂中,并采用固定支架固定模型桩,保证其垂直度;最后,将模型箱放入真空箱内抽真空,之后静置 24 h,获得试验所需的模型。通过直剪试验测得,模型桩与透明土之间的界面摩擦角为 26°,静置 24 h 后透明土的内摩擦角为 33°。

1.3 加载方案

根据规范 JGJ106—2014《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2014)^[12],采用分级加载方式,每级荷载为 20 N (约极限承载力的 10%),共 10 级。试验过程中,每级荷载保持 30 min 或基础顶沉降稳定后,再施加下一级荷载并使用图像采集系统采集散斑图像,直至基础顶出现明显的沉降或达到 10 级荷载。试验全程处于暗室,室内温度保持 20℃。

2 缩径对群桩的桩-土相互作用影响机制

2.1 极限承载力

由图 2 可知,完整群桩的极限承载力为 227.5 N。1、2 和 3 号群桩的极限承载力分别为 207.5 N、167.5 N 和 127.5 N。相较于完整群桩,1、2 和 3 号群桩的极限承载力分别损失 8.79%、26.3% 和 43.9%。由图 3 可知,4、5 和 6 号群桩的极限承载力分别为 247.5 N、207.5 N 和 187.5 N。相较于完整群桩,4、5 和 6 号群桩的极限承载力分别变化 -8.79%、损失 8.79% 和损失 17.6% (注:负号表示承载力高于完整群桩,非损失)。由图 4 可知,7、8 和 9 号群桩的极限承载力分别为 227.5 N、247.5 N 和 207.5 N。相较于完整群桩,7、8 和 9 号群桩的极限承载力分别变化 0、变化 8.79% 和变化 -8.79% (注:负号表示承载力高于完整群桩,非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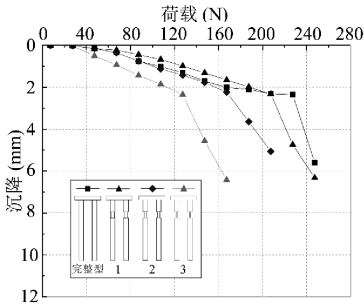


图 2 1-3 号群桩桩顶荷载沉降曲线

由以上试验结果可知,随着缩径径向尺寸的减小,极限承载力的损失率呈指数上升;随着缩径径向尺寸的增大,极限承载力的损失率呈线性下降。究

其原因,缩径径向尺寸减小时,缩径处的桩身刚度以及桩身与土体的接触面积呈指数下降;相反地,缩径轴向尺寸增大时,对桩体刚度以及桩身与土体接触

面积的损失仅呈线性变化。因此,缩径径向尺寸对群桩承载力的削弱作用大于缩径轴向尺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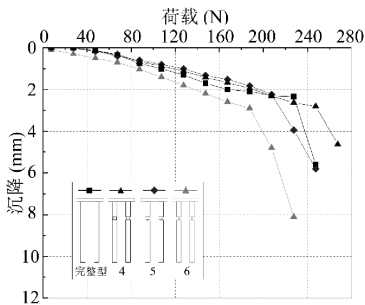


图 3 4-6 号群桩桩顶荷载沉降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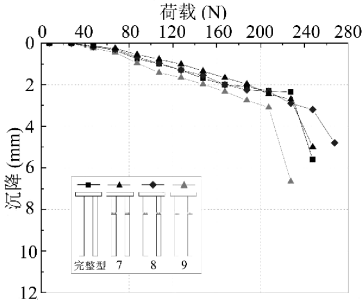


图 4 7-9 号群桩桩顶荷载沉降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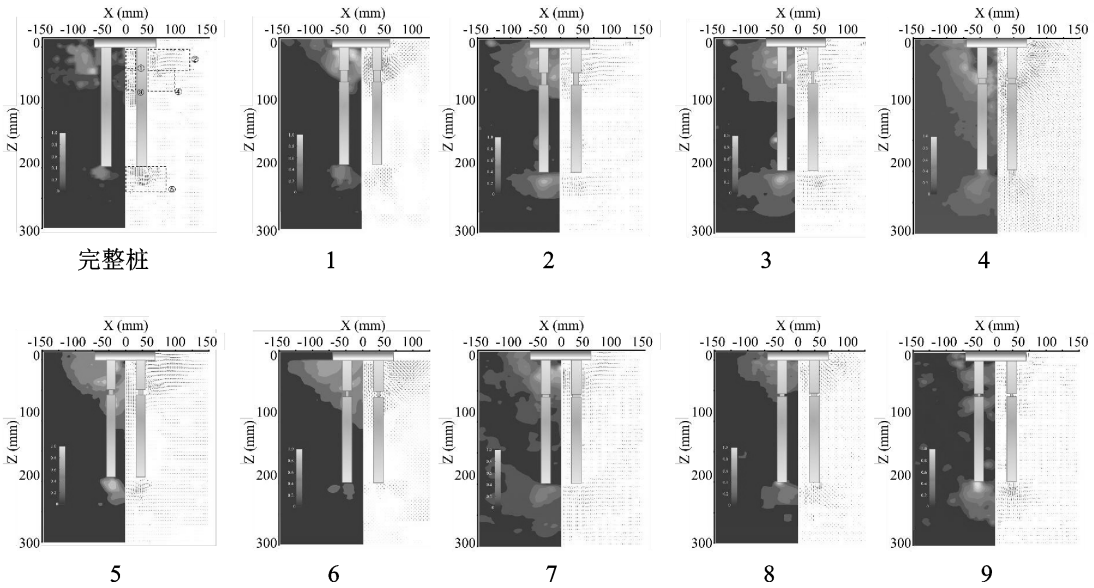


图 5 桩周土体变形图

2.2 桩周土体变形

由图 5 可知,在完整群桩与 1 号缩径群桩中,土体变形主要发生在承台下 2.5 倍桩径范围内的桩间土(区域 1)及桩端土(区域 5),表现为整体下移;而桩周其他区域的土体变形则相对较小。承台下 2.5 倍桩径范围内的桩外侧土(区域 2)具有水平移动趋势,并在桩外侧 1.5 倍桩径处出现向下位移。1 号群桩在缩径顶部因形成“刚性核”而产生水平应力,导致周边土体呈斜向下位移。4、5、6 号缩径群桩的桩周土体变形范围大于完整群桩;随着缩径径向尺寸的减小,区域 3 与区域 4 的变形范围逐渐增大,引发斜向下集中位移,进而造成桩侧摩阻力损失,该现象与 $Ld = 20\text{ mm}$ 时的情况类似,其 X 方向位移范围依次为 100 mm、120 mm、140 mm。7、8、9 号缩径群桩在 $Ld = 5\text{ mm}$ 时,土体位移形态与完整群桩高度相似,缩径对桩内外侧土体的水平与竖向位移影响均较小,土体应力呈弧形外扩,未显著扩大变形范

围,且其极限承载力接近完整群桩。

3 结论

本研究通过透明土模型试验,系统研究了缩径群桩的桩-土相互作用,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缩径对群桩的承载特性具有显著削弱效应,且径向尺寸的影响远大于轴向尺寸。试验结果表明,随着缩径径向尺寸的减小,群桩极限承载力的损失率呈指数型上升;当径向尺寸减小至桩径的 30%时,承载力损失高达 43.9%。相比之下,轴向尺寸的增大仅导致承载力呈线性下降。径向尺寸的减小是导致桩身刚度退化及桩-土接触面积减少的首要因素,其影响具有非线性放大效应,而轴向长度的变化影响相对较弱。

(2)对于径向缩径严重的桩基,缩径会使桩周土体产生斜向下的集中剪切位移带,这不仅扩大了土体的扰动范围,而且导致桩侧摩阻力严重损失。而对于轻微缩径的情况,土体位移模式与完整桩相

似,应力呈弧形平缓外扩,未显著扩大塑性区,因而对其极限承载力影响较小。

参考文献:

[1]POULOS H G. Pile behavior—consequences of geological and construction imperfections[J].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and geo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05, 131(5): 538–563.

[2]PETEK K, FELICE C W, HOLTZ R D. Capacity analysis of drilled shafts with defects[M]//Deep Foundations 2002,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Theory,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Performance. 2002: 1120–1135.

[3]李振亚. 带承台(梁)桩缺陷检测若干关键问题研究[D]. 杭州:浙江大学, 2017.

[4]ALBUQUERQUE P J R, GARCIA J R, FREITAS NETO O, et al. Behavioral evaluation of small-diameter defective and intact bored piles subjected to axial compression[J]. 2017, 40(2): 109–121.

[5]LIU S W, ZHANG Q Q, CUI C Y, et al. A simplified approach for the response of pile groups composed of dissimilar piles[J]. Structures, 2021, 34: 4548–4559.

[6]YUAN B X, SUN M, WANG Y X, et al. Full 3D Displacement measuring system for 3D displacement field of soil a-

round a laterally loaded pile in transparent soil[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mechanics, 2019, 19(5): 04019028.

[7]徐志军,王云泰,杜建平,等. 缩径基桩竖向承载性能的透明土试验研究[J]. 湖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2, 49(7): 214–221.

[8]徐志军,王政权,王云泰,等. 基于支持向量机的缩径桩承载力可靠度分析[J]. 地球科学, 2023, 48(5): 1948–1959.

[9]HIRD C C, NI Q, GUYMER I. Physical modelling of deformations around piling augers in clay[J]. Geotechnique, 2011, 61(11): 993–999.

[10]KONG G Q, CAO Z H, ZHOU H, et al. Analysis of piles under oblique pullout load using transparent-soil models[J]. Geotechnical Testing Journal, 2015, 38(5): 725–738.

[11]徐志军,田江涛,王云泰. 基于透明土试验的带承台缩径基桩承载力的可靠度研究[J].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24, 43(S1): 3151–3160.

[12]JGJ 106–2014. 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S].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4.

(责任编辑 李玉玲)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Shallow Necking on Vertical Bearing Characteristics of 2×2 Pile Groups Based on Transparent Soil Model

YANG Qingnian¹, GUO Zhaoxiang²

(1.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2.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He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Abstract: Pile foundations are prone to necking during construction and service, leading to a reduction in their bearing capacity. However, the intrinsic mechanism of how necking weakens the bearing capacity of pile groups remains unclear. To address this, transparent soil model tests on necking pile groups were conducted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necking dimensions (radial and axial sizes) on the bearing capacity of pile groups, and to reveal the pile-soil interaction mechanism in necking pile groups, as well as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the reduced bearing capacity. The test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radial size has a far greater influence on the bearing capacity than the axial size. When the radial size decreases to 30% of the pile diameter, the bearing capacity loss reaches as high as 43.9%, and the loss rate increases exponentially with the reduction in radial size. The presence of necking induces inclined downward concentrated shear bands in the surrounding soil, expands the disturbed zone, and causes a loss in side friction, thereby weakening the bearing capacity of the pile group.

Keywords: Necking; Pile group bearing capacity; Pile-soil interaction; Transparent soil test

面向竞赛教学的通用型机器人设计

周振,肖丽,孙冬,于泽琦,张晓冬
(郑州轻工业大学创新创业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针对竞赛教学中机器人种类繁多、学生入门困难的问题,本文设计了一款模块化轮式机器人。通过提升机器人零配件与电路模块的通用性,满足学生学习及参与机器人学科竞赛的需求。以搬运机器人为例,依据竞赛项目要求,分别完成了机械结构设计、硬件电路设计、实物制作与功能测试。实验结果验证了该机器人的可行性和稳定性,其具有结构简单、成本低、通过性强等特点。

关键词:机器人;竞赛教学;通用型;模块化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6.02.021

中图分类号:TP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6)02-0124-05

0 引言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自动化与智能化技术在工业生产中占据愈发重要的地位。机器人作为工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自动化水平的提升对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人力成本具有重要意义。机器人技术融合机械工程、控制工程、电子工程、计算机工程及人工智能等多学科知识,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交叉学科。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在高校教育改革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当前适用于竞赛与教学的机器人平台种类较多,主要可分为竞赛专用平台、教学演示平台和行业专用平台等。为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实践操作能力,设计一款通用化、模块化的教学机器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面向竞赛教学的通用型机器人,旨在兼顾竞赛实战需求与实践教学灵活性,通过模块化设计实现多种功能的灵活组合。该类平台不仅能在各类竞赛中体现出优异的自动化水平与智能化程度,还可作为教学载体,帮助学生系统理解机械结构、自动控制、传感器技术等多学科领域知识^[1]。

本文旨在研究一种面向竞赛教学的通用型模块化搬运机器人设计方案,主要包括需求分析、系统总

体设计、机械结构设计、硬件电路设计、软件系统设计以及实验测试等内容。通过较为系统的分析与设计,期望可为机器人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教学提供一定参考与借鉴^[2]。

1 竞赛教学机器人特点分析

适用于竞赛的机器人种类较多,本文以搬运机器人为例,结合中国大学生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大赛、大学生机器人与人工智能大赛、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等赛事要求,明确通用型机器人的设计需求。

1.1 机器人路径规划方案多样性

搬运机器人由信息采集、数据处理、执行机构等几部分构成。结合各大赛事的具体要求,分析得出机器人须具备路径规划功能:在有中心引导线的场景下,可采用循迹运行模式;在无中心引导线的场景下,可采用摄像头、超声波传感器等感知设备结合惯性导航的方案进行路径规划,能够根据机器人的不同使用场景,选用不同种类的传感器。

1.2 机器人硬件设计冗余性

根据不同的赛事要求,机器人应能够方便更换不同的机械臂、不同型号的电机和车轮,以满足各大赛事中不同使用场景的需求。为实现这一目标,在

收稿日期:2025-10-18

基金项目:2025年度河南省高等教育研究项目“文化引领、赛创融合、多元协同:地方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2025SXHLX172);2022年度河南省首批“专创融合”特色示范课程“工程机器人创新实践系列课程”(2022078);2025年度河南省科技攻关项目“退役锂电池快速分选与一致性筛查研究”(252102320167)。

作者简介:周振(1993—),男,河南郑州人,硕士,郑州轻工业大学创新创业学院实验师,研究方向为电子技术、机器人技术。

更换执行机构时无需重新设计电路,因此,机器人硬件设计需保证一定的冗余性和兼容性。

1.3 机器人软件控制功能模块化

软件系统设计需遵循强内聚、低耦合的原则。当根据不同赛题要求更换执行机构时,能够快速对模块化代码进行增删和调试,从而满足硬件电路的变化需求。

2 机器人系统方案设计

机器人系统由机械结构系统、信息采集系统和控制系统组成。机械结构部分由车身、机械臂、机械手爪、物料盘、水泵等不同模块构成,是机器人的执行机构^[3]。信息采集部分用于获取周围环境及竞赛赛道信息,常用的模块有循迹模块、摄像头、超声

波模块等。

2.1 机械结构设计

2.1.1 移动机构设计

搬运机器人常见的移动机构有轮式和履带式两种。为使机器人具备足够的负载能力,电机选用直流减速电机;电机输出轴采用标准 5 mm D 型接口,可根据需求安装普通车轮、福来轮或麦克纳姆轮。使用普通车轮时,机器人速度更快、控制更精准,可完成前进、后退、转向、原地转向等基础动作;换装福来轮或麦克纳姆轮后,可实现横向平移、任意方向移动,配合加速度传感器可完成更精准的位置校正、狭小空间移动等普通车轮无法实现的动作,两种移动机构的车身结构设计如图 1 所示^[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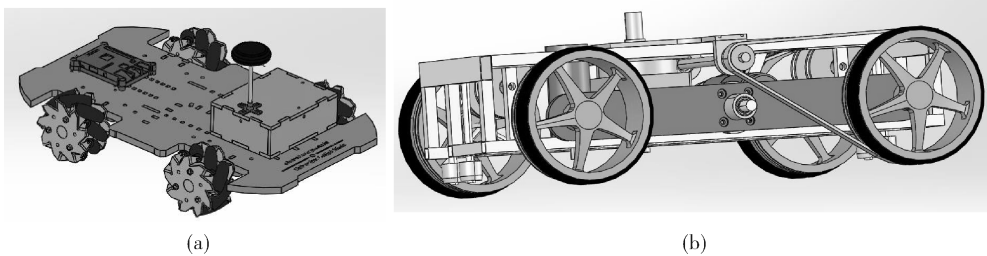


图 1 车身结构图 (a) 麦克纳姆轮底盘;(b) 普通车轮底盘

2.1.2 机械臂设计

机械臂结构形式多样,如直角坐标型、圆柱坐标型、球坐标型和关节型等。直角坐标型机械臂具有结构简单、控制精度高的优点,但运动范围有限;圆柱坐标型机械臂运动范围较大,但控制精度相对较低;球坐标型机械臂具有较大工作空间,但控制算法较为复杂;关节型机械臂具有灵活性高、运动范围大等优点,但精确控制难度较大。在实际设计中,根据具体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机械臂结构形式,本设计选用了圆柱坐标型和关节型两种机械臂,根据竞赛需求进行选型,选用机械臂结构图如图 2 所示^[5]。

种,通过两个或多个夹爪开合来实现物品的抓取,其机构设计需要考虑夹爪的形状、尺寸、材料和夹紧力等因素。夹爪的形状和尺寸,应根据夹取对象的不同进行设计,以确保能够稳定地抓取物品。吸盘式抓取机构是通过吸盘产生的负压来吸附物品,其结构选型需要考虑吸盘数量、直径、材料和吸附力等因素,吸盘数量和直径应根据搬运对象的形状和尺寸进行选型,以确保能够稳定吸附物品,所选用抓取机构结构图如图 3 所示^[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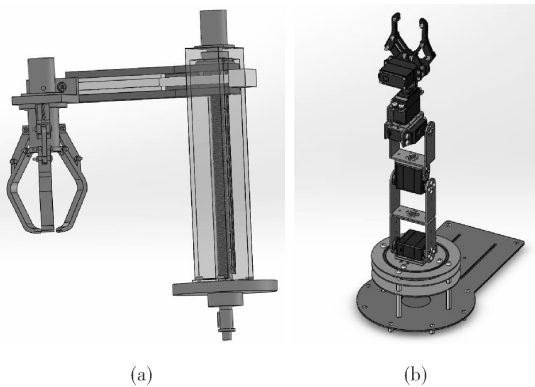


图 2 机械臂结构图 (a) 圆柱式机械臂;(b) 关节式机械臂

2.1.3 抓取机构设计

机械爪结构多种多样,常见的有夹爪式、吸盘式、电磁式等形式。夹爪式抓取机构是最常见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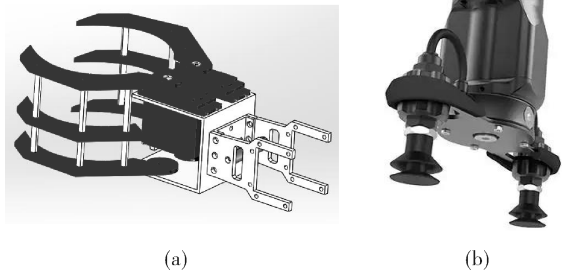


图 3 抓取机构结构图 (a) 夹取机械爪;(b) 吸盘式机械爪

2.2 硬件电路系统设计

硬件电路系统分为主控制板、电源模块、电机驱动电路、角度传感器、速度传感器、摄像头等,硬件电路系统结构如图 4 所示。

主控制器是搬运机器人的控制核心,负责接收传感器信号、数据处理、控制电机运动等功能,主控制器电路原理图如图 5 所示^[7]。主控制器选用

STM32F103RCT6,其采用 64-LQFP 封装,有 51 个 I/O 引脚,充足的引脚可方便控制各种外设。选用 TB6612 作为电机驱动芯片,主控与电机驱动芯片间使用 PC817 芯片进行隔离。采用 OpenMV 模块进行图像采集和处理,方便获取任务信息和赛道信息。采用 MPU6050 芯片采集车身姿态,辅助摄像头实现搬运机器人行走、转向等功能。使用霍尔式编码器进行测速,可获取任意一个电机转速、方向等信息。电源模块使用 3C 锂电池供电,采用 LM2596 稳压电路,分四路生成 12V、7.4V、5V、3.3V 电源,供电给电机、舵机、主控制器、传感器等电路使用。采用 OLED 显示屏进行人机交互,可实时查看机器人速度、

加速度、角度等信息,同时可将信息实时通过蓝牙串口传回上位机,在电脑上实时查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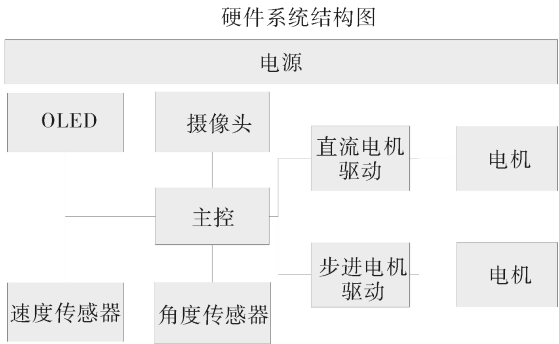


图 4 硬件电路系统结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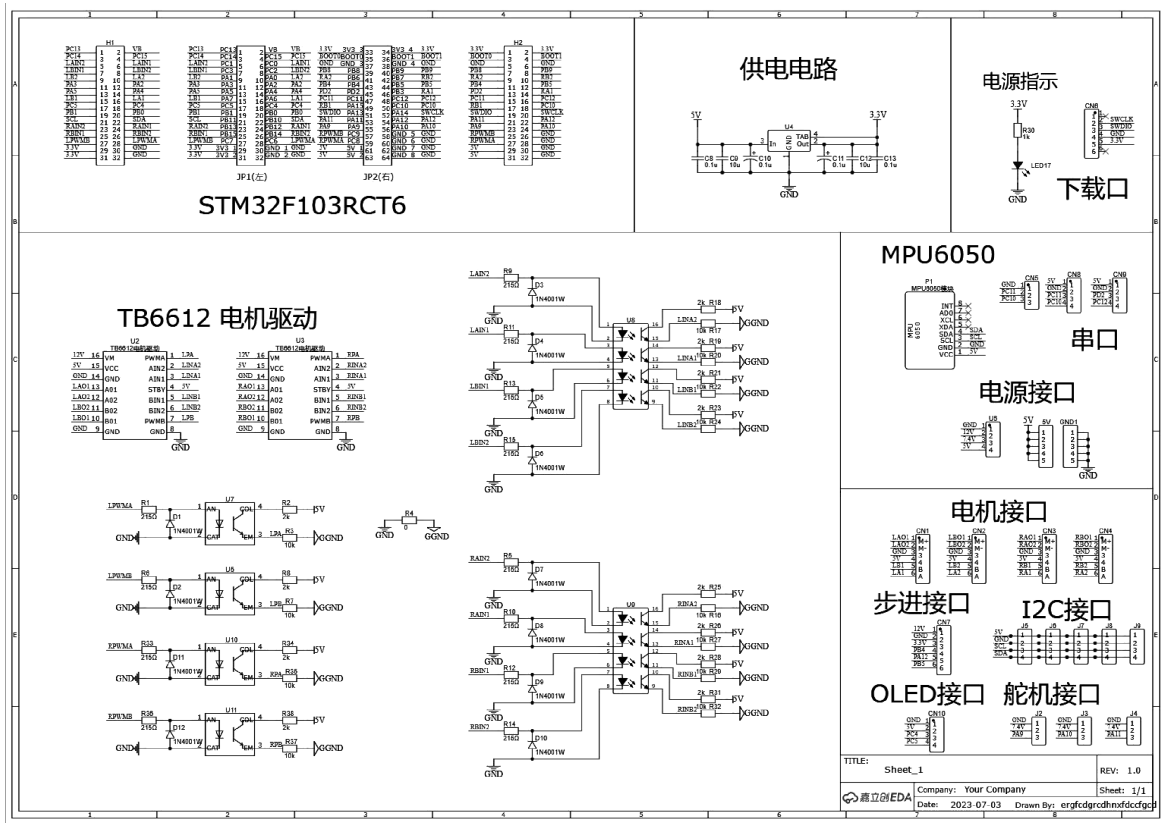


图 5 主控制器电路原理图

2.3 软件系统设计

软件系统主要由数据处理、运动控制、图像处理等模块构成。为保证机器人通用性,要求不同模块代码高内聚、低耦合,在使用不同组装方案时,可方便对代码模块进行随时修改。

2.3.1 传感器数据处理

机器人方向信息采集数据后需要对采集的原始数据进行滤波处理,降低数据的波动性,剔除异常值,滤波算法常采用卡尔曼滤波实现数据处理。卡尔曼滤波是一种递归估计算法,只要获知上一时刻状态估计值,及当前状态观测值,即可计算出当前状态估计值,详细算法计算流程如下所示。

(1)估计 k 时刻的状态为 $u(k)$, A 为状态转移矩阵,将上一时刻的状态演化到当前时刻的状态, B 为输入控制矩阵,将当前时刻的外部输入信号加入当前系统中:

$$X(k) = A * X(k - 1) + B * u(k) \quad (1)$$

(2)计算误差相关矩阵 P , 度量估计值的精确程度:

$$P(k) = A * P(k - 1) * A' + Q \quad (2)$$

Q 为系统噪声的协方差矩阵, A' 为转置矩阵;

(3)计算卡尔曼增益系数 K :

$$K = P(k) * C(k)' * (C(k) * P(k) * C(k)' + R) - 1 \quad (3)$$

$C(k)$ 为观测矩阵, R 为测量噪声协方差矩阵。

(4) 单输入输出系统中 R 为常数时, 上述方程可转化为;

$$K = P(k) * C(k)' / (C(k) * P(k) * C(k)' + R) \tag{4}$$

(5) 状态变量反馈的误差量残差 e :

$$e = Z(k) - C(k) * X(k) \tag{5}$$

其中 $Z(k)$ 为含有噪声的测量值;

(6) 更新误差相关矩阵 $P(k)$:

$$P(k) = P(k) - K * C(k) * P(k) \tag{6}$$

(7) 更新状态变量 $X(k)$:

$$X(k) = X(k) + K * e = X(k) + K * (Z(k) - C(k) * X(k)) \tag{7}$$

(8) 系统期望的输出为 $Y(k)$:

$$Y(k) = C(k) * X(k) \tag{8}$$

2.3.2 运动控制算法设计

运动控制算法是搬运机器人的核心算法, 使得机器人的控制更精准。机器人电机的速度控制采用 PID(比例-积分-微分)算法实现, 是电机控制领域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控制算法, 广泛应用于各种机器人控制和电机控制中。PID 算法通过计算目标值与实际值之间的误差, 利用误差与比例、积分与微分三个系数相乘得到的值, 来调整控制信号, 实现对被控对象的精确控制, 算法框图如图 6 所示^[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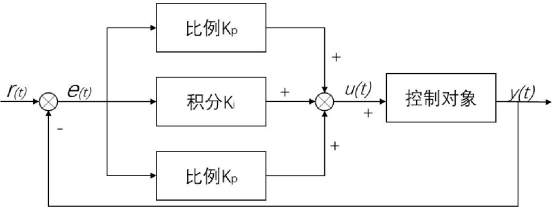


图6 算法框图

定义误差 $e(t)$ 为目标值 $r(t)$ 与实际输出 $y(t)$ 之间的误差, 比例项是误差 $e(t)$ 的直接函数, 其作用是立即对误差做出反应, 以减小误差。 K_p 是比例增益系数, 比例项的控制输出 $u_p(t)$, 积分项的控制输出为 $u_i(t)$; K_i 是积分增益, 微分项的控制输出为 $u_d(t)$, $u(t)$ 为 PID 控制器的总输出。

2.3.3 图像处理算法设计

图像识别是机器人系统的眼睛, 系统硬件采用 OpenMV 模块, 基于 OpenCV 函数库实现机器人导航, 任务获取, 机械臂抓取等任务。算法首先对图像进行预处理, 采用高斯滤波与 CLAHE(自适应直方图均衡化)算法抑制噪声并平衡光照影响。然后通过计算目标轮廓的最小外接矩形或定位预设的 ArUco(轻量级视觉基准标记)标记, 获取其在图像中的像素坐标。随后, 通过相机标定获取的内外参

数, 解算法解算出物料相对于机械臂末端的三维位置。该位姿数据通过通信接口实时传输给机器人控制器, 引导其完成精准抓取。在保证实时性的同时, 显著提升了机器人对复杂工件的识别率与抓取成功率。

3 机器人系统测试

为验证所设计搬运机器人的功能和实际运行效果, 制作实物, 编写控制程序, 完成机器人系统测试。

3.1 不同车轮机器人运动测试

换装不同形式车轮, 组装出不同的搬运机器人, 相关机器人实物图如图 7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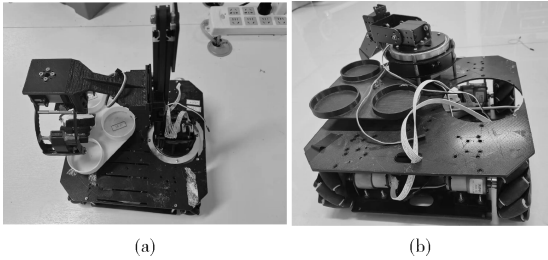


图7 机器人实物图(a)普通车轮;(b)麦克纳姆轮

分别完成不同车轮机器人功能测试, 测试结果如表 1 所示, 机器人能够完成前进、后退、左转、右转, 麦克纳姆轮完成平移和各个角度平移。分别使用普通车轮、麦克纳姆轮完成指定任务, 任务完成情况见表 1^[9]。

表1 不同车轮功能测试表

运动功能	普通车轮	麦克纳姆轮	福来轮
前进	√	√	√
后退	√	√	√
原地转向	√	√	√
平移	×	√	√
45度平移	×	√	×

注: ×表示未完成相应功能, √表示已完成相应功能。

3.2 机器人教学功能验证

经上述功能测试可知, 该搬运机器人主要功能模块有: 麦克纳姆轮运动控制、福来轮运动控制、云台控制、圆柱坐标型机械臂控制、四自由度关节型机械臂控制、OpenMV 模块图像处理、直流电机调速控制、角速度和加速度信号采集等, 基本涵盖了车型机器人设计中常见的机械结构和控制模块, 可根据教学进度和学生需求进行任意组合。因此, 该搬运机器人, 无论从机械结构选型, 还是硬件电路设计, 以及控制软件等方面, 均实现了模块化, 具有良好的通用性。

3.3 机器人竞赛功能测试

不同竞赛赛项对搬运机器人的要求有所区别, 以中国大学生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大赛“智慧物流搬运”赛项场地为例进行测试, 机器人安装不同机械臂, 并进行多次测试^[9-10], 测试步骤如下, 测试结

果如表 2 所示。

(1)将机器人放置在距离物料放置平台 30 cm 位置；

(2)启动机器人,机器人自行走到物料放置台旁边；

(3)调整车身到指定位置；

(4)使用机械臂抓起物块放置到搬运机器人上；

(5)为测试设备稳定性,重复运行测试 20 次。

表 2 机器人夹取放置物块数据统计

安装不同机械臂机器人	安装圆柱形机械臂机器人	成功率	安装多关节机械臂机器人	成功率
移动到平台				
边缘指定位置	19	95.00%	20	100.00%
成功识别物块	19	95.00%	19	95.00%
成功夹起指定物块	18	90.00%	15	75.00%
成功放置到搬运机器人	18	90.00%	15	75.00%

从表 2 中可看出,两种搬运机器人能够完成定点移动、调整姿态、抓取物块、放置物块等功能,加装圆柱形机械臂的机器人在抓取物块成功率方面,明显优于加装关节型机械臂的机器人^[11]。

3.4 其他机器人竞赛作品

面向竞赛的机器人有很多种,根据结构有轮式、双足、多足、软体等;根据功能有越障、爬墙、战斗、服务等;根据使用方式不同还有积木机器人等。此外,本机器人教师团队还带领学生,先后开发了战斗机器人、救援机器人、越障(多足)机器人、下棋机器人、轮腿机器人、循迹避障机器人、球童机器人等作品。

4 总结

本文设计的通用型搬运机器人,结合机器人竞赛的功能需求和特点,能够实现竞赛教学和基础科研的通用和互换,提高了机器人设备的通用性和实用性。实践证明,所设计的机器人能满足多个竞赛的

赛事需要,可广泛应用于电子工程、机械工程、控制工程、机器人工程等专业的实践教学和科研基础平台。

参考文献:

[1]陈东青,冯哲. 基于模块化的工业机器人实验室建设与管理[J]. 创新创业理论与实践,2024,7(18):167-169+198.

[2]马少华,马建民,刘振东,等. 智能物料搬运机器人教学实验平台设计与开发[J]. 实验技术与管理,2021,38(3):120-125.

[3]崔庆权,宁晶. 一种教学和竞赛通用型双足机器人的设计与研究[J]. 电子测量技术,2020,43(9):18-22.

[4]刘高腾,许胜楠,赵倩. 基于自主导航和深度学习的分拣服务机器人设计[J]. 自动化与仪表,2024,39(8):49-53.

[5]王永康,李福豪,姚震,等. 面向智能加工车间的搬运小车设计[J]. 机械,2024,51(7):67-73.

[6]付丽,梁华林,冯若愚,等. 基于机器视觉的垃圾自动分拣装置[J]. 实验技术与管理,2023,40(1):123-127+159.

[7]杜捍,胡聪,徐梓阳,等. 智能物流搬运小车设计[J]. 大众科技,2024,26(2):127-131.

[8]陈振伟. 平衡机器人运动位姿 PID 控制优化仿真研究[J].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4, 40(7):11-15.

[9]柴玮锋,郭森,白峭峰. 一种超市搬运机器人结构设计及底盘静力学分析[J]. 机械工程与自动化,2024(2):20-22.

[10]严续伟,戚家伟,王晨,等. 物料搬运机器人的设计及运行[J]. 科技与创新,2024(1):39-40+45.

[11]李斌,才磊,郭建飞. 基于疲劳测试的工业机器人重复定位精度测量与分析[J]. 工业仪表与自动化装置,2024(5):65-70.

(责任编辑 李玉玲)

Design of a Universal Robot for Competition Teaching

ZHOU Zhen, XIAO Li, SUN Dong, YU Zeqi, ZHANG Xiaodong

(School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 Zhengzhou, Henan 450002, China)

Abstract: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a wide variety of robots and difficulties for students to get started in competition teaching, this paper designs a modular wheeled robot. By improving the universality of robot parts and circuit modules, it meets the needs of students' learning and participation in robotics discipline competitions. Taking the handling robot as an example,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competition events, the mechanical structure design, hardware circuit design, prototype fabrication and function test are completed respectively.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verify the feasibil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robot,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imple structure, low cost and high trafficability.

Keywords:Robot; Competition teaching; Universal type; Modularization